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韩国崛起之谜

 **eBOOK**
网络资源 非纸质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三十八年，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瞬间。一位伟人曾挥毫写下脍炙人口的诗句：“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然而，就是在这短短的三十八年间，历史的镜头曾两度在这里定格，世界的目光曾两次在这里聚焦：

公元 1950 年 6 月 15 日，一声清脆的枪响打破了朝鲜半岛三八线地区上空的宁静，一场二战后最大规模的局部战争拉开了序幕。对峙的双方，一方是中朝百万大军，另一方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及韩国军队。战争空前惨烈。美军挟二战余威使用了除原子武器以外的所有现代化武器，半岛震颤，山河易色。三年之后，当战争的硝烟徐徐散去，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悲惨的图画：昔日美丽的城市被夷为平地，大地一片焦土，成群的流浪难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历史真实地记录下这样几个数字：1953 年，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足 60 美元，失业率高达 80% 以上，被列为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

三十八年后的 1988 年 9 月 17 日，汉城。人如潮，花如海。盛况空前的第 24 届奥运会在这里隆重开幕。汉城以她全新的姿容迎来了五大洲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名友好使者。汉城又一次受到全世界的瞩目。但见汉城街头，现代建筑鳞次栉比，摩登大厦高耸入云，豪华轿车奔驰穿梭，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好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历史也同样如实地记录下这样一组数字：1988 年，韩国人均收入 4042 美元，国民生产总值 1720 亿美元。韩国已悄悄叩响了富国俱乐部的大门。

于是乎，有人惊呼“汉江边的奇迹”。

于是乎，有人盛赞“第二个日本”的出现。

是呵，三十八年过去，三八线依旧，江山依旧，但景物已全非。之十八年间，一个新韩国已横空出世，巍然屹立于黄海之滨。人们在惊叹之余，无不怀着极大的兴趣探寻着韩国的崛起之谜。

有人断言，韩国崛起的历史，是一部艰苦创业的历史；

有人声称，韩国崛起的历史，是东方传统文化复兴的历史；

有人发现，韩国崛起的历史，是一部痛苦与希望交织的历史……

作为韩国的邻邦，我们对身边冉冉升起的这颗新星，或许有着更深的感触，肯定有着更多的思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诚哉斯言！因此，我们不再满足于欣赏这颗新星的耀眼与辉煌，而是把目光投向了这颗新星划破长空后留下的长长轨迹和她赖以升空的巨大基座。

韩国崛起之谜

第一章 “半岛现象”的基座

一、东方的明灯

站在色彩斑斓的世界地图前，如果我们用思索的目光扫视一遍五颜六色的各国版图，就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几乎所有的半岛上都建立了独立于大陆部分的国家。

以亚欧大陆为例。欧洲，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挪威与瑞典；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亚平宁半岛上的意大利。亚洲，小亚细亚半岛上的土耳其；印度半岛上的印度；马来半岛上的马来西亚；韩半岛上的北朝鲜和韩国（实际上为统一的国家分裂的两部分）。

这些半岛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点，明显的地理条件将它们与大陆国家区别开来。如法国与西班牙边境的比利牛斯山脉，意大利与中欧各国边境的阿尔卑斯山脉，中印边境的喜马拉雅山脉，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

于是，半岛国家就成了特殊的地理、政治文化现象：既是大陆的一部分，深受大陆国家的影响；又由于高山、河流的阻挡形成自己的单元，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

在世界大陆国家与相应的半岛国家中，关系最密切、影响最深刻的当属中国和韩半岛国家了。几千年来，中国和整个朝鲜之间对抗与融合、征服与反征服、同化与反同化所激起的火花，不断在历史的大舞台上闪现。

直到上个世纪末，包括现今韩国部分的朝鲜才最后一个从中国清朝的天朝藩贡关系中解脱出来；可在这个世纪 80 年代，韩国就已经作为“亚洲四小龙”之首在庞大的中国身旁走上了经济腾飞之路。

历史就是这样给韩国安排了一个选择：要么在大陆国家的强大力量下被同化掉，要么在抵制同化时刺激起自身文化的发展！

1. 走出巨龙的影子

亚欧大陆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大陆，韩半岛是这个大陆的一个小突起部分。

韩半岛位于亚洲东北部，向南延伸约 1000 公里，地理位置具有战略意义。

半岛北面是中国和俄罗斯的一些地区，正西面是中国大陆，东面是日本列岛。韩国西海岸同中国山东半岛的最短距离约为 190 公里。南部港口釜山同日本的本州岛的最短距离为 180 公里。

韩半岛从北向南延伸，把黄海同东海隔开。

韩半岛及其所属岛屿都位于东经 124 度 11 分到 131 度 52 分和北纬 33 度 6 分到 43 度之间。

韩半岛同中国和俄国这两个大陆国家接壤，同海洋国家日本毗邻，长期以来一直成为向日本传播大陆文化的陆桥。这个半岛的地理位置既有利也有弊。

毫无疑问，当古代航海技术还不发达的时候，半岛上人民的目光只能投向大陆；而且由于陆地的相连，大陆的影响也很容易传到半岛。因此，韩半岛地理位置的利在于容易接触毗邻的文化，弊在于容易成为侵略成性的邻国的打击目标。

面对世界上最大的洋——太平洋，当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的古文明迅速向外传播的时候，当俄国人迟至十七世纪才来到西伯利亚的时候，中国对朝鲜、日本的影响与控制是可想而知的，这三个国家之间千百年来也一直保持

着联系。因此，在本书以后论及韩国文化、历史时，要经常地提到韩国的两个重要邻邦——中国和日本。

事实上，在近代以前，朝鲜包容在中国“天下一统”体系中，对世界了解甚少。世界也缺乏对朝鲜的了解。

朝鲜曾被西方视为“隐士之国”。19世纪初叶以前，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东亚的活动舞台，主要集中在在中国沿海以西的地区，包括印度半岛、东南亚诸岛屿、中国东海与南海等国际贸易中心，以及日本西部。韩半岛远离太平洋主要航道，西方来远东航行的船只必然沿着中国南岸航行，然后到达日本的西海。广东立即成了中国大陆的交通中心，而长崎则成了日本的交通中心。从这条路线来看，西方船只到达朝鲜西岸的可能性很小。偶尔，船只在从广东驶向长崎途中，被风暴吹偏了航向，在朝鲜海岸边失事的时候，才有几个人知道朝鲜。因而朝鲜尚处于西方商人和探险者有待认识的阶段。

同样，朝鲜对世界的了解、对西方的认识非常有限。宣祖（1586—1608年在位）末年，出使北京的朝鲜使者带回欧洲地图一件，使朝鲜知识界对西方世界的地理位置第一次有了较准确的了解。实学家先驱李睟光（1563—1628）对此有如下记述：“万历癸卯（1603年），余忝副提学时，赴京回还，使臣李光庭、权愷以欧罗巴国舆地图一件六幅，送于本[弘文]馆……所谓欧罗巴在西域最绝远，去中国八万里，……欧罗巴地界南至地中海，北至冰海，东至大乃河，西至大西洋”。但是，对意大利籍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为该图所作序文，李睟光竟称“其文字雅驯，与我国之文不异，始信书同文”。

由此可见，韩半岛国家在整个近代史以前都被紧紧包围在中国文化圈中，大量吸收着中国的文化，然而却惊人地保持着本民族的特性。

近代以后，韩国沦为日本的半殖民地、殖民地，被强制执行“同化”政策，可韩国人民进行着不屈的抵抗，直至完全获得独立。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韩国的民族文化正是在同邻邦学习，化为己有，抵制同化的过程中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在韩国的民族性格、风俗习惯中有许多似乎是中国的东西，但是任何一个有识之士在经过研究之后都会说，那已是准确无误的韩国所特有的了。

这种对外来文化的亲和力和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构成了韩国民族精神的基本特征。

2. 三千里大好河山

韩半岛是美丽的。中国古代就有诗云：“愿生高丽国，一见金刚山。”足见韩半岛风光之绮丽。

韩国的地貌方面的特点是大小山脉很多，在韩国领土中所占的百分比达到将近70%。小山多半位于南部和西部，越往东边和北边，山也越高。总的来说，韩半岛的西部和南部大陆坡度平缓，沿着河流有各种类型的平原、小山和盆地。东部大陆坡很陡，没有重要的河流或平原。

半岛的北部山地主要由东北部的摩天岭山脉、咸镜山脉、赴战岭山脉、狼林山脉，以及这些山脉所围就的白茂高原、盖马高原和西北部的秋逾岭山脉、妙香山脉、阿虎飞岭山脉、马息岭山脉、灭恶山脉等组成。半岛的东部沿海区，有纵贯南北的太白山脉，南部则由太白山脉向西南延伸形成的小白山脉、车岭山脉、芦岭山脉所组成。

如果从飞机上俯瞰韩半岛，这些山脉组成了一条弯卧的巨龙。交叉错综的大块山脉为龙头，沿东海岸弯曲部分为龙身，向西南延伸部分为龙尾。这

条巨龙不仅挡住了太平洋的狂风和大海的肆虐，更重要的是造成了相当丰富的动力和矿产资源。该地区地势高，山脉多，水利资源、森林资源极为丰富；这里的金矿分布占朝鲜全国总矿区的 60%，菱镁和石墨的蕴藏量居世界首位，钨、铁、铬等金属矿产资源也很丰富。尤其值得一书的是在这个巨大的龙架上点缀着熠熠闪光的宝石——风景秀丽的旅游胜地。太白山脉地段有著名的风景区金刚山（高 1638 米），若是有幸仁立山巅，西俯沃野，东瞻大海，天下美景可尽收眼底；南部有智异山、雪岳山、五台山、太白山、伽耶山、鸡龙山等名山。此外，汉拿山矗立在朝鲜海峡的济州岛上，俯看朝鲜境内，群山蓊郁，峰峦挺拔，有的气势雄伟，有的溪谷透迤，林莽滴翠，有的溶洞奇特，巧夺天工，还有的奇岩重叠，飞瀑泻跌。这些山不仅景色秀丽，更有迷人的文化特性。几乎每一座山都有一个传说，每一座山都是一处文化胜地。

朝鲜半岛北部和东部的山脉由高到底缓缓地向西南延伸，形成了西部和南部的丘陵地带，平原夹杂其间，主要分布在西海岸和南海岸的河川流域，大都为侵蚀平原和冲积平原。自北向南依次为：位于鸭绿江下游的龙川平原为北部主要水稻产区；位于清川江下游的博州平原和安州平原为北部粮仓；位于大同江下游地带的平壤平原是北部主要农业基地；位于礼成江下游的延白平原和载宁江流域的载宁平原为北部主要粮食产地。南部主要平原有：汉江冲积而成的汉江平原是南部主要的水稻和人参产区；平泽平原土地肥沃，利于灌溉；锦江下游的内浦平原是现在韩国正在进行大规模农业综合开发的地区；位于全罗北道西部的湖南平原为朝鲜三大平原之一，河网稠密，农田辽阔，是南部著名的“粮仓”。

这些平原地区交通便利，人口稠密，有广阔的农田和茂密的果园，被称为半岛的“谷仓地带”。它们自北向南静静地躺在不断延伸的大山怀抱，躲开了北方寒流的入侵，而又向黄海、东海地带伸展着两臂，接受着来自这里的北上的朝鲜暖流的滋润。

俗话说：有水方有灵气。韩半岛因降雨量丰沛、山地较多，是世界上河系较发达的地区之一。这些河流大都是山涧河流，它们流经崇山峻岭，蜿蜒曲折，流速快，水利资源丰富。北部有鸭绿江、图们江和大同江，南部有汉江、洛东江。

韩半岛的水上资源不止于此。作为半岛，三面均有碧波浩森的苍海。碧波汹涌着这块神奇的土地，形成了许多迷人的海滨风景。东部海岸较平直，成为天然的渔场。韩国是世界上重要的渔业国家，盛产沙丁鱼、比目鱼、鳀鱼、海参、牡蛎、紫菜等。南部和西部海岸曲折，形成许多海港和港湾。东海岸主要有雄基、清津、新浦、兴南、元山和目前韩国境内的束草、注文津、竹边、浦项、蔚山等，其中浦项、蔚山是东海岸的重要港口，浦项是著名的钢都。蔚山的海外贸易闻名遐迩。西海岸的主要港口有新义州、海州和现在韩国的仁川、群山等。仁川为韩国西海岸最大港口，也是汉城的门户。南部沿海的港口主要有丽水港、三千浦港、釜山港，其中釜山港是韩国最大的港口。

温湿多雨的海洋性气候每年给韩国带来约 500 米 ~ 1500 毫米的降雨，非常适宜农作物的生长。

无论是从地形还是气候上看，韩半岛都有非常优越的条件，因而朝鲜人民相信自己的国家是神创的国度。的确，与日本相比，韩半岛少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比如就地震来说，从公元 2 年以来，韩国有记载的地震总数略

微超过 2000 次，其中只有 48 次具有破坏性——远比日本有记载的破坏性地震少。较之日本，韩半岛是一个相当稳定的陆块。

黑格尔曾经说过，地理环境是塑造一个民族性格的重要内容。类似的观点也曾被霍布斯、孟德斯鸠这样的大思想家论述过。

因而，朝鲜人的爱国热情是一种近似于爱自然的和平精神，和日本民族由于世代同自然作斗争，时常伴有生存危机的狂热的爱国精神迥然不同。

韩国人的性格中也多乐观、朴实、自信。他们建设国家的源源不断的热情不是出自一种危机感，而是来自心底的纯朴的爱。关于韩国民族的性格，本书后面还有论述。

总之，韩半岛占尽天时、地利，所有这些都是民族发展的基础。也正是由于她的物华天宝，千百年来在这个半岛上，演出着一幕幕的历史悲喜剧。难怪诗圣泰戈尔曾经热情讴歌他心中的“高丽”：

早在亚洲的黄金时代，
你是一盏明亮的灯光。
那盏灯重新点亮之时，
将把东方照亮。
这里是无所畏惧，
 昂首挺胸的地方。
这里是知识自由自在，
 不被窄墙分隔的地方。
这里是真实的深处
 为向完成目的张开双臂的地方。
这里是至诚的清泉
 在固守习惯的沙滩不迷路的地方。
这里是无限展现的思想和行动
 引导我们心灵的地方。
我心中的祖国
 高丽啊！
望你苏醒，
成为自由的天堂。

二、艰难的蜕变

蝴蝶是世界上种类最多、最漂亮的飞行昆虫。我们每人小时候都喜欢追赶蝴蝶玩耍，羡慕她们在天空自由自在地飞舞

可是一只蝴蝶是怎样出世的呢？孵卵后生出幼虫。幼虫长大时要脱皮，从小到大不知要脱掉几次衣服。脱掉旧皮，长出新皮，以保护自己。幼虫多次脱掉衣服以后，用坚硬的外壳裹住自己，变为蛹。硬壳裂开后飞出蝴蝶，软弱的身躯和翅膀不久即变得坚实。一只美丽的蝴蝶就这样高高地飞向天空。

特利那·坡罗斯在寓言《给花朵以希望》中，将蝴蝶这一小生命的漫长而痛苦的出世过程描写得非常感人。一只美丽的蝴蝶直到飞上天空，要历尽艰难的逆境。不脱掉外皮就无法成长。脱皮伴随着痛苦。最后，由蛹成为蝴蝶，完全是变为另一种存在。若不否定到目前为止的自我，是决不会促成大变革的。

幼虫在问：怎能抛弃仅有一次的生命？非冒险不可，这里需要勇气。要想占领顶峰，不能爬上去，而要飞上去。坡罗斯对蛹变为蝴蝶的最后一瞬间是这样描写的：

黑暗逐渐逼近了，
幼虫愈益害怕了。
它感到该抛弃了，
抛弃一切……
然后黄色的幼虫等待着，
……直到那一天的到来……

爬在地上，被踩来踩去的幼虫，想要爬上顶峰，非成为蝴蝶不可。

新韩国，她是一只新出世的蝴蝶。被踩来踩去，历经磨练的幼虫变成了一只蝴蝶，她就是新韩国，崛起后的韩国！当雅典的命运处于危险关头时，苏格拉底号召雅典人“了解你自己”。这就是说，“从你们国家苦难的历史中学习和发现力量的源泉”。现在，就让我们来追述一下韩国崛起的历史上留下的艰难的痕迹，以及这些痕迹中所蓄藏的力量吧。

1. 在中国文化的摇篮里

当东亚有迹可查的历史序幕徐徐拉开的时候，蒙古人种已经居住在这一固定的区域内。在东亚文明的发祥地中国北部，据考证发现，有一部落居住在中国朝水（今潮河）与鲜水（亦称龙鲜水，今唐山陡河）。这个民族因久居其中而得名朝鲜族。后辗转移居朝鲜半岛，遂有“朝鲜”国名之称。

在朝鲜建国史研究上，有一种流行的“箕子朝鲜”的观点。中国古代商周时的周武王即位，封箕子于朝鲜，于公元前 1122 年建立了古朝鲜国。这充分反映了公元前十世纪汉文化影响古朝鲜的过程。

随着汉人的扩张，大量人口涌入朝鲜，农业、铸铜和炼铁技术也随之传入朝鲜。这种与汉文明的接触对于朝鲜人创造自己的文明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七世纪时，新罗统一了韩半岛。它进一步仿效了汉式政治机构和文化模式，其统治模式几乎是唐朝中央集权制的翻版。它每年向唐朝纳贡，大批学

者和佛教僧侣也长期留学唐朝。恰在这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达到鼎盛时期。到中国取经的部分朝鲜佛教僧侣则把中国佛教的诸多派别传入了朝鲜，其中以传播通过对宗教信仰的虔诚来拯救自己的“净土”派最为普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借助佛教教义，新罗出现了“花郎道”，一种强调对内融合，对外抵御异族入侵的民族精神。

新罗时的朝鲜半岛居民深受中国汉文的影响。他们不仅将地名和人名全部改成了汉式名称，而且，从新罗开始，朝鲜人的名字就一直由单姓构成，其中金、朴、李三姓最为普遍。

由于大陆和朝鲜地理相连的便利条件，佛教的传播不会有鉴真东渡日本时的艰辛，因而至公元十世纪，高丽王国统治了韩半岛，当政者即把佛教定为国教，僧侣享受与文官同样的待遇。佛教一时在朝鲜达到鼎盛，并在贵族的文化和生活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同时，高丽的佛教艺术也表明了这一点。高丽时期，学术和文学活动也有所增强，12世纪编纂了《三国史记》。约一百年后，一位名叫一然的和尚编纂了《三国遗事》，这部著作记述了史书上没有记载的重要史实和传统。

佛教的传播，更大的意义在于中国文化的对外扩散。伴随僧侣往来的，还有大量的学者、工匠。中国的文学、艺术、史学、雕刻、政治思想一直输送往韩半岛。

十四世纪，李氏王朝统一了韩半岛。太祖李成桂即位后不久即于1401年与明朝建立了藩属关系。此后5个世纪的时间里，李朝一直保持着同中国的密切关系，互派使节，中国影响的浪潮不断波及李朝，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业已确立的汉式政治和文化模式。

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在朝鲜达到鼎盛。李朝初期，朝鲜人之所以接受儒家思想，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其主要制度和社会习俗都是仿效汉模式重新确立的，而且较以往更完善。由于李朝相对于中国来说要小得多，更易统治和保持凝聚力。实际上，李朝在许多方面都几乎变成了儒家社会的典范。

李朝时期，有一位国王应当特别提及，他就是世宗（1418—1450在位）。世宗以精通儒学而著称，出于对儒家人本主义的重视，他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事，比如召集学者在中国农业方面的代表作《齐民要术》的基础上写了《农事直说》。这些事更大的意义在于强化了朝鲜民族的独立性和发展。

其中意义最大的是谚文的发明。而当时，朝鲜使用的文字是中国汉字，汉字学起来十分困难，并且为贵族所专用。人民大众在无知的深渊中越陷越深。但世宗了解普通人民的生活，他想使他们受到教育。他说：百姓“有所欲言，而终不能伸其情，我很怜悯他们，因此创造了二十八个字母，称之为‘适于教给人民的字母’。”至今，韩国不仅有了自己的语言，而且有了自己的汉字。

写到这里，我们似乎已经可以说，韩中两国的文化根源本来相当不同，但韩国古代国家成立以后，一直大量接受中国文化。韩国文化在吸收了铁器文化和佛教后，在融合了既存佛教文化与后来的儒家文化后，一次次大幅度提高了自己的文化水准，抗击了东北亚其它少数民族的入侵。比如，在高丽时代，先是辽国派遣80万大军于公元993年入侵，此后，辽国又先后四次入侵。1231年，蒙古族开始入侵，此后又相继有六次入侵。

毫无疑问，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对李氏朝鲜五百年的影响，在朝鲜民族文化中已经烙下了深深的印记。这种儒家文化在韩国的崛起中究竟起

到了怎样的作用，本书以后还有专门论述。

但是，勿庸讳言，儒家文化对李氏朝鲜也产生了许多消极的影响。由于引进了严格的儒教身分制度，李朝规定了“士农工商”的等级。由于对商业发展的极度轻视，以至李朝建国 250 年内还没有货币。

当历史的车轮逐渐驶向近代，儒家文化在李朝，一如在它的故乡——中国一样开始衰落了。尽管中国文化曾经帮助朝鲜民族发展了自身文化，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表现出了极强的生命力，但它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外邦的强烈冲击。

2. 东瀛西侵超波澜

李朝后期，国王同儒家学者之间，统治阶级内部在遵从儒家规范上发生了斗争。这些基于儒家哲学思想和道德、礼仪的斗争，在十六世纪末期演变成韩国历史上有名的“四色党争”。党争一直连绵不断，主宰着脆弱和动荡的朝廷命运。

在此内部纷争之际，李朝又遭受了一次来自日本的灾难性入侵。丰臣秀吉 1590 年重新统一日本后，派遣 16 万大军人侵李朝。李朝腐败无能，日本人长驱直入，攻陷汉城并席卷了朝鲜半岛，唯有西南角幸免于难。

丰臣秀吉之乱给朝鲜造成的后果包括政府记录、文物、档案、历史文献和艺术品被毁，田地荒芜，人口减少，工匠和技术人员流失。耕地仅为战前面积的三分之一。工匠流失造成手工制品以及陶器和书籍印刷等质量下降。

自王辰倭乱（文禄、庆长之役），又发生了丙子胡乱（满人的入侵），经济陷于崩溃边缘，民生凋敝。对李朝来说，危机在一步一步地加深。

空前的危机导致了人们的反思，批判精神日益盛行，新儒学（朱子儒学）的准则和价值观念开始发生动摇。于是，在 17 世纪前后，一种极为重要的“实学思想”应运而生。

“实学”即实事求是之学，来源于《前汉书》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一语。这批具有“实学思想”的学者抨击被偶像化了的朱熹体系，批判僵化思想。他们认为教条主义儒学的发达不仅无助于现实社会经济的发展，反而由于追求过于严格的纯粹性，而使其思想体系陷于僵化。他们认为，人民的生活状况比新儒教政府机构的士大夫极为珍视的合法性和礼制问题更加重要，“若农民不聊生，任何国家都无法生存，而即令没有君主，人民却能照样兴旺发达。”这就是实学的基本理念，“生民”、“为民”。它认为“利用”与“厚生”比以往的“正德”更为重要。

实学思想有三个派别。

第一，经世致用学派。他们从 16 世纪中叶至 17 世纪中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柳馨远、李瀾、丁若镛等是核心人物，他们以经世济民为基本理念，继承了“修己治人”的传统，但重点不在修己而在治人，并由此提出了土地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改革方案。

柳馨远在他的《磻溪随录》中提出了下列措施：（1）建立一种利益能由大家公平分享的土地制度；（2）实行推荐制，代替科举制；（3）为所有人确立均等机会；（4）改革政府机构；（5）采用新学。

丁若镛著有《经世遗表》和《牧民之书》。在书中他批评了随波逐流、得过且过的生活方式以及那种坚持朱熹派哲学的两班阶层的生活。他强调了实用主义的生活方式，宣称“没有人能超过尧舜”。他对趋炎附势的特权阶层浪费他们的生命表示惋惜。

第二,利用厚生学派,该派产生于17世纪中叶前后,存在了约一个世纪,以朴趾源、朴齐家为代表人物。他们属于经世致用学派的一支,但更重视致用即利用与厚生,在此基础上展开其理论。该派提出开发科学技术,振兴工商业和革新生产工具等相当具体的改革方案。

第三,18世纪中叶以后的实事求是学派。金正喜等考据学家以博学、实证和实用的精神探讨现实的学问。这与其说是一个学派,毋宁是指李朝后期实用学的态度。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实学,可以说到此时达到了顶峰。李朝在这个时期(英祖、正祖时代)在历史、地理、语言、农业和医学等广泛领域内都展开了实用之学。

实学对儒学的一大批判,抓住了儒学的两大弱点:一是忽视经济,二是热衷于空洞的理论。实学提出生民、为民思想,要求发展经济,发展科学技术;摆脱空洞无用的道义之争,解决实际问题。这些主张都明显地带有近代化色彩,很好地克服了儒学自身的弱点。而且,由于实学家关注现实问题和实用学问,超越“华”“夷”,不参与朋党之争,因而在华夷观上,已打开视野,走出盲目自大的“小中华”意识的象牙塔,产生“华夷一也”的世界观。

实学思想对韩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之大,使韩国的儒学思想有了别于中国儒学的一大特色。韩国后来的总统朴正熙在他的著作《我们国家的道路》中论及历朝有价值的传统时,就专门提到了实学思想。

从儒学到实学,韩国学者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毕竟,这两种思想还同属一个体系。当历史的车轮驶进十九世纪,从地中海崛起的工业文明开始走出它的摇篮,越过太平洋来叩响东方国家大门的时候,韩国的文化又面临着第二次冲击。

3. 西风东渐再起波澜

18世纪下半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土地私有化进程的加速,朝鲜的资本主义已经萌芽。但是,这个进程被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所打断,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朝鲜开始沦为资本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

1866年,法国、美国先后入侵朝鲜,但皆被朝鲜军民击退。第二年,日本侵略者终于用军舰和大炮轰开朝鲜的大门,迫使朝鲜封建政府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朝日修好条规》,即江华条约。从此,朝鲜开始沦为日本的半殖民地。

继日本之后,欧美列强也加紧对朝鲜的侵略。朝鲜封建政府被迫先后与美(1882年)、英、德(皆为1883年)、俄、意(皆为1884年)、法(1886年)等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使朝鲜封建统治阶级妄图使朝鲜与世隔绝的迷梦化为泡影。外国哲学和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朝鲜,国内保守思想方式日益动摇。这个时期,试图以民族独立精神改革封建王朝政体的新思想出现了。这就是著名的“开化派”思想。

“开化”一词,源于中国儒家经典《易经·系辞传》的“开物成务”和《礼记·学记》的“化民成俗”。具有开化思想的学者发出了“东道西器”和“自强洋务”的时代强音。

“开化派”思想可以从以下四位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中略见一斑。金玉均。他在“致高宗王的信”中,提出了改革封建朝鲜的计划。

金玉均在信中指出,在外交事务中,我们必须接受欧美各国的友谊,与

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在国内事务中，我们必须改革政府，以技术方法指导愚昧的人民，鼓励商业，改革政府财政，建立一支近代军队。当今世界把商业看成是国家最重要的任务，世界各国竞相生产物品。现在我们必须放弃两班制。从速放弃陈旧无用的官僚政体和社会等级制。利用社会有才之士，建立中央集权政府，倾听人民呼声，获取人民信任。兴办学校，开发智力，教育人民，接受外国宗教，并扶植其传播。这是建设近代国家的一条途径。

概而言之，我们可看出三种不同的思想。第一，就像外部世界诸国所实行的那样，必须通过鼓励商业，增加生产，为国家奠定经济体制。第二，确立中央集权政体，废除封建主义和社会等级制。第三，输入外国宗教，发展人民精神智力生活。

金玉均的进步思想是旨在建立一种启蒙气氛——唯有在这种气氛中才有可能建立一个近代国家——的开拓性尝试。换言之，他不仅反对因管理不当和教条主义造成的各种限制，也反对使人误入歧途的思想，他试图为一切朝鲜人确立自由和自主精神。他的一系列思想直接涉及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思想自由。

朴殷植。他深受英国实证主义和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这种东西方思想的综合，清楚地表现在他的下述一段话中：“西方学者说，生存斗争乃进化基础。故最适者、最强者生存；最弱者、最劣者则被淘汰。这是唯一的自然法则。这种思想并非违背仁慈、博爱之美德，因为唯有聪明、智慧、坚强和勇敢的人才会完全拥有这样一种美德，而弱者和愚者则不可能拥有这种美德。通过竞争之力，难道不是优胜劣汰吗？”

考虑到这一点，他把先进的科学与完美的民族伦理结构（即道德体系）看作是建立一个强大而独立的国家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他尤其强调先进知识的发展在社会发展及消灭封建主义中的主导作用。从历史观和世界观出发，他认为，国家兴亡强盛、民族存亡，皆取决于有无知识。

朴殷植是民主政体的热情支持者，他的政治思想彻底拒斥封建政体的极权主义独裁。他说，“既然所谓国家乃是公民的集合，那么人民的技术、财富和力量便构成国家的技术、财富和力量”。根据这个观点，国家政府不只是少数精英的责任或所有：而是为全体民众之所有。如果每个公民各尽其责，那么国力就不至于衰弱到目前这种状态。

申采浩。他是一位有代表性的历史学家，力图把民族自豪精神灌输给朝鲜人民。在《朝鲜史》序论中，他把“历史”界定如下：

历史乃是处于相互竞争中的人的心神状态之时空发展的记录，因而世界史必须记录人性状况，同样，朝鲜史必须记录朝鲜民族人性状况的发展。他说到，在撰写朝鲜历史时，必须研究各种条件，例如，食物、服装、住所、农业、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土地分配、货币体制以及其他经济因素。这种历史观避免了奴才主义、殖民主义弊病，牢固地植根于调查研究人民的丰富精神之中。

总的看来，他的历史观强调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这种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成为民族特性意识的基础。

周时经。他是朝鲜语言学者，也是启蒙思想家，为朝鲜语言的复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周时经认为，语言之“理”是他自身语言研究活动的必要法则。“不生不灭，无始无终”，他的这一能动之“理”相应于朝鲜思想中的“韩”概念。

“韩”，这是朝鲜独有的思想，其含义为“大的”、“高的”、“首要的”和“统一的全一”。

周时经以其统一、全体或“韩”概念确定了开化派的意识形态基础。政治上，形而上学的统一意味着政府与人民不应两极化。从全体或“韩”的观点来看，人民的财源与其政府的财源并非是两种分离的东西，而是相互关联的东西，从而也就避免了长期存在的一种悖论：人民过得好，管理者就过得不好；反过来，管理者过得好，人民就过得不好。

在伦理学上，周时经要消灭以君臣关系为基础的陈腐伦理体系，发展一种平等主义的伦理哲学。基于君臣关系的伦理学，其显著特点是无条件的服从，至诚维护封建等级社会中的生存秩序。在这样一种体系中，个人的权利遭到全盘否定。为了恢复人的本性，周时经强调以全体或“韩”为基础的价值论，这一概念相当于“伟大的”意识形态。

这些就是当时开化派思想的主要内容。这个时期，许多学者都拥护启蒙和维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在于受到了欧洲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思潮的影响和鼓励。这一时期欧洲的流行思潮是达尔文主义、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以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

欧洲思想对朝鲜启蒙哲学的影响是深远的。那些引进的社会学、政治学思想最初被认为是借以根除封建主义最后遗迹的良方妙剂。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们遵循这些进步思想，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能够完全消除过去的旧意识形态，提出一种全新的思想体系。

4. 沙吹尽头始到金

事实上，韩国思想文化的变革到这里还未结束。经过二战，朝鲜半岛的分割，韩国人民又对自己的文化进行了反思，尤其是自朴正熙总统以来。朴正熙总统著有一本书，名为《我们国家的道路》。在这本书里，朴正熙总统结合时代特点，对民族文化再次作了深刻的反思，并将这一系列反思贯彻到具体的国家政策中去，从而为韩国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作为对韩国历史文化的考察，写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得出一般的结论。

首先，韩国属于“中国儒家文化圈”（其他几个国家和地区是日本、北朝鲜、台湾、香港、澳门和越南），民族文化中有深深的儒家文化的印记。我们知道，直到19世纪初叶以前的数百年间，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存在着一个以中国封建王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长期以来，周边邻国的统治者为了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都与中国的统治王朝建立并保持一种特殊的封建依附和“朝贡”关系，他们各自对本国的统治权必须经中国朝廷的“册封”加以确认。这种封建的宗藩关系，构成所谓的封贡关系，朝鲜是这个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在宗藩关系中，经常地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在朝鲜民族文化中，常常提到“边陲意识”和“事大主义”。尤其是高丽和李氏王朝，把全部力量和热情都倾注于模仿。朝鲜与中国的这种特殊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促进了它文化的发展。可以说，儒家文化是它的底子。

其次，韩国文化有两次很好的改造。一次是实学运动，一次是开化派运动。

实学运动使韩国的儒家文化变得更积极、更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实学运动克服了儒学的两大弱点：不重视商业经济活动和坐而论道。这次改造是对儒学的一次发扬光大。它使韩国批判地吸收了中国式儒学，取得了精髓，抛

弃了一些不必要的形式。

开化派运动使韩国完成了东西方文化的结合。开化派运动采纳了西方社会民主、平等、自由、法制、人民主权、重商主义等等精髓内容。它给韩国的东方文化注入了新的文明因子。而这些文明因子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是必不可少的。

所有这些，都使韩国人在文化上学会了吸收、改造、借鉴。当韩国民族完成了儒家文化的完善和发展，完成了注入西方文明的新鲜血液之后，韩国的崛起已经是注定无疑的了。内因已经具备，外因只需等待时机。在 70 年代，韩国人抓住时机，一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在人们的惊呼声中成为“日本第二”时，这一切早在上个世纪末就已经奏好了序曲。

这样看来，韩国的文化既充分地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又明显地保存了自己的民族特色，具有宽广的兼容性和顽强的生命力，在总体上受儒家文化浓烈熏陶的同时，又面向世界，不断地适应时代的步伐，在古老传统的基础上又不失灵活的生机。韩国的诸种文化交融，在推动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马克斯·韦伯遇到的挑战

“亚洲四小龙”取得了令世界瞠目结舌的经济发展速度。它们都是“儒家文化圈”内的国家。

日本早已崛起为经济大国，与美国、欧共体并列为世界经济三极。它也是“儒家文化圈”内的国家。

可马克斯·韦伯早就预言过，在东亚缺少培养资本主义精神的文化。

当西方经济普遍处于停滞、萧条状态的时候，经济学界对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开始了有兴趣的研究。

的确，儒家文化促进了东亚国家经济的发展。韩国在李朝初期，通过“排佛尊儒”，在整个500年里直接接受了中国儒家思想。

1. 整体号召机制

儒家思想中，关于社会秩序原理的核心是寻求中央集权和社会组织结构的稳定性。它的目的是维护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而且这种集权体制从有史以来，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

以忠孝为支柱的儒教秩序，经过长期的体验和教化，把优于其它文化的整体号召机制保持至今。国家，作为一个大集团，具有高效率地实现某个既定目标的能力。

类似这样的系统，可为政府正确地发展经济提供指导和政策，并且在国民具有自觉参与激情时发挥作用。现实也确实如此。

儒家文化圈的巨大经济潜力，来源于全社会所具有的统一机制。韩国有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这种传统对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去做良性运转的要求，超过了对经济发展的要求。

因此，韩国和西方发达国家虽然都是自由经济和计划经济相混合的经济体制，但是前者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后者是以自由经济为主。

韩国的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是无法忽视的。政府制订计划，确立目标，建立有关制度，形成个体经济的强大后盾。集中各个经济实体和个人的能力，整体号召机制使整个国家的经济取得成功。

2. 家族一体主义

儒家思想中，家族的中心是人际关系。所以，儒教中历来就保持着忠孝一体化的伦理体系。忠是对君主或国家的服从和奉献；孝是维系家族内部人际关系秩序的道德伦理。国家也可以是一个“大家庭”，因而，忠孝一致成为儒教的行为模式。

而且，韩国是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人们对国家有深入的了解，并且认为国家和民族是同等的概念。所有的集团，都以家族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所以，忠与孝相统一的行为模式在经济政策、对外贸易、企业经营等等方面，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带来了高效率。

在韩国，政府和企业之间、企业内部人们之间，保持着上下尊卑的关系，有一种置身家族之中的感觉。政府发展经济的政策，极大地刺激了个人的经济活动；与此同时，政府和企业结为一体。传统的家族集团主义保证了稳固的社会秩序，当出现重大问题时，比较容易举国步调一致。

在欧美国家特别是美国，从来就没有重视政府的传统。政府依靠法律和政策来把握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向，但和企业之间保持经常性的对话，以求与企业之间的和谐统一，是不可思议的。而在韩国，需要解决某些重大问题时，

比如石油危机等等，在政策下达指令或制定法律以前，政府和企业之间能够互相理解，双方可以很自然地达成一致。这就体现了家族集团主义的传统。

如果将目光缩小到一个企业内部，我们也会看到一个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家族共同体，企业成员间保持着宗族般的人际关系。公司的干部，也穿着工作服，在施工现场和工人们同甘共苦。他们心甘情愿地加班加点。

在欧美国家，低能的人会毫不留情地被社会所抛弃，那是个冷酷可怕的社会。所以。作为个人，必须加倍努力，就这方面讲，有其优点。但是，作为社会整体，就未必会产生高效率。因为这样的社会机制往往会导致社会动荡。韩国当然也重视才能，但更重视的是人性。即使能力不强，只要诚实地工作，也不会为社会所抛弃。不摒弃弱者，而是让他们做和他们能力相称的工作，使他们能和社会共同生存，这和家族成员不会轻易被逐出家庭是一致的。这种家族集团主义，依靠礼义和人情把人们紧密地团结起来，构成长期稳定的社会机制。因此，从长远看，这种社会机制将具有发挥持续稳定高效率的优点。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韩国的企业由于是以家族集团主义原则来经营，因此个别的、短期的效益也许并不能尽如人意，但企业结构是稳定的，全体人员是作为“人”从中发挥作用。人的一生和企业是紧密相连的。因此，他们总是做着长期打算，具有驾驭新潮流的能力，也不惜对企业做必要的投资。

3. 教育为本思想

在儒家文化圈，人们保持着修身立命的传统，一般纵向流动率较高；欧美国家与之相反，主要是横向流动。

社会流动从根本上说和教育状况有很密切的关系。韩国非常重视教育。欧美社会的一般民众接受的是普通教育，而社会精英们从一开始就接受特殊教育。韩国则不同，人们共同生活在平等的地位上，社会把自由选择职业和受教育的机会扩大到所有的人。

特别是儒家修身立世的传统，使人们为获得成功而热衷于接受教育，人们都涌向一流大学。而根据社会对流的原理，只要你具有才华，则不论出身和目前的地位如何，可以接受任何等级的教育，可以选择优越的职业，并可以成名立世。这类纵向流动率也因此而可以大大提高，而且，这还能起到使社会生活能力得到全面提高的功能。儒教文化圈国家的教育热潮和教育的普及，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无论生活得多么贫寒，也要让子女努力学习，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现象。

和其他宗教文化圈国家相比，儒教文化圈国家的确重视教育。因此，教育在韩国自然地得到普及，教育水平也不断提高，而这些又成了经济发展的促动力。关于这一点，之后更有详论。

韩国吸收了儒家文化思想，并使之适应了现代化的需要，找到了古老传统文化与时代潮流的闪光的结合点。儒家思想最终成为促使韩国崛起的最坚实的基石。

第二章活性的自主文化

一、不甘屈服的民族之魂

“无论是痛苦还是欢乐，都要爱我们可爱的国家。”

韩国国歌里的这句歌词也许可以概括他说明韩国人民和他们的土地之间的密切关系。

这是一块曾经遭受过部落兵戎相见和邻国兵戎相见的痛苦、遭受过野蛮的殖民统治、自相残杀的战争、分裂和分离的痛苦的陆地。

这也是一块曾经享受过家族和民族的欢乐、享受过大自然和赐予地球生命的四季、山脉、河流、海岸和海洋的欢乐的土地。其欢乐还来自把古代同现代世界融合在一起的传统。

1. 神创的国度

每个民族都有关于自己民族起源的传说。这是一个民族显示其有别于其它民族的基本特征之一。许多关于韩半岛国家建国的神话，一直流传至今。

《檀君》是关于古朝鲜建国的神话。古代，有天神桓因知道庶子桓雄想下凡，于是就选定了三危、太伯二地，并给了桓雄三个“天符印”作为天上神仙的标志。桓雄率领三千人降到太伯山顶（即今妙香山）的一株神檀下，建立“三神市”，自称“桓雄大王”。他设置了“风伯”、“雨师”、“云师”等官职，主管农业、疾病、刑罚、善恶等三百六十余事。其时，有一熊一虎同住于一洞中。它们来到桓雄大王面前，请求大王把它们变成人。桓雄大王就给他们二十头蒜，叫它们吃下去，并且告诉他们吃下去要躲藏起来，一百天之内不能见阳光。熊照办，于是变成了一个女人。但虎没有照办，就未能变成人。桓雄大王与熊变成的女人婚配，生下了王俭，即檀君。这个檀君于公元前 2333 年在平壤建立王国，并定名为“朝鲜”，在位一千五百年。后隐居于阿斯达为山神，活了一千九百零八年。

如果说《檀君》是有关北方的建国神话，那么《朴赫居世》和《驾洛国》则是南方的建国神话了。

新罗位于朝鲜半岛南部东侧，始祖是朴赫居世。传说原有六个村，其祖先都来自天上。相传大约在公元前六十九年，六个村的祖先率子弟们寻求有资格为王的人。他们发现南边有奇气如同闪电，一匹白马下跪作叩头状，跟踪找去，发现一个青紫色的蛋。把蛋打破后，一个俊美的童子从中而出。沐浴之后，童子全身光彩照人，鸟兽为之起舞，日月分外明亮，起名为赫居世。因为蛋和瓢的模样近似，赫居世就以“朴”（瓢）为姓。

与此同时，在一个水井边，有鸡龙出现。这个鸡龙自肋下生下一个美丽的女孩，但嘴唇很长，有如鸡喙。经洗浴，长唇脱落。

朴赫居世长到十三岁，便娶这个鸡龙所生的女孩为妻。夫妻二人成了新罗的国王和王后。

虽然有人认为这些传说不过表明韩国人民的图腾崇拜，不值得重视，但是另一些人则认为，相信一位神仙自愿希望成为一个凡人具有重大意义。他们认为，这些传说已世代深植于韩半岛人民的心中，韩半岛人民并不把凡世看作是天上神仙的流放地，不是打发犯了错误者下来受惩罚的地方。

相反，这片国土美丽如梦境，连神仙和动物都愿意在这里生活，因此韩国人民对于选择了这样一个地方作为自己的家园感到满足。

韩国流行着一句谚语，“宁居人间秽土，也不图天国仙境”。这句谚语表明，人们宁要现世的生活，不管它如何贫苦，也不要想象的、未知的天国

的生活。韩国文学作品中有许多故事反映了韩国民族的这种心理倾向。

比如，美丽的仙女往往下凡来寻求更充实的生活，与凡人结婚，生儿育女，而且最终还像每个已婚妇女一样操劳家务。后来她又回到她过去天上的住处，但是故事中通常都不提她回去后情况如何。

根据人类学和语言学方面的考证以及历史传说，韩民族起源于生活在中亚细亚阿尔泰山脉一带的种族。这个种族后来移居到现在的中国东北和西伯利亚。其中被认为是起源于通古斯的一支，来到韩国半岛的东海岸，并在那里定居。

当这些移民在大约公元前三千年进入韩半岛的时候，他们遇到了原居住于当地的古亚细亚人的反抗。古亚细亚人最终被赶出韩半岛，分别迁移到其他几个地区。日本北端的阿依努人、萨哈林岛（库页岛）的土著居民和西伯利亚东海岸的爱斯基摩人都是这些古亚细亚部族的后裔。

从西伯利亚到中国的东北，再向南辗转转到韩半岛，韩国人民的祖先越过广阔的平原，寻求在气候比较温暖的地方安家定居。他们是凭自己的自由意志定居下来的。历史上的韩国人民选择了这块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

我们因而也就不难理解，韩国人为什么如此仰慕他们的祖国，而无论当时他们的生活如何艰难。我们因而也就不难理解，当这块土地遭受外族一再入侵的时候，他们能够用头颅和鲜血捍卫这块领土的完整。我们因而也就不难理解，当这块土地还很不富裕的时候，他们能够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让这个半岛国家走上经济的腾飞之路！

2. 三朵护国神花

韩国民族的历史是一部苦难史。

韩国民族的历史是一部斗争史。

被征服的痛苦和反抗压迫的斗争一直交织书写着韩国的历史。

造成韩国苦难的外部条件，正如本书第一章中提及的，来自三方面压力：西面是中国，北面是俄罗斯和满洲，（古指现今东北亚中国和前苏联的一部分），东面是日本。

以中国大陆为例。每当一个强大的朝代兴起的时候，它的势力就扩展到整个朝鲜半岛。中国强大时，可以向几个方向扩张：向北扩张到蒙古，向南扩张到越南，向东由山东半岛通过大海扩张到朝鲜半岛，或越过长城扩张到辽东半岛和满洲。在强大和繁荣的时期，中国就利用这些通道，于是朝鲜半岛就不断遭到汉族的入侵，从扶余时代到李朝，朝鲜不断受到入侵。

形成于满洲并取得胜利的部落往往进入这个半岛。确实，满洲现在被认为是个聚宝盆，受到许多国家的觊觎，但是在古文化期，由于气候严寒，这个地方不适合于人类居住。所以，对于满洲人来说，向南入侵是自然的。金、清和蒙古的类似入侵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的主要目的不是统治小小的朝鲜，而是入侵中国大陆。然而朝鲜总是首当其冲。

由于同样的原因，俄国人企图统治朝鲜的主要目的是想把朝鲜作为桥梁来征服整个东北亚和日本。朝鲜的邻居日本一有机会也要侵略朝鲜。从疆域和地形来说，日本既难以同满洲相比，也难以同大陆中国相比。同朝鲜半岛相比，日本显然享有较为有利的地理位置。它是个孤岛。在强大和繁荣的时期，日本也企图寻找通向朝鲜的通道。它的最终目的也是统治满洲和大陆中国。

但是，韩国人民凭借着对本民族、本国家的挚爱，为免遭文化的同化和

民族的灭亡一直作着艰难的抗争。而恰恰是在这种对抗中，刺激起人民的民族性。

这种民族性蕴孕在三种精神之中。这三种精神世代相传，已注入每一个韩国人的血液之中。它们是“花郎”精神，“李将军”精神和“三·一”精神。

“花郎”精神

“花郎”精神产生于三国时新罗的发展壮大期间。

4世纪—7世纪时，韩半岛有3个国家。

北部的高句丽。它是朝鲜历史上第一个地道的本民族国家，由脱离了满洲中部通古斯扶余人的五部落组成。到公元4世纪时，它控制了朝鲜半岛北部三分之二的地区。

南部的百济。朝鲜半岛南部分散有马韩部落、辰韩部落和弁韩部落。4世纪上半叶，在汉江流域，出现了名为百济的集权组织国家，后来逐渐控制了整个马韩地区。

高句丽通过陆路，百济通过海路与中国的王朝保持藩属关系。这两个王国深受汉文化的影响。

在高句丽和百济王朝发展壮大时，一度被高句丽统治的东南部的辰韩地区，4世纪末出现了一个独立的王国，名曰新罗。

新罗本是个相当落后的非汉文化区，为了生存还不得不同日本倭人进行斗争。然而长期的竞争，反而使它获得了更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到6世纪初，新罗王朝日益巩固，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统一的君主制国家。

这一期间，新罗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花郎。所谓花郎，就是国王从贵族中选拔美貌少年，平时修身养道，锻炼身体，接受忠君报国的思想教育。战时，则要求勇于牺牲，为国王献身。

花郎战斗极其勇猛，往往冲在队伍的最前列，闯入敌人阵中凶猛砍杀，至死方休。他们追求的最高目标就是为国捐躯。

随着花郎的兴起，新罗迅速地通过与百济结盟，从高句丽手中攫取了汉江上游，后又与百济为敌，夺得了汉江下游地区。如同日耳曼人打败了罗马人一样，新罗作为一个非汉文化地区却打败了文化相对发达的高句丽和百济，花郎的作用不可低估。

随着佛教在朝鲜半岛的传入，花郎精神开始形成。花郎精神由元晓僧创立，它取“融二不一”的思维方式，将多样性的统一做为目标。

花郎精神掺和了佛教的观点，认为一心的两性乃为不二归合的原理。互相渗透，相互转换之理，即为表现非合理的合理，非伦理的伦理，是“一心二源，融二不一”。希望藉三国精神的特殊性互为融合，形成真正的统一。

正是由于花郎精神，新罗又联合被征服的高句丽和百济赶走了唐军。之后，新罗又大学汉文化，进一步仿效了汉式的政治机构和文化模式。

可见，花郎精神是一种以我为主的对内融合思想，一种国家思想，有强烈的民族统一和振兴意识。

在以后的丰臣秀吉入侵期间，己卯士兵叛乱之后的义兵运动以及东学党运动中，很多人都称自己是花郎，群起抵抗外族入侵者。

“李将军”精神

一碧万顷的黄海，是中、朝、日三国关系演变的历史大舞台。透过汹涌翻腾的海浪，我们仿佛看见海面上现一再腾起的炮火和硝烟。一个民族的兴

起和另两个民族的危机猛烈撞击出的惊涛骇浪，如今依然拍打着故地的岸礁。而四个历史名人的名字早已沉铸在黄海海底。他们是朝鲜的李舜臣和日本的丰臣秀吉；中国的邓世昌和日本的伊藤博文。

“李将军”精神是十六世纪末，朝鲜面临着日本的第一次大规模军事入侵时熔铸而成的。

16世纪下半叶，日本经过长期混战后，丰臣秀吉开始统一全国，不久就对朝鲜发动了壬辰战争，妄图水陆并进，先取朝鲜，然后超过鸭绿江经辽东半岛攻占明朝首都北京，进而征服中国。日本凭借着优势兵力和先进的武器装备，在釜山登陆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占领了除平安道平壤以北及全罗道沿海一带部分地区以外的全部朝鲜土地。

然而，日朝之间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海战，将日本的美梦彻底粉碎，并最终导致了整个战争的失败。这场海战的领导者就是彪炳史册的李舜臣将军。

早在壬辰卫国战争前夕，李舜臣就预见到日本的侵略意图，发明了龟船。这种船龙首龟尾，船背覆有铁甲外壳，形状似龟。船身两侧各设10支桨，作为行船的动力。在龙头和船身四壁上凿了许多枪眼和炮穴。战斗时，龟船可以四面发炮，进退纵横，敏捷如飞。李舜臣使用龟船带领朝鲜水军接二连三地给日本水军以沉重的打击。

在战争初期的玉浦海战中，李舜臣指挥的水军初战告捷，仅以一人负伤的微小代价，取得了击沉日本战船44艘，缴获粮食300多石的辉煌战果。玉浦海战是壬辰卫国战争的第一次辉煌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朝鲜军队的士气。

在以后的战争中，李舜臣充分展示他的军事指挥才干，多次利用小船诱敌，涨潮时用大船将敌船分割包围的战术，使日军遭受重大伤亡。经过四次出击，完全肃清了对马海峡及其附近的全部敌船，控制了海上主动权，使深入内地的日军在朝中联军的打击下陷入后无援军，又缺给养的境地。

更值得称道的是李舜臣的奋勇杀敌精神。在泗川浦口海战中，李舜臣左肩受了伤，流血不止，但他仍坚持指挥战斗。直到战斗结束后，他才用尖刀挑出弹头。官兵们无不肃然起敬。

由于奸臣的诬告，李舜臣曾在战争期间被下狱治罪，结果，朝鲜水军几乎全军覆灭。李舜臣听到消息，悲愤异常。他在接到复职命令后，不计个人恩怨，立即赶赴上任，并组织了这场卫国战争的最后一场海战。朝中联合舰队在露梁海峡包围了溃逃的日本敌舰。在激战中，李舜臣发现有3个敌将坐在大楼船上指挥战斗，于是先发一箭射死其中的一个，然后集中精锐部队攻击指挥船。这时，李舜臣突然发现部将的战船被敌人包围，形势十分危急，他急忙亲自击鼓率军援救。不料，他左胸被一颗飞弹击中，身负重伤。在垂危之际，李舜臣仍念念不忘打击侵略者，他嘱咐儿子说：“现在战斗正紧，千万不可发表我死的消息，可用防护牌把我盖住，你要继续干，……”话音未落，就壮烈牺牲了。在这次战斗中，朝中联合舰队共击沉击毁日船200多艘，消灭了2万多名敌人。这样，持续7年之久的朝鲜壬辰卫国战争以朝中两国人民的伟大胜利而告终。

在这次壬辰卫国战争中，为了彻底歼灭入侵之敌，李舜臣经常夜不解甲，剑不离腰。他在剑上刻了“三尺誓天，山河动色”8个字，以铭心志。李舜臣不仅是位武将，其文学功底也相当深厚。在战争空隙，他写了不少诗文。例如，“誓海鱼龙动，盟山草木知”，充分表达了他要彻底消灭敌人的决心和勇气；“水国秋光暮，惊寒雁阵高，忧心辗转夜，残月照弓刀”，则真实

再现了他忧国忧民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1604年10月，朝鲜朝廷在论功行赏时，把李舜臣排在第一位，封为“效忠仗义迪毅协力宣武功臣”，并追赠“大匡辅国崇禄大夫议政府左议政兼领经筵事德丰府院君”。

1950年7月13日，北朝鲜政府设立“李舜臣勋章”。

李舜臣英勇无敌的气概及其强烈的尚武精神被誉为在民族面临外敌入侵时，誓死保国的“李将军精神”。

“三·一”精神

有一句大家都很熟悉的话，“欲必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必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朝鲜”。这句话出自日本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日本早就有吞并朝鲜的野心。如果说在中国这么一个强大的汉文化中心身边，有被同化的危险，那是指两种文化之间和平地相互吸引；可是日本要同化朝鲜，用的不是书籍和思想，而是枪支和炮舰！

当日本迈出了这一步的时候，同时也激发了朝鲜民族的“三·一”精神。

1910年8月，是朝鲜历史上一段不堪回首的黑暗日子，李氏王朝正式签署了《韩日合并条约》，从此，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韩半岛顿时风云凝止，三千里江山变色。

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极为残酷。它实行武官总督制，即完全依靠军警力量推行“武断统治”，建立起以“治安”为中心，以经济掠夺为目的的统治体制。

在一片“朝鲜人顺我者生，逆我者亡”的叫嚣声中，日本警宪大肆屠杀朝鲜独立运动人士。不仅如此，日本殖民当局在文化教育方面还实行愚民同化政策，企图扼杀朝鲜民族意识，摧毁朝鲜民族文化。1910年8月，总督府发布《朝鲜教育令》，宣布日语为“国语”，并明确禁止朝鲜人民学习和使用朝鲜语。学校不准开设朝鲜历史和地理课程，学校教育的目标是把朝鲜人变成日本天皇的“忠良国民”。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1919年1月22日废帝高宗突然身亡，成为朝鲜民族独立运动的导火索，引发了朝鲜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三·一民族解放运动。

1919年3月1日这一天，朝鲜的青年学生、农民、工人、市民、中小工商业者等各阶层人民纷纷走上街头，参加这场伟大的民族独立运动。上午10时，在汉城钟路大街的塔洞公园内，聚集了成千上万的民众和青年学生。下午之时30分，学生代表高声宣读了《独立宣言书》。之后，集会群众振臂高呼“独立万岁！”“日本政府和军队从朝鲜滚出去！”“成立朝鲜独立政府！”“自由平等万岁！”等口号。顿时，口号声响彻汉城上空。在这发自肺腑的口号声中，人们仿佛听到整个汉城在怒吼！整个朝鲜在咆哮！此后，集会群众拥向街头示威游行，示威群众分成3队：一队走上外国领事馆集中的街道；一队向德寿宫（旧皇宫）进发；另一队拥向日本占领军司令部。群众一边高呼“日本兵和日本人滚出去！”“朝鲜独立万岁！”等口号，一边散发《独立宣言书》、《独立新闻》、《觉醒号》、《雷民报》、《敬告二千万同胞》、《同胞们团结起来》等宣传品。他们还把无数面朝鲜小国旗撒遍全城。成千上万群众的游行队伍如汹涌澎湃的激流，一齐涌向停放李熙灵柩的德寿宫前，人们对李熙的灵柩行三鞠躬礼，连呼“万岁”。当示威群众由小西门经过日本町的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和美国使馆前时，一名高举朝鲜国旗的青年学

生当场用自己的鲜血书写了“大韩独立”4个大字。此外，有些青年学生在大街小巷发表演说，争取更多的人参加示威游行。许多妇女端茶送水，慰问示威群众，整个汉城淹没在反日救国的狂潮之中。

与此同时，汉城电气公司的电车售票员和司机都举行了罢工；汉城东亚烟草公司及其它各公司、工厂的部分工人也举行了罢工。

设身处地的设想一下吧。在那些攒动的人头中，在一张张悲愤的脸上，在一声声的口号声中，在到处飘扬的血书上，我们是不是感受到了一种无法阻挡的、埋藏在一个民族心灵最深处的力量呢？

据说，汉城的一名巡查郑浩锡亲眼目睹了3月1日的示威后，回家用牙齿将自己的手指咬破，拿出两幅白布，一幅用鲜血画了一幅太极旗，另一幅用鲜血书写了“独立万岁”4个字。他发誓说，为争取国家独立不惜生命。

由汉城点燃的独立运动的火焰，迅速燃遍朝鲜半岛。这场运动从3月1日起一直延续到5月末；4月中旬，斗争达到高潮。运动的规模空前，仅从3月1日至4月底，全国218个府、郡中就有212个府、郡发生了1214次示威与冲突，参加人员达110万。到5月底，运动次数超过2000次，达到150万甚至200万人。运动由城市到农村，由铁路沿线到偏僻地区，席卷朝鲜三千里江山。

这次惊天动地的运动，表现了朝鲜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精神，震撼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的统治，3月26日，京畿道水原郡松山面百名农民在沙江里和平示威，日本警察前来镇压，迫使农民起而自卫。3月28日，500余名农民暴动，打死日本巡查部长。3月31日，与水原郡相邻的安城郡3000余名农民袭击了安城警察署。同郡的另一批农民还捣毁和焚毁了所在地区的警察派出所、面事务所、邮电局，并剪断电线，砍倒电杆。日本深刻地感受到朝鲜民族的巨大的反日力量。

在这次运动的影响下，朝鲜国内兴起了维护朝鲜文化运动，国外设置了韩国临时政府，金日成同志领导的朝鲜人民军在中朝边境开展了反日游击战，直至1945年朝鲜光复。

“三·一”精神是在民族灭绝、被武力同化的危急关头激发起来的强烈民族意识。

几千年来，韩半岛民族面临着种种威胁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不利条件，凭借着对这块土地的热爱和三种精神，依然在风暴不断的历史长河中扯帆前进。有这样一个历史的民族，有这样一个热爱自己土地、国家的民族，韩国在适应了现代化的冲击下的崛起又怎能是一个不可解释的谜呢？

二、民族性格的万花筒

瑞典著名经济问题记者哈肯·赫特巴克曾著书预测日本会成为经济大国。他因此而声名显赫。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从那时起直到1953年他一直以记者身分在韩国采访。当时他对韩国的状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他曾著文断言韩国在经济发展方面绝对不会成功。

然而，韩国自60年代起经济便得到高速发展，这消息很快就传遍世界各地，他也因此失去了信誉。

为了重新认识韩国经济的发展状况，1976年和1977年，他连续两次飞赴韩国，经过访问写下了《新的挑战——韩国》一书。在书中，他写道：“世界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韩国经济如今正以不可阻挡的势头迅猛发展，它将成为第二个日本。”

前后两个结论可谓天壤之别。贝然，后一个结论的做出是由于韩国经济有了高度发展，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4美元猛增到7000多美元，这样令人瞠目结舌的发展速度不得不让人发出感叹。

前一个结论的得出，依据是什么呢？是赫特巴克目睹了劫后余生的韩国人在当时极度贫困的生活，难民、临时栖身的小房子、战争遗留下的孤儿等许许多多惨不忍睹的场景。这样的环境下，赫特巴克做出韩国经济发展不能成功的结论不足为怪。但是，他的错在于断言这个国度绝对不会成功。赫特巴克的早期预言说明，他还不了解韩国人，不了解生活在那一惨状下的韩国人的性格。

1. 朴实、规范化朝鲜人崇拜太阳神，并自称为太阳神的子孙。白色表示太阳之光，故朝鲜人民对白色倍加厚爱，朝鲜民族也被称为“素衣民族”。他们喜欢洁白的颜色：衣饰、房屋墙壁、木格门窗等等皆以白色为尚。素装从头饰到脚上的鞋和袜子都要保持一致，一身洁白。尤其是在节假日里或家族内有红白喜事时更是如此。墙壁要保持洁白，一般不张贴书画。木格门窗上贴的纸，与墙壁的颜色协调起来，绝不贴其它颜色的。尚“白”与尚“洁”有关。从古到今，虽然尚白习俗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尚洁的习俗却一直流传不衰。敬老爱幼是朝鲜人民由来已久的传统。礼貌待人是后代教育中最重要的内容。父母教育子女，要求他们能够文质彬彬待人，自强不息修身礼仪。这种东方式的美德在这里受到极大的重视，成为人与人交往时应有的风度美的重要内容。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要经历这一特殊文化氛围的熏陶才能成为被全民族所接受的一员。

尚白、尚洁到尚礼，是同一条线索的延伸。因此，“素衣民族”选择了那些比较规范化的整洁淡雅的东西作为审美的对象，并把它们凸现在自己的物质与精神天地之中。

例如，韩国的绘画在线条和色彩上别具一格，与亚洲大陆上豪放有力的笔法明显不同，与岛国艺术所特有的色彩艳丽和过分细腻的特点也明显有别。杨柳和云雾不是以豪放、坚毅的线条描绘，而是轻描淡写。对天空、江河和其他自然物体，韩国人极少以强烈的色彩来描绘。浅淡素净的色彩自有其引人入胜之处。

还有一个例子是韩国的服装。男子的基本服装由一件短褂、一条裤子和一件外套组成。短褂的袖口宽松，裤子也很肥大，并用带子将裤脚束在脚踝

处。女子的“韩袍”，包括一件有两根长丝带的短褂，丝带系着一个蝴蝶结，另外还有长长的抽子和高腰长裙。白棉袜和由丝、稻草或橡胶制成的船形鞋与韩袍配套而穿。从图案的简洁和上下线条色彩的协调中可以看出韩国服饰的秀雅。

朴实、规范化构成韩国人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对于韩国迅速经历社会转型，建立新秩序而不出现动荡是很重要的。

2. 乐观、自信

能歌善舞是朝鲜民族的特点，无论男女老幼，每逢喜庆之日或高兴之时，总要欢聚一处尽情歌舞。

朝鲜族先民敬奉仙鹤图腾，其鹤舞从步态到神态基本上模拟出仙鹤漫步舞蹈的特点。脚上的动作较简单：经过高踮、慢抬，然后落下去，后脚紧跟着前脚。上肢的动作较富于变化：两臂柔中带刚，变幻出多姿多彩的舞蹈语言。欣赏时如能参照仙鹤飞动时的姿态，这种舞蹈会给人带来更多更美的享受。它运用诸如“张开双臂”、“母鹤步子”、“小鹤步子”、“背手”等一系列舞蹈语言，渲染凸现了朝鲜族人民乐天的气质和幽默的风采，使传统的风范在现代的舞台上得到确认和张扬。

无论朝鲜的南方北方，举行农乐歌舞多在春天，也经常在生产的重要时节，如插秧、割稻草，有时在修路、架桥、打井、盖房等劳动时歌舞，因此，农乐最能充分表达朝鲜民族的喜悦心情。每逢节庆之日，穿着鲜艳服装的姑娘们围成一圈，将奏乐人围在中心，翩翩起舞，小伙子们也跳入圈中，以活泼的颈部动作转动缀在帽顶上的长带。另外，戴着各种假面具扮成新娘、婆婆、古代宫廷两班等人物的舞乐手们也在在一旁作各种滑稽逗人的动作。从中表现了朝鲜民族自古以来的明朗、乐观的民族性格。

朝鲜人的音乐、民歌和欢快的舞蹈是连结在一起的。这“三位一体”构成了这一歌舞之乡的风情。当你每到一处，你就会有这种感觉：不会唱歌跳舞真是天生遗憾。这里是歌舞的海洋，即便你唱不好跳不好也不要紧，只要你能融到歌舞的激情中与主人分享快乐，就等于答谢了主人的盛情。

从很早的时候起，朝鲜族就喜欢饮酒伴歌舞。他们常常是且饮且歌且舞且醉。在乡下每临农忙结束，人们便聚在一起，饮酒歌舞。每个人在这种聚会中都可以充分显露自己平日的拿手好戏，或歌或舞，或来点幽默滑稽，为大家助兴。这种聚会是相当多的。远方来客或者家有喜事都能引来全村人同享歌舞的快乐。在城市，朝鲜族往往利用过节或家中办喜事之机请来亲属邻里共度良宵。节日往往从孩子们开始。孩子们向家中长者依次敬酒行礼。然后孩子们一起歌舞，全家人则为他们击节伴歌，高潮迭起，有时锅碗瓢盆也都要用来充做乐器。在有节奏的鼓点声中，人们喊着“早它——早齐”（“好”的感叹语），使歌越唱越起劲，使舞越跳越醉人。

在酒歌舞三位一体的盛会中，有真的愉悦，真的美感，真的也是美的生活。这里面蕴含着坦率而又健康，明朗而又幽默的美。

韩国人这种明朗、乐观的性格，使得他们在苦难的生活面前，总能燃起新的希望之火，用满腔的激情开始新的事业。

3. 强悍、明快

朝鲜民族不仅能歌善舞，也非常爱好体育运动，具有节日期间开展体育运动的优良传统。其中尤以秋千、跳板、摔跤、拔河、射箭几个传统体育项目最普及、最盛行。

朝鲜民族的男子们喜欢比技巧、比气力，看谁最强悍。因而，摔跤这项古老的比赛项目至今不衰，其历史可追溯到高丽时代。

朝鲜式摔跤类似蒙古式，但又有不同。比赛双方相对弯腰，右手抓住对方腰带，左手抓住对方系在腿上的腿绳，进行较量。比赛时节一般选在端午、秋夕和重阳举行，最盛大的比赛是在阴历7月15日的百中日。场地大都选在河滩或海滩。全村百姓都来呐喊助威，获胜者可得到一头黄牛，骑在牛背上回家，就像凯旋而归的将军。

拔河是有悠久传统的集体比赛项目。其场面很大，经常是村与村或郡与郡之间的较量。但是这种拔河与我们所熟知的拔河不同。比赛用的绳索不是简单的一根绳子，而是用草绳编成的直径为60—90厘米的一道道绳圈，有二三百米长。由于需要大量草绳，而且比赛又是上元节的一项重要活动，所以一过正月各村的人们就到处搜集草绳，这已是历年形成的习惯。上元节这天中午，人们将编好的圈绳担到比赛场地。场地周围人山人海，有唱歌者，有跳舞者，有饰各种面具的杂技演员和农民乐队，前来助兴。比赛两队踏歌进入场地，每人抓住插在圈绳上约一米半的木棍，号令一下，鼓乐雷动，围观的人们也齐声助威，场面蔚为壮观。

秋千和跳板是妇女们喜好的比赛项目。跳板流传很广，姑娘们自不必说，连孩子和中年妇女也穿上盛装，在跳板上腾空起落，显示自己灵巧的技艺和俏丽的身姿。跳板的花样很多，有时还可合着民族节拍做出各种有节奏的动作。荡秋千也非常精彩引人，少女们穿上白衣，襟垂飘带，下着艳丽的彩色长裙，随着秋千荡漾，长裙在空中飘舞，看起来恰似展翅飞翔的白鹤。这些传统体育活动，充分展示了朝鲜民族强悍、明快的性格特色。

这是一首由朝鲜女性写出的歌：用勇敢向上的快乐的摆渡和腾跃——秋千和跳板。

跳板与荡秋千之俗，在朝鲜风俗中占据着十分突出的位置。这一活动充分体现了朝鲜女性的矫健和轻柔：随着跳板的一起一落，腾空飞起的女性需亮出多种优美的姿势，时而像蝴蝶，时而像仙鹤。更动人的是她们能在凌空的一瞬间完成较复杂的动作：甩开彩扇或钻彩花圈。同样，在秋千的大幅度摆渡中，荡秋千女也以矫健的身姿一曲一直地冲向横在高处的铜铃线。从碰上铜铃开始数起，一下、二下、三下，直到耗尽了最后的冲刺力。每一次摆渡都划出一个很大的优美的扇面，构成一幅极为动人的图画。

4. 三块金牌的底蕴

1992年奥运会在巴塞罗那召开，当时，正值地中海最好的季节。温暖的天气，碧空如洗，巴塞罗那城到处是彩旗和国旗。各国的运动员们云集这里，进行着体力和智力的较量。在他们背后，反映的却是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的精神风貌。让我们来看看其中韩国的三块金牌都体现了什么精神。这三块金牌精神时常挂在韩国金泳三总统的嘴边。

第一枚金牌是韩国选手吕甲顺在射击比赛中获得的，50米外的靶心10环只有拇指盖儿那么大。手臂稍稍地抖动造成准星的哪怕1毫米的移动，都会使子弹偏离整个靶面。因此，从瞄准好直到扣动扳机的那一刻，射击选手们都是屏住呼吸的。要让子弹射中靶心，需要极端的克制、沉着和集中，需要有“求精瞄准”的心理。“取法乎上得其中，取法乎中得其下”。所以，每次射击前，都要尽可能保证发出的子弹能够打中10环，这样才能取得优异的成绩。韩国选手吕甲顺做到了这一点。这种精神不能不是尖端产业中最迫

切需要的心理素质。

第二枚金牌是韩国女子手球队获得的。手球场是一个封闭的比赛场地。它和足球、篮球、排球一样需要整队的配合能力。个人技术是一个层次，整体协调能力又是一个层次。在这次女子手球比赛中，韩国队发挥整体优势，多传球，打配合，终于力克强敌，登上冠军宝座。现在的社会虽然是个性很强的社会，但是如果只强调个性的多样化，而形不成有机的整体，个人的个性也绝不会有生命力。如果没有由多样性凝成一体的智慧，就不能迎接大国的挑战，跨入世界强国之列。

最后一枚金牌是韩国马拉松选手黄英柞获得的。巴塞罗那奥运会的这一幕给人以很深的印象。他不只是因为时隔 56 年取得马拉松的胜利大大提高了韩国在世界中的自尊心。更重要的是他经过长达两小时拼命的艰苦奋斗，最终到达了“死亡之坡”，这种坚定的信念使人们深受感动。突破那“死亡之坡”之后，在 40 公里处，他超过了日本选手，成了世界马拉松比赛的第一名。黄英柞拼命突破“死亡之坡”，而不是在“死亡之坡”上蹲下来，得以完成最后的伟大结局。结局精神是创建韩国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精神素质。在韩国迄今为止的漫长岁月里，韩国人民流下了许多泪水和汗水，也流过许多鲜血。他们面临着一个个“死亡之坡”，可最终都以胜利告终。这三种精神，用金泳三总统的话来总结，就是：用细腻的精神，把七千万同胞在多样中凝成一体，突破“死亡之坡”，用坚韧不拔的精神武装全民族，从而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崛起。

5. 热情、真诚

人际交往中，欧美社会的人具有妥协精神，那是为了维护民主原则；日本人也具有妥协精神，那是为了调节人和人之间或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利害关系，避免引起正面冲突。

韩国人是难以妥协的。之所以这样，正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由于它经历了无数艰难曲折，有过许多因轻易地妥协而遭受了损害的经验。但是韩国人一旦相互了解，他们的态度就不仅仅是妥协，而是会变得异常亲密，建立起相濡以沫的深厚情谊。要达到深入理解的程度，对韩国人来说，需要一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这是由于人们都有鲜明的个性，在相互理解的过程中，又免不了产生磨擦，所以，要经历一个时期。

我们不妨将韩、日的人际交往作一对比。

在韩国，一旦成为朋友，大家就会交往得很深。人们常说，朋友家可以随便出入。事实也确是如此。在朋友家可以恣意行事，家长和那些上了年龄的人们之间也是一样，没必要打个电话事先预约之类。无论什么时间，就是结了婚的朋友家也可以不打招呼便前去探访。

在韩国，朋友的家就和自己的家一样，对朋友的父母也同样称呼“爸爸”、“妈妈”，对朋友的弟弟也叫“弟弟”，两个家庭，亲如一家。

在日本，像韩国这样交往颇深的朋友关系则为数不多，那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归属集团。韩国人则更看重与家族之外的好朋友的交往。

韩国人在交往中不计较利益的得失，很重情感的交流。

举个例子，韩国人与他人相遇时，同龄人自不待言，就是和上级或是和下属相遇，也一定会握手致礼，而日本人则很少握手，只是鞠躬。握手礼是通过身体的接触来表示相互间的亲密情感，而鞠躬的形式则过于严肃，它重视的是礼节本身而不是情感的交流。

还有一例，韩国人在招待客人时非常热情，情同骨肉。在很多时候，为招待客人，不惜慷慨解囊，甚至倾其所有。自己再贫寒，也决不怠慢客人。日本人却不是这样，两三个人一道出游，费用是均摊的。

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整个韩国社会内人际关系融洽、自然、协调。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家庭。这样的氛围很适合每个人发挥自己的才干，愉悦地工作，也有助于整个社会休戚相关、共渡暂时的困境。

当然，韩国人的性格还远远不止这些，这只是其中几朵美丽的浪花。这里要强调的是，韩国人的这些性格不是最近十几年或几十年，乃至上百年形成的，是世代代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经过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逐渐沉淀在民族的血管里。它们已经融合在民俗、生活、工作的各个方面。所有这一切使得韩国人在深刻地改变着他们周围的社会。

成就是暂时的，再好的成就也要突破，再好的社会也要向前发展，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芳林新叶催陈叶”。但是，一个民族的性格，一个民族的精神却是永恒的。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应像那位瑞典记者一样，由于看到当时的困境就武断地做出否定的结论；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不会对韩国的高速发展感到困惑；理解了这一点，韩国之崛起还会是个谜吗？

三、似曾相识的习俗

古人云“千里不同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然而中国与韩国彼此相邻，同属于东方文化圈。韩国民风中留下了不少中国文化的遗痕，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特色。人们从千姿百态的习俗中可以窥见韩国民族的个性。

1. 传统的岁时节令

在传统的韩国社会里，多使用的是阴历，绝少使用阳历。韩国的传统节日有正月春节、正月十五、观灯节、五月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九节等等。

春节是传统韩国生活中最为隆重的节日，与中国一样称为“岁首”、“元月”。节前要制作大量的节庆佳肴，临近除夕子夜时分全家人团坐在炕屋上守岁。阴历节这天，男孩子放风筝，姑娘们跳跳板，大人们也要通过各种形式来表达驱邪和祈祷丰收的心愿。春节时要祭拜祖先，又要拜家中老人长寿，老人则送子孙们“压岁钱”。

清明节——3月3日，人们要准备一些酒菜，到先人坟前奠祭。

五月端午节是一年中除春节以外最大的传统节日。5月5日这天，妇女们要用菖蒲煎水洗头，据说可以使头发更秀更密。还要用菖蒲的根削成簪子，上刻“福、寿”字样，插在头上，据说这样可以去邪。有的地方还搞“端午祭”，由巫女们跳舞念咒，男佣们演假面剧，人们则在祭坛前祈祷上苍。最具代表性的是妇女们荡秋千。在大树下或秋千架旁，身着艳丽民族服装的妇女，或单人或双人，在人们的注目下，踏上踏板，荡向蓝天。彩裙在空中飘舞，还进行各种比赛。朝鲜古典小说《春香传》，写南原府李翰林之子李梦龙和艺妓月梅之女春香之间的爱情，就是从李梦龙在端午节这天看到春香荡秋千的优美倩影而引发出来的。

七夕节，即7月7日，妇女们要向织女祈祷，以求自己的针线活有所进步。

八月十五中秋节与中国相异较大。此日，全家人各自不论供事何处都要回到家里团聚，还要到坟地看祖。韩国人极重孝道，中秋节子女能否回家拜见双亲长辈是衡量子女孝与不孝的重要尺度。

2. 生死婚嫁礼仪多

一个人从生到死要经过几个重要阶段。

首先是生育。妇女怀孕后，整个妊娠期，为了使孩子聪明、健康，有许多禁忌。饮食方面，不食鸭肉、兔肉、猪肉，据说，鸭肉会使孩子脚长蹼，兔肉会使孩子长红眼睛，而猪肉则会使孩子皮肤粗糙。在行为方面，最常见的是席不正不坐，耳不听淫声，目不视恶色等。孩子出生后，举行的仪式有百日诞、周岁诞。过去，由于婴儿死亡率高，要到快满100天才给孩子命名，现在大多三日内即命名。通常按祖谱的规定，再配上一些吉祥的字，如福、寿、禄等。在孩子满百天时，要由姑母第一次给婴儿理发，第一次给婴儿穿上花衣（之前只穿白衣），要像过节一样，用米饭、海裙菜汤、打糕等招待前来祝贺的亲朋。

对孩子来说，最隆重的要算过周岁生日。这天，最有特点的是“穿周衣”、“吃周糕”、“抓周”。在亲朋的一片祝贺声中，母亲开始给孩子“穿周衣”。如果是男孩，就要穿粉红或七彩上衣、七彩长袍、蓝背心、紫红色或灰色裤子、布袜，系吊袋；是女孩，则穿七彩上衣、殷红长裙、布袜，戴遮耳，系

吊袋。经过这么一打扮，孩子显得花枝招展，喜气洋洋。然后是让孩子吃“周糕”，有糯米做成的打糕、方糕，米面做成的蒸糕、带馅的“松片”。打糕象征坚韧，“松片”象征充实，白雪糕象征贞洁、长寿。最有趣的是“抓周”。就是在桌上摆上各种东西，让孩子伸手去抓，根据第一次抓到的东西来推断其将来。是男孩，摆上弓、钱、纸、墨、书、米、枣子等，是女孩，摆上米、面条、墨、尺、刀、针、线等，各有象征。不论抓到什么，人们都要说些吉利的话。

接下来对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婚礼。从现今中老年的经历来看，整个过程大致分为议婚、婚礼式、后礼三个阶段。

现在的韩国人一般都实行晚婚，但直到本世纪四五十年代，却仍习惯于早婚，按习俗，男女满16岁即可成婚。过去，男女的婚事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作父母的一件大事就是为子女操持婚事。父母亲在为子女物色配偶时，很重视对方的门第，讲究“门当户对”，但决定婚事成败的是“宫合四柱”，即所谓的“合八字”，一旦选定，便要托媒说亲。通常媒人不只一个，开始先到对方刺探有关情状，然后由叔伯和姑娘中一人来回传递信息。经过一番来去探访，觉得合适后，才是家里人到对方家“相亲”。当双方经过深思熟虑，同意联姻，两家的主婚人之间便开始交换书信，内容是送四柱、择日、请婚和许婚等项。其中最重要的是送四柱，又称“纳采”，即由男方主婚人将男方的生年、日月时封好，连同请婚书一起送到女家。女家接收四柱即意味着承认婚事，如果接受后又罢婚则形同离婚。所以对女方来说，四柱是异常珍贵的，一定要好好保管，婚后也放在衣柜里珍藏一辈子，女家通过媒人同男家商量后，便将婚期写成“择日单子”连同许婚书一起送回男家。这之后，男家要选一个吉利的日子，由媒人带着礼单，派人背着装有衣料、被料、棉花、大米等的包袱，到女家“送服”。

婚礼式是整个婚礼的最重要部分，以新郎为中心进行，包括大礼、小礼、东床礼等。婚礼式在女家进行。这天，新郎先要在家里举行两种仪式，一是祭奠祖先，二是请来巫人，祈求新郎一行平安。然后新郎动身到新娘家，这叫“初行”。跟随新郎身后的亲戚朋友等多人，称作“后行”。在快到新娘家时，新郎要找一间房子驻足作短暂停留，这叫“私处”。在此，新郎换穿官服，一行人吃一点新娘家送来垫肚子的饮食，等待良辰到来即刻起行。来到新娘家跟前，新娘家要派人欢迎。在新郎一行到达前，背箱礼的老大爷抢先赶到新娘家，由新娘家一名多福的女子接过箱，打开箱盖，伸手随手摸出一件衣料，如是青色，象征新娘喜得贵子，如系红色则为千金，时辰一到，新郎则来到大礼厅，只见他头戴乌纱帽，身着文官服，脚踏黑靴，好生气派。通常，大礼厅设在新娘家前院，上搭棚、下铺席，后置屏风，中央设大礼台。台上放着象征多产的大米、板栗、鸡，象征长寿的枣子，象征永不变节的松竹，象征琴瑟的青红丝。整个仪式由村中一位知书达礼的老者司行，新人等按照他的呼唤依次行礼。首先，女方主婚人来到门外作揖迎接新郎。新郎随即来到小桌前，接过“雁夫”的木雁，并奉送给女方主婚人，女方主婚人接过放在小桌上，新郎起身后退二步行再拜礼。这时新娘的母亲用裙裾包起木雁，扔进新娘住的里屋。据说，木雁立着，意味着头胎生男；木雁躺着则为女。这叫“奠雁之礼”，又称小礼，因为雌雁与雄雁只要交尾一次，就绝不与别的雁交尾，所以借以表示有信和贞节的心迹。接着，行“交拜大礼”。新郎来到大礼台东侧，南向仁立，新娘头戴华饰，穿青褂，着红裙，罩阔衣，

走到大礼台西侧，站在新郎对面。新娘向新郎拜两次，新郎回拜一次，并且双方相互再重复一次才原地坐下来。交拜礼毕，还要行“合卺之礼”。在新郎新娘面前各摆一小桌，上放酒盏和酒菜，由旁人斟酒，新郎新娘作饮酒状，连续两次，第三次则在新郎的酒杯绕以青丝递给新娘，在新娘的酒盏绕以红丝递给新郎，二人同时饮尽。到这里，大礼就算结束，守在一旁的亲朋将板栗和枣子塞进新郎的口袋里。

随后，新郎新娘来到屋里，互相对视，行“相见礼”。新郎再到另屋，脱冠卸带，换上新娘家制作的衣服，来到上客屋里，拜见上客，报告大礼已毕。接着，女家便请新郎和上客吃“大桌”，事实上，人们并不举箸，只是走走过场，很快便撤下去，装在篮里，送往新郎家。这叫“床需”。男家的家人和邻朋尝着女家送来的饭菜，借以了解女家的烹饪手艺和接人待物的品性。

当晚，新人二人在女家里屋度过新婚之夜。屋里铺好被褥，置以屏风。新郎新娘盘腿而坐，家人端来酒菜，一对新人双双举杯。之后脱衣熄灯。这时间年轻人向房中偷窥，称为听房。第二次早饭罢，新郎才由人领着拜见岳父母等亲戚。片刻后，妻家和邻里年轻人便开始捉弄新郎，这叫“东床礼”。人们给新郎出难题，要他作答，以考验他的聪明和胆力。如果回答不利索，就用绳子捆绑悬起来。这时，岳母不忍新郎受苦，赶紧为年轻人摆酒，为新郎求情。新娘虽然也会站出来求情，但更重要的是借以了解新郎的为人，而对新郎来说，则是平生最大的一次考验。

新郎在新娘家住了两宿，到第三天，便偕同新娘一起回家，新娘来到婆家叫作“新行”。新娘坐的轿子用各种装饰盖之，借以驱鬼避邪。在新郎家门口燃堆柴火，让新娘跨过，以示洁身。新娘进屋，稍事打扮，便要出来拜见长辈、公婆，并同伯叔姑嫂互拜。从第二天起，新娘连着三天向公婆请安。过了三天，新娘就要下厨做饭，第一顿饭常常要掺和些从娘家带来的小黄米与红豆。之后回娘家觐见。

婚后，丈夫与妻子一般都能同舟共济，白头到老。他们很重视处女的贞操，绝不允许婚前有不轨行为。现在，韩国的城市大多已改行新式婚礼。其中作为婚礼中重要的大礼与小礼，多在礼式场进行，且有很大变化，但其整个格式仍旧保持着传统的色彩。

人到六十周岁又回到自己出生的本相年，其时要进行盛大的“回甲式”贺寿宴。回甲仪式是人生最大的生日仪礼，认为人过六十即可长寿。“人生七十古来稀”，届时举行“古稀宴”。

人活到生命的尽头，就要故去。丧葬之礼在韩国极受重视，其礼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很大。在韩国，自古以来将儒家思想奉为理念和道德规范，这在丧葬仪式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丧葬礼主要过程是招魂、收尸、告丧、洗尸、大小殓、具服、置葬等。丧眼依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亦不同，与儒家的五服丧制相同，包括斩衰、齐衰、大功、小功和鳧麻。五服丧制表明韩国民众社会是父亲中心的家长制社会。墓基的选择最重视土层厚、水位低的基准。人们认为墓地选择好坏、吉凶，直接影响后代子孙的贫富、贵贱、寿夭。韩国葬制历代以土葬为主。丧葬仪式之后，给亡灵祭祀。同中国民间传统一样，在丧葬以后，丧主们根据同死者的亲疏关系，守孝一段时间，长则三年，短则三月。在守丧期间，不能成婚，如果父母去世，更是要严守此规。

3. 深受儒家影响的家族习俗

韩国的家族习俗具有浓厚的儒家思想色彩，家庭是构成一个社会的内核。长期以来，韩国是父系制社会，父权在家庭里占有绝对地位。韩国人除重视亲属关系外，还重视宗族关系。每一门中都有族谱，记录各成员之间的关系。韩国人的姓氏与中国人的姓氏有密切关系。高句丽自一世纪起，百济自四世纪，新罗从六世纪起，才使用姓氏。韩国人的姓氏以单姓为多，复姓也有。常见的单姓有金、朴、李、崔、张、郑、林、安、姜、吴、洪、朱、白、尹、曹、申、康、许、柳等；最常见的复姓有司空、诸葛、皇甫、东方、南宫、鲜于等。

除此之外，在家庭关系、家族交往和家庭中每个角色的认定和要求上，韩国都同中国的传统有相似的一面，这是同中国对韩国的历史文化影响难以分开的。

第三章从汉江到浩瀚的太平洋

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世界经济发展，可以用“奇迹”来概括。在战后的废墟中挺立起来的德国和日本可谓奇迹，1968—1974年间震撼世界制造业的巴西亦堪称奇迹，而自从六十年代末直至九十年代，世界的经济奇迹移师东方，在西太平洋和南中国海上，升起了四颗灿烂夺目的新星——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世人称之为“亚洲四小龙”，它们的增长吸引了各大洲人们的眼光，激发了人们对于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民族心理、传统文化、开放与封闭、秩序与自由的新一轮思考。东方人又来了，在久违了的一个多世纪之后，依然是那么充满自信、温文尔雅，只是他们带给世界的不再是汉家的丝绸和盛唐的三彩，而是西方工业文明赖以骄傲的汽车、微电子产品、钢铁和金融、贸易服务业，正如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所预想的那样“师夷长技以制夷”。四个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标志着世界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四条小龙的腾飞，各有各的方式。中国的宝岛台湾，土地肥沃、气候宜人，物产丰富，加上1949年在这一弹丸之地所聚集的大量资金、设备和管理、技术人员，使这一地区成为“亚洲识字率最高的地区”，结合美国出于政治、经济目的而输入的资本和技术，它的发展便不足为“奇”了。香港，介于东西方两大世界之间，其独特的地理和政治地位，使之取代上海，填补了远东海运、贸易和金融中心这一真空，亦足以认为是时代的机遇。新加坡，扼守马六甲海峡，审时度势地建立起自由港和金融业、制造业。在战后中东石油东运日本的必经之路上，取得了一份丰厚的“级差地租”。唯有韩国，以其隅居东北亚的小国身分，做起了惊天动地的大买卖——在短短二十年间，从一个遍地农田的自然经济国家一下子成为财阀林立的工业化国家，它拥有钢产量世界第二的大企业，它生产的汽车正以其价廉物美而威胁丰田、日产、福特、通用等老牌的市场份额，它的建筑承包商无处不在，被戏称为“足以承包地球”……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竟是这样一个小国所为。这才是真正的“奇迹”。

但是韩国人并不满足于此，在屈辱的《江华条约》和《日韩合并条约》签订之日起，一百多年来，自强、腾飞是他们的梦想；超越东邻日本，是他们的具体目标。当英国《金融时报》的评价——“凡是日本能做到的，无论是什么，韩国会做得更好”——传到汉江平原上时，也许那位百年前饱尝屈辱的李朝德宗皇帝李熙会感到一丝欣慰，而曾经身为“朝鲜总督”的伊藤博文却无法接受这一事实。

这就是“奇迹”——不可思议，然而却是事实。

一、“攻”“守”之间：发展战略的抉择

如果粗略地进行划分，在本世纪，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主要处于两大地区——亚太和拉美。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拉美各国已着手进行工业化，“发展主义”的号角响彻安第斯山时，亚太各国基本上还处于殖民与封建的双重奴役之下，所以，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上，拉美各国先行了一步。然而，时过境迁，到了本世纪末，拉美却远远没有完成当初的设想，仍然处于发展的“漩涡”中，石油的开发、产业结构的多元化，投资的增加，都没有使经济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各国发现自己走了大半个世纪，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依然是贫富分化、依然是收支逆差，所不同的是又增加了巨额外债和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和城市贫民……这标志着以拉美为代表的进口替代发展模式的彻底失败。进口替代思想源于一批第三世界结构主义经济学家的“中心—外围”理论和“世界二元性”学说。这一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后，源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不平等，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主要是初级产品，而发达国家则主要以制成品输出到世界市场中。由于技术进步主要集中于制造业，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不仅在初始状态，而且在增长速度上，都低于发达国家，因而前者产品成本更高，利润更低。这样，世界就形成了以发达国家为“中心”，发展中国家为“外围”的二元结构。要改变这一状况，发展中国家必须进行工业化，实行进口替代，以民族工业来取代占据本国市场并获取超额利润的外商。公允地说，这一思想逻辑清晰，切中要害，不失为发展的一条途径，但是，进口替代思想仅着眼于一国和国内市场，对于像美国、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国内市场容量大，固然产业发展的潜力很大，但对于拉美和亚太的诸多小国而言，要取得长远的发展，必须把目光放得更远，盯住国际市场。出口导向，寻找市场，成为产业发展的基础。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这是一句尽人皆知的名言。它出自巴西球王贝利之口。可叹的是拉美人在足球场上完美地贯彻了这一宗旨，因而所向披靡；而在世界市场上却一味防守，力图以“进口替代”确保城池不失，殊不知在这一日趋开放的世界上，一味死守是毫无出路的。韩国，这支跻身世界市场的新军，以“防卫反击”打法，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块天地。

1. 稳固后防：进口替代战略实施阶段

韩国的经济并非是一幢空中楼阁，它的起飞也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在战后到朝鲜停战初期，韩国经历了一场持久的经济灾难。由于连年的战争摧残，国民经济濒于崩溃，工农业生产急剧下降。从工、农两大主要产业看，工厂数目下降，失业人数剧增，粮食产量下降，耕地面积减少，另外通货膨胀严重。具体而言，1941—1948年，工厂数目从6328个下降到3808个，减少了40.3%；职工人数从149242人减少到105696人，减少了29%；工业总产值下降了83%；粮食产量下降了18.9%，耕地面积减少了近二成。以1936年的物价指数为100，1946年猛升为22100，1947年达到40200，1949年更增至81000，通货膨胀之巨可见一斑。战后初期韩国的对外贸易基本上是对美双边贸易。按照韩国政府1946年1月发布的第39号军政法令，美国完全垄断韩国的对外贸易，1946年，韩国出口总额仅36万美元，进口总额4949.6万美元，贸易逆差达4900多万美元；1949年，贸易逆差增至11400万美元。

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韩国面临着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严峻考验。

面对本国薄弱的产业基础，韩国政府以美国援助为经济支柱，制订并实施了“经济复兴计划”。计划要点是：第一，以发展消费品工业（轻工业）为主，实现面向国内市场的工业化；第二，通过消费品工业带动生产资料工业（机器制造业和材料工业）的发展，逐步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给；第三，投资来源主要靠“美援”（美援金额占国内自有资金的两倍以上）；第四，利用“美援”引进大量机器设备（占美援总额的70%以上）。

在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期间，韩国政府采取了许多具有浓厚的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措施。

第一，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韩国对进口产品普遍开征高关税。对于准备由本国制成品代替的消费品征收高额关税，以限制甚至完全禁止国外工业品进口；对于某些奢侈品更是高额征税。而对于本地区生产所需原材料、半成品，则征收较低关税。而食用谷物、非竞争性设备进口则是免税的。对于国家重点进口替代项目所需中间产品和机器设备也免征关税，以降低生产成本。同时，韩国政府还采用进口许可证等数量限制的方式，进口得到了政府的直接控制，以缓解国际收支的压力。

第二，以外汇管制和多重记率实行奖出限入政策。

依据当时的韩国外汇结汇制度，出口商的外汇收入能在自由市场上以较高的市场价格转换成外汇结汇证，通过汇兑使出口商的实际收入增加了。同时还实行出口——进口挂钩制度，出口商可以按较低的汇率和关税进口生产所需的投入品和资本品。对于进口商，则国家严格控制汇兑，使得进口变得无利可图。

第三，在信贷与投资政策上实行倾斜。

韩国政府给予替代进口产业以低息贷款。对于某些急需发展的重大项目，贷款条件更为优惠，这样，企业建设与发展的成本大大降低，产业起飞获得了一个相对优越的环境。同时，为了保护民族工业、限制资本所得外流，政府禁止外商直接投资。

所有这些政策都带有浓厚的保护主义特征，其目的都是为民族工业造就一个“温室”。在温室培育中，韩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首先，国内市场的开拓和保护促进了以日用消费品工业为先导的经济增长。据统计，在1953—1962年间，韩国的GNP年增长率为5.1%，其中工业总产值的年增长率为10.8%，恶性通货膨胀得到了抑制，经济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其次，随着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韩国的单一农业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农业仍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粮食总产量在1952—1957年间增长了30%；另一方面，农业总产值在GNP中的比重却由1953年的50.4%下降到1962年的45.2%，同期新兴工业的比重却由10.6%上升到17.1%，经济结构日趋多元化、现代化。

再次，韩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促进了贸易结构的合理化，初级产品出口比重从1955年的81.6%下降到1963年的11%，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则相应地大幅提高。在进口结构中，消费品所占的比重相应减少，进口替代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和资本品的进口急剧上升。

最后，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改善了韩国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工业部门，食品、轻纺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得到了迅猛发

展。

这一系列的结构变迁，都为未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按照英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来划分，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属于“为经济起飞准备条件”的阶段。虽然在这一时期韩国并未取得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增长，但它却是一个农业社会工业化必不可少的关键步骤。因此，无论后人如何评价进口替代的功过，它都是不可逾越的。

2. 转守为攻：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

在经济恢复进程的逐步深化过程中，进口替代战略也相应地走到了它的尽头，这一战略思想在实践中所带来的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并日益深化。

第一，实施进口替代经济发展战略，形成了具有内向型特点的产业结构，这种产业结构遇到了国内市场狭窄的矛盾。由于普遍存在的贫穷，韩国人民的购买力十分有限，产品很难有广阔的销路，尽管在政府的扶植与保护之下，生产有了较大发展，但是过剩的生产能力只能导致开工不足，设备闲置等人力、物力和财力浪费的现象。

第二，实施进口替代经济发展战略，着眼于当前需要的日用消费品的生产，使有限的资源得不到最为合理的配置，经济结构和贸易结构仍然是不平衡的。出口的产品仍然是附加值较低的农产品、水产品和矿产品，而这些产品受自然条件限制较大，出口增长率较低，盈利的潜力也是有限的。与此同时，进口替代工业部门所必需的大量原材料和资本品的进口却在进一步扩大外汇支出。因此，贸易赤字仍然得不到压缩。

第三，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导致了企业生存的“温室效应”，效益很难提高。如前文所述，为使本国产品免受国外同类产品的竞争，韩国政府制订了一系列严格的保护贸易政策，使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的企业都能较容易地得到高额利润，因此，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不重视改善经营管理水平和更新设备以提高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旱涝保收的经营心理使企业没有风险意识，产品因而缺乏国际竞争力。政策优惠是具有“刚性”的，一旦给予便很难收回。企业处于温室之中，无形中增加了政府的负担——正如母亲面对一个永远无法“断奶”的孩子。

在诸多弊端的重压下，韩国意识到了变革的呼唤，目光投向了动荡不定但又极具诱惑力的国际市场上仍正如韩国贸易协会会长朴忠勋所说：“像我国这样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只有从国外引进本国所不足的原材料进行加工，以赚取外汇，而用这些钱来充当必要的经济开发的财源。因此，无法不走出口立国的道路。”

纵观国内产业发展所需的诸多因素，韩国政府和企业家都一致认为出口导向工业化的时代已经来临。

首先，韩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且成本低廉。产品要进入世界市场参与竞争，最基本的两个条件是产品是否“完美”，价格是否便宜。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国家，由于技术、工艺的限制，产品的完美程度显然低于发达国家，但是，低廉的价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产品的不足。韩国拥有一支吃苦耐劳且工资低廉的庞大劳工队伍，这是韩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展开价格竞争的基础。

第二，经过进口替代，国内已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以轻纺工业为龙头，化工、钢铁各业也大有潜力可挖，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已具备了一定的基础。

第三，工业化所需资金来源较为稳定。韩国具有东方社会所特有的勤俭

节约、重积累轻消费的民族性格，因而在经济进步时期，一旦个人的基本消费需求得到满足，其收入的边际储蓄倾向（即每增加一单位收入相应增加的储蓄额）是很高的。这部分储蓄是韩国生产性投资的基本来源之一，从 1962 年至 1968 年，韩国居民储蓄额占 GNP 的比重从 4% 猛增至 17.5%。同时，韩国政府给予企业利润的再投资给予减免税的优惠，企业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相应得到了提高。另外，在 1954—1960 年间，韩国接受了高达 18.8 亿美元的“美援”，占韩国投资总额的 65% 以上，这此投资大大推动了韩国工业部门的发展，带动了日后成为韩国支柱产业的纤维、化工的起飞。客观地说，韩国在选择出口导向的主导部门时，利用美援所形成的现有工业基础也是不容忽视的考虑因素。

从国际条件来看，韩国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的实施正好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目光敏锐的韩国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并牢牢地把握住了机遇。

在战后的二十年中，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一个发展相对稳定的黄金时代，欧洲各国在马歇尔计划的推动下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主导着各国的经济政策，私人需求和政府需求的不断扩大刺激着整个世界的繁荣。首先，经济增长带动了资本、技术的国际化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按照西方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分工理论，各国按自己的比较优势向世界市场提供产品，西方发达国家丰裕的是技术和资本，因而率先发展高科技仍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欠发达国家则以劳动力为首要的丰裕要素，所以就存在着以本国的廉价劳动力结合国外资金、技术进行生产，向世界市场提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可能性。其次，经济增长的需要给技术进步提供了强劲的推动力。在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这短短的二十年间，电子计算机、生物工程、光纤通讯、新能源、新材料的开发为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提供了一个又一个崭新的手段，生产力成倍提高。这些技术成果又反过来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技术的日新月异为韩国这样的后起之秀提供了绝好的发展机遇——它不必在更多的成本对原有企业进行改造，只需要充分地引进先进技术，就可以形成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具有企业经营常识的人都知道：对一座老企业进行技术更新往往比建一座新企业的投入更大。韩国正是以引进新技术而使自身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惊人的地步。第三，贸易和投资的国际化也给韩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以美国为首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在六十年代的两轮多边贸易谈判使缔约国间的贸易壁垒得以减弱，为韩国产品的“大进大出”提供了可能。1964 年 5 月至 1967 年 6 月，关贸总协定“肯尼迪回合”谈判又规定了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普惠制待遇”，即发达国家单方面对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工业品大幅度减让关税，规定在 5 年间下降 35%；同时还规定美国和日本降低关税 10—11%，欧共体降低关税 7%。此外，美国的“801 号关税法案”特别规定：“凡是装配美国产零件，以及用美国产零件组装的产品输入美国时，可免除相当于增值部分的关税。”这也为韩国产品日后打入欧美市场提供了条件。60 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增长日趋平稳，资本回报率偏低，导致大量资本输出，这些资本的输出往往是低息的或附带优惠条件，使韩国置身于良好的国际融资环境中。

在这一良好的国际环境中，韩国审时度势，捷足先登，充分利用“三低”（石油价格低、美元汇率低和资本利息低）的发展良机，以发展外向型经济，开拓国际市场为突破口，进入了经济的起飞阶段。

二、窗口听涛：出口=“自由”

强烈的出口意识和占据国际市场的观念把韩国从汉江推向了太平洋，韩国政府和企业打起了陆海空协同的歼灭战，拉开了经济特区建设的序幕。

韩国的经济特区主要有两类：出口工业区和出口自由贸易区，其核心就是出口。1964年9月，韩国政府颁布了《出口产业基地开发建设法》，根据保税加工贸易所规定的条件，在交通运输方便的沿海地区大量建立出口工业区。

韩国的出口工业区有以下特点。

第一，数量大。

从建设法颁布之日起截止到1987年6月，在韩国不到1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共诞生了40个出口工业区，区内进驻企业3700余家，40个工业区的出口额约占韩国制造业出口总额的50%左右。

第二，集约化、专业化经营。

韩国的每一个工业区就是一个工业出口商品生产基地，产品基本按区生产经营，不存在地区间大而全、小而全、自成体系的“诸侯经济”模式。例如，浦项是钢铁出口基地，钢铁出口占全国的60%左右；昌源工业区是综合机械产品的出口基地，区内有企业120多家，雇员100万人，投资额逾百亿美元，全区机械产品的生产量和出口量占全国的50%以上；温山工业区是有色金属产品的出口基地，1979年温山铜冶炼厂的年产铜量为8万吨，占全国铜产量的57%；丽川工业区是化工产品的出口基地，1979年该区的石油化工产品的生产能力（以乙烯为标准）为35万吨，占全国生产能力的70%。

第三，规模大，竞争力强。

韩国政府和企业界认识到，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企业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因而韩国的出口工业区主要是大企业的聚集地，垄断性强，竞争力高。例如，蔚山工业区内依靠日本设备和技术建设起来的拥有100万吨位造船能力的造船厂，建成后却成为日本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在国标投标中，多次以比日本厂商低得多的价格与买方达成交易。目前，韩国在世界造船业中的地位仅次于日本。1987年，韩国得到的造船订单为149艘，总吨位416万吨，占当年世界造船市场份额的30.2%。

在大力建设出口工业区的同时，韩国政府又于1970年1月颁布了《出口自由区设置法》，在出口自由区内实行特殊优惠政策，保障投资环境，产品全部出口，吸引外商投资建厂。韩国先后建立了马山和里里两个出口自由贸易区。在这两个自由区内，政府给予了最大限度的政策倾斜——财政拨款兴建公共设施、没有标准厂房、仓库供投资者租用，金融、服务配套设施一应俱全：“栽下梧桐树，招来金凤凰”，出口自由贸易区在短短五年的发展进程中，就吸引近1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

资。

韩国出口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基于两个基本目的，一是以出口带动企业发展和经济腾飞；二是引进外资的同时，能吸收世界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动本国的制度创新。从出口自由贸易区的经营实质看，两个目标都基本达到。首先，两大出口自由区在1970年建区时的出口额仅有1.5亿美元，1975年就增至11亿美元，到1985年进一步提高到59.6亿美元，成为韩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一支生力军。但是，出口自由贸易区更为深远的意义并不在于此。

韩国把自由区更多地当作制度创新的窗口，在整个七十年代，韩国的企业家、普通职工都在这一窗口中看到了世界的运行现状，学到了从经营管理到国际惯例、从规模生产到技术工艺的一系列新东西。正如韩国产业研究院的一位高级研究人员所指出的，出口自由区所给予外商的优惠政策可以看作是韩国对外学习所缴的学费，而真正受惠的是韩国本身。

我们从韩国出口工业区和出口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发展中可以看到，无论是产业发展还是自由贸易，都离不开“出口”二字。即使在马山出口自由区，政策优惠也是有一个基本前提的，即产品必须百分之百外销，所以，“自由”不是无条件的。韩国政府此举即在于告诉内外厂商：要想获得自由，那么就请出口。

窗口已经打开，汉江的滚滚波涛汇入了浩瀚的太平洋。也许，面对海洋宽广无垠的胸怀，汉江会感到自己的渺小；然而，经历了近百年苦难的朝鲜人深深地意识到，只有融入这个世界，才能不被世界抛弃，于是，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世界，而结果呢，是世界选择了韩国。

三、造就“金字塔”：出口导向与产业结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货币主义”学派的“掌门人”米尔顿·弗里德曼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是嗤之以鼻的。他曾撰文把落后国家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比喻为“建造金字塔”，他说：埃及的金字塔除了观赏以外，毫无用处；埃及为发展民族工业而建造了自己的钢铁厂，这些钢铁厂正如金字塔一样毫无用处，因为埃及直接从发达国家进口钢材所需的成本要远远低于建造一座大型钢铁企业的成本。不容否认，从单纯静态的、抽象掉非经济因素的经济意义上讲，这一论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由此带来两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第一，发展中国家是否真的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实现由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飞跃？第二，发展中国家是否只能按自己的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决定自身在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韩国人不信邪，他们响亮的回答是“不”。首先，日本在近代的起飞引起了他们的浓厚兴趣，他们发现，制度创新可以带来经济发展，最终使自身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贫瘠的自然资源并非经济增长所无法逾越的障碍，这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平等竞争，市场不能排斥任何一个竞争者，发展中国家同样有资格进入市场，只要它提供的产品为消费者接受，它就获得了成功。韩国人以其直观的思维方式开始了重构产业体系的实践，在汉江边建造起一座雄伟巍峨的金字塔。

1. 纤维工业——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先驱

1967年，韩国“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以“出口第一主义、出口导向策略”作为经济发展的总方针，随之而来的第一个问题是主导产业的确立问题。针对韩国经济的具体状况，韩国以轻纺工业的优先发展作为工业化的起点。

当时，韩国工业底子薄，自有资本严重不足，没有兴办重化工业的实力；技术人员的缺乏和工人操作水平的低下又使韩国不具备建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能力；另一方面，韩国资源贫乏，不能像中东产油国那样简单依靠出口自然资源来发展本国经济。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利用本国丰富的人力资源，先发展投资少、见效快的轻纺工业，通过轻纺工业产品的出口来积累资本，逐步发展其他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韩国的轻纺工业优先发展的主要途径是发展加工贸易，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和半成品，雇佣当地的劳动力进行加工和装配，然后把制成品返销国外。这就是韩国工业化初期“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劳动集约，高附加值”的出口导向产业发展模式。

在轻纺工业中，纤维工业是主导部门，包括棉纺、毛纺、丝纺、化纤以及针织、成衣、染色、加工等诸多行业。1964年，韩国政府颁布《纤维工业实施临时措施法》，通过更新设备、扩大企业规模、提高生产效率，大力促进纤维织品的出口，在整个六七十年代，韩国纤维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一跃而成韩国最大的出口产业。1962年，纤维产品出口额为300万美元，1980年增至50亿美元，1986年达到87.34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25.2%。可见，纤维工业的发展及其出口在韩国经济发展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六十年代的起飞到八十年代的结构调整，韩国的纤维工业也经历了一个从成长、兴盛到逐步衰落的过程，由工业化的主导产业变为夕阳工业，但它给予韩国经济腾飞和结构调整的支持，是功不可没的。第一，纤维工业适应韩

国工业化起步阶段的结构特征，节约了资本，实现了劳动集约经营，为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三大目标作出了贡献。一般来说，纤维产业人均资本装备率比较低，为制造业平均水平的 88%，其中服装业最低，仅为 25%；相反，其劳动集约程度为 9.5%（劳动集约程度=工资成本占总制造成本的百分比），明显高于制造业平均水平的 8.9%，其资源集约的程度（资源集约程度=原材料和固定资产折旧占总制造成本的百分比）为 66.7%，明显低于制造业平均水平的 76.1%。从吸纳就业看，纤维工业平均就业人均均为 64 人，高于制造业平均的 56 人。这一系列指标都表明纤维工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符合一般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基本特征。第二，韩国的纤维工业成长体现了该国“大进大出，进为了出”的基本战略构想。韩国纤维工业的国际化体现出决策者的精明与独到。他们认识到原材料的出口贸易条件是不断恶化的，因而进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沾了世界的光”，同时，能使自己生产的原材料决不依赖进口。在韩国纤维产品的贸易伙伴中，又以美、日两国为主，对美、日的出口额约占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这两个国家劳动力成本高，纤维产品价格较高，韩国以低劳动力成本的产品赢得了高额的价格收益，为工业化积累了巨额资金。第三，适应国际市场发展潮流和本国经济走向，产品的技术含量不断提高。在韩国经济起步的时期，工业整体技术水平低下，发展轻纺工业是现实的抉择。随着市场需求的多样化，产品需要不断升级换代，研究开发费用的投入便十分关键。以 1984 年为例，韩国纤维工业的研究开发费用比上年增长 37%，标志着该产业已逐步进入高品质化、多样化和高价值附加化的新时代。在国际市场上，轻纺工业属于“两极产品”，即低档产品极为便宜而高档产品价格昂贵，韩国企业瞄准多变的趋势，注重信息交流和产品开发，聘名师设计，迎合国际市场“重手工轻机器”的特点，进一步提高价值附加，赚取丰厚的超额利润。

韩国，在七八十年代，首先树立了“纤维大国”的形象，1985 年，韩国的天然纤维产品的总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 1.9%，化纤产品的比重则为 5.5%，出口比重更高达 7% 以上。然而，韩国人的明智并不在于他们死守纤维产品的阵地，而在于他们不断地寻找新的生财之道，很快，人们发现，韩国的电子时代已然来临。

2. 电子工业——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巨人

韩国的电子工业从五十年代末的第一台电子管收音机诞生之日起，已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三星、乐喜、金星等大财团的发家史也就是韩国电子工业的振兴历程，这些企业巨人从电子工业中走出来，并把电子工业一步步推向世界尖端。电子工业可谓韩国经济成长的火车头，从该产业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韩国的经济进程。电子工业占制造业 GNP 的比重在 1970 年仅为 1.8%，1980 年达到 4.8%，1985 年增加到 8.5%；在韩国的出口总额中，电子工业所占的比重也由 1970 年的 6.6% 上升到 1980 年的 11.4%，以至 1985 年的 14.4%。电子工业目前正处于成熟发展期，是一个方兴未艾且前景乐观的朝阳产业，为韩国的经济发展提供着巨大的推动力。

韩国电子工业的发展堪称神速。1959 年，金星公司开始组装生产收音机，标志着电子工业正式进入国家的产业结构之中。在近十年的发展中，韩国已具备收音机、电话机、电子元器件的规模生产能力。1966 年，韩国政府把电子工业列为战略产业，增加政府支持；1969 年又制定了《电子工业振兴法》和《1969 至 1976 年的电子工业振兴 8 年基本计划》，从此，电子工业

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七十年代，韩国电子工业年均增长率高达 40%，开发了电子表、电子计算机、彩色电视机、收录机、无线电通讯机等一大批新产品。进入八十年代，电子工业仍常盛不衰，年均增长率仍达到 20%，批量生产录像机、摄像机、初级机器人、微型计算机，产品升级换代极为迅速。在九十年代，韩国已确立了其稳居世界电子工业前十强的地位，成为“电子大国”。

韩国的电子工业之所以欣欣向荣，自有其过人独到之处。

第一，以出口为宗旨，不断开拓海外市场。1974 年，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庆尚北道的龟尾成为韩国最主要的出口工业基地，所生产的电子产品大举进入国际市场。1969—1974 年间，黑白电视机的出口量以每年 200% 的速度递增。出口产品的更新换代亦可谓神速。例如 1973 年亚南产业与日本松下电器公司合资生产彩电，到 1974 年就创下出口 2.9 万台彩电的佳绩。

生产促进了出口，出口又带动了生产。为了占据海外市场，韩国各主要电子产品生产商采取了对外促销和直接投资双管齐下的市场策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对外促销上，三星、金星等企业在世界主要市场纷纷建立代表机构，直接推销产品。面对日益抬头的世界贸易保护主义，各公司又实行在海外直接投资设立企业，以避开贸易壁垒的办法。对海外市场的充分利用保证了韩国电子工业的兴旺发达。从 1980 年至 1986 年，电子产品的出口额由 20.04 亿美元上升到 66.87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 22.2%。

第二，引进最新技术，“一步登天”。韩国的劳动力以熟练操作工人为主，技术人员仅占 7%，企业用于研究开发的经费也低于发达国家，约占总投资的 4% 左右。韩国的电子工业主要依靠引进技术发展起来，节约了自行研制和开发的时间，因而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形成强大的竞争力。1967—1984 年间，韩国的电子企业共引进 365 项技术成果，其中 44% 来自日本，45% 来自美国，主要是生产性技术，基础开发性技术项目为数甚少。重实用、重产品、重效益成为韩国出口型电子工业技术引进的主要特征。

第三，生产经营高度垄断，在短期内培育出能参与国际竞争的“大兵团”。据统计，到 1985 年底，韩国共有 1112 家电子企业，其中 63% 为国内私人独资企业，23% 为合资企业，14% 为外商独资企业。但是，三星、金星和大宇三大财阀就垄断了电子产品销售额的 90%，而其余 1000 余家企业只占有不到 10% 的市场份额。韩国官民对于这种不同寻常的集中垄断是持默许甚至支持态度的。他们认为，本来就缺乏资源优势的东北亚小国若再进行国内竞争的内耗，不仅无法抵御外来产品的冲击，更谈不上走出国门，占领海外市场。因此，攥起拳头，集中力量一致对外，成为韩国上下的共识。

第四，注重产品效益，形成以轻为主的电子产品体系。与美日等电子强国相比，韩国的电子工业集中于家用电器和元器件的生产。九十年代，韩国电子产品结构中，家用电器占 33%，元器件生产占 46%，工业用电器产品占 21%；而美国和日本的工业用电器产品占电子工业总产值的 77% 和 37%。韩国的电子产品主要是轻型结构，以满足家庭消费为主要目标。由于这种产品结构具有投资省、回收快、生产技术较简单，易形成规模收益的特点，便为注重实效的韩国人所采用，成为韩国电子工业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3. 汽车工业——出口导向的新支柱

自本世纪初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采用流水线批量生产“T”型车以来，汽车工业就与巨型企业、规模经济联系在一起。它意味着，一个国家要发展

自己的汽车工业，就必须花大本钱建大企业。在这一领域，韩国再次站在了世界的前列，堪称汽车工业史上的一大奇迹。

早在五十年代，作为美军后勤部门，韩国就有了汽车改装厂，但是严格意义上的汽车制造厂诞生于1962年，是韩国与日本日产汽车公司合资建立的“新国家汽车公司”，以进口零部件组装汽车，掀开了韩国民族汽车工业的序幕。同年，政府颁行《汽车工业法》，规定限制国外汽车进口，保护和扶植本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对于汽车组装所需零部件则给予减免税优惠。这样，在六七十年代，韩国与日本、美国和意大利的著名汽车制造厂家进行合作，形成了一整套有“韩国特色”的生产管理模式和产业发展格局，产品多样化，质量和国产化水平大大

提高。

七十年代初，韩国政府先后制定了《汽车工业发展计划》和《汽车工业长期振兴计划》，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汽车国产化和进军国际市场的口号，汽车工业进入起飞阶段。1972年，韩国现代汽车公司投资7000万美元，建立起一座年产8万辆汽车的汽车厂，1974年推出国产名车“小马”（PO—NY）牌。1976年韩国已名列世界汽车生产国的第16位，国产化水平达到90%。

八十年代，是韩国汽车业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早在1981年，政府为了避免本国企业过度竞争而造成浪费，颁布《汽车工业合理化措施》，明确规定了各厂商的产品类型和生产范围，如规定现代汽车公司和西韩汽车公司专门生产小汽车，起亚公司和东亚公司专门生产载重车和大客车等。政府的干预理顺了产业布局，以现代公司为首的汽车厂商掀起了第一轮攻占海外市场的冲击波。1982年，韩国汽车首次打入拉美市场，1985年在加拿大销售10.4万辆汽车，成为该国最大的汽车供应国。到1986年，现代公司又成功地进入美国市场，为大批量出口奠定了基础。进入九十年代，韩国汽车商看好中国市场，大宇公司的“王子”（PRINCE）牌、现代公司的“索纳塔”（SONATA）牌以其价廉物美而受到中国消费者的欢迎。

回顾韩国三十年的汽车工业发展进程，人们不得不惊叹其飞速的增长。韩国的汽车生产能力在六十年代以平均每年26.5%的速度递增，到七十年代，年均增幅达到40%。从1980年至1986年，汽车产量又从36.6万辆提高到81.1万辆，增长1倍多。

韩国汽车工业的腾飞，给发展中国家留下了三个启示。

首先，坚持外向型经济，敢于参与国际竞争，而不是一味置幼稚工业于国家保护伞之下。韩国特色的汽车工业发展道路就是一条大胆引进技术，充分吸收技术，迅速冲出国内的道路。韩国向福特、日产、菲亚特等各厂拜师学艺，一旦羽翼丰满就敢于“弑师”，在国际市场上一见高低。

第二，注重内部积累，扩大生产规模。汽车工业是“高投入、高产出”的产业，如果达不到最低资本限额，就不可能获得规模收益。韩国厂商敢于投入巨额资本，引进技术，培养人才，于是在短时间内形成了较大的生产能力，相应地，整个产业的规模经济效益也不断提高。

第三，发挥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使韩国汽车得以顺利地打入国际市场并占有相当的市场份额。据测算，韩国汽车工业劳动者的小时工资率仅是美国的十分之一，日本的三分之一。低价和大众车型是韩国汽车占领国际市场的两大法宝。

另外，政府的支持，国民意识中对国产车的偏爱，以及美、日两国的技

术输出，都促进了韩国汽车工业的腾飞。

据经济学家预测，下个世纪前十年，汽车工业将成为韩国的发展龙头，并逐步进入成熟期。面对日趋扩大的生产能力，不断提高的技术水平和日益广阔的市场前景，汽车工业这颗“希望之星”正在冉冉升起。

韩国造就了一座二十世纪的“金字塔”，它不是“无用”、“浪费”的代称，而是经济奇迹的真正内涵。面对韩国产业的迅速现代化，即使是最保守的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这一客观的经济现实。

四、长袖善舞：走向全球的经营艺术

市场的争夺是经济竞争中最为残酷无情的战斗，没有硝烟，却同样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韩国以出口导向工业化作为立国方针，不能说不冒风险。即使单纯从经济角度考虑，韩国政府和企业家必须面对两种“不确定性”——其一是世界经济周期。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日益紧密的国际分工和经济联系使通货膨胀和失业成为国际性的“传染病”，这是因为一国市场的供求波动会直接影响另一个国家某些产业的繁荣与衰退。因此，外向型经济无疑把自己的发展命运绑在世界经济上，更确切地说，是绑在占世界市场绝大多数份额的少数发达国家身上，这无疑是有风险的。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八十年代的几轮衰退直至九十年代初漫长的“经济严冬”都直接构成对韩国出口产业的打击。其二是市场的不确定性。产品的营销所涉及的消费者们好，竞争对手的进退和策略、价格的涨落、成本的波动……都具有不确定性，无怪乎马克思在其鸿篇巨制《资本论》第一卷中精辟地把产品的销售，即“市场实现”看作是“一个惊险的跳跃”。生产者能否生存简而言之即在于产品能否推销出去。尤其像韩国这一以出口为生命线的国家，在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八十年代，如何成功地开展全球性市场营销，就成为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

无疑，无论从总量角度抑或从结构角度看，韩国都是成功的，至少从本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这三十年的实践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以下的一系列数字可以说明韩国出口战略的辉煌成就。

从总量角度看，韩国的出口额自1962年的5400万美元起步，到1971年增至10.68亿美元，此后，在1977年和1981年又分别突破100亿和200亿美元大关，1988年达到606.96亿美元，在世界上居第11位。在这25年间，韩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也从0.04%上升到2%。韩国出口贸易年增长率在1961—1982年间竟然高达40.2%。每二年增加近一倍，又堪称一大奇迹。进入八十年代，从1981—1990年，韩国出口贸易仍保持每年增长18.7%的高速度。即使在1990年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韩国出口额仍高达650亿美元，居世界第14位。

从结构角度看，韩国更是成就斐然。种种指标都表明韩国的产业发展正经历着质的飞跃，由一个发展中国家典型的出口结构逐步演变为发达国家所特有的结构模式。

首先，韩国出口的产品结构呈多元化和高级化趋势。60年代初韩国的出口产品以农产品、矿产品等初级产品为主，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重连年递增。据韩国贸易协会统计，韩国初级产品的出口由1962年的72.6%下降到1988年的5.3%，而同期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重则由27.4%上升到94.7%。由此可以判断，韩国已由一个农业国变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

即使在工业制成品的出口结构中，也呈现出高级化的发展进程。六十年代，由于出口导向工业化的主导产业——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得到优先发展，该产业的产品出口额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从1962年的20.3%猛增至1971年的72.1%；七十年代则是“电子时代”，电子产品的出口比重由1970年的3.5%上升到1987年的21.5%，而轻纺产品的比重则下降到30.8%。七八十年代又是韩国第一次结构调整的时期，重化工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重

化工业产品的出口在 1982 年首次超过轻纺工业，达到 50.8%，到 1985 年又上升到 58.3%，钢铁、造船、汽车及其零部件、精密机械等重化工产品已成为韩国的主要大宗出口产品。

其次，从韩国出口的市场结构来看，也出现了明显的多元化趋势。韩国的贸易伙伴从 1962 年的 33 个国家和地区猛增到 1992 年的近 180 个国家和地区。韩国商品走向全球。为了“不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韩国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全方位开拓世界市场，避免过于直接地使本国经济与美、日两国挂钩，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进入九十年代，韩国的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初见成效，对美、日两国的出口份额由七十年代中期的 7% 以上下降到九十年代的 40% 左右，并开辟了俄罗斯、东欧、东南亚、拉美、中东市场，尤其注重占领两个市场，一是号称最难进入的欧共体市场，二是最有发展潜力的中国市场。目前，韩国汽车已在德国、法国、波兰、越南、中国的大地奔行；韩国的化纤、电器、化工产品充斥从悉尼到圣保罗的企业和店铺；“韩国制造”（Made in Korea）已不再意味着粗糙、低廉，而成为优质、高档次的代名词。

韩国，不仅是一个“世界新工厂”，也是一个“国际职业推销员”——美国《华盛顿邮报》如此评价。

1. 官民一体，协同作战

在西方人眼中，市场经济发达的韩国，与其说更接近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倒不如说更具有计划调控的“统制”色彩。而官与民的结合也达到了西方学者所无法想象的完美程度。在韩国企业攻占一个又一个海外市场的背后，都有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推动。

（1）由“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

韩国政府和企业界都认识到在现代国际市场竞争中，技术决定成本和质量，从而在最终意义上决定了产品的竞争力。多年来，韩国政府把技术的引进与创新作为发展经济的主要手段，依靠整个国家的经济力量，与私人企业携手推动技术进步。在八十年代，虽然韩国的技术研究和开发投资在 GDP 中的比重一直保持在 5% 上下，但与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例如在 1984 年，每千名研究人员的研究费用，美国为 750 美元，日本为 370 美元，欧洲主要发达国家也在 100 美元左右，而韩国仅为 37 美元。韩国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技术发展，强烈地意识到自身所处的创新时代必将带来更为激烈的竞争，致胜之道须有“尖端”与“适用”两大类技术的不断推陈出新。

产业的发展决定了技术的发展。据韩国经济与技术研究所估计，按 1980 年不变价格计算，韩国的制造业在未来 20 年中将面临急剧的结构变动。电气、电子工业将从 1985 年的 11.3% 上升到 2001 年的 24.1%；同期，汽车工业将从 5.7% 上升到 10.7%；机器制造业将从 8.6% 上升到 10%；钢铁工业则从 7.0% 上升到 7.7%；而造船、纤维和化学工业将分别从 5.4%、14.7% 和 20.3% 下降到 1.9%、6.3% 和 16.9%。处于扩张行列的产业都是技术附加值高、资本需求量大的部门，它们的增长代表了韩国的经济进步潮流。

为重点提高电子、汽车、机械、钢铁、纺织、石油化工、造船和鞋类等八大产业的竞争能力，韩国前总统卢泰愚于 1991 年 3 月宣布，在今后 5 年内将花费 23.4 亿美元的政府和私人投资用于研究与开发，加速技术改造。政府将重点扶植高技术产业，在 2000 年之前开发 919 个高科技产业，以便在微电子新材料的市场上谋取一席之地。

1987年是韩国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的关键年，投资2574亿韩元的技术开发资金，全方位地进行技术创新。首先，官方组织200个企业的500名研究人员有重点地进行技术攻关，解决韩国的急需技术问题；第二是为提高生产第一线职工的操作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组织500个先进技术企业，对其生产的368种产品进行行业内的横向指导；第三是对尖端技术和战略性稀有材料进行联合研究，集中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力量共同开发；第四是建立大量企业附属的研究机构。到1987年底，民间企业附属的研究机构已有500余所，其中，从事电子、电气、化工、机械、金属等直接与出口产品相关的“实用技术”的研究所达到337家。

韩政府为企业服务，可谓用心良苦，尽心尽力。1987年，政府选择了19种前景看好的产品和51家企业，从技术开发、产品设计、海外宣传和市场营销等各方面给予支持，提出以“一流化商品”占领国际市场。1990年，“一流化商品”的出口预达到30.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2.4%。到1991年，“一流化商品”的品种扩大到25种，生产厂家也增加到70个。

在政府的支持下，韩国成功地通过技术开发和引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据测算，韩国技术进步占国民收入增长率中的7.2%。技术的开发使韩国在二十年来立于国际市场的“小霸主”地位。

（2）调整市场结构，灵活多变

尽管韩国力求经济的独立和自主，但其贸易往来仍主要集中于美、日两国。为了避免经济主动权受制于人，也为了避免日益激烈的美韩、日韩贸易摩擦，韩国近年来致力于调整出口的市场结构，实行灵活多变的营销策略。

策略之一：对美贸易“让进来，打出去”

美国是韩国的主要贸易顺差国，为了稳定而持久地发展对美贸易，韩国政府认为过大的对美贸易顺差并非好事，由此引发经济争夺和政治问题都是双方均不愿面对的。因此，韩国采取了更大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到九十年代把商品进口自由化比率提高到95%以上，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西方工业国敞开门户。应美国的要求，韩国还对436种商品关税进行了不同幅度的下调，最多的下降20%，占美国要求降低关税商品总数的84.3%。韩国还多次派遣大型“采购团”访问美国，洽谈大宗商品进口。在1987年，仅一个采购团就向美国提交了价值20亿美元的订货单。

投之以桃，投之以李。韩国的诚意必然带来美国人对韩国商品的继续欢迎。韩国利用八十年代中期和九十年代初两次日元大规模升值的良机，在美国市场上与日本商品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1987年，韩国对美出口额仍高达183.82亿美元，占当年出口总额472.81亿美元的38.9%。

策略之二：对日本继续“奖出限入”

韩国对日贸易的逆差，是韩国政府长期力图解决的问题。

1986年，韩国的对日贸易逆差创历史最高纪录，达到54亿美元，比上年的30亿美元增长近70%。巨额贸易赤字使政府不得不痛下决心实施外科“摘除手术”。

针对进口，政府决定，除能够挖掘国内生产潜力、提高国内产业素质和有利于发展未来产业所必需的设备进口外，对日本产品的进口实行数量控制，特别强调要求全国100家主要进口日本产品的大公司减少对日进口；政府还严格限定日本商品的最高销售价格；对日本技术的引进，政府也规定除

尖端技术外一律不予受理和批准。

为了增加出口，韩国政府多次敦促日方将纺织品、玩具等 60 种主要对日出口的商品关税削减到 10% 以下，取消对韩国商品的进口限制，进一步开放日本市场；下令专门从事对美出口业务的 100 家大公司积极开拓日本市场；针对日本限制韩国商品批量进口的状况，从历来以大企业为主大批量生产、大批量出口的经营战略转移到鼓励中、小企业加入出口行列，不嫌弃做小生意的营销战略上，重视小额、少量、多品种的对日出口，以避免日本贸易保护主义的壁垒；抛弃以低工资为基础的廉价商品出口方式，采取以提高商品质量为主的高增值性出口方式；大力提倡民间的对日通商外交和韩日经济协会的对日贸易外交活动，乘日本因日元升值而收缩生产、扩大进口之机，韩国抓紧增加日本所需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并积极引进日本资金和技术，生产返销日本的产品。政府甚至设立“对自出口奖”，表彰出口成绩卓著、打入并占领日本市场的企业。经过多方努力，韩国的家用电器、钢铁、机械产品陆续进入日本市场，销售额逐年上升。1987 年，韩国对日出口额达 84.37 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 17.8%。

策略之三：瞄准欧洲统一大市场，敢于啃硬骨头

欧洲统一大市场号称世界最大且最难进入的市场。从德国中世纪的“汉撒同盟”到本世纪六十年代的“欧洲经济共同体（EEC）”，人们总结出经济集团的一个基本特点——集团内的自由经济和集团外的保护主义并存。这对严重依赖海外市场的韩国经济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但是，欧洲统一大市场又使流通市场单一化，又使韩国降低了逐个打入成员国市场的交易成本，营销更为简便。韩国有识之士提出，能否成功地进入欧洲统一大市场，关键在于能否采用有效的对策战胜贸易保护主义。

1990 年，韩国政府、企业界和学术界的有关部门及人士共同组成了 13 个业务对策研究班，集中探讨进入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基本策略。

第一，根据产品的市场特点进行分类，对不同的产品经营采用不同的对策。韩国把对欧洲出口的产品分为四类：有希望产品、可能产品、注意产品和危险产品。“有希望产品”包括通信终端机、数据处理机、汽车零部件和时装等。韩国可以以技术、价格优势大规模进入欧洲市场。“可能产品”是指市场需求量大，但进入市场较为困难的产品，包括家电、汽车、办公自动化器材、飞机、医疗设备、通信交换机、广播器材等。由于这类产品技术成熟，欧洲产品本身具有极大竞争力，韩国主要以批量生产降低价格来打入市场。“注意产品”是指技术含量不高、价格竞争激烈、市场需求量不大而进入市场障碍较小的产品，如建筑材料、服装、玩具、食品和鞋类等，韩国的对策是提高技术，以质量取胜。“危险产品”则是指市场需求量小、进入市场困难的产品，包括钢铁、造船、铁路仪器、机电设备等。韩国则以相机行事为宜。

第二，注重市场基地建设。

到 1991 年，已有 11 家韩国企业在欧洲联盟国家拥有自己的生产性子公司，另有 30 家正处于筹备和建设阶段。三星电子公司已在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设立了四家工厂。其中，在英国东北部城市比灵赫姆投资的一家电器工厂自 1992 年起向欧洲市场大规模供应电视机。金星公司在德国、意大利和比利时建立了三家工厂，大字公司也在北爱尔兰、比利时和法国建立了 3 个生产基地。从发展趋势看，韩国将重点投资于英国和德国，法兰克福正逐渐成

为韩国对欧贸易活动的集散地，大批韩国企业在这里建立了欧洲代表处。目前，在韩国的前 200 家大企业中，已有 20% 的企业正积极拓展欧洲市场。

第三，制定和普及欧洲工业标准。有关专家指出，欧洲的工业标准及其严格的检测制度正逐渐成为该市场的一大非关税贸易壁垒。早在 1990 年，美国和日本就已在布鲁塞尔设立本部，收集这方面的信息。韩国提出，与其消极地了解和适应其工业标准，不如采取积极的态度与欧洲认证机关签订协定，事先制定与欧洲一致的工业标准，并在国内普及统一的欧洲标准。

第四，建立欧洲物流中心。这是韩国进入美国市场时采用过的一种方法。中心的成立，可以将韩国出口欧洲各国的商品集中运送到这里，然后再分运到各个国家。为此，韩国的运输企业必须与欧洲统一大市场有关部门建立合作关系，提供有效的集装箱联运服务。

在韩国政企合作、共同努力下，对欧贸易已初见成效。在欧洲市场上，韩国已占据了 7% 的彩电市场份额和 13% 的录像机市场份额。在德国市场上，韩国的商品从服装、儿童玩具、电子表、电视机、录像机到电子计算机，应有尽有。韩国的大宇和现代汽车公司的产品也成功地挤进了英国、比利时、德国和意大利市场。据 1991 年 5 月 28 日的《国际商报》报道，欧洲已成为韩国的第二大汽车市场，法国《快报》周刊把韩国产品冲击欧洲市场称之为继日本之后来自太平洋彼岸的第二次浪潮，认为这次浪潮很可能扫荡欧洲工业，而且已经压倒了日本电子工业巨头。

2. 砥砺出精品

韩国企业并非单纯依靠政府的鼎力扶植才得以成为国际市场的一支新军，企业界自身的奋力拼搏、潜心经营是韩国成功占领国际市场的真正秘诀。

(1) 质量 > 价格

经过六十年代工业化初期纤维产品出口的迅速积累，韩国的产业结构逐步走向高级化、多元化和高价值化。同时，面对国际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韩国企业界意识到必须实现经营战略和战术的转化，由过去的低成本、低价格竞争转变为高价值、高质量取胜。不断开发新产品，以优质产品占领市场，成为韩国企业的新法宝。

在新兴产业中，提高产品质量一时蔚然成风，以汽车工业为例，汽车的耐用性、安全性、舒适性、适应性、方便性，以及耗油量、排气量、环境污染程度、车型美观程度等，都是衡量汽车质量的重要依据。为进入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市场，韩国的汽车企业特别注重以质量求生存。现代汽车公司从 1981 年 10 月开始投资 7 亿美元，以三年多的时间建成了一座年产 30 万辆汽车的前轮驱动型轿车厂，这家汽车厂还附设有现代化涂装厂、高性能发动机厂和齿轮厂。1984 年 2 月，该公司又建成了国内最大规模的行车试验场，接着又建成了冲撞测试场和在零下 40 和零上 60 气温下检验性能和环境测试场。由于质量的大幅度提高，现代公司生产的“小马 (PONY)”牌汽车迅速打入东南亚、美国和欧洲市场，以其节油经济性得到客户的欢迎。此后，现代公司的“索纳塔 (SONATA)”、大宇公司的“跑车 (RACER)”、“王子 (PRINCE)”都成为行销全球的优质经济型小汽车。质量带来了销售额，带来了效益。韩国汽车在国际上的声望不断提高，其性能甚至得到了美国汽车巨头克莱斯勒公司总裁艾柯卡的赞叹。仅 1991 年头四个月，韩国就出口汽车 10 万辆，比上年同期增长 20% 以上。

(2) 商品 = 产品 + 服务

在现代市场营销理论的影响下，韩国的企业家认为，提供到国际市场上的产品应该是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的结合，这才叫“商品”。所谓有形产品就是厂商生产出来的能满足人们消费需求的物质产品；而无形产品是指人们在购买有形产品时得到的全部附加服务和利益。如提供信贷、免费送货、上门安装、售后服务，等等。韩国的企业不仅向国际市场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还把周到细致的售后服务视为应尽的义务。许多韩国企业在海外设立维修服务中心和零部件生产基地，为消费者及时提供维修、更换零部件等各项服务，并注重顾客对产品的反映，对于质量有问题的产品实行包赔包换。

产品与服务构成了韩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卓著信誉。美、日、欧各国和地区对韩国商品的兴趣与日俱增，许多大跨国企业愿意与韩国公司合作共同开发市场。

（3）运用现代化营销手段促进产品销售

韩国企业以外销为生命线，因而十分注重销售技术的不断创新和综合运用，在全方位展开销售攻势。

首先，韩国企业在境外普设销售分支机构，形成了健全的销售网络。到1989年，韩国九大综合商社在187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300多个分社，及时反馈世界各地市场的信息，为企业的生产当“千里眼”和“顺风耳”。另外，许多大公司还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建立大型综合商品展销店。例如，1986年韩国在日本大阪建立了一家大型商品展销店，主要经销中小企业产品，年销售额达600多万美元。此后，这类商店在日本、美国、欧洲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其次，为了促销成功，韩国企业可谓不惜工本。广告、宣传、公共关系等现代化手段无所不用，使世界各地的消费者都能眼里、在心中留下它们的形象。如三星在美国平均每年支出7000万美元的广告费，金星、大宇等公司也频繁在世界各地举办展销会。另外，赞助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等重大体育赛事更是韩国企业的拿手好戏……今天，在美国CBS电视节目中，在东京银座的霓虹灯里，在上海街头的巨幅广告牌上，人们都可以看到SAMSUNG（三星）、GOLDSTAR（金星）、现代（HYUNDAI）、大宇（WAEDOO）的赫赫身姿。

（4）小处着眼、积腋成裘

韩国是一个“志在走出大模样”的小国，但在国际市场上却是一个既抱西瓜又捡芝麻的精明商人——大生意固然要紧，小买卖也照做不误。例如，在1987年，韩国富田产业公司开发出一种小型新技术：在汽车轮上装上一种发光盖，使汽车在夜间行驶时四轮闪闪发光。该公司在18个主要汽车生产国申请了专利，一时订单如云。仅这一件小商品就创汇100多万美元。

（5）培养国际化人才，进一步走向世界

面对国际经济的挑战和继续占领、开拓国际市场的需要，韩国企业界提出了“培养国际化专门人才”的口号。韩国的主要公司负责人都具有名牌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MBA）以上的学位，同时也要求本公司的管理人员攻读经营销售的硕士、博士学位。

如三星电子公司向日本和美国的大学、研究机构派出了专攻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电子计算机专业的研修人员。现代公司于1989年成立“地区研究会”，教授外语，研究主要贸易伙伴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和商业惯例，针对不同的市场确立不同的经营战略和战术。大宇公司从1985年起派遣职员到日

本和台湾的企业边学习边工作，掌握实用的经营技巧。锦湖集团则与汉城大学、延世大学和高丽大学挂钩，每年派出 80 名职员脱产学习 5 个月的营销学硕士课程；同时还对本公司职员实行留学选拔制度。

经营人才的培养使韩国企业的整体素质得到迅速提高，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6) 建立“新形象”，走自己的路

从六十年代以来，韩国的出口一直依赖 OEN（来料加工）的方式，即韩国制造商按国外厂商的要求进行生产，并在产品上贴上国外厂商的商标出口。1990 年，韩国出口额达 632 亿美元，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服装出口的 90%、鞋类出口的 97%、微波炉、彩电、录像机等家电产品出口的 80%）都是 OEM 方式。这种出口方式虽然有利于韩国产品比较容易地打入国际市场，但是主动权操在外国厂商手中，不利于消费者认识韩国企业的形象，因而从长远看，是不利于国际市场的进一步拓展的。

出口的增长、经济的腾飞大大刺激了韩国企业界的民族自信心，各企业纷纷到国外注册商标，大打“韩国牌”。1990 年，韩国在海外注册商标达 1235 种，比上年增加 17.3%。同年，韩国企业在海外新设分支机构 137 个，建立直销店 507 家，大大促进了印有韩国厂家商标的产品出口。

进入九十年代，韩国企业界的目标更为明确，韩国应该成为真正的制造业大国，韩国产品也不应再仅仅是廉价商品。“世界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这就是新时代韩国的宣言。

五、劳务输出：工业化的一个侧面

人们在论及韩国出口导向工业化和经济腾飞时，很少看到劳务输出的作用，而仅把它当作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种偶然性。事实上，劳务输出是韩国工业化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有理由断言，韩国的迅速起飞与它劳务输出所实现的充分就业和资本积累是密不可分的。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在其二元经济模型中率先提出了欠发达国家的普遍特征——存在一个庞大的边际产出为零的劳动力群体——剩余劳动力；并指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必要条件是实现剩余劳动力由传统的自然经济部门向现代资本主义部门的转移。在他以后，结构主义和新古典发展经济学家纷纷提出了各自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型，比较著名的有“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乔根森模型”和“托达罗模型”等。他们从更为具体的假定出发，给出了更为确定的解决方案。遗憾的是，以他们的理论所指导的实践是不成功的，拉丁美洲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所带来的恶果是经济学家们始料不及的。

历史再次嘲弄了理论的苍白而证明了实践的伟大。韩国，这样一个二战以后人们除了在战争中才能回忆起的东北亚小国，以自己的直觉和执著，在短短二三十年间，完成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彻底转移，秘诀何在？道理很简单，正如其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的选择一样，韩国再次把目光投向了海外。在国内工业化刚刚起步、资本有限、就业机会不足的情况下，谋求剩余劳动力向国际劳动力市场的转移，应当是较为合理的选择。

劳务输出有各种方式。东欧、东南亚的劳动力多数以个人前往海外打工为主要形式。韩国却以国际工程承包为主，抛弃了完全个体的方式，其好处有两点。第一，在形式上韩国工人受雇于国内的建设工程公司，不是直接到海外就业，不会受到移民法的限制。第二，个人打工汇回本国的劳务收入只能体现为国内私人收入，而国际工程承包则既保证了工人的私人收入，更多的则是企业的工程建设收入，同时带动韩国的建材、机械、钢铁、运输业以及金融业的发展，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是不可估量的。

因此，在韩国出口导向工业化进程中，劳务输出和国际工程承包是功不可没的。

1. “承包世界”的韩国劳工

韩国六十年代的工业化，把大批劳动力从自然经济中解放出来，由此拉开了劳务输出的序幕。1965年，韩国现代建设公司以540.5万美元中标，在泰国承建一条总长98公里的高速公路。这是韩国第一个海外工程承包合同。随后，韩国的建筑企业逐步进入了东南亚各国市场，并扩展到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在对外工程承包的初期发展阶段，韩国承包的规模一般都较小，从1965年至1973年，韩国劳工在26个国家和地区留下足迹，总承包金额达4.23亿美元。

1973—1983年，是韩国对外工程承包的黄金时代。1973年以后，中东各产油国凭借手中握有的巨额石油美元，先后掀起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热潮。韩国建筑企业在积累了八年实践经验后，抓住机遇，迅速打入中东建筑市场。1973年11月，韩国三焕建设公司率先打入沙特阿拉伯，中标承建一条价值2410万美元的高速公路。时隔仅两年，仅1975年一年间，20家韩国公司共获得7.51亿美元的工程承包额。到1978年，中东建筑市场已有四分

之一为韩国企业所占领。进入八十年代，韩国的承包工程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化，一方面继续承揽土建工程，同时还承接造船、机械、建材和石油化工等大项目，承包金额迅速增加。至1980年，承包金额为82.6亿美元，1981年至1983年又分别高达136.8亿美元、133.8亿美元和104.4亿美元，三年合计370亿美元，是1980年前全部承包合同累计金额302.7亿美元的1.2倍。八十年代，韩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承包商和劳务输出国，无怪乎韩国建筑企业自豪地说，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韩国从“98公里”发展到足以承包全世界。这种气魄并非没有根据。

历经了八十年代中后期两伊战火的洗礼和九十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普遍的衰退困扰，韩国对外劳务输出和国际工程承包也经历了一段低潮时期，承包金额年均下落34.2%，从1984年的65亿美元下降到1987年的17亿美元。进入九十年代，韩国的对外工程承包又活跃起来，韩国劳工的身影又出现在从利比亚至菲律宾火热的工地上。

从1965年至1991年的26年间，韩国在41个国家承包了近3000项工程，在海外承包市场的占有率达6.8%，承包金额高达1012亿美元。这于一个仅有4300万人口的小国来说，无疑又是一个“奇迹”。

2. 劳务输出的贡献

劳务输出对韩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大方面。

第一，改善了国际收支状况。据《韩国经济年鉴》统计，1965—1977年，韩国对外工程承包所带来的外汇纯收入近10亿美元，1978年一年就达到17.3亿美元，1981年和1982年又分别增至21亿美元和26.3亿美元。劳务输出和对外工程承包的外汇收入占非贸易收入的比重由1975年的7.1%上升到八十年代的30%以上。截至1986年，海外工程承包纯收入累计额达161.5亿美元，对于缓和两次石油危机的影响，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作出了积极贡献。例如，1977—1981年的韩国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承包工程收入以外的非贸易收支赤字为92亿美元，海外承包工程纯收入为61亿美元，两者相抵，使整个非贸易收支赤字减至31亿美元。

第二，带动了相关商品出口，刺激了某些产业的发展。例如，对外工程承包的不断扩大，刺激了建材工业的发展，带动了成套设备的出口，每年都有大量的韩国钢材、水泥和机械设备运往施工现场。1971年韩国对中东的商品出口额仅1000万美元，到1981年增至32.2亿美元，占当年总出口额的26.6%，其中劳务输出和承包工程的作用不可低估。以1977—1980年的数字看，韩国对中东地区的出口额为68亿美元，其中建筑材料和设备的出口额达15.2亿美元，占22.4%。

第三，就业队伍的数量和质量得以迅速提高。从就业数量上看，韩国积极拓展对外工程承包业，等于是利用国外市场容纳本国劳动力，大大缓解了国内的就业压力。韩国派赴海外的建筑工人，技术和管理人员，在1977年为4.6万人，1977—1985年平均每年高达16万人。近年来，派往中东的建筑工人占全国建筑业就业人数的15—20%。如果加上对外工程承包所诱发的国内建材工业的就业人口，每年平均增加30万人就业，十分可观。从就业质量上看，国家和建筑企业为了高质量地完成承建工程，需要一支技术完备、操作熟练的就业队伍。企业的技术投资的职工培训，在无形中提高了韩国劳工队伍的基本素质。韩国还十分注重大量培养海外建设所需的专门人才，在中央一级设立“建设技能训练院”，大型建筑公司则建立“建筑技术训练所”，

官民联合共同培训熟练劳动力。

韩国的劳务输出，与该国的商品出口一样，同样是其出口导向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举措成功地完成了韩国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奠定了基础，它所带来的不仅是在韩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可以明确计量的外汇收入，更多的是我们无法看到的“体制收益”——它避免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中出现的种种难以克服的经济与社会难题：农民大量涌入城市、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失业和社会动荡、工业化资金不足与债台高筑的矛盾……

劳务输出对于韩国的意义绝非“出口创汇”四字可以概括，其中值得人们玩味、深思的实在太多太多。

六、对外投资：后工业化时代的来临

在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发展进程的诸多指标中，资本输出的总量与结构是一个重要的尺度。一般而言，在工业化初期，主要以资本输入为主，以解决区内经济发展的资金不足问题，当国内的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后，资本产出率迅速提高，盈利和劳动收入的增加使国内的生产要素结构发生变化——资本不再是稀缺的要素，同样劳动力也不再是丰裕的要素。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资本便发生跨国的流动。因此可以断言，当一个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一定规模的对外投资时，就标志着这个国家已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经济已趋于成熟。

1. 对外投资的方式与类型

1968年，韩国南方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对印度尼西亚的林业部门投资300万美元，用于森林资源的开发，成为韩国对外投资的开端。从七十年代中后期开始，韩国制造业的资本输出进入高速发展期，韩国企业进入跨国公司的生产行列。进入八十年代，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韩国经济逐步成熟，某些产业的输出成为必然，加上韩国对外贸易收支出现了长期的盈余，对外贸易所积累的盈余成为大规模对外投资的资本基础。从1968年至1988年，韩国对外投资总额已达15.51亿美元，累计998个投资项目，投资市场遍及东南亚、北美、中东和欧洲各个国家和地区，进入了世界新兴投资商的行列。

(1) 自主投资：民族主义在资本输出中的强烈体现

韩国的对外投资始终以民间企业投资为主，政府投资为辅（只进行少量的资源开发性投资）。民间企业投资中又以大企业居多。截至1990年，韩国大企业对外投资占97.8%，而中小企业只占2.2%。在投资种类上，长期以来只搞直接投资，自1988年起国家才准许从事风险较大的股票、债券等间接投资。

大体上，韩国的对外投资有以下三种方式。

第一，单独投资，即韩国企业完全依靠自己的资本、技术和设备所进行的投资。这种方式一般为资本和技术力量较为雄厚的大企业所采用。在韩国全部对外投资项目中，单独投资约占65%，其中贸易业、运输保管业占56%，制造业和水产业占50%。

第二，双边合作投资，即韩国企业与投资所在国企业或第三国企业合股成立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投资于某一行业。较大规模的资源开发项目，需要资本量大，技术难度较高的重化学工业及尖端技术产业投资项目多采用这种投资方式。

第三，跨国合作投资，即韩国企业同两个以上的不同国籍的外国企业所进行的合作投资。这种投资方式的优点是在资金、技术及管理方面可以相互取长补短，但因参与企业多，致使业务关系复杂，容易发生纠纷，故韩国对外投资采用这种方式的并不多见。

在各类合作投资项目中，韩国企业所占的股份一般为50%，最高达80%，可见大多数合资企业的经营权都掌握在韩国企业家手中。相信自己，充分发挥自主性是韩国的民族主义精神在对外投资业中的深刻体现。

(2) 工业深化与出口导向：对外投资的类型

韩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是工业深化和出口导向的结果，同时又为工业深化和出口导向服务。在工业深化型对外投资中，韩国企业的投资重点主要在以

下三个方面。

第一，资源开发型对外投资。韩国国内自然资源贫乏，不具备自行实现工业化的要素基础。在工业化初期，韩国以轻纺工业作为出口导向的主导产业，曾面临自然条件约束下天然纤维（棉、麻、丝、毛等）严重不足的问题，进口率高达 99%。随着工业化的逐步深入，韩国产业结构进一步提高，资源约束的“瓶颈”效应日趋显著，石油、天然气、铁矿和有色金属全部仰食于海外，而这些产品的国际市场波动频繁，使韩国面临极大的价格风险。韩国痛感有必要直接投资于海外的能源、原材料产业，为国内的工业化服务。在七十年代，韩国对林业、水产业和矿业的投资达 0.32 亿美元，占全部对外投资的 22.3%，高居各业之首。进入八十年代之后，重化工业的迅速发展带动了韩国对海外能源、矿业投资的大幅提高。据韩国财务部统计，截止到 1988 年，在韩国总额为 9.69 亿美元的对外投资中，能源、矿产投资为 3.97 亿美元，占 41%。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韩国在印尼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建立了木材工业基地；有近 20 家公司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东盟五国等 12 个国家开辟了 34 个矿区。其中规模较大的有韩国石油公司、现代综合商社等 4 家企业联合组成开发公司在也门投资开发大油田，日产原油 20 万桶。目前，乐喜金星、三星物产和石油公社等大财团、大企业成为进军世界能源、原材料市场的主力，活跃在从印尼到苏丹，从尼日利亚到巴西，从澳大利亚到马来西亚的世界原料、能源生产地区中。截止到 1993 年，韩国资源开发型对外投资已占全国资本输出总额的 51%，占据了绝对领先地位。

第二，产业输出型对外投资。随着韩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和工业化战略的不断调整，国内资源的比较优势发生了变化。劳动力收入的普遍提高使得本国原来所依据的低要素成本变得不再廉价，轻纺工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因而随之下落，原有生产能力的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地区便成为当务之争。从八十年代起，韩国在海外投资建设纤维、纺织、服装、制鞋、玩具、胶合板等部门，以图降低成本，以继续保持在这一领域的竞争优势。韩国的产业输出型投资主要集中于东南亚、加勒比海地区和中南美洲。仅纤维工业一个部门，1985 年仅投资 240 万美元，建立了 7 家企业；到 1987 年，就增加到 44 家企业，投资额猛增至 2410 万美元，提高了 10 倍。

第三，学习先进技术和经验型投资。在半导体、电子计算机、生物工程等尖端技术产业的投资领域，韩国可谓别有深意。在这些能体现今后世界工业发展潮流的尖端技术上，韩国从研究开发到规模生产都显得力不从心，而且又面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后知识产权、技术转让方面的重重限制。在发达国家从事高科技的直接投资，一方面可以打破国际间的技术封锁，又可以及时了解国外科技信息产业和产品信息，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方法。从九十年代开始，韩国厂商进军硅谷，加快了芯片的制造和开发。资本的输出来带来了技术的回流，1991 年以来，韩国的集成电路打回国际市场，销售额逐月增长，出口额超过 58 亿美元。目前，韩国集成电路的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 12.1%，出口量占世界出口量的 20%。尖端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学习，大大提高了韩国工业化的质量，为产业结构的更新换代奠定了物质基础。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戴约所说，“技术性对外投资体现了韩国的高瞻远瞩，它所得到的不仅仅是资本收益，还有技术、管理和人才，所有这一切，使韩国具备了一个发达国家所应具有的基本素质。”

再看出口导向战略所引发的对外投资。从八十年代初至今，国际贸易保

护主义和经济集团化趋势的强化，使出口导向工业化国家的生存环境变得日益严峻。韩国企业为了拓展商品市场，各显神通，对海外的扩大出口型投资迅速增加。

第一，以直接销售商品为目的，进行贸易业投资。著名的大韩贸易振兴公社和其他私营综合商社在海外大量建立分社、办事处和销售网络，从事贸易洽谈、市场调查、广告宣传和商品咨询等，一切业务以扩大出口为中心目标。如大韩贸易振兴公社，堪称贸易业对外投资的龙头和典范。它成立于1962年，是官方投资兴办的，目前在海外有近百家分支机构，平均

每年为企业界联系和介绍4万多笔出口生意，并且组织数以千计的企业参加国际博览会和展销会。目前，大韩贸易振兴公社成为韩国活跃于国际市场的主力部队，其职能正从过去单纯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到收集经济技术情报，调解贸易摩擦和掌握国际市场营销信息，全方位指导韩国外销企业的市场行为。

第二，建立生产基地，避开贸易壁垒，迂回出击。投资重点是受到严格限制又具有较高竞争能力的电子、汽车等部门，由境内母公司部分或全部提供所需设备、原材料和技术，产品则就地销售。目前，三星电子、乐喜金星、大字电子等主要制造业厂商纷纷进军欧美地区，建立生产基地。钢铁、汽车等产业也将逐步转移到中国生产基地上。截止到1991年，韩国在海外制造业的投资达3.5亿美元，占全部对外投资的37.1%。

韩国的对外投资，在本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支持国内产业发展，促进出口繁荣成为对外投资的主旨。目前，韩国累计投资4.03亿美元用于国外资源开发，所需石油的20%，铁、铜、亚铝块、铀及烟煤的30%将依靠对外投资开发进口，生产得到了可靠保障。制造业、贸易业投资也呈现惊人的增长。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预测，从九十年代到下个世纪前十年中，韩国仍将是世界主要资本输出国之一。

2. 投资的宏观效益分析

韩国大规模的对外投资，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国民经济的整体实力得到了迅速提高。

第一，增加了外汇收入。据韩国银行统计，截止到1990年末，韩国对外投资的外汇收入已达到21.28亿美元，相当于同期对外投资余额的三倍多。其中资本盈利为1.63亿美元，工资外汇汇入额为19.65亿美元。从海外投资各部门外汇汇入额看，1990年项目收入对投资额的比率中，运输保管业最高，达到443%；建筑业为180.1%，林业为108.4%，矿业最低，为13.3%；同期，工资汇入额对投资额的比率，建筑业为26倍，水产业为6.5倍，运输保管业为4.1倍。所有这些收入对改善韩国的国际收支起了一定作用。

第二，确保了能源、原材料供应。韩国自然资源匮乏，资源开发一直是韩国对外投资的主要目标，带有浓厚的政策导向色彩，虽然往往收益率偏低，给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效益却是不可低估的。如烟煤和开发进口量，在1983年为216.3万吨，到1985年增至500万吨，缓和了能源供求的紧张局面，保障了工业生产的需求。

第三，带动了出口贸易。韩国的海外法人企业实行就地生产和销售，部分产品也向第三国迂回出口，从而有效地避开了发达国家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并节省了运费、降低了成本，使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得到增强。通过海外生产基地的投资，也带动了本国半成品和成套设备的出口。据韩国银行统计，

1981年，韩国对海外法人企业的出口额为20.64亿美元，1985年增至50.82亿美元，在出口商品总额中的比重由1981年的10%上升到1985年的19.2%。从1968年至1985年，韩国对海外法人企业出口总额为215.59亿美元，扣除进口额，进出口顺差额为68.24亿美元，大大改善了国际收支状况。

第四，提高了劳动力素质，扩大就业机会。

随着资本和设备的输出，劳务人员随之大批出口就业。1988年韩国向海外法人企业输送劳动力达2万多人。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对外投资结构的高级化，尖端技术、国际金融、对外贸易的投资比重大幅上升，大量具有专门技能和较高专业技术的劳动力成为劳务输出的主流，并在实际操作中得到锻炼，掌握了发达国家的尖端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就业数量和素质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第五，学到了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

近几年韩国有意识地扩大对美国、西欧等发达地区高科技产业投资，在合资经营过程中掌握了外国科研开发信息和最新技术情报，并培养了一批技术和管理人才，促进了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使电脑、半导体、生物工程等尖端产业的技术水平得到提高，从而加速了产业结构的升级。

韩国的对外投资充分体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的结构性特点。正如马克思所断言，不断地追求利润乃是资本永恒的本性，经济的发展、资本的丰裕将最终造就一个更加国际化的韩国，一个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韩国，一个全新的韩国。

经济的力量就在于此，后工业化的时代已经来临。

“东亚，今天是世界经济动力学的中心”，著名美国经济学家布赖斯·卡明斯如是评价。然而，支撑东亚国家发展的动力研究何在？是韩国等四小龙给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还是世界经济促进了小龙的腾飞？显然，韩国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和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主要是立足于世界，从世界经济的浩淼无涯中汲取了增长的源泉；然而，韩国留给世人的不仅仅是产品、服务和资本，更多是制度创新的启示——无痛苦的生产方式转轨，神速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奇迹般的资本集中和动员……在短短三十年间走过了西方国家三百年的历程。有机遇，但还要善于把握机遇；有理论，但更多的是一往无前的实践与摸索。

鲜血、汗水和梦想造就了韩国的奇迹。在奔流不息的汉江里、在水天一色的太平洋上，一条小龙已横空出世，如日方中。

第四章 权威 · 秩序 · 市场经济

韩国，是东西方经济学家都面对的一个“特例”。它在传统经济环境中迅速建立起来的市场运作模式显然与兰格、布鲁斯以至斯大林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有着本质的区别；另一方面，在短短的三十年间，韩国政府全面介入经济生活，从行政干预到计划引导，与自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以来的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市场自动调节的传统思想大相径庭。但是，无论是偶然还是必然，韩国成功了，在世人对这一“奇迹”不绝的赞叹声中，经济学家们却陷入了对韩国“制度悖论”的深深思考之中……

按照最合乎“逻辑”的西方学者的思想，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是主体多元化和制度的自由化，即市场的交易主体必须是相互平等的多元结构，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交换或不交换等市场行为，以追求自身效益的最大化；同时，在经济制度中不能存在强制力量，否则就不能保证交易主体自愿行事，也就不能保证主体间的平等地位，最终会导致经济的低效率。因此，从理论上讲，市场经济排斥专制主义，反对国家干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也明白无误地按这一理论的指导步步深化。从十五世纪市场经济萌芽和市民阶级的初步形成，到十六世纪崇尚多元化、自主性的宗教改革；从十七世纪强调人文主义反对神权专制的文艺复兴运动，到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直接针对封建专制主义，提出“自由、平等、博爱”；……都是经济目标在政治思想上的体现。在具体实践中，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导火线是斯图亚特王朝官方垄断烟、酒专卖，阻碍了市场发展；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则是以资产阶级为首的“第三等级”反对波旁王朝分割国内市场，要求政治、经济平等。因此，在几百年来根深蒂固的西方传统价值观念中，资本主义即意味着“自由交易”，市场经济则意味着“主体平等”。

当世界进入二十世纪后半叶，韩国一鸣惊人，把政治权威引进了经济运行，把行政秩序揉入了市场秩序，使不相容的范畴变成了完美的结合，从而引发了世界经济制度的革命，也导致了制度经济学的革命。

美国经济学家雷蒙德·弗农于1979年提交给哈佛大学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深刻的思想变革：“如果我们内部政治经济结构不变，如果1945年以来的世界构成不变，那么一切国家自由地进入一切市场的观念和贸易壁垒的逐步减少以及资本市场的开放就会使我们很好的得益。世界经济体系将维持我们的原有的偏好和价值观念。可是，人们看到了东亚的崛起——它们正以我们完全不熟悉甚至曾轻易地加以否定的价值观和组织形式占领了我们曾经拥有的领域。人们也注意到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国家干预经济的不同方式。经济的竞争转化为意识形态的冲突和思想观念的调和，最终使我们不得不后退到这样一个问题上——我们是否一定要选择一系列在我们看来体现了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和原则……”

一、国家：从绝对权威到相对权威

世界银行专家帕维斯·哈桑在一篇题为《韩国：迅速增长的经济中的问题》中指出：“韩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度集权的政府引导下运行的私人企业，这是一种明显的悖论。在韩国，政府的作用绝不仅止于确定广泛的竞赛规则并通过市场力量间接影响经济，而是比这远为直接。事实上，政府似乎是一个参与者，常常在几乎所有经营性决策中具有决定性影响。”这是一种从学者的角度出发，对韩国的经济运行进行的“事后概括”。从历史的角度看，韩国“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抉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甚至可以说是在无可奈何中所作出的选择。

1. 绝对权威：由乱到治

从朝鲜战争结束到 1961 年以前，韩国的政治、经济局面一直是混乱不堪的。从政治活动看，完全依靠美国扶植上台的李承晚政权内部出现分裂，出现了“国会内自由党”和“国会外自由党”的激烈纷争，两派势同水火，政治斗争愈演愈烈。到 1960 年，自由党为了夺取总统选举的胜利，竟谋刺了几个在野党的总统候选人，一时舆论大哗，群情激愤，“四月学生革命”随之爆发，李承晚政权土崩瓦解。1960 年 7 月，韩国再次举行大选，当选总统张勉也无力收拾残局，韩国政局陷于风雨飘摇之中。在经济上，重建与恢复的前景十分渺茫，形成了靠美国“输血”生存的“美元依存型经济”。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韩国出现了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并存的局面，经济运行陷入了“低收入——低积累——低投资——低增长”的恶性循环，国际收支逆差每年都高达 3 亿美元左右，而外汇储备只有 2 亿美元。在产业上，工业生产大量过剩，75% 的企业开工不足，造成 40% 的高失业率。在农业上，素有“粮仓”之称的韩国却需要每年从美国进口 500 万吨粮食，廉价的美国农产品使小农经济迅速破产。

政治经济的全面危机导致了“铁腕人物”的出现。1961 年 5 月 16 日，朴正熙与陆军士官学校第 8 期毕业生金钟泌等少壮派军人，在深夜零点调动军队，借进行“烽火作战”演习之名，突然进击汉城，迅速占领总统府、国会大厦和广播电台，宣布全国戒严。5 月 18 日，张勉政权下台。“五·一六”政变后，朴正熙军人集团成立了新的韩国最高权力机构——“国家重建最高会议”，议长虽由前陆军总参谋长张都英担任，但实权却由副议长朴正熙一手操纵。为了建立绝对权威，同年，朴正熙利用所谓张都英“反革命阴谋”事件，逮捕张都英，并翦除其党羽，从此开始了朴正熙长达 18 年的独裁统治。

朴正熙的 18 年，是韩国由起飞到高速增长的 18 年。在他的一系列治国方略下，才有所谓“汉江奇迹”，才出现了所谓“第二个日本”现象。

2. 计划和市场：最初的结合

“五·一六”军事政变从根本上改变了韩国的混乱状况。事实上，在朝鲜半岛自 1945 年后的政治生活中，军方早已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左右着政局，军事政变只是使这种力量变得表面化、公开化、合法化。但是，此后的情况便有所不同了，甚至带有一定的戏剧性。军政府把军事组织管理的严格性和高效率运用到了社会管理和经济调控中，由此开始了一系列的制度变迁。

(1) 行政引导——政府主导型经济运营机制

韩国政局进入相对平稳阶段后，经济的振兴便成为当务之急。韩国政府

认为，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市场机制不发达，为保证经济运行的正常秩序，特别是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必须强化政府的宏观控制。为此，韩国迅速走上了以政府的行政引导为主的经济道路，目的是为了弥补市场机制不健全的经济环境下导向机制的“真空”。

第一，引导机构的设置。

1961年7月，朴正熙政府大力改组经济管理部门，新设了统管经济全局的“经济企划院”，自1963年起，由副总理兼任经济企划院长官，集中了政府的所有经济权力，如从建设部接管了全部计划责任，从财务部吸收了预算局，从内务部吸收了统计局。为了加强政策研究和制定的科学性，经济企划院建立了“韩国开发研究所”，起用了一大批经济专家和技术人员。此后，韩国又成立了“开发研究院”和“产业研究院”等高级咨询机构，为韩国的经济发展出谋划策。

韩国经济企划院的权力很大：可以自行决定产业部门的扶植重点和淘汰对象；密切监督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同官方贸易促进会一起，研究和开发世界目标市场和适用技术；邀请国内外专家，提供咨询，帮助制订计划。

作为经济企划院的附属研究机构，韩国开发研究院负责研究和分析国民经济发展的总量和结构问题，据此确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经济政策。

成立稍后的韩国开发研究院是韩国最大的经济技术研究机构，隶属商工部，在汉城、釜山、大邱、光州、大田等地设有7家分院，与海外15家数据资料中心建立往来关系。其职能是负责收集海外产业、贸易和技术发展的最新动向和信息，为韩国政府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服务。

第二，发展战略的抉择。

韩国政府认为，在本国财力、物力和技术资源十分稀缺的情况下，依靠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必将会出现结构失衡、经济增长缺乏后劲的结果。这是因为资本追逐的是最大利润，如果在投资领域放任自流，资本必然会集中于短期收益率高，见效快的产业，其结果是“长线更长，短线更短”。韩国政府采取了“不平衡增长战略”，以政府的扶植引导产业投资，一方面确保投资的经济效益，同时还要兼顾国家长期发展的需要。所以，政府在发展战略的选择上，不是采取压制市场的方式，而是一方面允许市场发挥其资源配置功能，另一方面给予适当的行政引导，在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选择不同的主导产业，以主动的姿态进行产业结构的重组。在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上，韩国采取了“先工业化、后农业现代化”的策略。其基本考虑是：在耕地有限、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情况下，单纯依靠农业积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为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结果只会延缓工业化进程；而工业的产出率较高，只要获得一定的初始资本投入，结合以大量廉价劳动力，发展以出口换汇为目标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一条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捷径。根据这一思路，政府和民间投资集中于工业部门，使工业部门在从1962年到1979年的18年间，年平均增长19%，而农业仅为3%。同样，在轻、重工业的关系上，韩国政府也采取了“先轻后重，以轻养重”的战略，在1962—1971年间，韩国的产业投资集中于投资省、见效快的轻纺工业，扩大出口创汇，以此增加基础工业建设所必需的资金实力。自七十年代起，重化工业成为政府导向投资的重点，钢铁、汽车、造船、有色金属、电子、石油化工、机械、水泥、纤维和陶瓷等“十大战略部门”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它们所得到的新增投资占韩国总体工业投资的70—80%。第三，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制定。韩国的

出口导向战略，基本上是由政府一手促成的。从商品出口、劳务输出、资本引进到对外投资，都有国家相应的法律手段和经济权杆的支撑。这些内容在本书前一章已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在此恕不赘言。总之，韩国的经济发展进程充分体现了政府的能动作用。毫不夸张地说，韩国经济飞跃的任何一个值得世人称道的成功经验，都离不开政府事前周密细致的安排。所以，韩国的秘诀，就是如何淋漓尽致地发挥政府经济调节机能的艺术。在这一点上，军政府以其特有的管理模式达到了有效引导国家经济前进的目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任何所谓“民主政权”所无法实现的。

（2）市场“培育”

自从朴正熙把经济增长放在韩国政府一系列政策目标的首要地位时，韩国人就自然而然地找到了“市场”，这把能打开财富大门的钥匙。经济学家总是惊异于韩国式的专制主义下诞生的市场体系——它是如此成长迅速而且结构完美，与西方市场体系并无二致。其实这里并无奥秘可言。政府追求的是经济增长，并且看到了国内市场的狭小，而以出口导向作为发展的模式。而在国际市场上，专制政府是不存在的——强制性交易不大可能出现，唯有以价格机制引导企业行为，保持市场的高效运行，才能使韩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通行无阻。所以，政府不仅不能压抑企业的市场行为，相反，还要鼓励企业进入市场，尤其是要敢于经国际市场的狂风大浪。

韩国政府认为，企业是市场主体，只有大企业才能经得起越来越严酷的国际竞争。另一方面，韩国政府调节市场，如果面对的是众多的小企业，协调的成本必然很大，而如果调节的对象是为数不多的大企业，在市场不健全的情况下，要容易操作得多。因此，韩国政府通过扶植大企业来促进市场的发育。据统计，1978年韩国在发展重化工业时，对只占制造业企业总数10%的大企业实行贷款，却占贷款总额的77%。同时，享受优惠贷款的大企业要承担一定额度的外汇创收义务。目前，韩国矗立着100多家大企业，占其企业总数的4.3%，其产值占GNP的比重高达73.3%。

韩国的这种特殊的市场发育手段与西方国家完全背道而驰。在美国，为了反对大企业在国内市场的垄断，保持自由竞争经济的活力，国会通过了“谢尔曼法”等一系列反托拉斯法，限制大企业的行为。相反，韩国为了打入国际市场，发育国内市场，从一开始就以建立和扶植大企业为己任，实现了从自然经济社会迈入市场经济的飞跃。

3. 相对权威：指导性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韩国政府介入经济生活的手段也随着社会由乱到治而发生了变化，并逐步稳定下来。政府从以行政命令方式强行参与经济事务转变为通过计划指导和与之相对应的各项政策的配套实施，把国家的宏观经济调节和私人企业的微观经济运行结合起来，政府建立起了自身的“相对权威”。

（1）五年计划——内容与效果

从1962年起，韩国已制定并实施了七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以此引导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发展成就。

第一个五年计划（1962年—1966年）

该计划的基本目标是：为了克服五十年代韩国畸形的消费性经济结构，大力发展替代进口产业的工业部门，提高工业产品的自给能力，为“经济自立”奠定基础。该计划规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电力工业和煤炭工业，确保能源供应；扩大农业生产，克服国民经济结构的不平衡；扩充基础工业和社

会的公共设施；扩大就业，开发国土；增加出口，改善国际收支，振兴科学技术。

根据计划目标，韩国大力引进外国资本，充实社会资本，扩大劳动就业，加快农业发展。资本的投向集中于水利资源开发、石油精制、水泥和化工等部门。但是，在“一·五”计划实施不到两年，农业严重歉收，加上计划投资规模远远超过实际投资能力，韩国政府于1964年对计划进行了修订，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年计划增长率由8.5%降至5%），压缩投资规模（总投资率由20%降至17%）。为了解决资金不足的主要困难，政府统一思想，于1965年通过实现“韩日关系”正常化，从日本取得了8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其中，无偿援助3亿美元，偿还期为七年的政府贷款2亿美元，私人贷款3亿美元）。韩国在其“一·五”计划期间的总投资额为5779.8亿韩元，其中外资占54.2%；同时引进大型外国先进技术30项。资本和技术的引进，对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到计划期末，韩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7.8%，大大超过了五十年代的经济增长速度。

在“一·五”期间，韩国经济增长呈现非均衡的特征：工矿业年均增长15%，农业水产业年均增长5.3%，电力、交通及公用事业增长8.1%。在整个GNP中的比重，农林水产业由37.4%下降到31.7%，工矿业由19.1%上升为25.7%，电力、交通和公用事业由43.5%下降为42.6%。工业内部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20.5%提高到30.6%，轻工业则由79.5%下降为69.4%。在制造业中，增长最快的是电机、出口用机械、初级金属制品、木制品和纸张等。

“一·五”期间，由于韩国政府开始推行“出口第一主义”，于1964年和1965年采取降低汇率，由130韩元兑换1美元降为25.4韩元兑换1美元，并实行单一浮动汇率制，扶植对外贸易的发展。出口总额从0.4亿美元增加到了2.5亿美元，增长5倍以上，出口商品结构从五十年代的农副产品占主要地位转变为以工业品出口为主。进口总额由1962年的4.1亿美元增加到1966年的6.8亿美元，增长了6.3%，进口的商品结构从消费资料为主转变为以机器设备和各种原材料为主。1964年11月30日，韩国的出口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朝野上下欣喜若狂。韩国政府规定每年的11月30日为“出口日”，作为国家性节日进行庆祝纪念。

第二个五年计划（1967年—1971年）

韩国的“二·五”计划，充分体现了政府的高瞻远瞩和务实作风。随着经济运行步入正轨，韩国政府提出了从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的经济发展长远目标，即“确立自立经济体制，奠定现代化经济的基础”。其主要标志是：（1）达到“充分就业”；（2）实现“国际收支平衡”；（3）投资来源以内资为主。韩国的“二·五”计划就是为这一长远目标作准备的。其基本目标是：“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的现代化和自立经济的确立”。具体而言，就是除了继续扩大“一·五”计划期间作为重点的社会间接资本外，重点是大力谋求工业结构的现代化，着手开发钢铁工业和石油化学工业，并且在“出口第一主义”政策的指导下，使韩国逐步实现经济开放，加速出口导向的工业化进程，促进进口产品的国产化，使出口产品大幅度地增加。

在计划的实际操作上，韩国政府重视“廉价且高素质的劳动力”的作用。为解决企业界人才不足的问题，政府通过行政和经济措施，把高素质的人才从政府机构和金融界引向企业界，同时鼓励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韩国利用

美国和日本的先进技术，建立起了钢铁工业基地和电子工业基地。

“二·五”期间，韩国经济突飞猛进，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10.5%，大大超过“一·五”时期。按 1965 年不变价格来计算，1971 年的 GNP 达到 15.6 亿元，比 1965 年的 8.1 亿元增加了 93.8%。

“二·五”期间，韩国的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各部门增长速度进一步拉开。工矿业年平均增长 19.9%，农林水产业年均增长 1.2%，社会公用事业及服务业年均增长

12.5%。农林水产业在 GNP 中的比重由 31.7% 下降到 24.2%，工矿业比重则由 25.7% 上升为 29.9%，社会公用事业和服务业的比重也从 42.6% 上升到 45.9%。主要工业品的

产量大幅度增加，尤其是合成纤维、石油化工、水泥、钢板等产品产量成倍增长。只有主要农产品产量因农业歉收而减少。

“二·五”期间投资总额为 19,842 亿韩元，其中引进外资的年平均投资率达到 30.9%，高于“一·五”期间平均投资率的一倍。在此期间，外国无偿援助为 5.8 亿美元，引进外国贷款和直接投资共达 22.62 亿美元。从投资结构看，社会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投资是韩国的投资重点，以突破经济增长的“瓶颈”制约。在“双基”产业中，电力、交通和社会公用事业投资 12517.9 亿韩元，占总投资的 63.1%；工矿业投资 4404.9 亿韩元，占总投资的 22.2%；农林水产业投资 1286.5 亿韩元，占总投资的 6.5%；此外，库存投资占 8.2%。在公用事业、基础设施和工业基地上的重点投资，大大改善了韩国的投资环境，促进了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为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

“二·五”期间，韩国的出口总额从 1966 年的 2.5 亿美元增加到 1971 年的 11.3 亿美元，增长了近 5 倍，年均增长 35%，进口总额由 1966 年的 6.8 亿美元增加到 1971 年的 21.9 亿美元，增加了近 3 倍。

第三个五年计划（1972—1976 年）

韩国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是其经济发展的巨大转折点。它的关键性是其它几个计划所无法比拟的。这一期间，韩国面临着世界经济转轨和产业结构调整机遇，也面临着石油危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世界市场萧条的冲击，能否抓住机遇，战胜困难，成为韩国经济生死攸关的决定性因素。

1972 年，西方发达国家进行了第一轮产业结构调整，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较利益出现了向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转移的趋势，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市场则面临着工资成本比韩国更低廉的东盟等发展中国家的竞争。韩国政府意识到必须抓住这一时机发展重化工业，将重化工业定为这一阶段的“成长战略产业”。因此，在 1973 年，韩国提出了“重化学工业化宣言”，迅速将产业政策从“轻纺工业出口刺激型”转化为“重化学工业刺激型”，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在此基础上制定的“三·五”计划以“开发农渔业经济，迅速扩大出口，建立重化学工业”为中心任务。其基础目标是：在稳定的基础上使经济持续增长，实现“增长、稳定和均衡三调和”；改善产业结构和国际收支，实现主要粮食自给，发展重化学工业，确立“自立经济结构”；开发汉江等四大河流，扩充地区内主要公路网，对土地进行综合开发等。

为了具体贯彻和实施以重化工业发展为核心的“三·五”计划，韩国专门成立了“重化学工业推进企划团”，对重化工业的发展重点、产品结构和

地区分布进行统一协调。同时，以建立昌源机械工业出口生产基地为起点，韩国的出口产品档次也进一步提高，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主旨得到了深化。

“三·五”期间，尽管韩国经济遭受了1973年末的世界性石油危机的冲击，GNP仍然从102.8亿美元增加到232.9亿美元，保持了平均每年11.2%的高增长率，超过了计划年均增长8.6%的指标。即使在1974年和1975年，受到世界性普遍衰退的影响，经济成长的步伐明显放慢，但仍保持了8.7%和8.3%的高增长，这在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是罕见的。

“三·五”期间，韩国投资总额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达到5679亿韩元，总投资率为26.1%。引进外资总额为59.8亿美元，比“二·五”时期增长一倍以上。由于继续推行“出口第一”主义和积极引进外资的政策，使出口贸易的年均增长率高达47.1%。到1976年，商品出口总额为78亿美元，大大超过35亿美元的原定计划指标。这一时期，也是韩国劳务出口和海外工程承包业获得迅猛发展的“黄金时代”，中东成为韩国建筑工程企业的主战场。1977年，韩国出口劳务的企业达62家，出口国家和地区达25个。

在出口的带动下，国民经济各部门都有较大的发展，农林渔业平均年增长4.8%，工矿业年增长率为18.2%，社会间接资本及其它服务业增长8.4%。经济结构进一步发生变化，农林渔业仍占GNP的24.7%，社会公共资本的比重略有下降，由45.9%下降为44.2%，工矿业则由原来的29.9%上升为31.1%。在此期间，钢铁、机械、造船等重工业部门和家用电器的生产都有了突出的增长。

第四个五年计划（1977年—1981年）

“三·五”计划的顺利进行增强了韩国政府的信心，力图加快重化学工业化的步伐。在“四·五”计划的制订中，政府提出要充分利用欧美国家摆脱经济困境还采用的低利率政策，大量引进低息外资，促进产业结构现代化，增加粮食生产，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改善国际收支状况。韩国的“四·五”计划以“保障国家的永久安全和国民生活的量与质的提高”为根本宗旨，根据“增长、平衡、能率”三原则，保证“社会开发”、“技术革新”和“效率向上”，确立“自立经济结构”。韩国政府认为，经济自立应由以下特征组成：（1）产业结构的现代化；（2）国际收支的平衡；（3）粮食基本自给；（4）地区内积累作为主要投资来源；（5）实现充分就业。

但是，“四·五”计划的执行却不尽如人意。由于1979年第二次世界能源危机的冲击，以及潜伏于韩国经济中的一系列矛盾的总爆发，导致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率迅速攀升，一度高达20%以上，经济成长率却一再下跌。政局也因此出现动荡，1979年，朴正熙总统遇刺，全斗焕上台执政，政治、经济陷于空前的混乱状态。“四·五”期间，GNP平均每年增长5.7%，大大低于计划水平，尤其是在1980年，韩国出现了朝鲜停战以来第一次负增长，增长率为-6.2%。从各部门看，农业发展仍然缓慢，年均仅增长1%，在1980年甚至跌落至-22%的增长谷底；制造业发展速度放慢为10%，未达到14.2%的计划指标。企业开工不足，生产能力过剩，出口增长率下降到年均33.9%，进口增长加速为年均34.9%，国际收支赤字仅1979—1981年就累计达到141.1亿美元。

在计划后期，韩国计划当局虽然采取了强制性的总需求抑制政策，但计划最终仍未完成。可以认为，“四·五”计划是韩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失败的计划，其根源在于韩国经济结构畸形，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因而经不起

世界经济衰退的打击。同时，韩国政府和企业界也深深地认识到政局稳定对于经济成长的“保护作用”。

第五个五年计划（1982年—1986年）

这是一个具有调整性质的五年计划。“四·五”计划由于盲目追求高速度，导致国内经济结构严重失调，结构性通货膨胀日趋严重，外债负担日益加重。调整成为本期计划的中心任务。“调整”的具体有三：（1）由“政府主导型经济”过渡到“民间主导型经济”，削弱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量，强调价格机制和市场调节的作用；（2）放弃“增长至上主义”，强调稳定和协调，经济发展战略逐步由非均衡增长进入均衡增长的轨道；（3）产业结构进一步高度化，投资重点从重化学工业转入技术密集和节省能源消耗的产业上。“五·五”计划所规定的基本指标是：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到1986年，GNP达到931亿美元，人均GNP达到2226美元，出口总额为357亿美元，进口总额为351亿美元，失业率降至3.8%。经过大幅度的经济调整，韩国初步实现了经济的恢复与协调。到1986年，韩国GNP为970亿美元，人均GNP达到2210美元，保持了7.9%的高增长率。

“五·五”期间，韩国的产业结构进一步均衡化，尤其是农林水产业在政府扶植下逐渐起步，年均增长率达到6.3%，高于以往的水平。工业进入稳定增长时期，年均增长率为9.6%，由单纯注重速度转变为速度与效益并重。公用事业和服务业的增长幅度略有下降，年均保持6.7%左右，低于前二十年的水平。根据世界银行《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统计，在1985年韩国的GDP结构中，农林水产业占14%，工矿业占45%，公用事业和服务业占41%。

“五·五”期间，经过经济调整，各项计划指标基本完成，通货膨胀率由22%下降到12%，实现了31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经济又进入健康运行的轨道。

第六个五年计划（1987年—1991年）

这是韩国刚刚结束的五年计划。计划的主要目标是“为二十一世纪的发达社会构筑牢固的基础”，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更注重经济的均衡和效率，提出“在效率和均衡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发展，增进国民福利”。

“六·五”计划是一个非常乐观的社会经济综合开发计划”。从国际上看，世界经济的“三低”（美元汇率低、石油价格低、国际资本利率低）现象，对于韩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是十分有利的，可以降低产品和资金使用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从国内看，经过“五·五”期间的大力调整，韩国经济已走出低谷，经济增长、就业充分、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的四大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好转。因此，政府审时度势，以经济改革为中心，提出了系统的规划措施，旨在使韩国经济进入又一个腾飞阶段。

“六·五”计划提出，计划期内GNP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2%；到1991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800美元，总投资率在30%以上，年出口总额为544亿美元，经常收支顺差为40亿美元。具体内容有：（1）努力实现充分就业。计划每年吸收37.5万新增劳动力，并通过传统农林渔业的工业化，扩大内需，减少外债负担。（2）进一步扩大出口。提出由以往的单纯注重出口产品数量的经济模式转变为以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为中心，克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同时要缓和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加强对境外投资的管理。（3）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技术立国。在提高机械、电子、汽车等主导产业的技

术能力和生产能力的同时，强化纤维、手工制作等传统出口产业的竞争力，实现其高价值附加化。扶植中小企业的发展，以扩大产业的总体规模，特别是要集中力量促进与机械加工、零部件和原材料生产有关的中小企业的发展，以提高产品的国产化程度，使未来的韩国成为世界性的零部件供应基地。科学技术投资占 GNP 的比重将由 1985 年的 1.7% 提高到 1991 年的 2.5%。(4) 强调地区间的均衡发展，提高地区经济活力。主要措施是控制人口和产业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给地方政府以更大的政、经权力，计划到 1991 年建成一百个“农村工业化地区”，提高这些地区居民的收入。(5) 提高居民福利水平，在公平和效率并重的基础上，合理分配社会收入。政府先后在农村地区和城市实行地域性医疗保险，从 1988 年起又建立了国民年金制度和最低工资制度，同时缩小学历间和就业种类间的工资差别。(6) 提高市场经济活力，建立立足于自立和竞争原理基础之上的自由市场经济秩序。对政府的经济干预职能进行合理定位，避免过度的经济集中，进口的自由化比率到 1988 年要达到 95% 以上。

韩国的“六·五”计划以“技术、市场”为中心，进入了“自主技术开发战略”的实施阶段。这一战略的实施，标志着韩国产业结构的完善和市场体制的进步。在这一新的发展战略主导下，韩国采取了以下措施。(1) 扶植高科技产业，自主开发技术密集型产品，以突破国际上的进口管制壁垒，进一步打开国际市场；(2) 扩大国内市场，提高国民消费能力，提高汽车、空调机、彩电等高、中档消费品的普及率，大力发展城市建设和住宅建设，扩大交通通信网，并以申办 1986 年亚运会和 1988 年奥运会来刺激国内需求。(3) 进一步开放国内产品和服务市场，实施进口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以开展互利互惠贸易，吸引海外直接投资。(4) 发展跨国公司和对外输出资本，以绕过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5) 大力培养本国的科技力量，同时加强科研机构的建设，积极开展国际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

到 1991 年底，韩国已经完成“六·五”计划，迈入“七·五”时期。从各项计划指标的完成情况来看，既有辉煌的成就，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可以认为，到了九十年代，韩国经济日趋成熟，已具备了先进工业化国家的基本特征。

在计划实施的前两年，韩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到 1988 年，其经济增长率连续三年达到 12%（其中，1986 年为 12.3%，1987 年为 12%，1988 年为 12.1%），大大超过计划指标。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奥运会前后的消费刺激，农业生产的连年丰收，以及电子、汽车和高技术产业的迅速扩张都不同程度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

在市场结构上，韩国的国内市场逐渐趋于成熟。以往的韩国经济发展是外向型经济为其主翼的，国外需求是拉动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六·五”期间，韩国政府认为过度依赖国外市场容易受世界性通货膨胀和衰退的影响，主动权操在其他国家手中，经济缺乏“自主性”和“安全性”；同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韩国企业所占据的世界市场份额已趋于极限，经济进入“稳定增长”时期，因而有必要实现从以出口为中心向以内需为中心的转移。随着国内不动产的金融市场的完善与活跃，国内需求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据韩国银行统计，1988 年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 6.9%，远远超过了 5.3% 的出口贡献度。这一转换意味着韩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的成熟。

在国际收支上，经常收支盈余随海外投资收益率的提高和产品出口量的上升而呈直线增加趋势。

但是，在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摩擦加剧、资本利率提高、原材料价格上涨、韩国货币汇率上升、劳动力价格上升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下，从 1989 年起，韩国经济出现明显的滑坡。1989 年，韩国经济增长率跌落至 6.5%，1990 年进一步下降到 6%，不仅低于年度 6.5% 的计划指标，也大大低于从 1961 年至 1988 年的年均 8.5% 的增长速度，在亚洲“四小龙”中居于最末一位。1989 年初，韩国经济企划院一度修订了 1991 年的计划增长速度指标，规定从 8% 下调至 7%，但仍然没有完成。这种情况仅在“四·五”期间出现过，引起了韩国朝野上下的警觉。

但是，仔细探究韩国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经济增长幅度放慢的根本原因，可以发现，这是体制转轨的需要，也是经济成熟的必然，同时也是国际市场影响的结果。

首先，经济趋于成熟，竞争日益激烈，韩国原有的宏观与微观体制已不足以保证经济的进一步成长，市场体制取代计划模式已势在必行。二十多年来，韩国一直以行政引导的方式调配资源，确定资本的流向和流量，造成了投资的利益诱导机制不健全，资源配置的非效率化和浪费，投资收益率不透明和投资风险过大等问题。在经济日益成熟的过程中，明智的企业家显然会对这种非市场诱导的投资缺乏信心和动力，最终造成投资率的下降。在韩国的设备投资率指标中，其增长幅度在 1987 年为 21.3%，1988 年为 10.1%，1989 年仅达到 7.6%；而日本同期的增长率分别达到 8.1%、15.9% 和 20.2%。设备更新改造速度的放慢会直接影响企业的技术水平，从而最终造成韩国产品竞争力的下降。

其次，随着二十多年来韩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迅速上升，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以往的勤俭、节约逐渐为迅速增长的消费品、娱乐和旅游支出所取代，国民储蓄率下降，消费率急剧上升。在这段时期，国内总消费以每年 9% 以上的速度增长，1988 年为 10%，1989 年为 9.9%，1990 年为 9%；其中，城市居民的消费支出增长已超过了收入的增长。

以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观点看，当资本主义经济进入成熟阶段后，投资日趋饱和，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呈下降趋势，再增加投资最终只能导致生产能力的相对过剩和“有效需求”的相对不足，造成经济衰退。因此，经济增长将最终由消费的“乘数效应”来保证。所以，韩国经济的成熟是造成投资下降，消费上升，经济增长率稳中有降的根本原因。

第三，韩国经济在总体上仍然是出口主导型经济，国际市场的兴旺与疲软直接影响到韩国的出口增长率和经济成长幅度。从 1989 年起，经济衰退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美国、欧共体国家和日本相继受到“传染”，高度依赖发达国家市场的韩国经济自然不可避免。1989 年计划出口增长 8%，而实际增长率仅为 4%，1990 年和 1991 年则进一步下降为 2.3% 和 1.9%。尽管计划当局采取一系列措施降低生产成本，促进出口量上升，以及把营销战略转换为内需主导型体制，等等，但结构转换非一日之功，效果并不显著。

无论是喜是忧，韩国经济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人们已经看到了东方浮现的新时代的曙光。

(2) 十年计划——国土综合开发

韩国政府在产业发展的同时，十分注重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因而把有条不紊地开发国土资源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早在六十年代初，朴正熙执政初期，韩国政府就先后颁布了《城市计划法》（1962年）、《国土建设综合计划法》（1963年）及《国土计划基本设想》（1968年）。在此基础上，韩国计划当局于1971年会同国内有关部门，并在美国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专家的参与下，制定出了为期十年的“第一个国土综合开发计划”（1972年—1981年）。此后，又制定了“第二个国土综合开发计划”（1982年—1991年）。因此，这两个计划又被称为“十年计划”。

122

国土综合开发计划的主要内容有：（1）土地利用计划。计划将韩国全境分为4个大图和8个中图，并在此基础上划分了11个农业生产基地，确定专业生产区。（2）水利资源开发计划。重点对汉江、锦江、洛东江和荣山江四大流域进行统一调度，综合开发。（3）交通运输开发计划。为实现全国各地人员、物资交流畅通无阻，韩国提出了“全国5小时生活圈化”，即在5小时内可由大城市到达任何边远地区。（4）城市开发计划。为避免工业化和城市化造成的人口过度集中和城市的畸型膨胀等问题，韩国在汉城圈内推行人口疏散政策，在半月地区开辟新的工业城和新的“行政首府”。（5）工业区计划。为了实现专业化分工，防止过度竞争和便于统一调度，韩国根据各地方的资源优势，设置了以不同产业为主导的工业区。

第一个十年计划在扩大工业用地、建设高速公路和推进江河流域综合开发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工业化带来的资源配置问题也十分严重——能源和土地供应紧张、环境污染严重、人口过度集中，等等。为了把经济增长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结合起来，第二个十年计划改变了以往“据地开发”的战略，采取“广域开发模式”，开发重点由汉城、釜山等少数大城市转向广阔的“边缘地带”，大力推进地方中小城市的建立，建立起一个又一个“增长极”，迅速带动所在地域经济的起飞。

在两个十年计划指导下，韩国经济的地区性二元结构得以基本消除，落后地区得到了合理开发，国土资源得到了切实保护，就业水平和收入水平不断上升，国内资源的“瓶颈”约束远不如其他发展中国家那么明显。

韩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是颇具特色的，它以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作为终极目标；在订立和实施中充分体现了科学性、民主性和权威性；并建立了一整套科学的指标体系，提高了计划调控的效率和效果，可操作性极强。然而，这种计划虽然凌驾于企业、市场之上，却不具备强制性，而是作为一种指导性的调控力量，促进了经济的健康发展。

在韩国，计划和市场的结合堪称“完美”，令全世界的经济学家为之赞叹！

二、财阀：秩序的载体

公共政策经济学家罗伯托·利姆在他的《政府的政策和私人企业：韩国的工业化经验》一书中写道：“企业的纵向与横向联合可以使一个企业规避风险，市场的不确定性和结构变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纵向联合能够消除企业对原料供应者和产品购买方的依赖性，确保了市场的稳定性……横向联合则增大了信息流，进而减少了投资和生产决策者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这些是起源于日本，后来又在韩国大量出现的所谓‘企业集团’或‘财阀’，产生的若干原因之一……”

在韩国，财阀是一个独特的社会经济现象。它脱胎于韩国独特的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土壤之上，在政府强有力的“擒”与“纵”之间，借助于“自由市场制度”和资本主义管理方式而迅速成长、壮大起来，左右着韩国的经济走向，并且影响着韩国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生活。“财阀”一般是指由家族控制的、具有相当大规模的企业集团，或者说是由家族控制的独立企业的联合体。韩国财阀远不同于欧美的财团。后者主要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兼并和联合而逐步形成的，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韩国的财阀是在不完善的市场秩序下形成的，无论在它的内部管理上，还是接受政府的宏观调控上，都带有浓厚的行政秩序色彩，同时，它又是市场运行的主体，带着政府和自身的意愿进行市场行为。因此，财阀的存在使韩国的经济体制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三级结构”：“政府调控财阀，财阀引导市场”。

与其说是韩国政府选择了财阀，倒不如说是历史选择了财阀。在韩国经济发展初期，政府面临着政治、经济的混乱局面。第一，市场是不完备的，政府的财政、金融经济杠杆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而强制性的行政命令在不计其数的小企业面前又显得十分乏力。于是，政府想到了重点扶植几个大财阀，通过对他们的调控就能使他们的行为充分体现政府的意愿，经济运行的秩序就能得到保证。第二，无论是进口替代还是出口导向，无论在本国市场上还是在世界市场上，韩国企业都将面临早已羽翼丰满、身经百战的发达国家企业的竞争，民族工业没有一定的资本规模显然只能甘拜下风，只有大规模企业集团的形成，才有可能在国际市场分得一杯羹。所以，韩国的财阀既是国内行政秩序的体现，又是世界市场秩序的载体，是政治和经济的紧密结合。也正因为有了财阀，才有了韩国的经济起飞和工业化。

1. “裂变”与“聚变”：韩国时间的成长之路

韩国的财阀是一个个庞大的企业集群，拥有众多的独资子公司、控股公司和参股公司，雇佣有数千乃至十几万名职工。它的经营领域遍及一、二、三次产业，其触角已伸到了经济、社会和国民生活的各个角落，其能量之大足以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从经营规模上看，韩国前 50 大财阀的营业额，在 1983 年为 532,274 亿韩元，与当年的 GNP582,800 亿韩元相差无比；在 1985 年达到 776,303 亿韩元，比当年的 GNP723,170 亿韩元还高出 7.3%；1987 年的营业额达到 970.763 亿韩元，仍略高于当年 950,760 亿韩元的 GNP 值。从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看，前 50 大财阀的附加值总额占 GNP 的比重，在 1983 年和 1985 年分别高达 23%和 20.8%，1987 年为 15.6%，实际数额达到 151,660 亿韩元。从对出口扩张的作用看，财阀所属的前 10 大综合商社的出口额，1982 年为 105,35 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 50.4

%；1984年为143，18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8%。显然，财阀已成为韩国外向型经济的主体。从吸收就业的效果看，财阀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截止到1986年末，占韩国企业总数1.2%的大企业，吸收的就业职工达226.7万名，占韩国总就业人数的40.2%。

韩国大财阀在世界大工业企业的行列中也占据了一席之地。1981年和1982年，就分别有10家和9家大企业被美国《幸福》杂志列入除美国以外的世界500家大企业中；到1987年，被列入世界500家大企业的韩国企业增至11家，而且所居位次均大大提前。1985年，三星和现代两大财阀首次被列入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50家大企业”中，分别居第42位和第44位；1986年和1987年，三星财阀又连续跃居第35位和第32位。

以韩国这样一个面积不足10万平方公里，人口不到5000万的小国，竟然能在“一夜之间”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如此之多、且如此庞大的财阀，无疑又是一个“奇迹”。

如果可以把韩国的生产资源、产出和收益，以及市场份额向大财阀的集中看作是一种核“聚变”效应的话；那么，韩国财阀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发展历程就堪称是一种核“裂变”效应。

韩国的财阀是在非常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按其不同的产生时期，可以划分为不同的财团类型。

第一阶段：萌芽期（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中期）的“原始型”财阀。当时韩国一批20—30岁的年轻人利用日本扩大侵华战争和发动太平洋战争所带来的“军需景气”和日本财阀向朝鲜半岛转移部分产业的有利时机，开始涉足实业界，在日本殖民统治的夹缝中经营粮谷加工、食品、养殖、纺织等中小企业和粮食贩运、杂货买卖等商业和服务业。通过掠夺土地和从事工商业经营，他们经历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吸收了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管理经验，逐步扩大经营范围，从而建立起大的企业集团。与以后的财阀相比，它们规模较小，一般都以小型工商业为经营主体，较著名的有“三养财阀”和“和信财阀”

等。

第二阶段：成长期（四十年代末期至五十年代末期）的传统型财阀。它们主要是借助于韩国经济复兴的良机，依靠美国的经济援助发展起来的。1945年朝鲜独立和1953年朝鲜停战后，殖民时期的中小企业主和商业资本家利用经济复苏之机，纷纷投靠到美国占领当局和韩国当权者麾下，通过与政治权力的合流，获得了赖以生存和成长的基本资本。1947年后，美国占领当局将没收日本殖民经济的，包括2576家各类企业、相当于当时韩国总产业价值80%的所谓“归属财产”，经韩国当局之手“处理”给私人企业主。1945年9月至1961年间，美国以供给消费品、农产品及生产资料的形式向韩国提供了价值21.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韩国政府将这些援助物资在市场上进行销售，转化为相当于当时财政总收入40%左右的货币资本，以此充当对工商业贷款和投资的来源，借助上述资金条件，许多私人企业主开办企业、拓展贸易，逐步在农副产品加工、轻纺工业、不动产和金融业等领域占据了垄断地位。比较著名的财阀有：“三星”、“乐喜”、“大韩电线”等。

第三阶段：膨胀期（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的现代财阀。六十年代初，朴正熙政权上台后，曾采取一些措施，以没收财产等方式对财阀的“不正当蓄财”进行处理，试图改变财阀对国民经济的垄断状态，给原有的财阀

一定的打击。但是，政府很快发现，在市场体制不健全、企业缺乏竞争力的情况下，财阀是一支可以加以发挥的经济力量，当然是在政府调控与指导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在韩国“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的大旗下，私营大企业充当起经济开发，特别是扩大出口的龙头，为现代财阀的兴盛开辟了道路。在政府各种优惠政策的扶植下，原有的私营企业加速了资本扩张，同时又促使更多的私人企业主投身新兴产业，并加入国际竞争的行列，积极谋求外向发展，迅速巩固了垄断地位。七十年代初中期，在“重化学工业化”的浪潮中，得力于政府的优惠贷款、税收减免等政策倾斜，大批财阀转向钢铁、石化、造船、汽车、电子等产业领域，迅速推动了韩国的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转变为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实现了生产结构和经营结构的升级换代。这一时期新涌现的代表性财阀有“现代”、“鲜京”、“韩国火药”、“大宇”、“双龙”、“韩进”和“东亚建设”等30多家，堪称财阀发展的鼎盛时期。

在现有的50家著名财阀中，“三星”、“现代”、“金星”、“大宇”和“鲜京”号称五大财阀，其净产值占韩国GNP的比重，1973年为3.5%，1978年为8.1%，1983年为10%，1986年在13%左右。在1986年，五大财阀中年销售额最高的“三星”实现137,115亿韩元的营业指标，最低的“鲜京”也有52.853亿韩元。

2. 扶植与竞争：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

从韩国财阀的发展历程中不难看出，在以往的三十多年中，财阀是依靠政府和政策倾斜而取得在某一产业的垄断地位的；同时，韩国企业家的艰苦创业、勤勉经营，也是使财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的必要条件。

(1) 扶植：政治权力与垄断资本的高度结合

韩国政府在经济发展初期选择了扶植私营企业，特别是大型私营企业，以塑造市场运行的微观主体的发展道路。其政策根据是，大型财阀凭借其资金、人力、设备和技术优势，有条件通过大批量生产降低成本，实现规模效益；能依靠其资信地位、筹资能力和开发能力，从事投资大、周期长和风险高的产业；能作为外向型经济的骨干，充当出口主力，并发挥产业联动的效果，带动经济高速增长。为此，韩国政府以信贷、税收、出口补贴等多种行政手段和经济杠杆，优先、重点地扶植大企业。七十年代中期以后，政府贷款的1/3-2/3被作为“政策性融资”，用于资助大财阀的发展。大财阀不但可以得到低利贷款，而且可以优先使用外资，并能得到大量出口补贴和各种补助金。这种“倾斜式”的扶植，使大财阀在内外市场的竞争中都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这是它们得以迅速崛起的基本因素之一。

同时，大财阀也认识到，在韩国市场功能不健全的前提条件下，政府以计划、行政手段配置经济资源将成为主要的方式。因此，在政府运用综合性宏观规划、经济杠杆、法律条令及行政手段引导、约束、推动企业行为，甚至直接干预企业的投资及经营活动时，财阀为了争取政策性优惠，以便对内确立垄断地位，并在对外竞争和扩张中占据优势，也视政府为靠山和后盾。

“顺之者昌”的心理，使韩国财阀乐于按政府的旨意行事。因此，韩国财阀的私人垄断资本与政府的政治权力结成密不可分的关系，其结合的密切程度超过任何“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于是，在韩国的市场秩序之上，出现了更高层次的行政秩序。政府的行政干预和计划调控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企业根据市场状况作出的经营决策；政府在成功地实施经济计划的三十多年中也发

现，直接干预比利用纷繁复杂的现代宏观经济政策要更省事、见效更快，且成本更低，何乐而不为？

政府强有力的作用往往直接渗透到财阀的重要管理和运作之中。正如哈佛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的，政府实际上是大财阀的缔造者，“在韩国大企业，政府是事实上的董事局主席，而商人们只有一些董事席位”。尽管随着经济的增长，财阀的经济实力在不断上升，但是仍然不能摆脱对政府的强烈依赖性。同日本财阀不同，韩国财阀的核心层往往是产业性大公司，而不是银行机构，所以不具备信贷能力。政府提供的贷款成为韩国财阀赖以生存的“生命线”，这就成为政府手中掌握的最有力的武器。经济企划院的官员控制着国内的贷款来源，有权给予某些出口创汇企业、从事战略性、主导型产业的投资的财阀以优惠，他们还通过许可证的方式充当外国贷款的媒介。韩国财阀是在经济落后、自有资本十分有限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因而贷款是扩大再生产的主要来源，而这一命脉操纵在政府手中，只要需要，政府可以使任何一家财阀在任何时候陷入破产的境地。极端的事例发生在1972年，当时的约尔森财团支持反对派领袖金大中，给朴正熙带来了不少麻烦，总统“拔掉塞子”，切断了资金供应，约尔森财团便垮台了。

另一方面，韩国政府又充分认识到让市场保持高效率运转的重要性，一方面能够迅速推动经济成长，另一方面可以发挥市场作为防止制度性腐败的钳制因素的作用。政府以其超然的“对各部门和各地区的利益保持相对的中立性”来操纵和鼓励大财阀的发展。

在政企的密切结合中，韩国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2）竞争：国内与国际

在韩国的国内市场上，市场容量的狭小与巨型财阀的众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谁占有更广阔的产业领域，谁拥有更多的子公司，谁就能获得垄断地位，因此在不同的财阀之间、同一财阀的不同企业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围绕争夺经营范围的蚕食和兼并是韩国经济生活中的“家常便饭”。其结果，失败者只好俯首称臣，沦为更大的财阀的“卫星企业”。按照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越是财大势雄的财阀，拥有的卫星企业就越多，在市场竞争中所处的地位也就越有利。据统计，韩国前30家大财阀所拥有的卫星企业的数目，1975年为250个，1980年剧增到420个，近年来虽然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到1991年仍有413个。这些企业大多数并不是根据现代化大生产所要求的分工与协作而进行的系列化组合，虽同属一个财阀，却分布于不同的产业和行业中，从家用电器生产到对外工程承包，五花八门，无所不有，这种包罗万象的“百货店式”的财阀经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某一行业不景气对企业的致命性打击，增强了财阀的生存能力。

同时，韩国财阀之所以把兼并作为扩大自身势力的主要手段，原因在于它们认为这要比直接投资新建企业简捷得多，没有建设期，不需要重新组织技术力量和操作工人，降低了交易成本。据韩国研究所统计，仅在1976年和1977年两年间，就有23个财阀吞并了49家企业，到1978年则有58家财阀吞并了138家企业。兼并一方面使大财阀消灭了竞争对手，取得在某一行业中的垄断地位；另一方面又可以把自己的触角伸向新的产业领域。如“乐喜金星”曾经先兼并了“国际电线”，又收购了“林永皮革”，前者消灭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后者则使它顺利地打入皮革领域。兼并的结果，是财阀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这一趋势从各财阀的销售额、上市股份资本额和拥有

企业数的差别上明显地表现出来。1986年，“三星”财阀的年销售额达137,115亿韩元，而列第49位的“东亚制药”的年销售额仅为1,858亿韩元，仅占“三星”的1.35%。即使是名列第10位的“罗德”财阀，也仅实现了14,472亿韩元的销售额，约为“三星”的1/10强。从注册资本额看，名列榜首的“乐喜金星”达1,054亿韩元，是“富国制钢”的45倍多，是位居第10名的“双龙”财阀的4倍。财阀拥有的企业数，最多的是“金星”财阀，有46家，最少是“忠南纺纱”，只有2家。随着经济的发展，财阀间的势力分化将进一步显露出来。

市场竞争的激烈还可以从一年一度的财阀排名榜名次的变化上反映出来。据统计，从1966年到1985年的20年间，能够始终在韩国十大财阀排名榜上占据一席之地的只有“三星”和“乐喜金星”两家财阀。而在韩国被称为“重化学工业化旗手”的“现代”财阀，直到1974年才打入十大财阀之列；1985年销售额名列第四的“大宇”财阀，在1966年之前连其实体都不存在。另一方面，韩国大财阀的衰败与没落也是司空见惯的事。从六十年代至今，已有“三佚”、“国际商事”等四家财阀破产和倒闭。同时，在六十年代盛极一时的大财阀，其影响力在目前越来越弱，由鼎盛走向了衰落。其原因是随着韩国产业结构的迅速升级换代，以传统轻纺工业为主要经营业务的财阀必然面临市场萎缩的困境，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又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最终不得不让位于从事新兴产业投资的财阀。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韩国的财阀排名榜就是产业结构的晴雨表。如1983年名列第十五位的“汉阳”财阀，到1988年降至第二十八位；而在1983年名列第二十四位的“东国制钢”财阀，到1988年则跃居第十五位。1977年打入十大财阀的“鲜京”和“双龙”财阀，一年之后就被“大韩电线”和“韩国火药”挤下了台。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哪一个财阀都不能高枕无忧，它们必须居安思危，不断地壮大实力，以保住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国际市场上，韩国财阀则是大显身手，以积极的姿态迎接国际竞争。政府“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极大地推动了韩国企业参与国际分工，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和国际标准、国际惯例，组织生产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加速经济现代化的进程。韩国财阀的能动性在国际市场上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对于政府导向的反应上和对于市场信号的反应上，都体现出极强的灵敏性。财阀外向型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大力组建出口导向企业，组织加工出口产品外销，以低劳动力成本取得比较优势；第二阶段是组建综合贸易商社，在海外建立销售、服务及信息网络，直接进入国际市场，以强有力的竞争占领国际市场；第三阶段是走向跨国公司化，不但从事商品交易，而且进行证券交易和直接投资，在海外设立生产基地，开展跨国生产和经营。据统计。截止到1987年底，“现代”、“大宇”、“三星”等20家大财阀在海外建立了182家企业，总资产达67亿美元。截止到1988年12月，韩国海外直接投资总额为15.51亿美元，累计998个项目。

韩国财阀以拓展海外市场为发展的主渠道，充分配合了政府的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它们参与市场竞争的艺术性和生命力。国民经济发展和企业的利润目标在财阀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3. 传统与现代：财阀的经营模式

韩国财阀规模庞大，经营范围广泛，毫无疑问是现代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尽管财阀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在市场竞争中却不带有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所共有的低效率、资源配置失当等问题。恰恰相反，它们一旦闯入市场，便能迅速夺取并巩固相当的市场份额，在经营和管理中显示出了极大的灵活性。但是，韩国的财阀只有不到半个世纪的成长过程，不仅不能与英美等经历了从十八世纪产业革命的老牌财团媲美，即使与日本明治维新后发展起来的“三井”、“三菱”、“住友”等大财团相比，也只能算是“小字辈”。由于韩国的财阀脱胎于传统农业经济社会，因此在其经营模式上体现出传统与现代交叉融合的特点。

（1）企业家才能：经营的根本要素

无论是战前的原始型财阀，还是五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传统型财阀，以及工业化过程中新兴的现代财阀，都表现出韩国式企业家艰苦创业、悉心经营的共同素质。多数财阀从经营粮食、日用品、火药生意或开办粮食加工厂、酿造厂、修理厂、棉纺厂等小企业和小作坊以及从事运输业、土木建筑业起家。他们遭受过日本殖民统治，经历了战争的浩劫和破坏，并在激烈的对内对外竞争中时时面临着破产倒闭的威胁。这样的环境造就了韩国财阀不怕挫折、不畏艰险的性格。正是这种白手起家、惨淡经营的创业精神，才能使他们闯过重重难关，学会在逆境中求生存的经营艺术，使企业由小变大，资本由少而多，逐渐发展成为韩国经济成长的中坚力量。

韩国财阀善于顺应时势，积极开拓进取。六十年代，他们乘外向型经济转轨变型的有利时机，积极投向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产业；七十年代，他们借推进“重化学工业化”政策，大举开辟资本密集型产业领域；八十年代则在新的经济调整中，他们又开始涉足技术密集型高技术产业。瞄准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的变化，果断地向新的领域和部门进军，这就使财阀不但实现了规模的扩大，而且实现了生产结构的升级。

精于管理，重视人才，也是韩国财阀迅速发展的秘诀。他们积极吸收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重视引进、运用新技术和进行技术开发，严格依照国际标准组织生产、销售和服务，努力使企业具备与国际先进大企业竞争、抗衡的资格和地位。财阀们崇尚“人才是企业生命”的信条，思贤若渴，不遗余力地发现、选拔人才。在财阀之间频频发生“人才争夺战”。他们贯彻“因才任用”的原则，对精通业务、善于管理、年富力强的优秀人才委以重任，并坚持以品格、能力，特别是实绩为标准进行考核，提拔精进人员。他们还十分重视人才投资，对企业员工进行严格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努力提高其素质。财阀的企业领导层具有相当高的知识结构。通过对 100 家大企业的 2266 名经营者调查，其中 96.8%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获得过博士学位的有 43 名，曾留学海外的达 145 人。重视、培养和善用人才是韩国财阀兴旺发达的根本之道。

（2）家族模式：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结合

韩国财阀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企业一样，基本上采取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的组织形式，但在它的所有制结构中，财阀的家族资本在其所属企业的总资本中占据了主要地位。从 1983 年韩国 30 家“上市公司”的持股情况看，财阀及其家族控股比重占 43%，构成了企业股份的主体，金融机构持股仅为 6%；同时，由家族控制的核心企业，通过法人持股的方式占有其他企业，是韩国财阀集团化的基本模式。

韩国财阀的“家族所有”模式，具体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是“企业者垄断型”。即创业者以其个人或家族的名义直接拥有大

量股份。如“韩进”财阀，其家族拥有企业集团 26%的股份；再如“锦湖”财阀，其家族直接占有了 34%的股份。采用这类所有制结构的财阀，企业规模一般相对较小。

第二是“核心企业所有型”。即创业者及其家族直接控制核心企业的股份，再由核心企业以法人持股的形式控制下属企业的股份。如“大宇”财阀，其创业者金宇中家族直接占有大宇集团的核心企业——大宇实业的大量股份；大宇实业又持有集团内各企业的大部分股权。

第三是“相互持股型”。它除具备第二种类型的所有制形式外，各企业间还相互持股。这类财阀的规模是最大的。

不论采取哪种方式，财阀的股份都收敛于创业者及其家族。据不完全测算，财阀家族拥有的股份平均为 33%左右。与这种所有制结构相适应的，就是财阀的创业者及其家族积极参与企业经营，所有权与经营权并未因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而发生分离。因此，在韩国财阀的运作中，高度集中的经营决策成为其基本特征。

韩国财阀的家族化经营，是与韩国财阀成长的内外经济条件分不开的。

第一，韩国财阀起步晚，创业历史短暂，主要财阀的起始企业部出现于四十年代之后，许多财阀仍处于“创业时代”。“三星财阀”是在 1987 年末首先完成权力过渡的，“金星”、“双龙”、“晓星”、“韩国火药”等财阀的创业者虽然不再担任企业集团的董事长，但仍是财阀的最高决策者。到目前为止，只有一半的财阀完成了实质性的权力让渡。所以，经营权的高度集中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企业的经营环境变动剧烈。企业要生存发展，必须及时根据环境的变化作出决策。同时，国际市场更是瞬息万变，使大多数依赖海外消费的韩国企业必须提高决策速度。这就要求减少决策环节，实行高度集中的一元化管理模式。

第三，正如产品需要商标一样，创业者及其家族就是财阀的“门面”。政府的扶植、投资者的抉择、消费者的认同，除了根据企业经营绩效、产品质量、服务优劣势外，还十分注重财阀的形象。在公众和政府眼中，大名鼎鼎的李秉喆就是“三星”财阀，金宇中就是“大宇”财阀，郑周永就是“现代”财阀。他们的形象已经成为企业的“无形资产”，这显然也是韩国财阀内部“个人崇拜”和“家天下”的形成原因之一。

对于韩国财阀的所有结构和经营模式，经济学家们褒贬不一，莫衷一是。应当指出的是，韩国真正走上市场经济道路的时间并不长，从以往韩国政府和企业界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来看，他们会不断变革，寻求最适合自身发展的经营模式。因此，现在下结论恐怕还为时尚早。

(3) 负债经营：潜伏的危机

在韩国财阀短暂的发展历程中，各财阀企业为建立垄断地位，致力于外延扩大，尽可能多地占据经营领域，结果造成企业规模膨胀与经营素质脆弱并存的局面。财阀大举扩张所诱发的资金需求，主要通过大量使用银行贷款来加以解决，因而“负债经营”成为韩国财阀的一种普遍现象。据统计，截止到 1988 年 6 月，韩国 50 大财阀的平均自有资本占总资产的比率为 18.1%，远低于标准比率 50%，也低于同期所有企业的平均比率 21.7%。50 大财阀的平均负债率为 454.8%，大大高于标准负债比率 100%，也高于所有企业平均负债率 360.3%。同期，前 30 家大财阀中，负债率超过 500%的有 16 家。

财务结构的恶化，标志着企业结构的脆弱。一旦经营环境激变，企业无力自救，就濒临破产的边缘。从七十年代起，“东明”、“国际商业”、“票山”等几家财阀的解体都是债务危机所致。

总之，韩国的“财阀经济”是其经济制度中的一个重要侧面。财阀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沟通了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既贯彻了政府宏观调控的意旨，又是市场竞争的主体。财阀，作为韩国经济的一个特殊的“中观层次”，影响着韩国经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三、制度创新：从行政导向到市场秩序

随着韩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有识之士意识到韩国再一次面临体制转轨的客观需要。经济的日趋成熟和市场的日益完善，使原本对经济增长起过重要作用的政府行为提出了新的要求。经过几十年的发育，韩国企业的竞争力日渐提高，它们一方面仍然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以保证市场的健康运转，弥补市场的缺陷；另一方面又希望能有一个更为宽松的经济环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竞争促进效率。

韩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1. 经济杠杆：政府的新工具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并非“局外人”，只是政府的职能不是直接干预和介入市场，而是利用财政的、金融的间接手段引导企业行为，以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基本目标。韩国政府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加强经济的自由度，也逐步由计划调节转向运用经济杠杆调控国民经济。

(1) 财政体制改革韩国的财政体制充分体现了“为经济增长服务、出口第一”的原则。在七十年代，韩国给予出口企业的公司所得税、股息所得税、资产税、资本货物进口关税以极大的减免优惠。进入八十年代后，韩国政府为了促进经济的再次腾飞和市场的完善化，提出了以稳定国民生活、实现产业技术现代化、促进市场功能为目标的税收改革，减少了对主导产业的直接性财政补贴，而是以有针对性的税收优惠促进经济成长。在九十年代初，韩国政府特别注重新技术的开发，对科研机构的投资、新技术的企业化投资实行免税，大大刺激了韩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有力地增强了产品的竞争力。

面对税收减免所带来的政府可支配收入的减少，政府一反过去单纯依靠赤字财政干预经济的传统模式，而是大力压缩财政支出规模，为企业“断奶”，让它们大胆地到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去竞争，以提高企业依靠自我积累和技术更新求生存、求发展的能力。

“小政府、大市场”成为韩国政府力求达到的新目标。

(2) 采用现代化金融手段，促进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

韩国的金融市场是比较现代化的。从六十年代起，政府推进了金融体系的完备化建设，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得以大量建立。为了实现政府对市场的调节，韩国首先完善了中央银行——韩国银行的职能，以利率、汇率、存款准备率、公开市场业务等现代化金融杠杆取代了单纯依靠货币发行量的调节以干预经济的手段。同时，韩国又于1969年设立了“进出口银行”，经营中长期进出口信贷业务，极大地促进了出口导向工业化的进程。到了七十年代，韩国制定了《资本市场发展法》，开放股票市场，设立投资公司，逐步建立和健全了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近年来，金融自由化成为韩国金融业发展的方向。

为了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韩国允许外国大银行进军韩国市场，与本国商业银行竞争、合作，为产业发展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韩国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各种措施将受到削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2. 经济自由化：向“民间主导型经济”过渡

早在1981年，韩国政府的《行政白皮书》指出，以往的经济发展得力于

政府主导，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市场经济的作用，使企业的竞争力弱化，为了从根本上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或早或晚必须向民间主导型经济体制转换。同时，韩国企业界也向政府发出了紧缩财政、确保金融机构运营的自律性的要求。在当时的情况下，韩国政府颁布了《限制垄断及公平交易法》、《金融制度改革方法》、《产业援助法案》等一系列法律性文件。按照韩国官方权威机构的解释，“经济自由化”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所有制方面的国有或公有企业的民营化；（2）企业经营方面的自主化，或称自律化，即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尽量排除政府的过多干预；（3）在市场秩序方面，消除妨碍公平交易的因素，保护中小企业的成长，限制生产经营的垄断。总之，经济自由化就是要逐步建立民间主导型的经济体制。

民间主导型经济，可以认为是对以往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的部分否定。原有体制从七十年代末期起就暴露出许多问题。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活动，特别是依靠政府巨额补助金和出口补贴等办法来扶植民间企业，造成了一系列副作用。企业对政府的过度依赖、民间企业活力的丧失、企业间正常竞争的削弱、政府财政负担的加重、办事机构的重叠，以及办事效率的低下……一系列“经济病”、“社会病”正在困扰着韩国政府和企业，严重影响到世纪之交韩国的新一轮腾飞。针对这一局面，政府有必要重新考虑到韩国经济环境的塑造，应该给企业以更为自由的发展空间，在对企业进行必要的干预的同时，强化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最大限度地激发企业活力。

韩国社会各阶层普遍认识到，经济自由化是韩国由传统经济模式走向真正成熟的现代经济体制的必由之路。是走出经济困境，实现新的经济起飞的必由之路。因为，经济自由化的五大指标也就是韩国今后二十年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

拥有更强大的经济势力，成为亚大地区乃至全世界的一个重要的工业产品供应国。

形成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高层次产业群和高度化的产业结构。

财阀与中小企业间呈现互补的产业组织关系。

贸易、金融和资本的自由运行。

扩大社会福利，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流，国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

转轨是艰难的，阵痛是难免的。然而韩国人信心十足——在经济自由化大潮的冲击下，腾飞于世界的，将是一条新的经济巨龙。

美国经济学家查默斯·约翰逊在他的《政治制度与经济运行》中把韩国的经济制度定义为“柔性专制主义”下的高速增长体系。这一体系的要素包括：由技术官僚实行的稳定统治；在一个强有力的主导性计划机构的全面引导下，政府与私人部门间的合作；耐保经济增长的持续的教育和科技投资；一个懂得如何使用及尊重价格机制的政府。

无论是通解还是特例，韩国又为世界提供了一种经济增长的模式。

它告诉人们，制度选择对于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

它告诉人们，政府与市场并不总是相悖的。

它告诉人们，稳定保证了增长，而社会摩擦则足以断送增长。

它告诉人们，起飞不再是梦想。

它告诉人们，……

韩国，东方的神话。

第五章大韩民族的复兴意识

直到东海水枯，白头山石烂，上天永保我疆土！愿我大韩民国万万年。

万众意志如钢，似南山劲松站岗。任凭风吹霜打，恒心持久绵长。

愿我大韩精神，如秋夜晴空皓月。清辉洒向大地，坚定，真诚，执著。

用我们的意志和精神，热爱我们亲爱的祖国。把身心与忠诚献给她。不管面对痛苦还是欢乐。

锦绣江山三千里，无穷花遍地盛开。大韩人誓死卫国，愿韩国屹立万代！

《爱国歌》——大韩民国的国歌，优美的音乐中充满了力量。风雨坎坷五千年，铸就了大韩人的意志——如钢如铁，半岛的风云造就了大韩人的性格——如南山之松。一首爱国之歌，唱出了韩国人民的决心，也道出了韩国民族的希望。

美丽的半岛被碧蓝的海水包围着。其中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养育了它的主人——大韩民族。

三面环海的地理位置曾经使朝鲜民族安宁地生活成长。创造了自己民族特有的文化，同大陆相连的半岛通道也给这个民族带来了新信息，使韩国民族受到了中华文明的影响和熏陶，并成为东亚文化圈中的一员。但是，曾几何时，从狂浪突起的遥远海天线上闯入了陌生的入侵者，使朝鲜民族遭受悲惨的命运；半岛陆路通道上的大山并不能挡住异族的铁蹄。

然而，大韩民族的生命力是极强的，生生不息五千年造就的灿烂文化和特殊性格使她能像大海一样承受灾难，消融一切并从中吸取力量，复兴民族，谱写辉煌的篇章。

一、东方文明中的民族精神

历史之河绵延数千年的韩国民族，在内外交患之中克服万难，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直至今日，该民族独创的伦理精神和思想体系还是民族生存的基石。

从韩国民族五千年的精神脉络来看，其民族精神起源于檀君，以其为背景发展到新罗的统一——三国精神，及近代的“三·一运动”精神。檀君精神为上古时代的产物；新罗的三国统一精神就其特征而言，实在是集东方之大成，并富有创新的性格；而“三·一精神”，则是处在西风东渐之际，综合时代背景与传统思想而成的自由之魂。

檀君神话，是朝鲜开国的写照。《三国遗事》中《古记》称：帝释庶子桓雄，贪求人世，得天符印三枚，率三千徒，降于太白山顶神檀树下，称桓雄天王。命风伯、雨师、云师掌人间农事、生老病死、善恶刑罚等三百六十余件大事。桓雄与熊变人身的熊女婚配，生子，号桓君王俭，于唐尧在位之五十年，定都平壤城，始称朝鲜。后，移都白岳山阿斯达，有国1500年。周武王即位，封箕子于朝鲜，檀君乃移于藏唐京，后还隐阿斯达。这一神话表达了韩族人民的精神寄托。

在韩半岛的三国时代，新罗崇尚中华文明，与唐朝联合击败了高丽及百济，而后又基于民族精神，再度联络高丽、百济的遗民与唐朝展开了斗争，经过多年努力，新罗完成了韩半岛的统一，其激发的精神就是花郎徒的“和谥”理论。

“和谥”理论为实现理想的和平社会，提倡一切众生有佛性，主张非平等的平等，反对自我中心主义，希望藉三国精神的特殊性互为融合，形成真正的统一。

向往统一，和平安宁是这一东方民族性格的一种基调，然而这并非表明这一民族的软弱可欺，恰相反，他们为了自己民族的事业而抗抵异族，实现真正的民族自由。

光阴荏苒，历史车轮来到了朝鲜李朝时代。

当高丽灭亡时，政权转到李朝手中，韩国国家统治理念也由佛教的护国思想，转变为儒家性理学。它来源于中华文化，被韩国民族加以开发、整理，从而掺入了当地的土著性，形成了韩鲜独特的性理与思想。

性理学原为易学论理：由周易发扬光大而成的朝鲜理学，基本上遵从朱子学。它的自然观是阴阳对立的二极对峙；它的人伦观则是调和人际关系的大家族制度；它的战争观则认为“兵不祥器”。其原则完全以周易为中心。

性理学的易学思想贯穿了朝鲜，成为传统思想的主流。对内求静，对外事大，就是“事大交邻”外交政策的基本哲学。最能集中反映这种朝鲜王朝文化的是韩国国旗——太极旗。

李氏王朝的衰落，标志了韩国进入新时代。

十九世纪的来临，西方文化大举到来，造成了韩国的保守与开明两派的竞争。朝鲜的内争给予日本可乘之机，1910年，日本魔掌伸入韩半岛，将朝鲜吞并，并实行殖民政策，完全否定了韩国传统思想。日本统治朝鲜36年，强迫韩国人民放弃往日民族思想，做日本的顺民，结果韩国民族不甘忍受殖民统治，不断反抗，三·一精神就是行动的产物。

1919年3月1日，韩国民族，不分男女老幼，揭竿而起向日本的殖民侵

略挑战，其原始的动力即为韩国民族精神的发扬。因此，三·一运动精神应为韩国的正统政治思想，完全由韩国民族独创的易学伦理，加西欧“动”的要素综合而来。

如上粗线条基本刻画了韩文化特征及源流。

传统的韩国政治制度是以家族为基础，其社会的结构在高丽朝鲜时代已形成以父系血统为中心的大家族制度。所以韩国与中国一样讲究忠孝之道，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族制度占了重要的地位。祖宗家法便是权威。

在韩国的文化发展史上，一般公认儒学占了外来因素极重要的地位，不仅如此，儒学思想几乎支配了韩国近代整个的思想，可以说，韩国应为全世界最汉化的国家，也是中国以外儒学思想与社会最密切结合的国家。

韩国社会几千年来未能摆脱儒学影响的范围，而又充分发挥了儒学思想的优点，将义理精神应用至民族主义上，把伦理道德视为治世之宝典，把君臣父子之观念作为修身养性座右铭。

毋庸置疑，韩文化为东方文化亦添上一笔。

中韩两大民族文化原是一脉相传，曾有一位颇负盛名的韩国学者许世旭博士说过“如果把中华文化比喻为长江的话，那么，韩国文化就是长江分出的第一大支流，但是，浩浩荡荡的大江是见不到底的，没有声息的，不比支流的清澈，也正因为如此——原是一源流的两大民族也有了不小的区别”。

就韩国人的个性来看，一般而言，韩国人喜欢白色，在思想方面韩国人以儒学精神为主，有浓厚的抵抗性及好战性、豪放、知命，有及时行乐的味道，这些都同中国人有所差别。

韩国人的优点是连绵性、持续性、创造性、自律性、道义性，刚气勇敢、温厚着实、礼仪东方、爱国至诚。

1. 顽强的生命力和民族激情

韩国的民众，经常生活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之中，半岛的地理位置招致无数次外国的入侵，从古至今，朝鲜半岛历经劫难。

外族的入侵，并不仅仅限于武力方面，政治上和外交上的压力也是侵略的形式之一。古代大陆上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会立刻给比邻的韩国或多或少的的影响。以往战争的残酷程度，令人难以想象。固然，无论何时，战争总是残酷的，但是对战败者的处置，在现代化过程开始以前和其后却有很大不同。以前，战败就意味着死亡。韩国的民众被屠戮者难计其数。国内战争与外族之间的战争也有所不同。国内战争结束后，战胜者对战败的民众一般采取安抚、同化的政策；而在同外族作战中一旦战败，民众的命运便可想而知。

韩国的民众就是在这种极端严峻的、不断忍受外族侵略和殖民统治的环境中生活的。为了获得战争的胜利，为了民族的解放和民众的自由，他们总是试图拼死去抵抗，而每次被镇压则要惨遭杀戮或忍受艰难生活的煎熬。

诸如在高丽时代，先是辽国派遣 80 万大军于公元 930 年入侵韩国，此后，辽又先后四次入侵。1231 年，蒙古族开始侵略韩国，此后又相继六次入侵。在这些战争中，不计其数的人被杀害。李朝时代最大的一次灾变，是绵延了七年之久的丰臣秀吉的王辰之乱。此后，又爆发了丙子之乱和中国清王朝对韩国的多次大规模军事入侵。历史的车轮进入近代以来，韩国人并未因西方的工业文明而逃此厄运，同东方的大多数国家一样，韩国的大门也照例被西

洋的炮舰打开。西方入侵的硝烟还未散尽，日本人又登上了这块战火连绵的焦土，开始了其残酷的殖民统治。而外族对韩国的统治，使韩国民众陷于屡遭劫难的悲惨境地。这些战争给韩国带来的是破坏和残杀，从而使百姓们生活于凄凉悲苦之中，难以生存。

韩国的民众就是在如此难以忍受的环境中存活下来了。在战乱中，要想保全性命，只能依靠家族，为避免战争的灾害，求得生存，人们就只能齐心协力，保卫家园。

正是这种背景，造就了韩民族的适应力与生命力，造就了大韩民族的民族激情。它来自韩国文化和历史的双重构成。异族的屡次入侵，国内统治的压迫，使韩国家族共同体的传统顽强地保持下来。家国同事，彼此不分。当韩国的政府军不能抵御外族入侵时，民众中却自发地兴起了义军，义军的首领常常是崇尚忠诚和节义的家族首领，他们有献身的信念和勇气，他们有为家为国富于牺牲的精神。在日本推行殖民政策的时期，韩国人民不堪忍受作亡国奴，1910年三·一独立运动，民众奋起反抗日本的侵略。所有这一切都铸就了韩民族的性格。

在韩国5000年的历史中，虽然曾经受到数不清的外族侵略，但从没长期隶属于一个民族的统治。韩国的民众总是处在公开或隐蔽地反抗侵略，保护家园的斗争中。他们继承着独特的文化传统，坚韧不拔，捍卫着民族的生存。

韩国人有极强的适应力，有应付任何事件的韧性和顽强的性格。因此，当他们为了一个目标，互相理解，共同奋斗的时候，就能迸发出巨大的能量和激情。

2. “我们国家的道路”的精神

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的韩国，满目疮痍，百废待举。

面对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文化渗透的民众，面对朝鲜李朝统治的文化历史遗产，五十年代的韩国总统写下了具有影响性的《我们国家的道路》。“我们国家的道路”的精神即是整个大韩的社会复兴思想，它首先强调经济文化的建设即培育国民的经济自立意识、“经济爱国主义”和企业精神。

朴正熙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是不发达国家出现革命骚动的时代，是不发达国家为了发展经济而开始参与竞争的时代。”“经济问题是我们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基础”。国家应当采取措施来解决人民的困难；政治应当最终为人民的经济利益服务。为了发展经济，必须使国民“经受现代民主精神净化之火的洗礼”，“来一个民族觉醒”，“形成现代化的精神状态”。

朴正熙认为朝鲜长期在专制君主和外来强国的统治下，形成了“事大主义”、“附庸主义和卑躬屈膝主义”、“奴隶主义”等“依赖他人、屈从以及盲目服从统治者的民族性格”，“缺乏独立精神”、“缺乏开创精神和进取精神”，人民“长期处于冬眠之中”，这阻碍振兴经济，不利于经济走向世界。他主张，通过全面、细致的灌输性宣传教育工作，使国民树立经济自立自强、“人能干我也能干”的观念，相信韩国人民有能力赶上和超过他国，向广大民众“灌输民族自我意识”和经济自立意识。

现在，随着韩国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自立”观念已在国民中牢固地树立起来。1984年1月，“现代集团”总裁郑周永在该集团管理人员大会上信心十足地说：“只要有主人意识，我确信，再过10年，我们即使超不过日本，也会赶上日本。目前，我们在许多领域已同日本并驾齐驱

了。”（《现代财团统帅郑周永》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9，P262）

其次是倡导“经济爱国主义”。朴正熙认为，必须使国民明了，“今天个人的经济生活，在严格意义上并非是个人的，而必然是社会生活和整个国民经济的一部分。”“只有当其他人也富有时，一个人的生活和财产才能得到保障——这是一种现代社会生活的方式”。只有“国家变得强大、自由和民主”，经济实力雄厚，“才能增强国家的威望和外交地位”。因此，“即使在经济活动上有完全的自由，我们也必须时时强烈地意识到我们人民的共同命运，不断提高和履行经济爱国主义”。“一个人对民族共同命运的意识和他的经济爱国主义应当通过积极、主动地参与完成政府的经济发展计划表现出来。”韩国政府的主张现已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得到贯彻。1987年3月，韩国的大宇集团，在其庆祝创业10周年时，总裁金宇中说：“政府的外向型经济政策……改变了我们的国际地位，这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革命性变化。”大宇“始终不渝地贯彻执行这一国策”。“大宇现在已经不属于哪个特定人或几个人的企业，而是全体国民的企业”。“大宇始终优先考虑国家利益”。我们必须“使社会、政府、企业三位一体，紧密团结，致力于发展经济”。（《大宇财团领袖金宇中》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P162—163，P167）

其三培养企业精神和企业家阶层。朴正熙认为，韩国封建社会和殖民时代的遗毒之一是“懒惰”、“特权思想和不劳而获的愿望”，以及享乐主义，这“阻碍了现代化”，没有形成“健全的经济概念”、“健全的职业观念”、“企业精神没有发展起来”。朴正熙曾对他所说的职业观念作了详细的解释。他说，在德语中，“职业”意为上帝的召唤或天职。西欧近代的宗教改革，都是教导人民发现个人的天职，为社会做出有益贡献。于是他们就忠于自己的工作，为本分尽责。战后取得“莱茵河奇迹”的西德人，就是在这种职业观念的激励下，一直勤奋地工作着。

自60年代起，韩国政府有意识地通过普通教育、职业培训、舆论宣传和政策措施，来培养国民的职业观念、企业精神和企业家阶层。随着韩国经济的腾飞和国际化，韩国逐步成长起了众多的大企业及企业家。到80年代，先后经过仅20多年的奋斗，韩国就有10家企业进入世界最大500家企业的行列。

在韩国，政治因素对造就企业家精英起着更关键性的作用。它的工业化是在1961年军事政变后由军事强人发动的。韩国军政府以建设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为最迫切的目标，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计划。这些计划使“自由”企业体系在政府“指导”和“干预下”进行定向，受到鼓励。政府进一步试行影响劳资关系，强调“产业和平”必须根植于韩国传统，以便维持“持久的经济增长”。1980年颁布《劳资代表会议法》，规定凡是100或更多雇员的行业必须成立劳资代表会议，劳资双方代表人数相等。会议的功能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培训工人，解决纠纷，增进工人利益，改善安全和劳动环境，加强劳资合作。政府领导的“工厂新村运动”是这种会议的思想支柱。运动的口号是“对待雇员如家人，为工厂工作如同干家务”。利用韩国传统价值，借助“工厂新村运动”建立一支像孝敬父母那样忠于公司的劳动队伍。由此延伸，雇主的决策不仅要遵循政府的规章制度，而且必须着眼于政府的利益。雇主坚持，企业实际上是“产业社团”，与其说要达到公司的目标，毋宁说是要达到国家的目标，雇员必须牺牲个人利益。

韩国的企业家意识即为，人人必须自愿参与国家计划，忍受低收入、加

班加点、恶劣劳动条件，等等。把一切说成是“暂时”的。为缩短“暂时”的困境，所有工人和雇主都必须遵从“上级”命令。通过“工厂新村运动”，用家庭关系喻工厂，不仅意味着工人必须合作以达到生产率的高增长，而且意味着群体的和谐。这样的企业家意识可以称为“军事模式”的。许多公司确实多少像军事化组织，要求雇员剪短发，穿灰色制服，左胸口袋上别上姓名标志。他们还使用多种军事术语的口号，诸如“工业战士”、“工业战线”、“边建设边战斗”、“出口战”、“占领 100 亿美元的出口高地”。

总而言之，《我们国家的道路》是提醒人们整个大韩民族面临了危机和挑战，促人猛醒，并为韩国的崛起而奋争。它是韩国复兴社会的思想，又是 50 年代韩国走向现代化的思路，更是一支号角。

二、汉城奥运会的精神内涵

1988年。

汉城——大韩民国的首都。

奥林匹克运动会隆重举行，那把给大韩民族伟大的生活里留下印记的永不熄灭的火炬，也给世界五十亿人民的心里点燃了和解的火种。

国际奥委会主席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是这样评价的：

“我确信，在近代奥运会近百年的历史上，第24届汉城奥运会是一次最成功的大会。

“同时，我也清楚汉城奥运会在实现东欧国家变革和人类和平的进程中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我再次向克服了南北分裂造成的痛苦和国内外的不利条件而成功地举办奥运会的韩国国民，致以衷心的敬意和赞许。

“汉城奥运会的伟大成就将永远载入史册，无论是对奥林匹克大家庭的成员，还是希望承办奥林匹克的所有的国家来说，这是可资借鉴的一次盛会。”（《奥运精神》光明日报出版社发行，1992年）

是的，1988年在汉城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世界五十亿的人们超越种族、宗教、政治、社会与文化的鸿沟创造了条件。更重要的是它实现了大韩民族的一个梦想：走向世界，向全球表明自己的价值。

这次盛会表现了韩国人对美好事物所表现出的真诚和热情。韩国人的一腔热血，只要有正确的引导，就可以对世界历史做出贡献，这是汉城奥运会给韩国人的启迪。

汉城奥运会的五大目标是：最广的参与、最大的和解、最高的成就、最好的安全和服务、最大的节约。韩国人做到了这些，而且汉城奥运会以维护世界和平的模式，确立了奥运会应起的作用。

在一个曾沦为殖民地的国家里，一个历经民族分裂与思想上进行“战争”的国家里，一个处于民主化漩涡中的国家里举行了这次奥运会，她促成了奥运史上最大规模的东西方和解，从而使人们重新找到了古希腊奥林匹克精神。

韩国奥委会加入国际奥委会四十个年头后，才争取到这样一个机会，终于迎来了希腊的圣火。为了迎接这一圣火，韩国人经历了多少个无眠之夜，付出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开幕式时被外国人称之为显示韩国力量的大型民俗表演，用的道具是用稻草编织而成的。在一向认为只有用钢铁制成的东西才会迸发出力量的欧洲人看来，也许对这种较力表演的柔韧性和强烈的节奏感有神秘感。钢铁之间的碰撞只会使它们变形，所以难以猛烈撞击。猛烈冲撞之后还会保持完好无损的特点取决于稻草的柔韧性。将冲突转化为和解的这种较力表演的高潮，向人们展现了韩国文化的丰富内涵。以韩国自己的文化为中心，吸收其它别国文化的长处。一位外国人看完开幕式后叹道：“我看到了韩国特有的色彩和动作，听到了韩国特有的声音。”

汉城奥运之歌“手拉手”的魅力是惊人的，从东方到欧美，多少国家的人们在诵唱这首奥运之歌。它之所以被人们广泛热爱，是因为它象征着和解与进步，符合世界上方兴未艾的民主化趋势。该歌作曲家莫罗德先生为寻找灵感曾于1987年访问了汉城。有一天清晨，他爬上了南山看日出，他望着冉冉升起的太阳，终于找到了灵感，这灵感便是歌曲强劲的开始部分。“手

拉手”一改韩国过去“寂静的清晨之国”的形象，为重新树立兴旺发达、充满生机、充满现代气息的崭新形象做出了重要贡献。

汉城的奥运会如此宏大，它越是盛大，韩国人就越是为它捏一把汗，“我们曾经放弃过亚运会举办权。因此，万一这次奥运会以失败告终的话，韩国就没有什么希望了。到时我们将陷入思想混乱局面而不能从自暴自弃的境况中解脱出来，成为葬送在5000年的历史首次碰到的绝好机会的千古罪人。从此，韩国人将失去信用，给世界造成极坏的印象，经济也会面临困境，国家信誉下降，‘韩国制造’的声誉也会随之受其影响。”所以韩国人只有拼搏奋斗共赴这次运动会。

汉城奥运会终于没有辜负韩国人的热情和努力，韩国无论从组织、信誉、形象、经济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使收入以及就业机会增大；它促进了国民的团结意识，成为提高民族自信心的转折点，树立了“我们也能干”的国民自信心，增强了战胜新的内外挑战，向经济发达国家迈进的信心；它促进了韩国对外形象的改善。

1988年10月2日下午7时，全世界的注意力又回到“蚕式”主赛场。人们尚未忘却16天前在这里举行的激动人心的开幕式，今天又期待着再一次体验那激动的心情。开幕式在白天，闭幕式在夜里。在主赛场设置了暗喻八卦图案的“S”形舞台。于是，阳和阴，太阳和月亮，男性和女性等互为对称的象征性因素构成了开幕闭幕的基本框架。梦幻般的光线和色彩混然一体，把蚕式主赛场装扮成完美的文化空间。手执各国国旗的运动员入场、升旗、乌鹊桥、“回忆”舞，一切都进行得井井有条……闭幕取得了圆满成功！

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为朴世直授予了奥运会金质奖章。朴世直低下头，代表伟大的韩国人民接受了这份殊荣。

通过汉城奥运会，使人感到韩国人很有灵感，是一个对灵魂的感受性极为出色的民族。

韩国人对奥运会如此热忱，是由于灵魂的震颤而使全身心兴奋之后的一种感情的自然流露。这种激情，正是韩国人的力量源泉，这个力量用好了，就有一种不可抵御的动力。韩国历史表明，韩国人的灵感正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经济的发达，唤起了人们对工作的热情，1989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十三位，但他们并不满足于经济的发达，而是同时为实现平等、自由、正义、民主而奋斗。

朴世直说，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奥运会成功的原因，那就是“因为我们用一颗爱心去工作”。从争办奥运会到闭幕，并努力使各种势力走到一起为止，他们自始至终都致力于宏扬奥运精神，用和平、智慧和爱心成功地举办这次盛会。正是这种身体力行、言行一致使汉城奥运会的宗旨没有成为一句空话，正是方法和目的完美结合的工作感动了世界人民。

汉城奥运会火炬的光芒，是由正在迅猛增长中的韩国年轻的能量燃出的。

汉城奥运会的火炬，照耀着曾长久生活在黑暗中的大韩民族，使之充满自信地开拓未来的道路。

三、东方文明与西方精神之间

韩国人的民族自尊第一，此乃国家复兴的基点。前美国驻韩大使理查德·沃克解释了韩国种种不安定中的安定：“他们会内斗，但是国家真有困难时，他们就团结在国家目标下”。沃克举了1986年亚运会一例：为什么赛前二个月一切都突然冷静下来，原因就在于“朝鲜人民的民族自尊”。

民族自尊对韩国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浦项钢铁企业策略处崔丁默承认：“朝鲜人很爱面子，中国人比较实际。”因为爱面子，政府出钱将高速公路两旁的农舍修葺刷新，使观光客备感抢眼。因为爱面子，韩国人很少妥协，冲突中的示威者在强烈的催泪瓦斯下，仍然猛冲而不却步。

经济上韩国人的民族自尊也很强。韩国电算院长金圣镇说：“经济上如果输了，别人就看不起你；如果赢了，别人就另眼相看，整个态度和气氛都变了。”

科技也是韩国人要追求民族自尊的竞技场。韩国除了要发展实用的技术，更为了在科技上创立自己的里程碑，而不停地向各种高科技探索。因此成为电视机王国还不够，还必须有录影机工业；发展出令人羡慕的256K式大规模集成电路还不够，还必须再向精密的一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迈进；有了世界第二大造船工业还不够，还必须有航空工业；甚至农业上能够生产香甜的水梨还不够，必须有能力用温室种植市价每根40元台币（合1.3美元）的香蕉。

著名的大财团更担负着为韩国创造奇迹的责任。三星、金星、大宇、现代等大财团各阶层的负责人，只要谈到公司的未来，没有不想到自己的成长对韩国未来的影响的。

在民族自尊之下，韩国人辅之以精诚团结、万众一心的做法，此可谓国家复兴实现的途径。1988年才窜升为世界第二大钢厂的浦项综合制铁株式会社，1961年建厂时，世界银行、美国进出口银行都认为韩国不宜贸然投资重工业而不肯贷款。临危受命的浦项社长朴泰俊却用日本战后为朝鲜的赔款，和39名工程师，硬闯出今天直逼日本制铁、也比中钢（台湾公营）产量高0.7倍的规模。浦项有关人士自豪地说：“如果浦项失败，就不会有韩国的经济奇迹，浦项的奇迹也就是韩国的奇迹。”

仅有清楚的国家目标是不够的，创造奇迹还需要一群人团结在目标下拼命。日经新闻社指出，韩国人与日本人很相似，都是订下目标后能集合全国力量来完成的民族。

排山倒海的全国大罢工，是在政府、企业、劳工与新闻界的合力下，短时间内解决的。舆论的作用的确影响很大。三星电子研究所所长林东升认为，罢工能在短时间内消失是“过去五年来经济教育的成功”，是政府一再透过报纸和电视对民众强调“韩国一定要做到经济强权才有办法生存”的共识已经形成。过去三年，韩国电视台都在黄金时间播出经济教育，指出早期韩国成长的策略到80年代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到全斗焕总统时经济政策已转而追求稳定。价格稳定并使经济保持增长，而且需要全民合作。“我们还不是那样有钱，虽然经济上已稍有成就，但我们要成为亚洲强国，却愿意容忍，虽然对现状并不满意，要追赶工业先进国，社会和谐很重要。”

如果说，民族自尊和万众一心的国家在东西方还有，还不足以说明韩国人特点的话，那么可以从民族比较中刻画韩国人的民族特点。

韩国与日本，这两个隔海相望的邻邦，虽然都深受东方文化的熏陶，同时又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受到美国的影响，但韩国人与日本人是不同的。这种差异表现于诸多方面，造成了韩国在经济起飞中呈现出自己的特色。

在环境方面，日本是一个岛国，无论适于耕作、居住的土地或自然资源都较大陆国家要小得多，正是由于这个特性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影响到日本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

相对于大陆和岛国之间，韩国正巧位于中、美、日之间的一个半岛上。日本的历史表明，日本有足够的机会和时间去检视外来的文化，取其所需，同时文化的侵入也会使一个孤立的地缘岛国变得十分敏感；韩国的情形则不同，与日本相较，韩国在文化价值方面较少自主的回旋空间，虽然韩国半岛被称为“宁静之土”，然而却长年饱受外来的侵略与内部的纷争，这样就形成了二者不同的文化品质和民族性格。

在文化方面，由于韩国坐落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关系，韩国是一个笃信东方文化的社会，它同日本一样都深受儒教和佛教的影响。

然而，韩国近年来基督教的兴盛却表明它颇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例如，许多韩国学者曾在美国接受教育，能讲流利的英语，甚至认同于一些美国的价值观念（需要说明，它还不像香港、新加坡作为西方殖民地那样）。日本人虽然也努力学习英语，但日本人在文化价值观上受到美国的影响要相对小得多，它更具有东方国家的文化性质。

在商业文化中，任何与韩国商人及日本商人有同时交往经验的，都很自然地会相信韩国人比日本人更具有个性倾向。尽管如此，韩国人在团队精神上的表现也不差，诸多韩国公司都协调、合作得很好，并能为国家、民族利益目标作出牺牲。一位日本学院派人士曾说到：“我很不情愿地承认，假如一位杰出的韩国人与杰出的日本人相互竞争，得胜者很可能是那位韩国人，不过如果将双方都增至十人来对抗的话，那么我敢保证日本人的这一方必然得胜。”有趣的是，假如换成美国人与日本人竞争，情形会相似。

另一件有趣的事实是，韩国与日本同样信奉儒家文化，却在商业行为上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几个世纪以来，日本一直是个重商的国家，日本商人之所以如此“职业化”，实际可归于几个世纪经验的积累，许多日本企业都是以家庭式的经营为主，而这种家庭式企业与儒家的家族观念有关。同样奉行儒家思想，韩国却是重学轻商，韩国的公司没有日本那样的几百年的老字号，它有的是新起的现代商业公司。这种差别可以在商业行为中表现出来。

在情感因素上，韩国人喜欢听伏尔第的曲子；日本人则偏爱德国人的抒情歌谣。前者的歌剧使人感到一种情感的宣泄，令人眼花的服饰、辉煌的背景；后者则充满诗意，细腻的内涵。因此，日本人一般不愿公开表露自己的情感，而韩国人外表看来也很重视镇静或成熟，但其通常并不吝于感情流露……

尽管同种文化的背景决定了它们有极大的相似点，然而在商业圈子里，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与众不同，对于韩国人和日本人来讲，尤其如此。韩国的大企业较日本的要资浅得多。三星集团成立于1983年，而三菱集团早在1870年便已成立；三菱集团的规模大约是三星的20倍；在组织管理上，日本组织完善的大集团，不再有家族成员积极介入集团管理，实行“拥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韩国企业则不同，这种家族式介入管理的迹象是显著的。韩国三星集团与现代集团的情形差不多，至今仍然深受创办人的影响与左

右。

在组织管理上，韩国基本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领导形态，这一点与日本的年轻一代极为不同。一般说来，日本青年一代较具有自由化倾向，而韩国青年多受“军事模式意识”影响，这就是为什么韩国人耐心与意志力也较强。

日本的大公司企图实施永久雇佣制，企业公司人员流动率很低，而韩国则相反，公司职员更习惯于辞职、更换工作或自己“重打锣鼓另开张”。

在经营文化中，韩国人表现了其特有的技巧。这些技巧与韩国之所以能取得今日的成功不无关系。一是弱势谈判。西方不少学者则致力于研究这种谈判方式，而韩国人正是这方面实践的老手，无论公营或私营企业在这方面都是成功的。韩国在无数的谈判中或项目投标中，一开始均居于弱势，而往往在最后却能得到最佳的贸易。造成这种结果的因素很多，情感因素就是其中之一，三方谈判，一般人认为居于弱势的一方会被淘汰，但结果往往是弱方能支撑全局；而被淘汰的一方往往是实力居中者。汉城奥运会的争办、韩国建筑集团在中东地区的投标与发展壮大无数次地证明了这一点。固然，韩国人的执著与毅力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经济发展与企业经营中，机会是至关重要的。韩国人就很擅长于此，当低油价、低韩元、低利率三者有利因素在当年凑在一起时，韩国就一鼓作气地奋力向前，现在的结果已是有目共睹了。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一个随时能够调整方向、反应迅捷的组织。日本和美国公司的一些大公司不是有官僚化倾向，就是事事协调一致，从而丧失了一些良机。而韩国人在这一方面却有二个重要的特质：一是拚搏精神，二是前面提到的“军事化倾向”，一个突然的调整或口号，一定会造成相当的困难，可是韩国人却能够习以为常。与此同时，韩国人在发挥集体力量的时候显得特别有效率。一个公司被要求在一段短小时内生产出一种产品，韩国公司就不却步，而是设法去达到目标，一直到成功为止，汉城的四条地铁同时完成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因为他们晓得，如果不这样做，就永远赶不上发达国家。因此，“韩国是一个凡事都有可能的国家”。

由此看来，处在东方文化中的韩国人有一种“西方精神”。然而，这情形只是一种“取向”。事实上，几千年的东方文明和民族文化积淀塑造了韩国人的性格和行为模式，它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还相去甚远。

对美国人来说，韩国企业社会的许多东西是奇怪的。从日常用语如：法律、合同、董事会、工会、经理、股东，直到基本术语，如公司、雇员等等，对于韩国人和美国人来说都具有不同的意义。二者的标准是不同的。美国社会是按基督教的个人伦理观发展起来的，而韩国的企业社会是按儒教的集体伦理观发展起来的。韩国的国民对财富、富裕和满足都有不同于美国人的观点，而营业技巧和宗旨以及其自由经营现代形式，都与美国接近。美国一位记者承认：“如果我们的优等射手在1776年的比赛中击败了英国对手，那么，两个世纪后的今天，韩国的贸易商也可击败美国贸易商。”

在西方的美国，人们常担心个人的自我实现或疏远感。看了那些没有灵魂的企业——这些企业看待工人实际上就像可以互换的机器零件一样，他们与公司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隔离的。而韩国人一方面是由于传统，另一方面是出于现代的需要，很自然地把人的价值注入到企业之中，他们把企业变成了一个村庄——构成了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新式管理方式，参与意识蔚然成风。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经营思想和培养这种思想的社会所构筑的不仅是一

种新型的“资本主义”，而是一种最适合于把资本主义制度带进充满压力和矛盾的二十一世纪的竞争性经营方式。缺乏像美国那样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技术储备的韩国，无疑已在证明自己在避免美国过去许多特殊问题方面，要灵活得多。

美国人肯定也有辛勤劳动并工作到很晚的，其中也有高工资的经理人员；美国工人也有他们各种公共俱乐部和活动委员会；延长工作时间也未必就是献身精神和工作效率的标志。然而，五点零一分时，芝加哥美国公司像死一般的寂静和汉城富有生气的活动之间的对比，却很能说明两种劳动文化和劳动道德之间的差别。

韩国人更善于总结经验，他们有选择地去记住美国人准备忘却的许多事情；他们极其重视对人民的教育；他们处理问题的方法并不像美国人那样愿把这些方法升华为一套方便可取的原则。可以说，韩国人是政治企业家。

政治企业家倾向于将他们的企业或工作看作是一个政治性的单独的社团，这些企业社团有些是对抗，有些是联合的。而美国人则倾向于把企业看成是直接的获利机会和获得这些机会的关系。西方企业界，公司由一些极其杰出的经理人员所经营，他们有充分的机会显示自己的才能。但是普通工人只被安排做些规定的死板工作。怎样规定，他们就怎样做——不多也不少。他们的人性全被忽视，正如卓别麟的讽刺电影《摩登时代》中一样。

当美国人和韩国人在谈到法律、律师和权利时，所用的字眼很可能相同，但人们对这些字眼的意义理解却不同。韩国人的确是儒家资本主义者——“和为贵”，他们尽量少地使用法律去打官司，除非万不得已。而美国人则不同，动辄法庭上见。然而韩国的社会秩序与竞争环境是良好成功的，这就显现出美国人已把资本主义的原始前提歪曲到怎样的程度，以及把按法律办事变成如何一个繁琐的诉讼和无价值的敌对诉讼程度的圈套，这极有可能把自己的企业搞得四分五裂。而韩国典型的合同条款：一旦双方发生权利义务之争议……双方应真诚共同讨论解决。

由于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韩国与美国的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极为不同。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韩国政府强烈地干预了经济，并产生了理想的效果，而且为国民理解和支持，美国人则不同了，美国人公开自认为是个人主义者，他们至少根据传统认为政府的限制最好也不过是一种难以避免的祸害，最坏则是干涉上帝所赋予个人或团体作出自己决定的权利……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可见，韩国人处于东西文化冲撞的一个结点上，然而骨子里还是儒家东方文化的灵魂。正是由于此，（除日本人外）没有任何人像韩国人那样为了民族的富强和经济的腾飞付出过那样辛勤的劳动，他们的劳动队伍有非凡的献身精神和工作效率，比任何其它国家的劳动者更有干劲，更为可靠。同时他们并不忘记呼唤民主。正是由于这种自觉的意识和民族责任感，使今日的韩国更能兼收并蓄，吸纳消融，变为本民族素质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韩国民族走向现代化，挺进世界的潜源。

四、要面包更要自由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朝鲜民族摆脱了日本长达36年的殖民统治，获得了自由。人们对国家和民族的建设充满了信心——期望建立一个自由民主政治来复兴民族经济。

然而现实并非尽如人意。韩国第一届政府即李承晚政府，虽然形式上是选举产生的，而且有不同政党之间的竞争，宪法上也明文规定三权分立，而且成立了议会、法院和内阁。但是，连韩国统治者也承认，李承晚搞的是“家长式”统治。1948年5月10日进行选举时，虽然动用了大批警察，四处戒备森严，但大规模的群众骚动仍伴随着选举活动的始终。

1948年7月12日，韩国国会通过了“大韩民国宪法”，7月20日，国会举行选举，有特殊历史背景，年逾古稀的李承晚当选大韩民国第一任总统。总理则由朝鲜民族青年团的李范爽担任。8月15日，大韩民国政府在汉城成立。在之后的几年里，李承晚为了能连任总统，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手段，时常动用军队、警察进行逮捕、恐吓。李承晚变本加厉的独裁倾向引发了其所属自由党的分裂。该党副总裁李范爽纠集其他不满自由党内部权力分配的人，成立了第二个执政党——共和党。而民主国民党作为李氏的老对手也重振旗鼓，于1955年9月改组成民主党。12月22日，韩国又一个合法政党——进步党宣告成立，委员长为曹奉岩，该党的口号是“反帝、反法西斯及和平统一”。韩国第三任总统选举异常激烈。1956年5月5日，民主党候选人申翼熙突逝于开往全罗北道的列车上，这无异于将火种投入干柴中，一场空前的骚乱在全国爆发。5月10日，虽然第二次总统选举又以李承晚获胜而告结束，但其得票率显著下降，相反，在野党的威信却显著上升。

选举结束了，但总统与在野党的关系更趋紧张。1958年进步党领袖曹奉岩等人因主张和平统一而被逮捕，1959年7月以颠覆大韩民国罪，判处曹奉岩死刑，并下令解散进步党。1959年4月，民主党所属的《京乡新闻报》被勒令停刊。因此属于民主党的副总统张勉与总统之间展开了激烈对抗。待到1960年第四届总统选举时（该年2月），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赵炳玉突然病逝于美国，李承晚趁机宣布提前选举。3月18日，国家选举管理委员会宣布，85岁的李承晚当选韩国第四任总统，创造了当选总统年龄之最高。几乎与此同时，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运动在全国蔓延开来。

4月19日，汉城各大学的十几万学生开始大规模示威活动。中午，愤怒的人们开始冲击政府机关。警察无力制止群众的暴动，下午6时，李承晚下令用军队镇压，整个汉城一片混乱。与此同时，釜山、大邱、光州、大田等大城市均有示威游行与汉城呼应，要求李承晚辞职。4月26日，50万人举行了大规模示威。当天，自由党控制的国会终于通过议案，要求总统立即辞职，李承晚随即发表声明，表示愿意辞去总统职务。

与此同时发生的朝鲜战争，至此已打了三年，但它对这个国家的伤害，足以危及任何领导者的政治生命。饥饿、贫穷、经济的崩溃接踵而至。社会危机来势凶猛。同一政治面孔长达十几年不变，激起民众强烈的反感。李承晚抱定了“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信念，在决大策，临大事时，过于独断。所以，韩国的每次选举都会听到抗议、不平、不满之声，韩国民众对政府包办选举积怨已久。

1960年4月28日，由前外务部长官许政组织了韩国过渡政府。1960年

6月15日，韩国国会根据过渡政府的建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原来选民直接选举总统的办法改由国会选举，把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同年7月举行民议院和参议院选举，民主党取得了这次选举的胜利。1960年8月8日，韩国国会宣布成立第三共和国。选举尹潽善为第四任总统。韩国进入了民主党统治时期。

民主党的张勉内阁面临了复杂的政治分野，内阁职位由新旧两派势力均分。但是张勉无力说服新派接收这一方案，8月23日组成的内阁，全部由新派成员出任，结果，暂时缓和的派别争斗再度激化，不久，民主党的旧派改称新民党并以在野党自居。可见，民主党并未拯救韩国的政治局势。

1961年5月16日晨，一伙军人以进行“烽火作战演习”为名，进入韩国首都汉城，他们同守卫汉城的军警进行了短时间的交战，很快占领了中央厅、国会大厦和广播电台。一条震惊世界的消息由韩国国家电台立刻播报出来。一个军事革命委员会接管了民主党政府的行政、立法及司法等全部职权，在全国实行军事管制，封锁空、海运，实行全面的新闻检查。军事委员会主席由陆军参谋总长张都映出任，副主席由第二军副司令朴正熙将军出任。

5月19日，军事革命委员会改称“重建国家最高会议”，张都映和朴正熙分别担任该最高会议的正、副议长。7月3日，于幕后的朴正熙以张都映里通张勉集团为由，解除了其最高会议议长和军人内阁总理职务。9日，以张映都为首的44名担任军政要职的高级将领被捕入狱，朴正熙政权自此开始。

大权独揽的军政府显然同他们宪法上标榜的三权分立南辕北辙。可是，朴正熙引证韩国和世界许多国家的实例，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欧美各发达国家业已确立的“民主制度最终应当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但“西欧诸国今日民主政制的建立，是经历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发展才得以完成的”。“建立民主的两个条件是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西欧民主制赖以存在的最重要的基础是全面工业化。”“因为韩国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经济条件同西欧是完全不同”，“缺乏吸收外国民主思想所需要的内在条件”，“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国家工业发展水平从整体来看仍然很低”，所以，“虽说我们借来了西欧代议制政府的‘外套’，但这件外套并不适合我们穿着。这种生搬硬套造成许多不良后果，其中包括腐化和枉法。而自上而下的整个组织的政治腐败和枉法已渐渐地侵蚀了我们的全部生活”，“唯一能拯救韩国前途的只能是军人政权”。“为了在将来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必须经历这一段“过渡时期”。（《道路》P153—160）朴正熙曾对美国记者说：韩国的民主是于1945年8月15日由外部输入的一种思想和制度，在过去的十六年里，充满了荆棘和坎坷。执政者虽大喊民主口号，却利用人民对政治认识的不成熟，延长他们的政权，掩饰他们自身的无能。重建国家最高会议担负起了重新耕耘韩国土地的使命，以使民主重新开花结果。而这种民主是本土的，不是外来的；是自主的，不是被动的。

朴正熙当政后，在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同量，在政治上也极力向西方靠拢，以取悦于西方，获得西方的援助。1963年，朴辞去军职，组建所谓现代政党——民主共和国，并以该党“文职”候选人的资格参加竞选获胜，出任总统。朴当政18年，独擅国柄，言出法随，政府的权威远胜李、张时期。其间，韩国“官方主导型”的国民经济开始起飞。1962—1979年，国民生产总值由22亿美元增至614亿美元，增长了27倍，年均增长10%以

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 18 倍，年均增长 12.8%，出口额由不足 1 亿美元增至 150.6 亿美元，年均增长 39%。韩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震惊了世界。正是在这一时期，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也较前有所进展，日渐成型。

1979 年 10 月 26 日，戒备森严的青瓦台政府，爆出一宗举世震惊、充满神秘性与戏剧性的政治血案：韩国一代铁腕强人——朴正熙总统，被其亲信——中央情报局长金载圭枪击身亡。

“朴正熙总统被刺身亡！”当这条消息传出时，人们莫不感到格外震惊。戒备森严的总统府青瓦台怎么会进入刺客？这位个子矮小、健壮，创造“汉江奇迹”、统治韩国达 18 年之久的一代强人到底死于谁手？这是不是一场军事政变？……遂成了大家推测、讨论的中心话题。

到 1979 年 10 月 27 日下午 3 时整，所能得到的资料，仍然只是韩国官方发表的声明：在一个晚会上，情报局长金载圭和总统侍卫长车智澈发生口角，结果朴总统及其五位保镖意外死亡……

人们对这项官方的宣布表示怀疑，并一致认为问题的真相绝不会那么简单。

第一，情报局长金载圭单枪匹马，如果不是事前准备，如何在短时间内，以短枪射击 5 个对手？

第二，按照规矩，与总统共进晚餐是禁止带枪的。金载圭为何可带枪入席？

第三，在事件发生后，官方只提起开枪的金载圭已被解职，并接受有关当局的质询。为何官方只使用“解职”而非“罢免”的字眼。……

经过一番沉默之后，汉城当局已修改其最初的宣布，透露事件的发生并非“意外”，而系情报局长被车智澈批评为颡顽无能，深恐掉职，而恼羞成怒，拔枪将朴、车二人击毙的。至于其他几位保镖，也遭局长的属下所枪杀。

这项经过更改的声明，固然比原本的宣布较有说服力，肯定了这次事件的发生，并非“意外”，而是金局长蓄意而为；但是事情经过果真如此简单？它背后是否有一股国内、或者国外的政治势力在作后盾，支持他的凶杀行为？这是不是一场“宫廷政变”？在这次事件中，真正的得益者到底是谁？……这些都不明朗。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次事件的结果，将使韩国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一个领导层真空的时期，各派政治势力纷纷行动起来，韩美关系也处于一种微妙状态……

如果说，汉城血案的发生，并不像官方所发表的那么简单，也并非金载圭与朴正熙个人的恩恩怨怨，而是牵涉到更加复杂的政治背景的话，那么朴正熙一度对反对派的压制，只能说是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而不能说明事件的真相。

对于朴正熙的评价，同情他的评论家认为：在短短的 10 多年时间，他把韩国从“春穷绝粮”的贫困境地，发展为“第二个日本”的工业国，功不可没，没有他的魄力，上述的成果是无法达到的。不满朴正熙的政论家却指出，他的专制程度，已经超过了应有的范围。特别是在美国人看来，尹谱善、金大中与金泳三都是拥护西方民主的人士，朴正熙逼他们太甚，既不利韩国政治的安定，也对美国在东北亚的利益有所损害。无论如何，朴正熙已成了悲剧的主角，他一生的功过，他的抉择是对是错，都留待史家去作判决。青瓦

台的数声枪响，改变了韩国原有的政治均衡形势，一个紫抓 18 年军政大权的强人倒了，汉城军政权力中枢突然间出现了空白。

或是由于策划不周，或是中途被出卖，枪手金载圭和同谋者金圭元，并未接管政权，反而身陷囹圄，被控以谋杀罪。

这是一个疑云重重的血案。它也许是一场不彻底的宫廷政变，也可能是一场流产的政变……然而，不管血案的真正背景如何，汉城的政治方向却从此有了剧变。

在军部，出现了两位新强人：陆军参谋长兼军法首长郑升和以及保安司令官全斗焕。

在政界，以崔圭夏代总统为中心的临时政府，向国民许下诺言：开放言论，解除军法统治，同时答应尽早公布新宪，并于次年春天举行总统大选。

紧接着，政府释放了千名政治犯，一时汉城充满了“民主气息”，反对派领袖金大中重新活跃在政治舞台，反对党——新民党也积极开展政治活动……

然而，这个血案冲击下的“春天”，毕竟是短暂的。正当举世在关心“三金”的政治动向，美国在盛赞韩国朝向民主大道之际，军人也在密切关注政局，准备随时插手。

1979 年 12 月，保安司令官全斗焕以“涉入刺朴事件”为罪名，逮捕前陆军参谋长和军法首长郑升和将军，从而击败了这一强大的政治对手，完成了“小型政变”之后，汉城已不断传着军部不满“民主”政治的谣言。当时有情报表明，以全斗焕和申铉碯总理为中心的当权派，对金钟泌领导的执政党并无好感，正准备筹建新的保守党。次年 4 月 14 日，全斗焕司令官宣布兼任中央情报局代理局长，表明了这名军人有意独揽大权的决心，并同时宣布中止文官政治，全面实施军法统治，完成了一场不折不扣的政变。

对于军部准备接管政权，拖延民主宪法和总统选举的倾向，政治敏感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频频在校园、教会和街头集会，游行抗议。

这项如火如荼展开的反对运动，很快蔓延到全国各地。面对着国内外的强大压力，摆在全斗焕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还政于民”，另一条便是不顾后果，按自己意志干下去。

宣布实行军法表明了全斗焕的态度。

韩国在大变动。经过一年半的大动荡、大改组、大调整之后，韩国的政治往何处去？一般民众对于青瓦台新主人，到底抱着什么样的态度？是满怀希望，还是听天由命地接受政治安排？……这一切问题如一团迷雾笼罩着汉城。

但是，从后来局势的发展看，朝野各党政策的变更与调整，其速度显然比不上军部的决定。1980 年 5 月，在民众要求“民主化”的浪潮中，新强人全斗焕宣布一切已经过去，韩国必须实施“适合于韩国土壤与气温的民主制度”。

1981 年 3 月 3 日，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全斗焕在宣誓就职典礼上指出了今后施正的四大目标：树立民主主义；建立福利社会；实现社会正义；改革教育和振兴文化。

新政权的另一个特色，便是展开大规模的“社会净化运动”，借以实现上述目标。“净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为了满足民众要求“打倒腐败贪官污吏”的心愿。这一运动的规模是十分广泛的，从政坛、官厅、经

济界，到大学和新闻界，无不受到影响，有人调皮地把这个人事大变动、称为“全都换”。随着人事的“全斗焕”，居于政界领导层的，有不少是年轻有为、在海外受过高等教育的少壮派，这些人一个共同特征是敢作敢为，没有旧时代的包袱。

由此可见，汉城这次的大调整，其实也意味着“世代的交替”。从这个角度看，新政权比起旧政权，显得更加富有冲劲和朝气。

全斗焕的整饬政治，再造共和，与当初朴正熙还政于民的做法相同，对消除长时间积留下来的弊政、丑行、恶习及劣迹起到了积极作用。基于几乎完全相同的理由，全斗焕效仿朴正熙投身于政治之中。只是现实状况并不似20年前那样对于政的军人有利。赶走李承晚时，在野的民主党大叫大嚷，可他们后来的政治作为却远不如自我吹嘘的那样出色，甚至无法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秩序。作为对此的一种反动，1962年的军人实际上具有广泛的社会同情和支持。而对全斗焕而言，与之对垒的在野力量，并没有政治失败的记录，相反，长期的不得志往往激起他们一次强似一次的冲击。特别是复杂的现代化社会，严重限制了干政军人作用的发挥。然而全斗焕还是做了下去。

全斗焕当政至1987年。其间，韩国经济国际化程度逐年提高，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800美元，跃然成“龙”。韩国整个文化教育水平也空前提高，引起世人惊叹。与此相应，人民的政治意识、公民观念空前增强，越来越不堪忍受独裁制度，争民主、要自由的学生运动和群众斗争接二连三。韩国军政当局向来对群众和在野党采取高压政策，结果是军警逞威于一时，民众的鲜血反而唤醒和激励了后来人。在人民斗争的推动下，韩国的政治体制的改革取得明显的结果。

在全斗焕任职的最后一年，人民群众以学生为先导，冒着枪弹、水龙，奋起反对带有军人色彩、不是由人民普选产生的专制政府。历史的风风雨雨，把当权者中的一些人敲得清醒了一些。执政的民正党代表委员卢泰愚，当时曾对人说：“看来，政治必须按国民的意愿去搞”。“只有党的组织搞政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必须有大众的信任和支持”。“全体国民已经生活在新的时代，国民的生活和意识水平正在发生明显变化，国民的生活也在多样化。时代变了，政治家也应该有相应的新的政治理论和方法，以代表国民新的多样化的政治要求”。“所有的政治家都应该豁出去接受国民的审判。这样，我们就能建成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体性的民主国家。”而“发展民主的关键是和平移交政权和修改宪法，实行内阁制。”（《卢泰愚传》新华出版社，1991，P16—150）

对于学生和民众占领教堂、阻断交通，以暴力对待军警暴力的行为，卢泰愚不赞成重操故伎，进行镇压，而主张对话，政治化解。他的正读大学的儿子向他反映学生的情况，使他对学生的“过激”口号、“过激”行动，有了多少切合实际的想法。他说：“现在不是采取强硬措施的时候，必须用说服和对话来克服危机。”“用说服和对话的和平办法是收拾混乱事态的最上策。”“机械的力量会留下机械的伤痕。让步是一种美德。民主和对话也只能在让步和互让的基础上得以实现。朝野双方都寸步不让，只会激化对立。……只要对话，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民主政治的基础就是对话和妥协。”（《卢泰愚传》，新华出版社1991，P144—150）1987年6月16日，卢泰愚晋言全斗焕，劝其对群众的“过激”行为“无论如何不能采用机械的办法，一定要政治解决一切问题。”全斗焕接受了建议，命卢泰愚全权

处理混乱的局势。

6月29日，卢泰愚发表“收拾时局的方案”宣布：他赞成根据朝野协议修改宪法，实行总统直接选举制；赦免1980年光州起义被镇压后被判处“内乱阴谋罪”的金大中，恢复其政治权利。这是韩国朝野长期争斗的两大焦点。卢泰愚的这一解决办法与朴正熙、全斗焕的一贯方针大相径庭，而与国民和在野党的呼声相吻合，所以，他的讲话立即在世界各国引起反响，争相报道。韩国和西方舆论界称这个讲话是“历史性6·29宣言，揭开了‘国民政治，时代的新篇章’，实现了韩国宪政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化，称卢泰愚是“政治英雄”，是“创造韩国民主化奇迹的政治家”。金大中等在野党人士也纷纷表态，说是受到鼓舞，称“卢泰愚是个男子汉”。

对于卢泰愚的上述宣布，华盛顿迅速表示欢迎。实际上，白宫对青瓦台日益强硬的政策早有怨言，它担忧全斗焕的拒绝只有使政局更加恶化，而对美国不利。卢泰愚突如其来的重大宣布，恰好是在美国副国务卿温斯基访韩之后发表，更使敏感的政论家相信，该方案即使不完全来自华盛顿的授意，至少是受到美国靠山的赞许。正是民心所向，美国又强加压力之下，全斗焕只好接受卢泰愚的11点方案。难怪异议分子“两金”（金大中与金泳三）在惊喜之余，要强调当局这次重大让步并非出于全斗焕或卢泰愚的“恩赐”，而是民众长期以来争取民主的一项胜利。

7月1日，全斗焕发表特别谈话，称卢泰愚方案“能创造一个实现国民大妥协、大和解的基础”。全斗焕决心采取措施以实现划时代的民主发展和国民和解。7月初，金大中等二千三百余人被恢复政治权力，10月，全斗焕辞去民正党总裁职务，打破了韩国成立以来总统兼执政党总裁惯例。

韩国全国2500万选民将于12月16日投票，选出第十三届总统。这是16年来，该国举行的首次总统直接选举，备受国内外关注。汉城观察家都天法断定谁将当选总统，一卢（卢泰愚）二金（金泳三、金大中）都信心十足，各自声称势在必胜。但观察家相信，任何一方即使获胜，票数都相差不远。

汉城观察家认为，不管是谁当政，军人直接干预政治的可能性相对会减少。因为韩国国民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这个角度看，选举过后即使会出现混乱局面，但基本上将向安定的方向发展。这回的总统直接选举，无疑也是韩国人在争取民主、学习民主，朝着安定政局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里程碑。

12月16日，全民投票选举总统，卢泰愚险胜金大中。1988年2月，全斗焕任期届满，辞去总统职位，卢泰愚入主青瓦台，实现了韩国历史上第一次和平交接政权。

卢泰愚取代全斗焕，韩国的政治走进一个新时期。在过去十年中，经济取得了迅速发展，韩国的政治受到不断增长的民主热浪的冲击。新一代的韩国人厌恶当局在政治制度上蜗牛式缓慢的改革。在政治光谱两端，学生们用单纯、激进的方式来表达他们改革愿望，军人则采取严厉的镇压政策。而中产阶级则开始要求限制延长几个世纪的极强专制传统，试图改变四十年的反抗——镇压——再反抗——再镇压的恶性循环。他们相信：韩国已富裕到能够经受对政权权力更广泛的分配。面对日益高涨的民众参政的呼喊，军人只有放弃凭实力统治国家的旧传统，这样才能有利于政治走向民主稳定。现代政治的核心是实力、权威、合理性三位一体。没有政治的制度化，经济发展最后只能导致社会的停滞不前。基于这样的认识，韩国总统卢泰愚发起了政

治改革运动。他采用低姿态，努力实现朝野双言的政治和解，在直接对抗的各种社会力量间寻求共同感和一致性，以便最终实现民主的政治体制。显然这是一条荆棘遍地，险象环生的道路。

这条路走至今日已日趋成熟。1993年民主自由党候选人金泳三当选韩国第14届总统，在竞选中，金泳三提出了“建立新韩国”、“清廉的政治、强有力的政府”等口号，得到国民的赞同。他说到做到，上台不久就刮起了一场廉政风暴，使韩国民众备受鼓舞。

金泳三是位不屈的民主斗士，他说道：

“自1954年我以26岁的青年步入政界到现在，弹指一挥间，已过38年。我的生涯算是用38年的艰难曲折的政治历程连起来的。抽去‘民主化’和‘斗争’这两个词，无法表现我的生涯。在独裁的乌云笼罩大地的暗无天日的日子里，我坚信着不使鸡鸣，东方亦明，向着民主的黎明，进行不休止的斗争。可谓宁要站着死，决不跪着生；宁要片刻生，决不永远‘死’。在我生涯中，说‘反对’、‘否定’、‘斗争’成为我追求真理的标志，决不为过。……”

“我的近40年的政治生涯已接近尾声。我还能做什么？还需要做什么？就这个问题，我深深地反省过。我以为自己还能发挥的作用是：结束解放后持续半个世纪的，疲倦而又饱受苦难的政治民主化的演习。为使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之花在新韩国灿烂盛开，做一个放置基石的工匠。”（《新韩国》P64）这位汉城青瓦台的新主人一直在做着美丽的梦：

我一直在做梦。
创建新的韩国，
这是我的美梦，
我的幻想。
它又是我们
所有人的美梦，
所有人的幻想。
创建新的韩国，
它不仅仅是梦。
只要我们有
确定不移的决断，
毅然决然的意志，
还有那
持之以恒的实践，
梦想会变成现实
屹立在我们面前。

金泳三对这一梦想的实现充满了信心：“现在正是拆掉迄今罩在我们身上的旧的政治框架、旧的经济框架、旧的文化框架，换上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的服装的时候，以便充当即将来临的新文明的开创性主角。

“我们应该苏醒过来。抛掉恐惧的心理，让我们的思想和行动面向无限的可能的世界。那时，东方的一盏明灯将会重新燃亮。那时，新韩国将成为东方的明灯。我正做着这种新韩国之梦。我确信，它将超越我自己的梦，成

为我们所有人的现实，展现在我们面前”。

韩国的民主进程还要走下去，经济的崛起、腾飞是民主化政治的基础，几十年的政治风云使韩国人民清醒地意识到大韩的未来基于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顺利与否。

五、还是原来的“朝鲜人”吗？

在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的韩国人，在东方文明的熏陶下，在历史社会环境的变迁中，造就了自己具有特色的性格。其中有些是有益的，而有些则是有害的，应作客观的评价。

为创造经济奇迹做出巨大贡献的韩国人至少是吃苦耐劳的，这是整个民族的传统，也是东方社会推崇的美德。由于人口压力大，可耕地面积小，韩国人要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民更努力勤恳。按照韩国传统要工作十三天才休息一天，而不是七天一周制。即使今日，韩国人也要比其它国家工作更努力。

韩国人为造就经济的崛起，采用了低工资、多积累的作法，否则，其劳动力密集的优势是难以发挥的。人们为了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甘愿忍受贫穷的生活和较低的收入。低工资制加之大批待雇劳动力使得韩国在所有劳动密集型行业中都具有很大的优势和竞争力。

通常我们认为的韩国人关心集体、遵守纪律只是它的一面。事实上，韩国人最重要的性格特征表现在遵守纪律与个人主义的矛盾统一之中。他们更多地表现出的是个性，需要组织管理，才能共赴目标。个人主义并非一定意味着完全排斥纪律。如果能使韩国人认识到这样做不仅有利于集体和国家，也有利于个人时，韩国人是乐意合作的。无论是对公司还是国家，为了达到一个目标他宁愿在一段时间内放弃个人利益以服从总体。在这种情况下，韩国人的组织纪律性甚至要比奴隶还强，原因是有其精神支柱。个人主义的特性使韩国人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勇敢无畏的精神。在大动荡时期，这种特性是大有益处的，它使韩国人根据形势变化自行作出决定。使他们抓住时机，赢得了时间和主动。

相对过去而言，造就经济的腾飞对韩国人来讲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事实表明，韩国人能够很快学到他所需要的全部知识，随时随地，向人学习或亲身实践。当韩国进入第一个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后，正是上述性格特征发挥了重要作用。成功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对自己的信心。

韩国人的自尊心极强。他们总是接受挑战，树立远大目标，而后在雄心大志的驱动下努力向自我和他人证明自身的价值。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往往要做出极大的牺牲。

除此之外，韩国人还富于抗争性。最明显的例证是他们反抗异族侵略和殖民压迫。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表现在争取民主的斗争。更激烈的反抗来自知识阶层——学生和知识分子。在战后三十多年时间里，校园中的斗争几乎是连绵不断的。学生们为维护自己和人民的利益提出各种要求。就是这微小或较大的压力也足以引起政府的重视。韩国常常被列入“独裁”国家，但它确实同许多同类型国家有着明显的不同。无论政府采取多么严厉的高压政策，总会出现各种形式的反抗，总会有反对派站出来替民众讲话。

韩国人的可塑性似乎很强，如果有英明得力的引导，他们就会发挥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创造力。在企业、组织中是这样，在国家的意义上也是如此。

回首历史，可以看到，没有什么可以吓倒普通的韩国人。这个民族熬过了艰苦的岁月，经历了饱尝和痛苦，甚至死亡，学会了怎样使自己渡过难关。这样，在他们身上就自然形成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性格特征，也激起了其对发展经济的迫切要求。韩国人要建立一个繁荣的国家，不仅仅出于物质原

因，更在于其精神支柱。他们希望赶上日本，以使自己民族立于世界之林。因此韩国人努力工作，刻苦学习，完成一项又一项艰巨的任务，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

几十年过去了，韩国的基本经济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厂工人越来越多，中产阶级已经形成。与此同时，收入的提高使人们拥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财富。

由于在经济及社会领域出现了极大的变化，政治改革就变得更加迫切和不可避免。毋庸置疑，大多数韩国人视民主为最高目标。韩国人逐渐成熟起来了，人们接受了更高的教育，许多人已是中产阶级，他们有相当满意的工作，稳定的家庭收入和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社会经济的巨大变迁造成了多元化，而在其中，民主问题是最突出的。

一届一届有“独裁”倾向和军人政府都在学生、工人等人民群众的群众民主运动中倒台了。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在逐渐高涨；政策的角色在渐渐变化，逐步实行了多党制；西方式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到目前可谓基本确立，并处在完善之中。全斗焕、全敬焕等第五共和国官员受贿案被揭露，有 13 人被判刑；同年，政府为 1980 年的光州事件平反，承认当时认定的“暴乱”实为“民主化运动”，并就此向国民道歉；1988 年 2 月生效的新宪法规定总统已不再像以往历届总统那样拥有解散国会的权力；金泳三上台后的“廉政风暴”都表明了韩国的民主化进程。经过了二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存在这样一种事实即：除非能够保证经济增长及政治进步，否则任何一届政权都不能取悦于韩国人民。韩国人还是韩国人：还在那块土地上生息，还有以往的文化 and 民族性格。韩国人不是原先的韩国人了：他们提出了更高更远的目标和要求，他们要振兴大韩民族，要造就新的奇迹，要向世界表明自身的价值。

第六章儒家资本主义精神的魅力

龙，是东方民族顶礼膜拜的图腾。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龙的故乡在中国。然而今天，韩国，用了20年实现了经济起飞，赢得“龙”的桂冠，被人称为“四小龙”之首。这不仅对于欧美国家来说是一个震惊，对于龙的故乡的人们来说，无疑也是一个强烈的冲击，于是人们自然将目光转向这里，想看个究竟，想看个明白。

1988年1月29日，美国政府宣布从1989年1月1日起取消对韩国等“四小龙”的普惠制。里根政府的这项决定主要出于取悦选民、对付政敌、安抚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和减少美国外贸赤字的需要，但正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韩国商品对美国市场的冲击。

从80年代起，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各大商店的货架上摆满了来自韩国等“四小龙”的各种产品。

一种韩国电子烤箱，价格便宜、操作简单，进入美国市场仅3年，市场占有率就达到20%。这种以“现代”命名的韩国小型轿车，其质量、性能、设计并不比美、日同类产品逊色，但价格却便宜1000美元到2000美元，进入美国市场不到3年，就卖出了70万辆。

一架飞机缓缓降落在韩国汉城的金浦机场，来自大洋彼岸的40名美国人鱼贯而出，行色匆匆。紧接着，在朦胧的夜色中，他们乘车前往浦项钢铁公司。

这是韩国最大的钢铁企业，始建于1968年，1992年钢产量为2150万吨，在世界最大的钢铁企业当中位居第三。当年，它的技术人员曾在不少发达国家的工厂里当学徒。“忠实的模仿”，曾被认为是赶超外国的第一步。而今天，当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现代化企业时，过去的师傅，反倒回来向徒弟学习了。

美国商务部的数字表明，1987年头11个月，美国同“四小龙”有353亿美元的贸易赤字，占美国外贸赤字总额的22%。1993年，韩国对美贸易盈余100亿美元，香港对美贸易盈余90亿美元……这一笔笔巨大的贸易盈余似乎在提醒美国人，“四小龙”已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区，没有资格享受普惠制了。

20年前，一场危机光临了所有的发达国家，卷走了人们至今仍迷恋不已的“黄金时代”，但同一时刻，在地中海沿岸和太平洋沿岸，另一些国家和地区却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经济发展欣欣向荣，迅猛异常。他们分别是东南欧地区的南斯拉夫、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拉美地区的墨西哥、阿根廷、巴西以及东亚地区的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为此，人们将“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桂冠戴在了它们头上。

不过，高速增长和持久繁荣往往不能两全。10年后，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中的大部分成员，遭受挫折，步履艰难，再也没有往日的风光。结果，在这支曾令人瞩目一时的队列中，只剩下太平洋西岸的那几个国家和地区，仍然保持增长势头，威风不减当年。

不知是谁，最先用“四小龙”这种充满了活力的名称给它们命名。

为什么机遇偏偏垂青于东方以韩为首的几个国家和地区呢？这些经济奇迹背后的精神支柱到底是什么？

有人从地理环境寻找答案，有人从经济政策索取谜底。固然，这些都

能是造就韩国腾飞的一个因素，然而最根本的并不在此。真正的原因在于其东方文化、文明背景下几千年来传统文化所沉淀和铸就的一种精神，加之苦难历史所形成国人的强国梦想。这才是问题的锁钥。

那么，这种文化是什么？这种精神又是什么呢？

一、儒家文化背景下的韩国

东亚地区是人类文明的主要源头之一，也是东方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历史悠久，范围广大，内容深邃，成就辉煌的东亚传统文化在这里形成。在传统的东亚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应为中国儒家文化，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意境之深，在纷繁复杂的东亚传统文化中独占鳌头，在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东亚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有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它不但对东亚地区古代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而且对东亚地区近、现代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

当人类社会进入近代后，比较先进的西方文化不断地向东方传播，使古老的东亚文化受到极大冲击。即使如此，儒家文化仍然留在东亚地区各国人民的社会生活之中。它是同东方文化成长的历史环境相连的。

“东方文化”作为一种“民族文化”和创造它的“民族共同体”本身是一种“历史现象”一样，它的孕育、形成和发展也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由横断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和蒙新高原西缘与北缘的高山、沙漠构成的西部屏障，在世界各族人民都以马、骆驼和小帆船为交通工具的漫长岁月里，对于“东方文化”的孕育和形成起了巨大的保护作用。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以西迁的“秦人”为主的东亚各族人民努力开拓通往西方的道路、对于“东方文化”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在欧美国家吸收“东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基础上，用蒸汽机武装起来的轮船和火车等交通工具开始在近代社会发挥巨大的作用。在此背景下，“东方文化”借以存在的外部屏障，尤其是海上屏障，虽然越来越失去作用，但由于“东方文化”在此前很久，已经有了长期的繁荣发展，早已不是专门靠外部自然屏障保护的婴儿，因此，在面临欧美“西方文化”严重挑战情况下，“东方文化”尽管付出了巨大代价，但维护了自己的独立，经受住了考验。

韩国作为东亚地区的一员，受到儒家思想的辐射和浸染，其程度之深，历史之久是其它民族不可比拟的。

朝鲜半岛和中国文化接触最明显的特征，莫过于汉字文化的早期传播和渗透。尽管汉语同朝鲜语的结构有很大的不同，但由于朝鲜早期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所以汉字在传入朝鲜半岛以后，很快便导致汉文在这个地区扩散。

据古籍记载，汉字文化早在中国战国至西汉初，汉文即传入韩国，从此汉文便成为这个民族进行交际的重要工具。据韩国学者考证，汉字始自公元前同朝鲜半岛结下不解之缘。正因为彼对的文字为朝鲜人所知，所以称其为汉字（当时中国正值前、后汉更替时期），并因袭沿用下来。自此以后，汉字和汉字词便随着汉籍的传播，缓慢地渗入韩国语言文字生活，上自国号王号，官爵称谓，下至文物制度，专用名词，无不以汉字命名。及至唐朝，高度发展的盛唐文化，更是源源不断地传入朝鲜半岛，有关文化、知识、概念方面的汉字、词随之融入朝鲜语言文字之中。汉字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汉字作为载体，不仅承载古老的华夏文化，而且也曾经使用过汉字的韩国民族创造独具特点的民族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作为中国文化，也是东亚文化渊源的儒学，几乎和汉字汉文同时传入古代韩国。儒学对朝鲜和日本古代文化的影响极为深远。如果考察一下韩国民族的哲学体系，就可发现，直到十六世纪之前，虽然半岛上存在过形形色色的思想，但主要有三种思潮：其一是在庶民阶层中有着深厚基础的原始宗教信仰——萨满巫神教，它从原始社会直至今天，几乎是深入人心的。其二是

佛教思想对韩国民族的思想意识的深远影响。其三更重要的是中国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几乎统治了李朝思想领域达五百年之久。韩国是我国的邻邦，因而中韩的儒学交流关系远比其他民族更密切、更深透。

韩国民族把对太阳神的崇拜同中国儒家关于“天”的思想结合在一起，从而在文化主体上为建立强有力的国家奠定了基础；随着家长式的专制君主制度和思想的萌发和展开，佛家关于“忠”的思想得到了弘扬？同时关于“孝”的思想所维护的是大家族秩序的伦理道德。

中国的《旧唐书》记载，高句丽在公元 372 年就在朝鲜半岛建立了最早的儒教教育机关大学，设五经、三史课程。百济普及儒教与高句丽相似“依中华之法”。新罗接受儒学虽然要晚些，但方式更彻底。新罗于公元 503 年按中国的方式改称王号。公元 632—647 年，新罗曾派大批青少年渡海到中国学习。自三国时代，儒家的忠、孝、烈精神已在韩国的国民精神中得到弘扬。

经过几百年李氏王朝对儒教的精心发展，儒教逐渐成为封建时代韩国人“意识结构的基础”，自一千六百年前建立第一所大学始，“儒教几乎融化在朝鲜人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中”。直到李朝末期，半岛的居民开始向近代跨进的时候，王朝的统治者还尊儒教为“国教”。从公元 1392—1910 年共 519 年 27 位国君统治李朝的漫长岁月里，儒教得到高度发展，论辩活跃，派别纷呈。

韩国儒学在韩国文化和思想发展的历史上印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对于韩国半岛的思想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儒家思想、儒教哲学、儒教文化，经过韩国的当政者、思想家和许多学者的吸收、消化和加工，经过他们对儒家经典的再解释，对儒家理论的再分析，对儒家思想的扬弃，韩国的儒教同韩国的现实紧密结合而融为一体，获得了特定的意义。儒家思想中关于社稷的观念形成了韩国民族自身的逻辑思维；关于节义的观念成为民族的正气；关于仁的思想形成了韩国民族精神的支柱。

儒教思想不仅渗透在韩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而且渗透到现代人的生活中。韩国著名的儒学家琴章泰曾指出：“儒教作为朝鲜民族精神的动力，具有广泛的功能。它不单纯作为某个时代的社会制度或伦理规范发挥功能，而且通过传统社会形成朝鲜人的意识结构，体现朝鲜人的文化方式的创造性源泉。”他认为，对民族传统的理解就是对民族自身的发现；对儒教传统的根本性质的理解，就意味着对推动民族精神的动力的发现。他还说：“通过朝鲜民族思想史去理解朝鲜的文化传统时，就能发现更深层的意义和根本的力量源泉。而且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在民族思想史领域，儒教从开始直到今天，一直作为一个轴心在起着作用。儒教不单纯是作为朝鲜民族文化中的思想体系被提出来，而且通过历史和社会的复合作用来表现它自己。”（《儒教与韩国思想》“序言”）

作为最接近汉字元文化圈的汉字亚文化圈的大韩民国的国旗、国徽都是古代中国的太极图：

国旗的白底代表土地，圆圈代表人民，四卦代表政府。在国旗中央平分两个平衡部分的圆圈，上端红色部分代表阳，下端蓝色部分代表阴，是宇宙的象征，说明万物相对，火对水、昼对夜、男对女、热对冷、动对静、正对负、黑暗对光明、建设对破坏等。中心太极揭示一切都在无限的范围内均衡与谐调地恒久活动。

太极旗蕴含着东方文化思想中所具有的哲理与神秘。这面 1882 年 8 月，

韩国派往日本的使臣朴泳孝和金玉筠鉴于外交的需要而绘制并使用的太极旗，于 1883 年正式规定为韩国国旗。一百一十一年过去了，它还猎猎飘扬在韩国的这块土地上。这说明韩国人对中华文明的膜拜，说明东方文化在韩国民族的积淀是何等深厚！

韩国民族受中国文化影响之深也可于文字的使用上略见一斑。韩国至今仍通用谚文和汉字混合的汉字，1961 年颁布了《常用汉字表》1300 个，1972 年又规定了韩国中学生学习汉字。1992 年 1 月 22 日，韩国的《中央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号召朝鲜人“继承文化遗产必须进行汉文教育”：“汉字是我们长期以来使用的记事手段。我们祖先的思想、感情和价值观都渗透在汉字里。所以，如果不培养汉字和汉文的基础学力，就决不能继承祖先的文化遗产”。

中国传统文化对韩国的影响决不拘于政治、文化方面，而且贯穿于经济行为之中。

韩国的经营思想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韩国大企业的特点之一便是家族控制和家族经营。韩国实际上并不存在名称为“××财团”的法人组织。所谓财阀就是某个家族通过控股和支配经营管理权而实际掌握一系列企业所形成的企业集团。财阀的统帅通常任财阀内母体企业的会长（董事长），往往还兼任其它核心企业的会长职务，会长及其整个家族控制着母体企业的大部分股份，而母体企业又控制着其它企业的大部分股份，由此构成家族统治。“现代”集团名誉会长郑周永家族直接掌握了核心企业“现代建设”55%的股份，“现代综合商事”19%的股份，以及“现代水泥”45%的股份，而上述核心企业又与财阀内其它企业相互控股，从而使大部分股份处于郑周永家族的影响之下。主要 24 家企业中仅有 8 家企业的（家族）自控股股份在 40%—50%之间，其余 16 家企业 50%以上的股份都为郑氏家族掌握。这个比例大得足以抵御外界对财阀内任何事务的干涉。1989 年 3 月官方公布，近几年韩国企业的持股集中现象正在加剧，1987 年一个人控股比例超过 50%的企业占企业数的 39%，比前一年增加 11%。据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服务部对韩国 50 家大财团进行调查，除亲属关系无法确认外，有 23 家至今仍控制在创业者手里，有 25 家完成了由创业者向其接班人交班过程，其中 20 家将会长职务交班给儿子，三家给了兄弟，另一家委托给外甥，交班中未交给亲属的仅有一家，这正是儒家家族思想的充分体现。

利用中国古代的灿烂文化为现代化经营管理体系服务，是韩国企业的一大特点。

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历来受到韩国人的崇尚。在当今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不少韩国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又掀起了一个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汲取中国古典智慧的“复古”热潮，形成了当前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新热点。

从近些年流行于韩国的几种中国古典书籍来看，主要有《论语》、《孟子》、《老子》、《易经》、《孙子兵法》、《三国志》等。许多企业领导人以及高中级管理人员，都试图从中国那些乱世之秋的历史风云人物身上学到成败的经验教训，从那些极其深刻而又富有哲理的古训中悟出经营的诀窍和克敌制胜的真谛，以应付风云变幻、动荡不安的世界经济新局面。不少企业将这些中国古典名著编成教材，作为必要的参考书发给高级管理人员人手一册。

特别是为韩国学者称之为人物学和商业学宝库的《三国志》，更是家喻户晓。

至于古为今用，以中国古代人物为楷模，以古训为准则，制定企业新的经营战略的例子，更是屡见不鲜。

《易经》中的“穷则变，变则通……”成为韩国招聘公司“此动荡时期，正是经商人的大好时机，要将危机看做是一种机遇”指导方针的理论基础。

《孙子兵法》中的“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成为众多企业高度重视市场销售信息的理论指南……

由此可见，儒家文化的影响贯穿于韩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正如《朝鲜儒家史》的作者玄相允所言：“儒教思想对整个朝鲜民族的生活和思想的感化及影响实乃大矣。儒学使朝鲜民族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民族性格发生了变化，政治、文化、经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二、儒教对“新教”的挑战及东亚新证明

在文化体系中，“儒家资本主义”是“儒家文化”理论研究对韦伯的“新教伦理”的挑战。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资本主义兴起的文化原因是基督教新教的伦理精神。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这种文化因果关系的根源，则在于伽尔文的救赎预定论和清教禁欲主义引发了近代西欧经济理性主义精神。为了证明这种新教伦理，韦伯对包括中国儒教和道教在内的世界各大宗教进行了比较研究，试图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广阔背景上探究经济理性主义为什么不能在基督教文化以外的其它国家出现的原因。韦伯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用了近一半的篇幅，从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全面分析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指出中国社会同样也具有产生资本主义的有利因素，中国之所以没有能走向资本主义，是因为儒家伦理的价值体系与基督教伦理不同，它缺乏发展资本主义的有利因素，从而不能诱导出经济理性主义，因为“儒教的理性主义是去理性地适应于世界，清教的理性主义是去理性地统治这个世界。”韦伯的结论是：儒家伦理是抑制资本主义在中国发生的文化因素。

然而，二十世纪中下半叶韩国、日本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令世人震惊，它以无可争辩的历史和社会事实向世人表明，现代化并非西方文明独有的幸运儿，东亚经济发展的奇迹引起了对韦伯学说讨论的热潮。“文化论者”循着韦伯的思路或者另辟蹊径，索寻东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文化动因。结果对韦伯关于儒家伦理的命题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批评和挑战。一些研究者认为，在儒家伦理体系中，也具有理性主义的成分，清教主义和儒家是巍然并立于世的两大理性主义伦理。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已面临“西方没落”型的衰落和分裂，美国以新教上流阶级（东部为主流）的社会已经逐渐走向崩溃，就是说美国核心价值——白种盎格鲁、萨克逊清教主义早已式微。今后美国的希望，可能在于儒家文化薰染过的亚洲移民地区，即美国的西海岸或说濒临太平洋的西海岸而不是大西洋的东海岸。台湾学者傅武光在论及儒家文化时认为，儒家思想中也有以理性为本质而具自由平等的基础，它不但对现代化构成阻力，而且对现代化有推动力。儒家伦理道德的作用，由家庭里延伸到家庭外，深入到政治、社会每一单元组织的每一层面。这些崭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是在现代化的互助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儒家伦理精神注入其中，便使各单元组织间、单元组织内上下层面间，系上了轮带，添加了润滑油，顺畅和谐地运转起来，其效率是惊人的。美籍华裔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多年来一直致力研究儒学，他认为工业东亚发展的模式在以前受儒家文化或儒教的影响非常之大。工业东亚教育占很重要的地位，政府和企业间的联系是那样密不可分，家族观念非常突出，有储蓄节俭之美德和习惯，有文化认同感。儒学是一种可以转化政治、社会道德的精神源泉。整个东亚文明，尤其是中国儒学以及受之影响的韩国文化，都是以道德理想转化政治，即将政治道德化。东亚的政治文化都往往表现出儒家政治化；政治权力利用儒家文化的力量来维系，不让社会有破坏的动力，只求安平。所以，忠孝节义这些观念都用以维持其政权。儒家文化的内在精神动力，离开政治化儒家的环境，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这些动力来自家庭观念、个人修身等，都与儒家文化思想有关，倘若引导得好，其精神和经济伦理可以极好地配合起来，促进企业得以成功和发展壮大。美籍华裔学者费景汉博士认为，东亚现代经

济的发展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现代化的经济文化”是现代化经济发展的结果，“四小龙”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它们有优秀的人力资源，而这个资源又来自传统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不但不会构成现代化经济发展的阻力，恰恰相反，而且非常适合现代化经济发展的要求。他还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适合现代化发展的三个条件是：现世主义、国家主义和机会平均主义。中国人是非常现实的民族，把生活在现今的世界看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不把希望寄予虚无缥缈的未来世界。与世界其它文化相比，以中国人为代表的东亚各民族是最有历史感的民族。上层的知识分子一直就有和过去历史连接的历史感、传统感、道德感；下层人士也是慎终追远，纪念祖先，历史感非常强烈，适合现代化的要求。只依靠自己，不依赖别人，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中国人注重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敢作敢为。总而言之，以中国为主的东亚文化非常适合促进现代化经济发展。

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同构”现象来看，韩国等“四小龙”都属于亚文化类型，即以原有民族文化为母本，又大量吸入多种外来文化为父本，相互交流、交汇、消融、汇合，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东亚“儒家资本主义”与欧美“基督教资本主义”表现出许多不同。不同的地方，诸如韩国等在教育上都重视伦理教育，通过科举选拔人才；在经济制度上都由政府领导经济，政府从宏观上控制经济活动，而不是完全放手让企业竞争；在家庭制度上都实行一夫一妻制，并重视家庭的稳定对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基本价值的理解，是建立既有利润又相互“信赖”基础上的劳资关系；在对未来的态度上都是高储蓄率，表明对未来有信心，有追求；尽管经济发展很快，存在贫富分化，但中产阶级的人数和力量迅速扩大，社会伤害性较小。

韩国文化堪称“儒家资本主义”代表之一。对韩国为什么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片废墟上，在短短三十年时间成为“亚洲一条龙”的原因固然有多种解释。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美国一位东方资深记者乔恩·沃伦诺夫指出：韩国取得经济成功的真正原因，乃是它将古老的中国孔子的儒家伦理同大战后美国援助期间引入的美国经济民主两者揉合在一起并加以巧妙应用所致。狄瑞克·戴维兹 1983 年 6 月在《远东经济评论》杂志上撰文认为，东亚地区的成功是孔子的儒家思想促成的：孔子学说有一套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社会的和谐需要有道德、有才识、有纪律、重和平和强烈责任感的领导者；主政者的责任感与其下属的忠诚互相契合；在上下之间，亲如家人，有着忠诚孝悌互相感应的关系，东亚人将这些价值观念用于现代社会，从而设计出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工业开发政策。

今天，人们已被东亚经济腾飞的现实所折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共识。

然而，在此之前，西方学者对儒家文化同现代经济的结合持基本的否定态度，即使在日本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之后，有些人还对此表示不可理解。

曾几何时，世界各国都在研究一个问题：儒家文化、传统文化与东亚，尤其是日本、韩国的巨大商业成功有无内在联系——它是必然的吗？——因而提出疑问。

众所周知，自英国产业革命以来，陆续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都具有西方文化背景。人们一直在关注和研究一个问题：非西方（文化）国家能否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日本开了个头。成为“唯一原先处在落后地位而在技术上赶上（并在有些方面已经超过）先进国家的国家”，成为第一个非西

方文化背景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但人们会问：日本的经验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日本的成功是否是唯一的？韩国经济崛起表明了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它使日本经验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为东亚经验。

韩国处在东亚地区，同日本隔海相望。

韩国深受东方儒家文化的熏陶（非西方化）。

韩国创造了经济奇迹，给人以启迪。

韩国的腾飞举世瞩目。西方许多专家认为，韩国在战后废墟上站起来，成为“亚洲第二个日本”，主要是民族和谐，没有内讧，受到了东方文化儒家学说“礼之用，学为贵”的价值观的深远影响。他们指出，东方文化的价值不仅不是现代化的障碍，反而在略加调整后，可以成为优良工商业企业组织的基础，韩国划时代的成就即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美国环太平洋研究所一位专家指出，韩国取得成功的真正原因，乃是将古老的儒家文化与战后引进的西方现代经济民主主义两者揉和在一起，并加以巧妙的利用。有的学者认为，今后的时代应该是“儒教文化时代”，它不仅同样可以造就经济腾飞，而且还能避免西方国家的“文明病”。

那么东方文化又是怎样促进韩国经济腾飞的呢？

其一构成民族团结的凝聚力。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是其振兴的前提。韩国民族的凝聚力有其各种复杂的因素，然而东方文化突出集团意识的哲学，无疑是重要的因素之一。这种哲学要求具有克己、友爱、纪律和效忠精神。它虽然可能使个人的创造性受到损伤，但经过良好的训练和恰当的运用，并使之融入到企业之中，韩国的企业家创造出一系列具有东方文化价值的经营管理艺术。它表现在愿把自己和自己所在的公司、企业、集团结合起来。对于个人而言，企业的兴衰荣辱与自己利益休戚相关；多数人能为企业努力工作，具有一种“积极参与”的意识。各种各样的企业精神正是这种集团意识的体现。整个韩国，从企业到国家，宛如一个同心圆的共同体，从而形成了一股把千千万万韩国人团结起来的凝聚力。正是这种根植于东方文化的凝聚力，使得欧美学者为之赞叹不已。

其二转化成经济起飞的推动力。现代韩国的许多企业家像日本企业家一样信奉儒学，主张要“把现代化企业建立在算盘和《论语》的基础上”。（涩泽荣一语）“道德和经济本来是并行不悖的。然而，由于人们常常倾向于见利而忘义，所以古代圣贤极力纠正这一弊病，一面积极提倡道德，又一面警告非法牟利的人们。后来的人们误解了孔子的真正思想……他们忘记了高产乃为善之道。”这种道德观与中国提出的“义在利中”异曲同工。没有这种劳动道德观及由此而产生的勤奋努力精神，韩国经济起飞是不可能的。要使韩国经济在发展中迎接与渡过各种挑战和危机，以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也是不可能的。

其三保持社会持续稳定的重要因素。现代经济的迅速、持续发展，必须要有安定的社会环境。西方学者认为，韩国经济起飞亦有赖于社会的相对稳定。虽然韩国上层人士更换频繁，但社会中下层却要稳定得多。这种稳定的原因，正是由于儒家思想的促成。儒家学说有一套维系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无论是强调个人修身，还是强调人际关系，儒家的多数行为规范，要求上下同心同德，亲如手足，彼此信任，互相帮助。这些价值观普遍成为韩民族的共识。正是这种心态使韩国在经济起飞时，能保持社会相对稳定。

应当指出，东方文化作用于韩国现代化并非其本身的简单回归，它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与韩国民族的特点相结合，适应韩国国情，使之能为国民所共同接受；二是与西方文化的优秀成分相结合，善于有选择地移植和吸收其精华；三是并非简单地恢复儒学传统，而是去粗取精，最终超越并高于其传统价值。正是韩国在继承东方文化传统时的这种特点，才使得东方文化具有新的活力，在现代化进程中，使东方文化得以光大，创造并印证了一个新的现代化模式。

三、 儒教文化与西方精神的结点

二十世纪中叶，在近代史中久经曲折的儒学等传统文化在凤凰涅槃中复兴了。

由于世界各国纷纷独立、自由，殖民帝国主义体系全面崩溃，武力扩张加战争掠夺已不再成为经济崛起之路。与此同时，环太平洋贸易、全球贸易兴起，世界各国都作为主人参加进来，再无主子与奴才之分，因此，公平竞争、平等贸易的新潮流开始猛烈撞击旧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建立公正的、合理的新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成为一代时尚，各国都对“世界新秩序”据理力争，迫使帝国主义及其海盗式贸易方式销声匿迹或改头换面。因此，在地缘经济学取代地缘政治学的时代，公平竞争、平等贸易开始逐步取代弱肉强食、战争获利。这样，无论什么国家，都只有一条路可走：

资源区位 + 勤俭拼搏 + 科技人才 = 强盛

在这个新公式下，世界商业精神开始回归诚善、仁义、勤俭与聪慧，也引发了世界商业精神再次向东方中国文化精神回归、认同。

东方文化内涵着世界商业精神的五大原则：

一、 以人为本，顾客至上

中国文化以人为本，以民为本，注重仁义，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美满关系，就是将家庭血缘宗法关系上升，推广到人类、世界、宇宙。如果把中国文化精神的人本原则推广到商业上，那就是“顾客至上”，“顾客就是上帝”。企业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内在力量，协调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公司要以人（顾客）为本，如亲朋至友，一切为顾客着想，这样必会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在利他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利己。

西方企业经营思想到本世纪才实现了从“经济人”到“社会人”的转变。

二、 以德为本，服务至上

中国文化注重伦理，崇尚道德，至善至德的精神在商业上就是追求职业道德，服务至上。服务就是利润，企业公司要以优质的服务赢得雇员的忠诚，赢得顾客的信赖。服务是利器，它是战胜对手的秘密武器。以德为本，乃是经济文化的第一原理，以德为本，乃是商业文化的第一要旨。

三、 以诚为本，质量至上

中国文化崇尚忠诚、仁义。“不信不立”，信就是商业的生命。以诚信为本，就是质量第一、信誉第一。企业公司要诚招天下客，诚招天下商。

西方企业在这方面也是非常注重的：质量是公司的生命，信誉是企业的资本。

四、 君子之争，公平竞争

中国文化崇尚自然，崇尚仁爱、平等，主张君子之争，这是一种和平的、高尚的、有利各方的公平竞争。自然则无欺，无为则不诈，君子则无恶。

五、 和合为本，互利合作

中国文化崇尚“和为贵”，崇尚天人合一，物我合一，万物和合、和谐、和同构成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

儒家学说中的“和谐”准则，对东亚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台湾学者杨仲揆认为，儒家文化区的社会，是建立在儒家伦理深厚的家庭乃至家族之上的。这种家庭向社会散发出和谐的气氛，成为社会安定的稳定基础。这种家庭，经常鼓舞它的成员努力向前，奋斗不懈，精进不已，因

此，这种家庭是东亚各国或地区现代化活力的最大源泉。儒家的灵敏行为规范，仍然为现代人所接受，为社会设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减少了人们之间的紧张和冲突。韩国学者金日坤在其《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中提出：“儒教文化最大的特征，在于家族团队主义的社会秩序。”“儒教团体秩序的团队文化，是依靠团队主义的历史与传统来维系的。……亚洲儒教文化区各国社会的最大特色，就是团队主义结合儒教伦理。”

在东方有句古谚，至今流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由此可见，和谐在东方文化、社会中的作用。

也正是这种精神，使东亚经济腾飞的国家和地区在民族、国家的利益上表现出一种奋力拼搏，忘我献身的工作干劲。

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的集体主义、人道主义、爱国主义及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勤俭节约、中庸达观和勤奋好学的精神，都是世界商业精神的精华，它是东方社会屹立于世界的巨大精神动力和行为杠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亚洲的儒教国家和地区中，除日本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结果经济得到了发展。

追求个人自由和合理主义，虽然可以说是西欧文化的根本，但和东方一样，在处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方面，同时还存在社会所要求的集体主义原则。即便是在西欧社会，向来也需要在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进行调节。它们常以权利和义务统一在一起。

但是，随着经济的成熟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出现了把自我本位的个人主义放置在社会共同目的或利益之上的现象，经济的正常发展也开始停滞不前。换句话说，这是由于个人主义侵犯了社会整体秩序，因而招致经济的不健康状态。所以有人称为“发达国家病”，学者们甚至大声疾呼这是西欧的没落。

由此说明，不仅东方文化须吸纳西方的文明才能适应当今社会发展潮流，同样，西方国家也有必要融合东方文明中的有利因素才能健康发展。作为人类共同财产，二者本是交融的。

西方近代资本主义价值观与东方儒学价值观相比较，有其相反的一面。儒学思想是重义轻利，重道德轻法律；而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则是重利轻义，重法律轻道德。儒家思想是重农轻商，西方文化是重商主义。儒家伦理道德中极力倡导家庭和社会上的人际关系与道德标准，强调亲属之间、朋友之间、四海同胞，应为一体，天下一家，讲求群体意识；与东亚的群体观念相反，西方却表现为明显的个人主义观念，以个人活动为中心，突出个人价值，强调个人的自由。可以说，东亚的儒家学说和西方文化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远不止上述几点，但这并不能说儒学思想同西方文化之间是完全相反的，作为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仍可找到其汇合点。

一是人道主义思想。儒家社会价值观中明显存在人道主义思想，表现在孔子的思想核心“仁”。这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想并无本质差别。每个人都重把自己当成人，也要把别人当成人看待，特别是看别人是人，自己也才是人。立人立己，达人达己，实施仁道，才能使每个人成为社会上名副其实的人。欧洲的文艺复兴，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掀起了改革运动，反对神权，以人为本。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又把人文主义思潮具体化为“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人道观。其实与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很有相似之处，只不过时代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不同。在两千多

年前的战国时代，儒学的人道主义思想在当时只能是一种学术思潮，尚未被社会普遍接收，而文艺复兴时代的人道主义，则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旧势力的战斗武器。

二是教育优先主义。儒家虽然相信人有天才，但还是主张通过学习和普及教育来提高人的智慧。那时，一些想出人头地、有所作为的平民，通过发愤读书学习，取得较好成绩，提高社会活动能力，成为战国时代各国的能人。特别是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主张，这在古代是难能可贵的崇高教育思想。在欧洲11—13世纪开始，在新兴城市里出现了市民文化，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城市公民对知识需求显著增加，学校和教育打破了教会封锁，到处办起了城市学校。正是由于教育事业的发展，使欧洲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获得飞跃发展，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教育给人智慧，无论是从东亚的儒教思想还是近代西欧资本主义精神中，都可以看到教育的作用。

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曾把东方文化伦理道德观念中的忠恕、仁爱、信义等主张与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主张作了一番比较，他认为西方的自由和东方的义，西方的平等和东方的恕，西方的博爱与东方的仁是一致的。东西方文化由于历史、民族传统的不同，不可能完全一致，但蔡先生的这番见解并非没有道理。作为人类社会发生产物的精神财富，不可能毫无相通之处，它们之间必然有相通和相似之处。

应该说，这样一种对待东方文化和西方文明之关系的态度是客观、中肯的。作为全球人类的文化，应该说它们有共同的东西存在其中。关于这一点，不仅可以从理论阐述中得到启示，而且从实践中亦可获得明证：今天的韩国儒教传统，是与满教、佛教、基督教等一起处在多元并存之中的。这种形势能使国民的自由奔放创造力及活力大大增强，从而对新情况的适应力更强。

韩国深受传统的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且至今儒家思想教育仍占主导地位，它几乎规定了韩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概括如下：

朋友之间，信任。

青年人与老年人之间，尊敬。

夫妻之间，地位和责任要有区别。

父子之间，亲密。

君臣之间，忠诚。

这些传统的道德准则仍影响着许多人的行为方式。违反这些道德准则就会招致指责和麻烦。

而且韩国人传统上一贯尊重知识。崇尚学识，把学者放在最高的社会地位上，而有“轻商”倾向。但自从三次五年经济发展计划实施成功以来，如上旧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在韩国，商人的地位在上升。目前，社会上实利主义有效地同新萌生的民族主义相结合，共同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度增长。

韩国的社会文化传统正面临着巨大的变化，充满活力的优秀城市青年人，已受到西方的教育和影响，他们竭力想创造“物质繁荣”。

在商业群体中，这种变化体现在他们强烈地希望从西方国家取得最新的生产技术和学到现代化管理技巧。

在韩国，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尤其与公司的关系，与西方国家不同。雇员一旦受聘，一般来说他就能在公司得到长期工作的安全感。因此，父亲般

的权威在企业中就占据了上风。长者可以有效地实施那种家长式的权威，从而在和谐的气氛下建立起合适的等级制度。

西方投资者在韩国建立企业以后，如果仅靠韩国职工的技术能力来雇用和分配工作而忽视年龄和地位的话，那么他就会发现自己不得不经常介入职工之间的无谓的争吵。或者假如他完全靠合同来处理雇员和企业的关系，那么本来使用一点家长制介入的方式就能安抚的小事情就会越变越大，最后导致许多甚至全体职工的罢工。

韩国经理与西方经理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对“价值”和“事实”的不同的偏重。西方经理往往偏见于更重数量化的“事实”，而忽略非数量化的“价值”。当然，在管理决策过程中，“事实”与“价值”的重要程度随着具体经济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情况下，尽管会付出代价，韩国高层经理们仍然会做出那种经营决策，因为他们的价值观认为应该那么做。因此，在作出重大的经营决策时，韩国经理往往更多地采用“价值判断法”，而不单纯采用“事实判断法”。

总而言之，处在东方文化和西方精神冲撞间的韩国有一个文化抉择和融合的问题。韩国学者金冬基说：如果我们能把韩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的、理智的、务实的精神成功地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就能力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标准的文化模式。不同文化的成功结合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摆脱“西方化”的错误观念，才能真正使发展中国家得以发展其落后的经济。

韩国是实现不同文化交融并进发出巨大力量的典范。韩国是一个山河秀丽，风景如画的半岛国。湖光山色之中，有这样一幅画面也许能引起人们的联想和思考。这是一座佛教的寺庙，寺庙的背后是座基督教教堂。它们是这样协调而又自然地融合在周围的环境中，这真是一幅绝妙的东西方宗教文化结合图。透过这幅画，使人们看到，在世界现代文化的潮流中，在西方文化像潮水般涌来时，韩国文化不仅给予巧妙的选择、吸收、消化和融合，同时也仍然保持着独特的自身特点，成功地迎接了西方的冲击和挑战。同样，在韩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在韩国成为经济强国的道路上，不正是体现了韩国对全世界现代科学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和优秀文化善于吸收、消化、融合和创新的特点吗？

第七章韩国崛起之剑

神秘的国度，高速发展的经济，人均六千美元的高收入国家，亚洲“四小龙”的领先地位……都在昭示世人韩国崛起了。

在“世界经济中心向东方转移”跨入“太平洋世纪”的潮流中，韩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六十年代韩国经济开始腾飞，创造了超越经济学常识的发展速度，国民生产总值一度达到两位数，在仅 20 余年时间里，由亚洲最落后地区一跃而为中等发达国家，并向发达国家的“门槛”进军。

人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支撑了韩国的现代化大厦？答案众说纷坛，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已形成共识：教育与科技是韩国崛起的双刃剑。

与工业化之前不同，现代生产力的基础正日趋集于一点，那就是人的素质——国民教育水平的高低和科技水平的高低。世界上有两种资源。过去是资源从土地中开掘出来的时代，而今天则是资源从人的头脑中开发出来的时代……

发达的教育制度，良好的国民素质，众多的科技人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和科技作为生产力，在国民经济的起飞和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科学技术正日益成为现代生产中最活跃的因素。

培根说过：“知识就是力量。”历史实践越来越向人们明示：教育是百年大计，是一种伟大的事业。它蕴含了无穷的潜力。韩国“汉江奇迹”的出现无可质疑地得益于韩国本世纪中叶以来富有特色的教育体制和“科技立国”政策。

韩国从历史上信奉的儒教中继承了一种高度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使其受益匪浅。现任韩国总统金泳三在其施政纲领性著作《开创二十一世纪的新韩国》中有如下一段话：

有个成语叫“孟母三迁”，说孟子的母亲为教育幼子搬了三次家。如今韩国的母亲中有几个不像孟母？

为了教育子女，我们韩国的母亲们把家从农村搬到城里，从这个城市搬到那个城市，这还不够，又都来到城中之城的汉城，挤在汉城市教育质量最高的第八学群里。她们对子女教育的热情，可以说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国土狭小，自然资源匮乏的韩国能够发展成今天的地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具有像韩国母亲这样的巨大教育热情。这绝非溢美之词。（《新韩国》P84）

恰恰是这方面的优势，保证了韩国引起技术、改革创新的顺利进行。在进行高等教育方面，韩国人比日本人热情更高，加上北方民族的毅力和勤劳，才达到今日之发展。前汉城大学校长、国土统一院长官申泰焕说“韩国虽然从 1962 年开始执行第一次经济开发计划。但在此之前，首先进行了教育改革，这对后来吸收外国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思想诸方面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我们只用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就具备了传统的产业技术，已成了出口贸易占世界第十位的世界性工厂。在尖端技术的开发方面也有了相当的进展。我想，这正是儒教教育传统对我们影响的结果。”

此言确实是耐人寻味的。

一、“有国籍的教育”

多年的动乱及被殖民者侵略、奴役的历史，使韩国人切身意识到：国家要独立、国力要强大，就必须首先把经济搞上去，而搞经济建设离不开科学技术人才。要造就培养国家建设需要的人才，根本的一点便是要抓教育，教育是国家未来成功的关键。重视人才的教育观念，是韩国重视发展教育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

韩国教育的另一个思想基础是民主哲学，体现为保障教育机会均等和尊重个人能力。教育的目的是，除了传授基本知识外，并向学生灌输重建国家所必须的价值和技术，这就直接导致韩国在短短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从一个贫穷的国家成长工业化国家，导致社会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韩国的教育目标是，不仅帮助学生们在新生活中扮演创造的角色，而且还要对他们灌输韩国人的价值观念。

朝鲜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这种源远流长的历史造就了这个民族的历史意识。尤其近代以来这个半岛经历了风雨坎坷，更加造就了该民族的历史意识，因此，培养青年人的历史意识，使之具有国家自尊意识并认识到富强的韩国对世界文化的意义，是韩国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

韩国的教育从本国实际出发，讲求实用性和民族性，尤其注重振奋民族精神，使教育的效果直接在国民的精神风貌和国家的经济起飞中显示出来，这种特性被一些学者概括为“有国籍的教育”。

这种特性决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韩国人的历史抉择。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殖民者独揽教育大权，扼杀民族文化和教育，实行奴化训化政策，甚至不准使用朝鲜文字，韩国民族教育一片荒芜。历史资料表明，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八·一五”光复前，朝鲜仅有 2834 所小学，人数为 1366024 名；中学 166 所，学生数为 80828 名；大学和专科学校共 16 所，学生 7819 名；师范学校 10 所，学生 8229 名。在 12 岁以下的人口中，78% 为文盲。

经过 40 年的发展，到 1984 年，韩国拥有国民学校（小学）6528 所，学生数为 504 万多名；初级中学 2325 所，学生数为 273 万多名；高级中学 1549 所，学生数为 209 万多名；大专院校 232 所，学生数 111 万名；研究生院 186 所，学生数为 6.2 万名。韩国政府还积极倡导、推行多种形式的社会教育，使全国人口识字率达 90% 以上，基本消除了文盲。

韩国的教育是在不断的改革中探索前进的。二次大战后，朝鲜从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朝鲜人民对于办教育的热情很高，因此，在 50 年代南朝鲜各种类型的学校也办得较普遍，但因只求数量，质量不高。到 60 年代中期，韩国教育走上正轨，开始重视质量。朴正熙为实现“民族中兴”，进行了教育改革，于 1968 年公布了《国民教育宪章》，确定了今后的教育方向和政策，可谓韩国教育走向规范并迅速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

进入 70 年代后，韩国政府把教育视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国家预算中增加教育经费，采取了许多开发教育的措施。70 年代初，基本解决了小学校舍不足的问题，调整了中等教育结构，培养了大批的技工。这一时期还特别注重实业高等学校教育，新建和扩建了很多工业高等学校，不断改进授课内容，为各种产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技术人才。

自 1972 年开始，韩国政府对高等教育实行局部改革。为适应经济高速增长的需要，韩国的高等教育一方面扩大教师和学生的数量，另一方面改进教

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培养所需人才。

80年代初，受政治的影响，教育秩序一度不正常，但从1980年下半年起即逐渐转入正轨。1980年7月30日，政府采取了教育改革措施，促进学校秩序正常化，并强调国民精神教育体系化，加强科学技术教育，推动智、德、体、技协调发展，要求教学内容的数量和水平要适应等。1981年12月起还进行了教材改编（第四次教材改编）。1983年6月9日公布《幼儿教育振兴法施行令》，同时全面推行义务教育。

从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韩国政府对教育部门的投资逐年增加。60年代韩国的教育经费占年均国民生产总值的8.8%，之后每年增长，教育经费的增长率多年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如1969年教育经费增长率为18.4%，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13.8%；1971年前者为10.6%，而后者为9.4%。1983年文教部的教育经费支出为21748亿韩元。

为了不断改良和发展国家教育计划，政府先后成立数个特殊教育研究机构，如国立教育研究院，韩国教育开发院，道立及郡立研究所以及一系列私立和公立研究机构。除此之外，韩国教育界还拥有一些群众性的社会团体和学术团体，如：大韩教育联合会，大韩教育共济会，韩国教育学会，韩国行动科学研究所、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私立学校教员捐金管理公团等。

韩国还在研究如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搞好终身教育的问题。他们认为80年代教育界的主要议题是增加教育投资，实行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相结合，摸索出一套终身教育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同时，韩国政府清醒地认识到，要培养理想的受教育者，教育制度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革，为此，他们又制定了新的教育方针，即强调“教育为主观意识服务”，强调“具有个人特性的教育”，强调“教育为了创新”，“教育为未来服务”，不难看出，韩国政府的教育眼光是既实用又长远的。

韩国的这种民族自强的“有国籍教育”思想并不是一种封闭的教育体系，相反，它是同国民教育国际化有机结合的。

众所周知，韩国经济是名副其实的出口主导型经济，其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出口这一“牵引车”带动。那么，什么支持了这一经济战略呢？答案是韩国国民教育的国际化。

国民教育的优劣关系到整个民族的素质。韩国经济在“内实”基础上走出亚洲，走向欧美，正是同教育走向世界相伴的。

韩国本是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自60年代韩国当局决定大力发展经济之时，也决定“通过教育手段对人民大众进行彻底的教育”，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自此之后韩国的教育投资在政府开支中的比重，均在15%以上，到1992年教育预算达84839亿韩元。

韩国教育投资水平约等于同等人均收入国家的3倍，所以，韩国的教育质量相对较高，为产业部门提供了质量较高的劳动力。韩国内外众多人士认为，这是韩国经济发展较某些国家为快、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较有竞争力的最重要原因。

在就学率上，韩国亦居领先地位。韩国在1959年就大体完成了小学义务教育，1985年小学入学率达到100%，基本普及了9年制义务教育，扫除了文盲。1990年，15岁以上人口中高中毕业生占49.7%；大学升学率达到37.6%。从量上看，韩国的教育水平已同美、日、英、德、法等国不相上下。近来，为了进一步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韩国政府给予教育更大重视，

按照 1992—1996 年第七个五年计划，到 1996 年，韩国幼儿园入园率将由 1991 年的 55% 提到 60%，高中升学率由 86.6% 提高到 89.4%，大学升学率提高到 53.6%，进入所谓大学教育大众化阶段。

韩国的教育走向国际化正是“有国籍教育”思想的延伸，韩国人重视爱国主义、妥协合作精神和国际形势的教育，为韩国走向世界奠基。韩国当局认为，在这个“有着形形色色的概念和想法的世界上”，像韩国这种“外交活动相对来说处于初期阶段”的国家，必须对青年进行“团体教育”，使之爱国，并使之“了解国际问题和民主的实质”，“培养理解、慷慨和友爱的态度”，以便与人沟通和合作，（朴正熙《我们国家的道路》，华夏出版社，1988 年 P189—190）

延世大学 1972 年成立“东西研究所”，下设 7 个研究组，分别对北朝鲜、日本、东南亚、中东、北美洲、非洲进行研究。该所与许多外国研究机构建立了学术联系，经常在韩国内外举行学术会议，既对外宣传韩国，又调查研究各国的全面情况。它出版多种朝鲜文和英文期刊和书籍，散发面比较广阔。这个研究所以及韩国其它大学的一些国际问题研究所，成为韩国对学生和国民进行国际问题教育的中心。

80 年代末，韩国教育主管机构进行一项改革研究，准备在大学里引入公民教育计划，目的是训练青年人妥协，合作的处世之道，并设置辩论课程，使学生学习怎样与他人达成一致意见。

其次，为了达到国际交流，韩国十分重视外语教育。

1910 年以后，朝鲜作为日本的殖民地，被强行推广日语，日韩间交流也自然十分频繁，其结果是出现了不少懂日语的朝鲜人。1945 年，日本战败，朝鲜从殖民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韩国成立伊始就十分重视英文教育，尤其在美国影响下，英文水平持续提高。同时，出于历史渊源，韩国一直比较重视汉语教育。1991 年 9 月 27 日，韩国教育课程委员会发表第六次教育课程修正案，强调对“实用的有效的语言文字”的教学，而在初中把汉文合并到国语中，在高中列为选修课。这引发韩国一些有识之士的批评，有人在韩国《中央日报》撰文说，“在国际化时代，要跟上时代步伐，必须同时重视英语和计算机教育。但是，在国际化时代要想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必须进一步重视和加强汉文教育。如果为了适应国际化时代只上英语等外国语课而取消汉文课，就会影响我国成为发达国家，甚至会使我国文化从属于外来文化。因此，绝对不能废除汉文课，而应比现在更应加强汉文课，以便在国际化时代更加正确地理解、继承和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这一席话是颇耐人寻味的。

经济要走向国门，走向世界，其关键在于人才同国际水平的接轨。韩国正是用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培养国际化高级人才。

韩国朝野一致认为，对于人多地小，资源匮乏的韩国来说，重人才、重科技是唯一生存之路。若没有适应数量的国际高级人才，要保证经济国际化处于较高水平几乎是不可能的。

韩国政府于 1987 年提出“科技乃天下之本”的口号，决心到 2000 年跨入世界 10 个最先进工业国家的行列。与此相应，韩国的有关投资逐年递增，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1963 年为 0.24%，1970 年 0.48%，1980 年 0.57%，1988 年 1.86%，1989 年 1.92%。在不到 30 年的时间内，这项投资的绝对值增长了 230 多倍。而韩国当局并不满足于此，仍然有一种紧迫感，认为

这个比例与美国（1989年2.73%）、日本（1989年2.69%）这些最发达国家“差距甚大”，致使韩国尖端技术落后，国际依存度较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疲弱。按照有关计划，这一比率到1996年提高到3—4%，2001年提高到5%。由于措施得力，资金有保障，韩国自己培养的和从海外引进的各类高技术人才逐年增多。1967—1986年，韩国科学研究人员由4000多名增至5.2万名，增长13倍；每万名人口中的科研人员由4人增至14人。取得硕士、博士学位的高级人才，由1981年的2.2万名增至1991年的8.3万名。最近十几年，每年都有数百名大学毕业生或博士后被送往美、日、德等工业发达的国家深造。博士、硕士担任社长，创业建厂的与年俱增，这为韩国工业品的更新升级准备了智力条件。同时，韩国不惜重金到海外设置招聘机构，网罗高新技术人才。1968—1990年，从美、日等国请回朝侨科学家1845名，其中1050人长期定居韩国。韩国每年还高薪聘请100多名外国高技术人才到韩国任聘或周末开展教学和咨询活动。进入90年代后，由于国际上经济和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的科技和贸易保护主义日益严重，引进技术的费用成倍增长且非最新尖端技术，韩国许多产业部门都深感人才不足，技术欠“尖”。据韩国国民经济制度研究院的预测，1992—1996年，韩国缺少博士级人才6300名，硕士900名，学士9900名，共缺2.5万名科技人才。为此韩国政府决定，今后每年从海外聘请400名左右高科技专家，派遣800名左右的科技专家赴发达国家研修。韩国教育部还拟在1992—1996年选派教师、教授4060名到中国、俄罗斯、东欧等国家深造。

与此同时，按照国际化的要求对职工进行职业培训。当今世界、经济、科技日新月异，知识老化迅速。加强对在职人员的培训，发展“终身教育”，乃是方兴未艾的国际趋势。韩国为了保持其经济国际化的深入，根据经济、科技的进展情况，不断对职工进行再教育、再培训。

其一，制定法规，比照先进国家的职工培训率对职工进行培训。韩国曾制订《职工训练法》，规定200人以上的企业必须建立自己的培训中心，每年训练15%的职工，不断培训；亦可由企业出资，派员到公共培训机构学习。否则，企业须缴纳职业训练税。每次培训后，须按《国家技术资格法》的规定进行考核，给合格者以相应的待遇。鉴于国际科技、经济竞争日趋激烈，1991年10月22日，韩国科技处和执政的民主自由党达成党政协议，提请国会制定技术开发银行法、技术师法、科学馆培训法、科学技术振兴法，并修改技术劳务培训法。按照这些法规，职业培训的标准更高了，范围更广了。

其二，建立科研基地和各类研究所，并与国外开展合作研究工作，用最新科技成果武装国民。韩国政府和各企业，逐年增拨经费，用于充实、扩建和新建研究机构，努力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以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国际联系日益紧密，各民族走向国际化的趋势锐不可当。韩国文化教育的国际化同经济的国际化大体上是同步进行、相辅相成。

二、富于特色的人力开发

南韩缺乏自然资源和资金积累，唯一蕴藏丰富的是人力资源。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南韩的人力资源又因文化程度不高、科学技术水平低下和劳动结构落后而不能为经济发展所充分利用。因此，只有重视智力投资，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增加全社会的智力资源，才能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

基于此认识，韩国政府十分重视教育投资。除朝鲜战争时期外，韩国文教部预算占财政预算的比重，基本是逐年上升。韩国对公共教育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与亚洲其它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相比要高得多。

韩国的学制几经改革，目前基本仿效美国的学制。即小学六年、初中和高中各3年，大学四年。但他们的高中分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二种。普通高中主要为升大学做准备，而职业高中多数为就业做准备。除此之外，还有实业系高等专门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学制五年）和初级大学（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2年）。1978年，韩国将实业系高等专门学校和初级大学合并，称为“专门大学”（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2—3年）。

韩国的初等教育机构称为“国民学校”，相当于小学。韩国的国民学校1945年约有2800余所，在校学生130万人，1982年学校增加到6501所，在校学生增加到546万人。韩国实施初等义务教育，免除学费。到1981年，据世界银行资料，就学率为100%。

韩国的中学在二次大战刚结束时只有165所，到1982年增加到3649所。同期内，在校学生由13.3万人增加到452万人，教员由5020人增加到12万人。韩国的传统思想是重文轻理工。60年代后，为进行经济开发和实现现代化，当局采取重工政策，加强职业教育，大力发展职业高中（目前，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的比例是6比4）。早在70年代，韩国在中等教育上的投资不断增加，迅速扩充校舍和教学设备，扩充教师队伍，实施免试入初中制度，取消重点中学，采取普遍提高中学教学水平等措施。

高中教育的目的是在初中所学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知识和实施技术教育。由于韩国初中义务教育的迅速发展，其教育部门的矛盾越来越集中于高中，出现了激烈的高中考试竞争，尤其是人文高中更为严重。1972年底，文教部成立考试制度研究协议会，提出改进考试制度方案、逐步采取高中水平的平均化，振兴科学与实业教育。发展地方高中教育、取消考试准备活动，尽量减少学生的负担和压力，同时减轻家长的经费负担等措施。从1980年起，在汉城、釜山等二十多个大中城市，将进入高中录取线的学生进行抽签分配的办法，一方面防止学生集中在名牌人文高中，另一方面实现高中水平平均化。高中阶段还加强了职业教育和职业辅导，增加学生高中毕业后的就业机会和提高自我判断的能力。韩国一般高中课程包括必修和选修课目以及课外活动，必修课有：国文、社会、伦理与道德、本国历史、世界历史、地理、数学、生物、体育、音乐、美术、英文和管理等。韩国的教育一律采用统编教材，以使各类学校教育知识系统化。韩国文教部更注意抓生活常识教育和道德、实业教育，在由单纯灌输知识的教育方式逐步转向在知识系统化的基础上，强调知识的实用性，强调教育要为现实生活服务。

韩国的高等教育也取得了迅猛进展。韩国的高等学校在1945年有19所，到1982年增加到97所（四年制大学），同期内，在校学生由7800人增加到66万人。进入七十年代后，韩国的高等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一是国家指

定实验大学。韩国的实验大学从 1973 年开始，到 1980 年，共有实验大学 43 所，其中国立大学 13 所，私立大学 30 所。从几个方面进行实验尝试，放宽大学学制的硬性规定，废除原来只有学完四年才能参加毕业考试的规定，为早出人才，缩短成绩优异的学生的修业年限；改变原来按专业招收新生的办法，而按学院或系招收新生，待基础课上完后才分专业；实施副专业制，主要是为了扩大学生的专业幅度和就业机会。二是逐步实现高等学校特性化。根据地区和学校的特点，设置重点专业。这是为了避免专业的重复设置，更有效地集中教育投资。大学特性化的改革，培养了大批急需的高级技术人才。三是实行高等教育大众化。在过去，韩国大学入学预备国家考试的合格生中，约有三分之二的学生没能通过大学入学考试，而被拒之于大学门外。现规定自 1981 学年起，废除大学入学考试，而根据高中学习成绩和大学入学预备国家考试成绩选进大学。这样，韩国比过去增加了约 50% 的学生进入大学学习，自此进入了大众化教育阶段。与此同时，规定了“大学毕业定员制”，从 84 届起，在大学期间淘汰 30% 的学生。

韩国的普通教育虽然尝试了一些改革，进行了一系列大胆尝试，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的普通教育毕竟相差不远，韩国教育中更富特色和开创性的在于其职业教育和社会教育。

韩国的教育科学研究者认为，50 年代是农业与手工业时代，整个社会对职业教育很不重视，加上传统重文轻工的影响，职业教育几乎一片空白；60 年代是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时代，由简单的劳动逐步转向技术劳动，职业教育开始被重视，教育部门和企业开始兴办职业教育事业；70 年代是重化学工业时代，由于采取了出口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大量的技术人力，职业教育得以迅速发展，为经济振兴作出了重大贡献；80 年代是建设以技术开发为中心的产业社会的时代，不仅要大力发展正规大学，而且更要发展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使职业教育适合高度产业社会发展的需要，建立起自己的职业教育体系，并且使之与终身教育密切结合起来。

韩国从小学高年级起开始进行职业技术教育，在四至六年级开设劳动技术课，在中学开设技术课。中学技术课是必修课，内容包括商业、工业、农业、水产、家政、家事、技术等。韩国的职业高中种类有农业、工业、商业、实业、综合、水产、海洋、艺术 8 种。到 1982 年，共有职业高中 626 所，在校学生 85.3 万人，这类学校在韩国发展极快，尤其在 1965 年以后，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工业和商业高中迅速增加，教学质量也迅速提高，很受社会的欢迎。

60 年代初开始发展起来的实业高等专门学校，能够较快地培养中等技术人才。随着韩国经济发展和对中等技术人才需求的增长，以及韩国当局实行了优惠政策，这类学校迅速发展，是韩国各级各类学校中发展最快的学校。创立于 1950 年的初级大学，设立于 1970 年的专门学校及在 1979 年由实业高等专门学校，初级大学和专门学校合并而成的专门大学，为实现短期高等教育机构一元化，提高入学新生质量，充实教学内容，增加实验、实习设施，培养社会必需的产业人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除此之外，韩国也十分重视职业训练，职业训练主要是为了提高在职人员的业务、技术水平，也有部分是培训徒工和进行改行培训。培训期半年至三年不等，从中央政府到工矿企业均有职训组织，职训所培养的学员，大部分都重返生产第一线，这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产品质量和加强出口产品的竞争能力，起了较好的作用。

三星集团，是韩国最大的企业集团，同时也是韩国最大的人才中心。该集团创业 40 年来，一直花大量的时间来吸收和训练人材，成为全国第一个设有全面培训员工中心的企业。每年训练费用高达 240 亿韩元。

位于汉城以南 60 公里的京畿道水原电子城，是三星电子公司的所在地。这家仅次于日本东芝公司的世界第二大计算机存储器制造公司，以富有创造和挑战精神而著称。在占地 165 万平方米的厂区内，有一座现代化的职工技术培训中心。按照公司的规定，从经理到普通职工，每年必须进行一星期左右培训和进修，按行业、职能、专业、级别分门类进行多样化的教育，以鼓励职工发挥其潜能。公司每年所投入的教育和培训经费达一亿多美元。

三星集团创始人、有企业巨人之称的李秉哲老先生曾感慨万分地说：“国家兴亡，依靠政治领袖的才能，企业兴亡，依靠管理阶层的才能。三星企业集团所以能不断扩充，就在于一直重视人力素质及培养他们的能力。企业成败，职工素质第一。”“我人生的 80% 精力花费在积蓄人才和教育之上。”

位于韩国东海岸的浦项制铁株式会社，是世界最大的钢铁企业之一，同时也是在韩国最早实施“产、学、研”工程，创办公司大学的现代化企业。该公司 1986 年创办的浦项工科大学，共设 10 个系，拥有 250 名教授，900 名研究生和 1200 名本科学生，在每年达到大学录取分数线的全国考生中，只有 2% 的考生有资格报考这所学校。“把企业利润返还给社会，培养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技术人才，由此推动科技的发展”，这就是学校创办的宗旨；“资源有限，创意无限”，这就是学校提出的口号。

这就是韩国最大的私立研究院。

韩国的社会教育，也就是指对普通大众进行继续教育。一是开办夜校，位于工业区附近的初中和高中专门为青年工人举办夜校，这些夜校和所教的课程目的是使年轻工人接受中等教育。二是函授，函授高中接收未能进入普通高中上学的学生，教学按三年分期进行，学生必须在七年内修完规定课程。通过知识考核可获得文凭，获得文凭者可申请参加大学国家统一录取考试。广播函授大学学制原定为 2 年，毕业后经考试，合格者可转入四年制正规大学。从 1981 年起，韩国开辟教育专用频道，广播函授大学改为四年，并开设学士课程。

同其他国家相比，韩国发展教育的独到之处在于：各级教育是为支持人才需求和经济发展而平衡发展的。如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 90 美元时，就已非常接近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 200 美元国家的人力资源开发格局，而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 107 美元时，人力资源开发格局已相当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380 美元的国家。这种提前完成人才资源开发工作，为后来韩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由于韩国重视智力投资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大学升学率已超过了日本，继美国之后居世界第二位，韩国计划到 2000 年，每万人中将有 30 名科技人员，相当于目前发达国家的水平。

然而，韩国人并不敢懈怠，因为一位美国企业家对自己国家敲响的警钟同样也震惊了东北亚半岛上的韩国民族。他说：“当资源是从土地中开掘出来的那个时代，美国是一个富国，但是现在资源是从人的头脑中开发出来的时代，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美国可以说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教育大国。作为一个世界上最早实行义务教育法的国家，无论是重视国民教育的制度，遍布城乡各地的教育网络，

还是每年高达 2000 亿美元的教育经费、群星荟萃的科技队伍，都使它最有资格和别人谈论教育。

不过，美国教育部长卡瓦优斯今天的话题，不是炫耀，而是忧虑。他说，美国现在实际面临着三重赤字：贸易、预算和教育。而最后一个赤字也许是最为严重的。

当乔治·布什登上第 41 任美国总统宝座时，曾讲过这样一句话：“教育是提高民族竞争力的关键，是增强国民精神的关键。”为此，他发誓要当一名“教育总统”。这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教育总统。

这表明：一种危机感正在蔓延。这种危机，并不来自政治，也不来自经济，而是来自教育。即使发达国家，诸如美、日、法等各国教育界为迎接挑战，正在酝酿重大改革。何况正在迈向发达国家门槛、奋发图强的韩国呢？

现任韩国总统金泳三有这么一段话：

“信息化、知识化时代正向我们走来，知识、技术变为强有力生产要素的新世界正向我们靠近。当今世界，技术竞争时代正在取代武器竞争时代，科技力量逐步成为衡量国力的尺度。科学技术从何而来？只有来自教育。如今世界经济无国界。在没有国界的世界经济时代，国家最重要的作用是通过教育提高国民素质。

没有自己技术的国家将沦为他国技术的附庸国。在技术战争时代，技术附庸国无疑是他国的殖民地。自己的技术也可称为技术主权。那么，自己的技术从哪儿来？从创造性来，从培养创造性的高水平的教育来。

这正是今日韩国人的认识和决心！

三、教育与经济崛起之辩

在描述剖析韩国经济振兴的著作中，乔恩·沃伦诺夫的《人为的奇迹》一鸣惊人，正如《东方经济学家》杂志所评价：“韩国的经济振兴举世瞩目。这部引人入胜的著作以其精辟的见地告诉我们这一切是怎样，又是怎么能够做到的。这是对一个出类拔萃的经济奇迹的出类拔萃的分析。”（《人为的奇迹》华夏出版社 1989）的确，这部著作的剖析是颇有见地的，它以其新颖的视角作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论证。但是，在韩国教育发展与经济崛起的关系问题上却值得再探讨并有待进一步澄清。

乔恩·沃伦诺夫是这样说的：

“毫无疑问，韩国对教育事业十分重视。年来岁往，教育经费逐步在韩国的国家预算中占据了可观的份额，同时，韩国也形成了庞大的教师和学生队伍。在六十年代中期，韩国的初等教育已基本普及；到七十年代末，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能升入中学，而且其中绝大部分能够升入高中，九年和十二年教育的实行得到了充分的保证。到八十年代，韩国的大学在校生已达 50 余万人。这一切同日本占领时期、特别是同李朝时期相比，不能不说是一项伟大的成就。用国际标准来衡量，韩国的情况也是十分值得称谓的。韩国的作为使世界银行和其它捐助人十分骄傲，他们认为，同其它发达程度相当的国家比较，韩国的教育体育可谓出类拔萃。

“但若从如上所述情况就得出结论说‘教育是南朝鲜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甚至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则尚嫌草率。实际情况并不能证实这一点，因为，在六十年代韩国经济开始起飞时，眼下这种相当完善的教育体系尚未形成。那时韩国人的中坚，总起来讲，并未受过专门的教育，有些还是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文盲。大多数管理者至多在日本人办的小学里受过教育，偶尔能有个别在日本人办的中学里受过教育的。而韩国的大多数劳动力只在李承晚统治时期才接受了根本就不能算得上是教育的教育。……可见，韩国模式最能充分证实的一点是，一个不具备正常教育体系的国家依然能够在经济上取得成就。事实上，只是在韩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后，它才培养出受过更多教育的人才加入到其经济活动之中。而那些韩国引以为荣的高素质官员，也只是在经济已得到充分发展时才出现。毋庸置疑，他们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将国民经济推进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但无可辩驳的事实是，韩国的经济发展先于其教育的发展，而是前者推动了后者，而不是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后者推动了前者。”

这便是乔恩·沃伦诺夫的观点。

笼统地讲，是一国的经济促进了教育的发展，还是教育导致了它经济的起飞这个问题是很难讲清楚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经济的腾飞一定会促进教育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也一定会产生经济效益。这样，我们需要做出一个时间的界定，才能说明韩国经济与教育的关系。

《人为的奇迹》认为韩国的经济起飞在六十年代，而在此前韩国的教育水平还很低，所以说教育是韩国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值得质疑的。分歧正在于此：我们不能说韩国经济于六十年代崛起，只能说 60 年代韩国经济开始出现转机。这主要同国际环境与韩国政府及人民意识到经济建设之重要并全力以赴有关。事实上，韩国经济的崛起，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是几十年才完成的，可以说，韩国崛起的进程至今还在进行。它是一个时期概念而非一个时点概

念。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会发现，韩国的教育在这一进程中扮演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韩国经济的崛起离不开教育这个支柱。倘若经济提出了技术人才的要求而教育未能及时满足，那么韩国经济的起飞也就可想而知了。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在韩国经济发展初期得到说明。

当时，韩国的经济还没有起飞，但是对教育投资的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速度。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韩国的教育经费竟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8%。按照英国《金融时报》估计，1985年，在汉城的1000万居民当中，有一半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到80年代末，韩国已经普及了小学教育，中学就学率在95%以上，高等教育就学率也高达35%，成为教育普及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直到今天，人们还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你：

各地农村中最漂亮的建筑物是学校，而不是行政机关；

国家教师的收入优厚稳定，丝毫不低于一流大企业的职工；

即使在寸土寸金的汉城，学校也有宽阔的操场。

谁都知道，办教育需要钱，而且短时期内无法看到经济效益。然而，令人吃惊的是，战后韩国政府大幅度增加教育投资。就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粮食危机，通货膨胀，人民生活还十分贫困，政府在战争的废墟上断然实行教育改革。

这种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传统是令人钦佩的。人们对这样一段历史也许还记忆犹新：五十年代末的韩国，饥饿的人群每天都在排队购买粮食和领取救济品，但同时也在排队买书。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他们仍然不忘学习，不忘求知。在他们心目中，精神更甚于物质。难怪一些历史学家指出：高水平教育成了战后复兴的巨大力量。

回首韩国经济的崛起历程，教育如此适时地推动着经济建设的发展。

“一五计划”期间，为提供经济建设所需要的技术人才，韩国一方面在美、日的援助下，向美国、日本和西欧等国派出几千名研究生、留学生、教员、技术员、护士和技工等，另一方面，采取了扩大理工学院招生名额，增设新系和专业等措施，1965年建立了8个专科学校。改革中等教育结构，除已有的普通高中外，增设一批中等专科学校，新设15所“工业技术研究院”。此外，还设24个职业辅导所，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学制5个月。1965年，韩国政府公布了《职业训练法》，并组成职业训练公团，公团下设立一系列职训学校；中央设有高等职业训练院和普通职训所。每个道设有特殊职业训练所（培养该地区特殊技术工人，如造船、养蚕、刺绣等）。在各个产业机关亦设有职业训练所。

“二五计划”期间，为进一步加强科技教育，除政府和企业投资外，设立了“科学教育基金”，并公布了《科技振兴法》。在培养人才方面，除扩大和增设理工科大专、专门学校及实业高等专门学校外，成立了韩国科学院，第一期招收400多名大学毕业优等生。在熟练工培养方面，除继续进行上述职业训练外，还委托陆军工兵、兵器学校等11个单位代培熟练工人。

“三五”期间，为适应重化工业的发展，决定把技术教育的中心从轻纺工业技术转向重化工业技术。同时，开始考虑发展自己的科研力量。在“三五计划”中，政府制定了较详细的人才供求计划。政府修改了现有的《职业训练法》，重新调整现有职训体制，用法律和体制来确保科技人员的培养。职业训练公团向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建设职业训练中心，大量培养技术人才。

如此人力资源开发初见成效，其一，基本上满足了经济结构转型中对各类人才的需求，60年代，韩国在由单一的经济结构向多元化的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需要有一批与工业发展相适应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但是，原来的单一经济结构，决定了原来的就业结构也是单一。因此，改变原有的就业结构时，一方面需要对大量转业人员进行培训，另一方面又要培养出适应新部门发展所需要的各类专业人员。其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由于正规教育、职业教育的对象大都是企业的在职职工，特别是技术管理人员，因而对韩国经济发展初期来讲，人力素质的提高对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有着直接的影响和重要的意义。

正是由于这种教育的政策和措施，使其国民的文化、技术水平相应提高，能够较快地学习和掌握国外引进的技术，迅速增加生产，提高产品质量，对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据计算，从1955年到1970年期间，韩国的教育收益率为22.6%，即每增长一个单位的国民收入，有22.6%是出自教育事业的发展。随着教育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教育与经济所形成的良性循环使教育收益率还会更高。虽然这种计算方法不一定准确，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总之，韩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的作用是不可置疑的。

将教育、才能、精力、意志列为人类资本四大要素，是美国教授舒尔茨的首创。他为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创立的教育经济学，在西方国家风靡一时，教育经费的空前增长也长达20年之久。

80年代中期，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高于4.4%的国家，世界上共有76个，其中就有12个处在西太平洋的怀抱中，而韩国则是遥遥领先者之一。

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欣慰的数字。这难道不正是亚太地区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吗！这不是已将韩国在新世纪的经济发展前景告诉世人了吗？

随着经济和科技的飞速发展，教育已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不同文化程度的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力也不同：小学程度为43%，中学程度为108%，大学程度为300%。

经济学家也作过计算：本世纪初，智力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只有5%到20%，而现在已经达到60%到80%。对此，著名经济学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说得更直接了当：“在本世纪初采用机械生产，以钢和石头做建筑材料的那个时代，上一两年高中就够用了。”而今天由硅片和电脑程序指导如何安装玻璃和塑料部件，“因此，现在光凭强壮的身体是不能为增加国民生产总值作多少贡献的”。

可见，教育，是对生产力的投资，是对未来的投资。谁能够提高教育和学习的效率，谁也就抓住了致富的机会。

成功者和失败者都告诉我们，穷国之所以落后，主要不在于生产投资不足，而在于教育落后。

经济的竞争是科技的竞争，而科技的竞争关键是教育的竞争。面对着即将到来的21世纪的强劲挑战和激烈竞争，世界各国都把教育作为国家未来发展的根本和源泉，全速加速改革，大力投资。距21世纪所剩时间已不多，人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挑战和竞争的巨大压力。

21世纪的未来，国家兴亡，民族荣辱的基石，将是教育！

四、“技术立国”战略的魅力

著名的东京秋叶原电器大街，是全日本甚至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器商业区之一，仅四五百米长的两条大街上，600 来家用电器商店鳞次栉比，各类电器商品琳琅满目。叫卖声，伴随着乐曲声，从早到晚，招徕着如潮而至的顾客。据粗略估计，每天光顾这里的顾客约 5 万人左右，逢节假日，多达 20 万人，商店的年销售总额约一万亿日元。由于秋叶原电器大街的这个特殊地位，人们又称其为日本商界的一个橱窗，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一面镜子。

今天，这里来了一位年轻人。

在商店里，他详细询问了各类商品的价格、性能和特点，临走时不忘带走图文资料。接着，他的身影又出现在一家颇有名气的光学公司总部。一番短暂的寒暄之后，开始和日本人洽谈技术转让事宜。

从他邮寄技术资料的收件人地址和姓名来看，他是韩国一家技术贸易公司的经理，正为引进技术事宜在日韩两国之间奔忙。

根据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的调查，1962—1983 年间，韩国共引进 2641 项外国技术，其中有 56% 是从日本引进的。在上述二十年时间里，韩国共引进外资 276 亿美元，仅在 70 年代因利用外资和引进国外技术而增加的国民生产总值就占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的 36.1%。对此，德国经济学家霍普曼指出，韩国人由于充分利用了先进工业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充分利用了“后发展国家”的效应，使自己的工业化速度比发达国家所经历的时间整整快了 3—4 倍。60 年代——70 年代，韩国分别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意大利引进大量先进技术，经过消化、吸收并改进，到 1987 年间，其生产效率已经比美国高 1.5 倍，比英国高 2.6 倍，仅略低于日本。

纵观韩国经济发展的历程，它是一个加速腾飞的进程。如果简单地将韩国经济的成功归结为国际社会提供的“良机”和美日“资本扶植”，这是不全面的。韩国经济成功的根本原因在其内部，在于它选择了一条符合韩国实际情况的经济发展道路，一条以“技术立国”战略为主旋律的经济发展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整个朝鲜长期受日本的殖民统治。由于朝鲜南部矿产资源极其匮乏，其有限的工业生产主要分布在朝鲜北部，一度形成“南农北工”的产业布局，其中工业资本的 90% 被日本垄断。二战结束后，日本将其在朝鲜的工业资本和工程技术人员的 80% 都撤回了本国。不久又爆发了朝鲜战争，这场战争使南朝鲜经济濒临全面崩溃。这时李承晚政权束手无策，只得求助美国提供全面经济援助，维持其经济的运行。1958 年，美国停止了对南朝鲜的“无偿援助”，改为贷款，这对全面依靠美国援助而运行的南朝鲜经济是一个巨大打击。这时的南韩面临二种选择，一是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二是全面破产。

朴正熙上台后，把经济建设置于一切工作的首位，动员一切人、财、物力，狠抓经济发展。为了引导南韩尽快步入发展的轨道，朴正熙提出了对南韩经济实行全面改革的三大战略设想，即：把主要依靠美国援助过日子的消费型经济改造成通过发展加工工业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开发型经济；把以国内需求为主要生产目的的封闭式经营机制改造成以“贸易立国”为中心目标的主导性经济机制；把过去“自由放任”的纯市场经济体制改造成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以政府力量为主体的主导型经济体制。朴正熙的这三大改革战略设想宣布后，在南朝鲜引起了强烈反响，获得了社会各界的拥护，

尤其是得到了南韩民族工业界的响应,认为此战略构想是韩国经济发展的“希望之光”。

但面临自然资源匮乏,资金严重不足,工业基础薄弱,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失业队伍日趋庞大这一严峻的现实,如何实施改革呢?以朴正熙为首的南韩政府经过苦苦思索和全面深入的分析,大胆提出了“技术立国”战略,并选择“技术立国”作为南韩经济发展战略的主旋律。三十年来,虽然韩国政治曾一度动荡,但“技术立国”的战略却始终没有改变,且有加强之势,这主要是由韩国的经济发展条件所决定的。纵观韩国科技战略的实施,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60年代初期,韩国确定走“生产——技术——科学——民用优先”的发展道路。当时国际上存在着两种科技发展模式:一种是美日采用的“生产——技术——科学”模式;另一种是苏联采用的“生产与科技并举”的模式。除此之外,还有民用技术优先还是军事技术优先的区别。南朝鲜采用了“生产——技术——科学——民用技术优先”的模式。主张在60年代和70年代要把技术资源全部投入到对国际上现有技术的吸收和扩散中去。甚至认为在这一阶段若存在研究和开发则是不正常的。其理论是,技术能力的成长存在某种适应的顺序。对后进国来说,在投资能力(设计和建设新企业及企业的扩张能力)和创新能力(开发新产品、新工艺和改进已有产品、工艺的能力)发展之前,发展生产能力(开动和维持生产过程的能力)必须先行在生产实践中获得能力之后,才能转而获得投资能力和创新能力。事实证明韩国确实是这样做的。直到80年代初韩国才开始抓自主技术开发,最近才着手抓基础科学研究,把1989年定为“发展基础科学年”,并计划到2000年把研究与开发经费占GNP的比例提高到5%(发达国家为3%)。

第二阶段是60年代末,他们决定发展非煤铁型工业基础。在韩国发展外向型经济过程中,60年代末吸取了日本的经验,不建设传统的煤铁型工业基地而是抓炼钢、造船和重化工,其依据就是后者“能带动出口”。并在60年代后期制定了推行这些行业的法律,为其生产、推销和技术开发的长期计划提供了立法基础。到了70年代,这些行业确实变成了真正的“战略行业”,为外向型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现在,人们在探讨这种做法是否是构成“东亚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或它是否是当代工业化发展的新方式。

第三阶段是80年代初,南朝鲜决定发展半导体工业,以便及时抓住当代主导型技术的开发,不断增强外向型经济的后劲。这是韩国科技发展战略的又一成功例证。因为韩国这一举动,进入80年代以来,开始与发达国家同步前进。1983年底,成为继美日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生产者。之后又陆续开发并生产新型电子元件。其电子产品出口额1987年已突破100亿美元,约占当年世界电子产品市场的5%,对美日在半导体领域的领导地位形成了挑战。这表明韩国在当代主导产业信息产业中已争得一席之地。

第四阶段是从90年代开始,韩国确立高技术产业“出口导向”的战略方针。韩国认为,严峻的国际形势迫使它不得不独立开发高技术,因为发达国家越来越把高技术当作武器来对对方进行封锁,不把开发高技术作为国家未来的目标,韩国就无法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生存下去。韩国吸收了日本发展技术促进经济腾飞的经验,果断地确立高技术产业“出口导向”的战略方针,即瞄准国际市场,制定各种优惠政策,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千方百计发掘人才,大量引进外来资金和先进技术,并和国内优势相结合,在高技

术领域发挥竞争优势，然后再打回国际市场，以达到投资快、经济效益高的目的。

科技界的老师是由学生成长而来的。

在世界坐标中，韩国人始终甘于呆在学生的位置上。在政府积极倡导下，“求知于世界”，使节团出国考察，留学生出国留学，聘用海外专家，引进西方技术，吸收西方文化，文明开化之风盛极一时，特别是对西方的技术和管理、更是钟情。

在欧美商人眼里，韩国市场外面似乎有一道万里长城，防守严密，水泼不进。近年来，为此而引起的国际官司屡屡不断，已成为国际贸易战中的一大焦点。

不过，有一个市场例外，它对任何国家的产品都敞开自己的大门。这里没有艰难的讨价还价，没有严密的关税壁垒，各国商品自由进出，各领风骚，简直就像一个硕大的国际橱窗。这就是全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成果。

二次大战后初期（尤其朝鲜战争后）的韩国，在科学技术领域，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落后了半个世纪。为了尽快缩小这一差距，韩国政府采用了“吸收性技术革新”的战略。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加以模仿、消化和创新。在这一战略之下，韩国对西方的技术引进，成绩显著。60年代，平均每年引进几百项。70年代，平均每年引进上千项。在钢铁、机械、电子等一切领域，先进国家在半个世纪开发出来的技术成果，韩国人只用20多年就学了回来。

南韩的技术引进和技术立国是其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一个重要措施，也是其实现经济崛起的强有力手段。上述从宏观上把握一下韩国科技政策的变迁，那么具体讲来，它的科技政策怎样呢？

1. 科学技术的行政管理机构

内阁中负责科技政策的“科学技术部”建于1967年。该部负责制定以下方面的基本政策：科研与开发、培养有技能的人员、国际技术合作、研究机构的发展和资源的开发以及为促进科技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然而，政策的执行掌握在其它专业部门手中。科学技术部只是对与科技发展有关的其他各部的各种计划和管理活动进行协调的中央机构。政府中至少有8个部积极参与科技的发展。如，韩国引进外资和引进技术是属于“经济计划委员会”的管辖范围；专利、工业标准化以及工业技术开发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是属于商工部的权限；而科学和工程教育则由教育部负责。由于这个原因，1973年成立了全国技术委员会，以便使科技发展能成为一体化的全国性活动。该委员会包括政府各有关部的部长，加上私营部门和教育机构的代表，而以政府的总理作为主席。该委员会负责商讨科技的长期发展政策，主要政策的协调，与科技发展有关的总协调以及人力开发计划的协调等。

南韩政府在1982年采取了强有力的加速科技发展的措施。政府的断然措施之一，是每季度召开一次促进科技发展的总统会议，会议参加者包括：总统、所有内阁成员，以及大学、私营部门和公共研究机构的代表。开会的目的在于有效地进行部门之间的协调并对全国的体制实行彻底的改组，以加强技术革命的能力。1984年，政府建立了科学和技术委员会，该委员会作为工作机构每月开会一次，负责使各个不同机构的活动一体化，并跟踪在上述季度总统会议上所提出的问题。

2. 科技的基础设施

在对行政机构进行调整的同时，政府在加强科技能力方面也作了重大努力。1966年建立了一个一体化的技术中心——“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以满足工业部门技术上的需要。该研究院是南韩第一个多学科研究机构，负责在应用研究的广泛领域中开展活动，其中包括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为中小工业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和小规模试验工厂的工程技术研究。在60年代，“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的科研与开发活动着重解决在生产工艺技术转让过程中发生的简单和实际的现场问题。到70年代，该院已从事较高层次技术问题的研究，如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开发本国原材料和改进引进技术。

韩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及其工业的日益高级化和多样化，要求科研与开发工作不仅在数量和质量上，而且在研究范围方面与其保持同步。单靠“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一个机构已不能满足所有这些要求，取而代之的办法是将原来的机构转变成为一个系列专门化的研究所；每个研究所都被指定在一个优先发展的工业领域中进行深度开发：造船、海洋能源、电子、通讯、能源、机械和化工。从70年代起，大德“科学城”接纳了这些新建立的研究所之中的大多数研究所，并接纳了许多私营企业的科研与开发中央实验室。

包括“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以及从它分出来的研究所在内的公共研究机构，在韩国的科研和开发工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们的支出在科研与开发费用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很大。这些研究机构在开发新产品和新工艺以及采用和改进外国技术方面对工业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贡献。

科学城的建设是韩国大兴科技的特色之一。

让我们参观一下韩国的“大德科学城”。它距忠清南道大田市只30分钟路程，各种高技术研究开发部门分布在800万平方米的城区里，韩国科学技术大学和科学技术院犹如众星拱月，立于其中。这里的学生不仅免除一切杂费和食宿费，而且可以领取奖学金，成绩最优秀的前两名学生，甚至还能获得参加诺贝尔奖授奖仪式的殊荣。因此，这里人才荟萃，个个学业有成。

“我希望本校学生能够获得诺贝尔奖。”

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李正五教授充满了自信。80年代，大德科学城初具规模，很快研制出一些新技术、新产品。1991年在大德兴建“科学文化中心”，以招徕更多更优秀的国内外科技专家。计划到2000年，大德科学城的研究机械由目前的26个增至60个，人口由1万人增至7万人。1991年12月，光州尖端科学基地又破土动工，主要研究并开发精密化学、生命工程等高新技术。最近10多年，韩国各类企业研究所纷纷成立。1981年共有43个企业研究所，研究人员计2086人，1986年达到817个，1990年966个，1991年6月底即猛增至1087个，拥有5.4万多名科研人员，其中博士749名，硕士7214名，学士28289名。10年中，研究所和科研人员各增加20多倍。企业研究所注重应用研究和新产品的开发，随时根据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开展科技活动。

近来，韩国为了追踪国际高新技术，很注意与先进国家共同进行科学研究。1991年10月，韩国科技处拟订《关于开展新国际秩序对策的尖端技术协作方案》，成立韩美科学技术开发财团，各出资5000万美元，作为进行共同研究和人才交流培训的经费。此外，为了完成多边性国际共同研究项目，韩国决定经常保有400名左右来自先进国家的研究人员，并每年派800名科技专家出国进修。在1992—1996年间，韩国将推动政府研究所和企业研究所，不惜工本地到美、日、欧的尖端科研基地设立韩国的研究机构，以最快

的速度吸收高新技术；确立“韩国——俄罗斯”、“韩国——日本”共同研究体制；扩大对外国研究机构的委托开发研究事业；建立科技情报数据库，促进海外科技情报的集中管理和共同使用体制的形成；诱导产业界、大学和各类研究所相结合，参加对国际性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

3. 科学技术法律制度

在科学技术部成立以后，颁布了一些有关科技发展的重要法律。包括：1967年科学技术促进法（确定了政府对促进科技所承担的基本义务）；1972年技术开发促进法（鼓励私营企业从事技术革新活动）；1973年工程服务促进法（旨在通过保护本地市场以及实施为本地工程企业制定的行动标准，以促进本地工程技术能力的开发）；1973年全国技术资格审订法（通过一套考试和颁发合格证的制度，以提高技术领域专业人员，尤其是那些掌握熟练技能的人员的地位）。此外，政府还提出了若干旨在促进特定工业部门的法律。包括发展汽车工业的法律（1962）、发展造船工业的法律（1967）、发展通用机械工业的法律（1967）以及发展电子工业的法律（1966）。这些法律为制定有关市场、生产和技术开发的长期计划提供了基础。

4. 科研与开发的投资和活动

在过去的10年中，韩国科研与开发方面的投资有了明显的增长。科研与开发投资总额由1971年的2860万美元增加到1976年的12610万美元，又增加为1986年的17亿美元。尽管韩国的经济增长率属于世界最高的增长率之一，其科研与开发费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仍由1971年的0.32%提高到了1986年的1.82%。80年代初的数字反映了政府对于推动技术革新的强烈干劲。研究人员数目也急剧地从1971年的5320人增加为1986年的47042人。

科研与开发投资的结构也有了变化。公共研究机构的人员在研究人员总数所占比重1972年为46.56%，1982年仅为21.54%。同一时期，私营部门研究人员所占比重大幅度提高，大学所占比重由31.2%提高了43.45%。总之，在70年代，公共研究机构起过重要作用；但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和市场对技术革新需求的增长，私营部门就起了主导作用。

5. 大力倡导科技意识

大力开展科普教育，提倡“技术立国”的精神。为了号召和鼓励全民为“技术立国”而献身，增强全国全民的“技术立国”意识，韩国政府于1967年初，特意规定每年的4月和4月21日为南韩的“科学月”和“科学日”。并于1967年发起了一场普及科学技术的运动，这场运动是韩国科技发展长远规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场运动规定了三个目标：应让全民全面理解科学技术在经济开发活动中的重要性，并养成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应用基本技术知识的习惯；鼓励所有人学习专门技能；促进工业技术的战略开发。这场运动还提出了三个口号，即教育、行动和责任。旨在通过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教育，使人们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有效和最有力的手段，从而掀起一场学科学、爱科学和用科学的全民运动。这每年一度的“科学月”和“科学日”纪念活动，为弘扬科学精神，增强全民的科学技术意识，鼓励全民参与和献身科技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总而言之，科学技术是支持工业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科学技术的以下三个组成部分之间应当是平衡的：对技术革新的要求，技术能力的供应，以及以上两者之间的有效连接。需求和连接有可能在一个短时期内通过产业政

策来解决，但是技术能力的供应、尤其是人力开发只有通过长期的计划和投资才能实现。这应该是一支经过训练的劳动力，有能力鉴别和吸收外国的技术并从而进行本国的技术开发，以便使国家能够保持其国际竞争能力。韩国在这方面走出了一条成功的路。

第八章还是一条“小龙”吗？

一、脱颖而出兮，“亚洲四小”

在太平洋西岸，沿着亚洲大陆的边缘地带，自北向南镶嵌着四颗“经济明珠”，其熠熠之光，令世界各国为之注目。这四颗明珠便是崛起于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四条经济“小龙”。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自六十年代以来，根据各自的现实状况制定和调整发展战略，不失时机地发展外向型经济。其经济发展速度很快超过一般发展中国家，名列世界前茅，脱颖而出。西方经济学界称誉它们为“优等生”，把它们经济的崛起看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奇迹”，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在西方国家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每个年代都出现经济奇迹：五十年代出了联邦德国，六十年代出了日本，七十年代相继出了新加坡、韩国、香港和台湾。尽管它们资源缺乏，都能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引起了世界关注，名噪于世，被称为亚洲的“四小龙”，近年又赞之曰：“亚洲四个小日本”。这四个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能够迅速摆脱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范畴，跻身于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行列，乃是由于60年代以来三十多年间高速增长的结果。

新加坡、韩国、台湾和香港都经历过长期殖民统治，到50年代末，有的仍然是经营转口贸易中心，有的仍以小农经济为主，其中有的可谓资源贫乏的弹丸之地，但它们能克服自身的不足，立足本地，面向全球，迅速地发展经济。

其经济飞跃的共同特点是持续地和高速地发展。它们的经济增长率都保持在8%—13%的高水平上。进入70年代后，发达国家由于石油危机而进入经济增长迟缓时期，平均经济增长率只停留在2%—3%的水平，在60年代经济增长率持续保持在二位数的日本也仅有5.5%的增长速度，“四小龙”却仍然获得令人惊奇的高速增长，它们的年递增率为：新加坡9.4%、台湾18%、香港19.3%、韩国24.8%。进入80年代，经济年递增率仍然达到在6%—19%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

新加坡：60年代初，刚从殖民地统治下获得自由，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只有很少量的手工业、农矿产品加工业和修船业。用新加坡人的话来说，“除了土地和人民外，一无所有”。正是在这样的起点上，二十多年来新加坡的经济以持续的高速度不断发展。50年代递增8.7%，70年代经济增长速度比60年代更快，年递增9.4%。发展最快的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增长率在11%—14%之间，70年代中期虽然受到资本主义世界危机的影响，仍然保持4%—6%的增长率。在1980年—1986年经济年递增平均保持在6.9%的速度。国内生产总值由1960年的21.22亿新元，增长到1986年的166.17亿新元，增长6.76倍，年递增8.2%。今天的新加坡已与纽约、鹿特丹并列称为世界第三大海港，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海上钻井建造中心和仅次于休斯顿、鹿特丹的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它不仅是东南亚的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而且同伦敦、香港和纽约一起合称世界四大金融中心。新加坡经济发展在短时期内获得的显著成绩，使它从不发达国家一跃成为举世瞩目的新型工业化国家。

香港：20多年来，香港经济发展是非常迅速的，除个别年份外，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由1950年的31.5亿港元，增加到1986年的2918.97亿港元，其增长率60年代要比50年代高，70年代比60年代高，1980

年以来，仍然保持高速度增长。年递增率，50年代为7%，60年代为13.6%，70年代为19.3%，1980—1986年为19.7%。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1950年的1408港元，增加到1986年的52759港元。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使香港在60年代起就已成为远东地区许多轻纺工业品的制造中心，而且在以出口为主导的方针下，成为国际贸易中心，加之70年代的多元化发展，它又进一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海空交通运输中心和信息中心。

台湾：二次大战后，台湾经历了一段时间不短的混乱。50年代后，它从本身经济遇到的种种困难出发，陆续采取措施，制订了一系列政策和经济建设计划，大约经历了15年的时间，经济由复苏转为迅速发展。台湾经济真正进入高速增长时期是60年代，到了70年代中期已经跃入工业现代化行列，在国际舞台上受到异口同声的称赞。台湾当局从50年代到70年代，先后实行六期“四年经济建设规划”和一期“六年经济建设计划”，每一计划期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是较高的。其经济增长速度，60年代为13.5%、70年代为18%，进入80年代仍达12.8%。国民生产总值由1960年的621.43亿元新台币，增加到1986年的27424.35亿元新台币，增长43倍。

韩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南韩是一个长期遭受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地区，它的经济是典型的殖民地经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又一度直接控制了韩国。三年朝鲜战争使南韩的整个经济又遭到巨大破坏，直到1958年还未恢复到1940年的水平。但从1962年开始，韩国当局先后实行了五个五年计划，国民生产总值年递增率，“一五”计划期为11.8%，“二五”计划期为19.9%，“三五”计划期为24.2%，“四五”计划期为19.7%，“五五”计划期为9.9%。国民生产总值由1960年的21.2亿美元，增加到1986年的1060.08亿美元，增长48倍，年递增16.2%。南韩经济的高速增长，引起世界各国的兴趣，有的外国报刊把南韩列入为数不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之一，有者称之为“汉江边上的奇迹”，甚至有的还称之为“亚洲的又一个日本”。

“四小龙”经济增长率对比表

时 间	期 间	年递增率
新加坡	1960—1986年(27年)	8.2
台湾	1960—1986年(27年)	15.6
韩国	1960—1986年(27年)	16.2
香港	1960—1986年(27年)	16.8

资料来源：陆大同、许咏莲《亚洲“四个小日本”发展经济的道路》。

亚洲“四小龙”之所以被誉为当代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建设现代化的“优等生”，令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瞩目，原因就在于，他们在50年代的经济水平还属于地道的落后国家和地区，经过后来二三十年持续以超过8%的速度的增长，现在已经达到或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走完了先发达国家需要走上百年的历程，大大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四小龙”在发展历程表明，他们所以能保持持续高速地增长，关键在于从制定经济发展战略，调整产业结构，到某些主要产品的增产、停产调整等，从总体上说，决策是科学的。

“四小龙”都具有地域不广，自然资源匮乏，国内消费市场不大，经济起步阶段资金严重不足，人员素质较低的短处，同时又都具备劳动力工资成

本低的长处。据此，他们在一个较长时期实行来料加工，贸易补偿，进口替代的经济政策。这些正确决策都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收益。

“四小龙”的经济起飞阶段是 60 年代至 70 年代。国际上从 50 年代至 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前，西方世界关税壁垒不严重，并需求一些轻工、服务市场；就国内条件而言，经过前一阶段的发展，已具备一定的基础设施，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和管理人员的经营管理素质有很大提高，企业适应国际市场需求的应变能力有所增强，资金严重不足的矛盾有所缓解等，根据这些条件的变化，“四小龙”先后及时地将进口替代发展战略转变为出口主导型发展战略，由此带动了工业的重型化和技术化的实现。进入 80 年代以后，它们充分利用西方发达国家在调整产业结构中出让某些先进设备，技术以及市场，国际分工愈益广泛推行和产品愈益向高精尖专方向发展的有利条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发展了一批高科技领域的产品。在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四小龙”经济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促进经济上新台阶的过程，50 年代—60 年代—70 年代—80 年代，呈现了明显的阶段性。

“四小龙”除香港外，都有一个权威的政府或当局，在政治权力上高度集中，经济上则以市场发展、市场运行机制为原则，形成“硬政府，软市场”的经济模式。他们十分强调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作用。韩国、台湾标榜实行“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新加坡政府也是一直强调“政府要干预经济”。

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循环，扩大出口，是“四小龙”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都采取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极有力地促进了它们的经济高速增长。台湾和韩国最早采取这一发展战略，出口高速增长和国民生产总值大幅度增长也最早。1965—1973 年间，出口额年平均增长率台湾达到 33%，韩国为 32%，新加坡和香港都在 11% 以上。自此，“四小龙”迅速追赶发达国家，同低收入国家拉开了距离。

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人力资源，是“四小龙”经济起飞的重要原因。“四小龙”在近代处于东西方文明的文汇点，既受中华民族文化中勤劳、尚学的优良传统的熏陶，又受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的冲击和影响，有着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素质基础。在此基础上，他们仍然高度重视发展教育。在 20 年间，韩国中学入学率从 27% 上升到 80%，台湾从 51% 上升到 96.7%，新加坡从 32% 上升到 55%，香港从 20% 上升到 62%。大学入学率，据 1982 年统计，韩国达 24%，台湾达 19%，新加坡和香港分别达到 11%。正是由于“四小龙”十分重视教育和科学技术，并将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从而有效地增强了本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如上综述了亚洲“四小龙”腾飞的共同点，但“四小龙”也各具特色，正是这些特色和差异造就了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不同的潜力和发展趋势。不同的地理位置、不同的国土面积及矿产资源、不同的人口及人口素质、不同的政治背景、不同的产业结构、不同的国内、国际市场、不同的政策措施使“四小龙”并非步调一致，而是表现出了潜力强弱。

无疑，在亚洲“四小”中，人口最多，经济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是韩国。进入六十年代以后，韩国在美、日资本的大力扶植和新政权的大胆精心经营以及国民的辛勤劳动中，国民经济获得了长足进展，一跃进入中等发展国家行列。人们已在议论之中：韩国是即将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所谓“门槛国家”，可能成为“亚洲的第二个日本”。

是的，韩国民族是自信自强的民族，政治上的一系列民主改革，强大的

经济后劲，科学技术的巨大潜力使韩国不甘再作太平洋西海岸的一条小龙，它要赶超日本，造就一条巨龙。

二、韩国的挑战：世界第一

当台湾产业在政府“自由化”即撒手不管的政策下，各自散往东南亚、大陆投资，或躲进利润较高的服务业时，韩国企业却在政府辅导下动作一致地向内强化体质，纷纷收回散在各处的投资业务进行重组。而当台湾很多大企业负责人因劳资问题而有三分之一不准备投资时，南韩企业家却在罢工最严重、工资上涨百分之二十的 1987 年，投资自动化设备而将生产力提高了百分之二十。

并非台湾得了“恐韩症”，台湾人明显感到，今天的韩国人的下巴抬得更高，语气更冲，气势更宏广。主持南韩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起草人之一的李起鸿，当年曾亲自赴台湾学习土地及农业改革的策略与措施。今天，在他汉城商业区的大厦里，李起鸿说：“我从来没听过南朝鲜企业家谈他们害怕台湾的竞争。”南韩这样的盛气不是没有理由的。五年前台湾经济部长赵耀东在新闻媒介上嘲笑南韩汽车天真地想开进美国市场，今天南韩汽车年产 100 万辆。据报道，大宇汽车三年后将输美 45 万辆。对汽车工业而言，台湾已经没有资格竞争出口，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太迟了。

1. 十年前的日本

联华电子总经理曹兴诚三年前曾批评南韩贸然大规模投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DRAM），很难维持，但 1993 年 DRAM 全球缺货，南朝鲜趁机大捞一笔，并进军技术更先进的-兆集成电路。另外如电视、录放影机等家电产品亦获得飞跃发展，金星株式会社台北分公司总经理朴秉洙也实话实说：“家电方面你们绝对不能当我们的对手”。

南韩的造船业也有直逼世界第一，台湾还企图保住拆船王国的宝座。而韩国的浦项钢厂则在 1987 年成功地实现了国营转民营，并于次年晋升为世界第二大钢厂。

这张亮眼的成绩单，让人均国民收入 6000 美元的韩国人，更加不把人均国民收入已有 5000 美元的台湾、或 7000 美元的香港、新加坡放在眼里。大宇集团社长金宇中的兄长、西江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金德中，在汉城火车站对面 25 层楼的大宇总部顶楼，滔滔而谈国际经济实力时毫不客气地指出：“我们的人民素质高、有纪律，经济成长又十分稳定，五千年以来第一次成为亚洲一股平衡的势力，我们的下一代将会为他们的国家感到骄傲。韩国将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不会有四小龙了！本来是南朝鲜、台湾、新加坡、香港，但是你看看，新加坡只是个城市；香港以后是中国的了；台湾虽是四小龙之首，但是未来还得视你们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如何发展。所以从长远看，根本不会有四小龙，只剩下一条龙，就是朝鲜。”

日本人说：“朝鲜人跟日本人十年前一样，反革命工作，侵略性十足。”

2. 世界第一的目标

韩国商工部负责拟定策略的战略局长朴云绪，在距汉城 40 分钟车程的果川市气势宏伟的政府集中办公区里冷静地说：“我们的国家目标是在 1990 年成为工业国，我们的野心是成为世界第一。”朝鲜人的冲劲勇猛是创造韩国经济奇迹的功臣，但更深一层探讨拼劲的来源，却是韩国一直有一个清楚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南韩人团结一致，拼命工作。什么是南韩的国家目标？朴云绪的“世界第一”透露了南韩人从求温饱累积成功而越来越膨胀的雄心，他们对提高自己的国际形象，向外国人证明“韩国也能”的民族

主义特别强烈。

文教部大学政策室奖学官列举了韩国教育宪章的第一条，来说明朝鲜人最希望教给子孙的精神。头一条是弘益人间，第二条就是民族自尊。

当时卢泰愚总统给公务员的“国政指标”，挂在果川市每间政府办公室的也是：一、民族自尊，二、民主和合，三、均衡发展，四、统一繁荣。卢泰愚的优先次序排得颇具深义。韩国一直是四小龙中政治变动最多的一条，二战后已换过六位总统，其中二位被暗杀，但是经济发展却只用了台湾二分之一的的时间，是在政治不稳定中疾速发展的奇迹。3. 亚洲的爱尔兰团结和“朝鲜第一”的国家目标，之所以对韩国人特别有蛊惑力，自有其历史背景。两千多年来，朝鲜被列强侵略、占领，使朝鲜人强烈感觉自己被巨大的外力挤压而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远东经济评论》驻台记者沈在薰是深受西方教育影响的朝鲜人，他认为朝鲜就是亚洲的爱尔兰或波兰，充满着叛逆与争取独立的强悍精神。因此，迈向现代化过程中就特别要表现自己，对首次能自己决定的国家命运也倍感珍视。于是，南韩人的眼光、气势、目标都直指美国、日本等工业先进国家。日、美对来势汹汹的挑衅也大感不安。这种朝鲜民族至上的作法，也给韩国经济发展的未来蒙上一层阴影。尤其是在与世界各国的对等贸易上，韩国四处要求开放市场，自己却排斥外货的做法已引起贸易伙伴的不满。金德中说：“目前我们是世界第13大贸易国，未来五年内，我们会成为第四或第五大贸易国。全世界都在注视韩国，我们将不再是发展中国家。”

4. 政治落后十年

1963年出任财政部长，后任朝鲜工业银行总裁，曾为大企业安排过无数贷款的李廷焕承认：“韩国一直采取政经分离的政策，政治的发展总是落后经济十年，”说明韩国为经济发展在政治上所付出的代价。民众不满的主题是社会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更是反对党最常用的武器。根据世界银行的比较数字，韩国的贫富差距是八倍，台湾为四点六倍，但与其他亚洲和拉美国家相比，其收入水平仍属平均。

金德中认为，几年来的政治改革，已使韩国向民主化方向前进了，未来几年将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南韩或者成为另一个菲律宾或中南美洲国家，或者成为像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

电算院长金圣镇分析未来亚洲形势，指出亚洲局势越来越重要，日本已有领导世界的趋势，但下一个是谁？“我们觉得也许韩国会有一次机会。毕竟，好几个世纪前，罗马和葡萄牙都是大国。”

台湾、南朝鲜生活水平比较

普及率	病床	医生	彩色电视机 (部每百户)	电话 (部每万人)	汽车 (辆每万人)	摩托车 (辆每万人)
台湾	236	276	94	3124	764	3698
韩国	385	998	5	4829	158	193

资料来源：1. FEER：AsiaYearBooR1988；

2. 台湾行政院主计处：1986年社会指标统计；

3. 韩国经济企划院：主要经济指标每病床（每个医生）所负担的人口数。

三、韩国的企业：摩拳擦掌

南部昌原工业区，现代集团创始人之子郑梦九和 500 个管理人员，被要求加薪的工人困在现代精密本馆，两个想从后门溜走的职员，被工人拖到工会办公室扛成重伤，有生命危险。现代集团造船的工人甚至坐卡车到工业重镇蔚山，放火烧市政府。

和劳工同属弱小势力的中小企业，也站出来疾呼自己的权利。“过去我们帮助把饼做大，现在我们要分饼了，”一位小贸易商道出了中小企业现在的心情。

保护主义更节节逼近这个一度以廉价品横扫欧美的出口国。南韩在保护主义与劳资纠纷的夹击之中。怎么办？

1. 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然而，这些问题都没有杀伤南韩的经济增长，1988 年第一季竟达 15%，是台湾的一倍多。和台湾不同的是，他们的投资意愿非但没有下降，各大企业反而更雄心勃勃地进行投资，三星投资年产 45 万吨的轻油裂解厂，使韩国的石化工业的规模首度超越台湾；靠经营客运起家的锦湖集团，以 850 万美元跨进航空界。

南韩为什么能在困境中出类拔萃？熟知南韩政经大势的人士分析，除了过去一年本值较台币低的经济因素外，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沉稳：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我们知道问题在哪里，知道怎么解决，而且正全力在处理，还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48 岁的油公司总裁金恒德笃定地说。

南韩今天最根本的问题，是“不平衡成长策略的后遗症”，商工部政策局长朴云绪指出，为求经济快速成长，过去集中贤源、全力培植大企业，却在劳工、中小企业及乡村种下不平的种子。

2. 成长的后遗症

生活在汉城最热闹的市中心，喜欢和先进国家比较的南韩人，强烈感觉不平衡发展的对比。走出摆设巨大雕塑、春意盎然的办公大楼，拐进小巷，只要 10 分钟，就看到低矮阴暗的平房，小店里的货摆到街上，驼成 90 度的老太太走在扔了垃圾、果皮的巷道中。卢泰愚宣布民主化后，平日因贫富对比而来的不满情绪一齐爆发。经过一年罢工、抗议的阵痛后，南韩政府断然摒弃孤注一掷求发展的政策，订下一个全新的国家目标：“财富平均的先进国”。曾任财政部长、朝鲜战争后参与经济重建的李廷焕说，过去的课题是增加生产，现在经济上轨道了，重点就是：自由分配、机会均等。

3. 新目标，老精神

现在，目标转新了，而韩国人那种团结合作的精神并未因目标的转换而发生分歧，人们的动作仍然一致。所有人一齐转个方向，力图将不平衡的经济发展引发的问题，运用新的经济策略来解决。

首当其冲的大财团，马上就嗅出风向的改变。二十年内建立起美国以外全球第 39 大企业的大宇集团董事长金宇中，公开承认许多南韩人对大企业印象不好，大企业应意识到身边环境的改变，努力获得社会的共识和和谐，“如果得不到大众的支持，我们很快会走到尽头”。

大财团迅速采取行动，适应国内要求公平分配和国外保护主义的压力。最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肉搏厮杀互不相让的大公司，应变步骤竟如出一辙：从对外扩张转为“向内充实”。无论是三星、乐喜金星还

是大宇的总部或会议室、处处可闻“内实”是最热门的话题。人人严肃地思考：如何让公司的体质更扎实？如何培养廉价以外的竞争力？

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解决经济扩张策略带来的社会上分配不均、公司内体质虚弱的问题。

4. 从“跳蛙”到“内实”

大财团过去跳蛙式的成长，生产力、技术、管理都不实在，只有回过头来内实，再求进一步的国际化。内实的第一步，是组织大重整，列出发展重点，合并重复投资，裁撤亏损企业，让出更大空间给中小企业。

排行第三大的乐喜金星集团，1987年实行大改组，合并了三家电子公司，并将三、四十家相关企业归并为五大部门。“策略性重整，不仅为了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求生存，而且要变局转为优势，”董事长具滋学强调，重整的企业目标，是要成为世界第一的电子产品制造商。

几乎是同时，排行第二的现代集团，也在“专业经营”的口号下实行了大重组，将三十多家关系企业化为九大部门，创办人金宇中下放七大部门的管理权，由专营经理负全责。

南韩政府也主动以各种法令，限制大集团扩张，扶持中小企业。过去，财团因无限制扩张而被称作“八爪章鱼”，营业额将近台塑集团四倍的三星集团，小至冷冻水饺都生产。韩国政府于是规定食品制造等17个行业、205种产业，专属中小企业，大企业不得涉足。

5. 逼“八爪章鱼”放手

政府更釜底抽薪地以金融手段防止大企业膨胀。一面催还大财团的贷款，一面将他们的贷款金额冻结在1987年10月的标准。

大企业发展新计划，也必须放掉一些旧行业给中小企业，否则将受到严厉制裁。排名第20大的锦湖集团，向朝兴银行贷款850万美元，计划进军航空客运，但因没有放弃一些旧行业，结果本来11%的贷款利率，被罚调升为19%。

身为资源重组主角的中小企业，也理直气壮地与大财团周旋。经营造船、建设的现代集团综合木材公司，由于计划投资侵犯了属于中小企业的领域，而被告到商业部，不但计划因此搁置，还得静待商工部裁决。

在财富重分配的压力下，股票上市就成了财团兼顾社会要求与资金募捐的新武器。大宇集团有9家公司上市，1988年连美国通用汽车占一半股权的大宇汽车，都极力说服通用让大宇汽车的股票上市，这里除了资金的考虑，更有“社会压力”。国营的浦项钢铁厂，也在1988年上市，以“分配多年来赚取的利润，并与奉献浦项的员工分享股权”。

国内资金的重新分配，使大财团无法像过去一样予取予求，于是转向资源更丰富的国际金融市场。自三星集团在三年前赴伦敦发行债券以来，国际资金的募集，已成为南韩时阀理财的新重点。

6. 群攻保守主义

与分配并列南韩两大经济问题的是保护主义。这个问题无例外地也是由朝野合力来解决。占总出口七成的大企业，带头迎敌。他们的策略，一是研究发展，训练人才；二是分散市场，建立品牌，现已逐渐做出眉目。

南韩财团将保护主义看作更激烈的国际竞争，他们认为，要成为这场比赛的最终赢家，必须从研究发展、提升科技做起。南韩最大的三星集团新总裁李健熙一上任就宣布向高科技发展的野心：“三星要成为朝鲜科技的领导

者”。

7. 政府来帮忙

年营业额近 200 亿美元的三星，每年投资营业额的 4.6% 在研究方面发展。1987 年更筹资 1.5 亿美元设立全南韩最大的私人研究机构：三星尖端科技研究中心。这个中心最近和金星、现代等公司合作研究 400 万单位的存储器，希望成为继美、日之后，第三个有此技术的国家。

46 岁的李健熙更以大手笔的并购来提升科技，三星买下了美国制造工业电子的 MicroFive 公司，突破了取得科技的困难。再将三星半导体、电子两家公司合并，以整合技术、减少重复投资。加上 MicroFive 的技术，要在二、三年后，将原来的消费电子产品为主的三星电子，调整为工业电子产品占四成的结构。因为大量生产中降低成本已不再是竞争的利器。

在耗钱又无法保证收益的研究发展投资方面，企业并不孤独，政府始终在帮忙。南韩政府规定，各企业研究发展费用的 10%，可以从营业税中扣除。对于资金不够雄厚的企业，政府还提供“种籽”基金，支持新在研究计划，这笔钱等到计划成功、赚钱后再还，如果计划失败，则不必偿还。到目前为止，总金额 1 亿多美元的 500 多个计划，得到过种籽基金的帮助。

8. 人才与科技齐步跑

人才是产业升级之本，南韩财阀在人才培养上不遗余力。大宇集团每年以 600 万美金资助员工出国攻读基础科技。和大宇的其它措施一样，也有清楚的目标：“到 1990 年，大宇将拥有 1000 名博士，届时就可以开始研究发展，建立自己的技术。”以纺织品进出口起家的金宇中强调，未来大宇的发展将以特种化工、工业电子、电讯及汽车为主。

情报汇集也被列入加强国际竞争力的重点之中，韩国正积极进行这方面的人才训练，有计划地召回海外分支机构的人员，学习企业文化、管理哲学及情报收集技巧。同时，南韩大财团也挥军海外，直接走入市场，和保护主义抗衡。他们最常采用的策略是：用“代工”办法，即到当地设厂生产、打出当地厂的招牌，这是突破保护主义樊篱的利器之一。三星集团中，光是三星电子一家公司，在海外就有六家工厂，分别攻打欧洲、北非、美国及东南亚市场。大财团用足了劲到市场打响自己的品牌。金星电子一年的广告预算是三千万美元，占金星电子产品出口总额的 1.3%。金星电子的家电，已在日本销售了 10 年，1987 年正式成立了日本分公司，并正式把“金星”介绍给日本消费者。

9. 转折点

南韩大财团摩拳擦掌，为更激烈的国际竞争热身。政府、中小企业联手，试图扭转资源分配的状况。南韩经济面临转型期。但韩国人自己，十分乐观。“我们过去经历过多少大风大浪都挺过来了，这次也不例外”，在经济企划院策划南韩经济 10 年的大宇汽车社长李经植，十分自信。韩国已有大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再经过这次内部整顿，努力将危机化作转机，一定赢过台湾。“如果制造业资本都变成商业资本，跑去开餐厅，这样很坏”，三星驻台代表李在纯观察台湾时肯定了南韩，“韩国制造业资本就没有流到商业去。”台湾产业少了锐气，而南韩看中工业投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南韩已是虎虎生风了。

四、韩国的科技：大胆开拓

在韩国人的眼里，工业化为的是自立自强。对一向与南韩称兄道弟、却又激烈竞争的台湾，早已传来不可忽视的警讯：韩国的工业早已为未来打出宽阔的开展空间。向来踩着稳健小碎步的台湾，就有部分原本领先的产业，已处在被南韩由后已接近美日，达到 2%。反观台湾近三年来却一直在 1% 上下徘徊。但南韩人却不以此为满足。”看统计数字，我们也许不比先进国家相差很多；但看看金额，我们实在还不能比”。韩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金学济说道。因此，韩国人在 1991 年将研究发展经费比例提高到 3%，并要在 2000 年达到 5%。

十年前，只占韩国研究发展支出五分之二之二的民间企业，在政府激励下，今天已吃下整个韩国七成的科技研究开支。而经过立案的民间研究单位，也由 200 个发展为目前的 500 个了。

2. 由失败奔回成功

事实上，这种不计成本的作风，在过去南韩强渡难关建立工业的过程中就已充分流露。八年前，三星集团决定跨入半导体存储器芯片生产。当时全球产量远大于市场需求，连许多美国大厂都纷纷退出。在三星第一个产品 64K 位存储芯片上市六个月内，市场上单价由 3.5 美元狂跌到 50 美分，三星咬牙撑了下去。当年赔钱的钢铁、造船等工业，今天成了南韩快速成长的基础。

由失败崩溃边缘奔回成功，南韩对自己益发有信心，对未来的雄心也越来越强。“目前我们的贸易、科技实力是全世界前 20 名，10 年后我们要作前 10 名。”曾在科技处规划未来 15 年发展计划的姜玟镐说。

3. 技术自主当赢家

历史“情结”加上工业需要，南韩人将自主视为工业发展的最高目标。“在这里，提到技术自主，没有人敢争辩”，瑞典电讯大厂 Ericsson 在南韩的资源顾问林致洙强调。南韩的造船工业，起步虽比台湾晚，最近却可为台湾建造巡防舰。特别是设计部门有几百个工程师在画图设计，而台湾到现在还是买外国图纸来用。南韩的成绩如此出色，飞利浦的斯莱福思指出，主要原因是“南朝鲜人有不同寻常的目标导向”。

4. 不怕风险敢担当斯莱福思以南韩跨入从来没有经验的半导体工业为例，说明南韩人眼中只有目标，却不为困难所阻。他说：“他们会碰到很多障碍，但他们一定会找出办法来证明他们成功了。”

领导人坚持冒险达成目标，也正表现出不怕失败的精神。曾任通讯部长的吴明，在 1981 年担任次长时，提议在实验室里打破外商对南韩交换机市场的垄断。当时不但电讯单位、制造厂商犹豫再三，连从未做过 10 亿韩国规模开发计划的南韩工程师，都不确定能否接下经费 240 亿的交换机计划。但南韩陆军军官校毕业、曾为韩国炮兵部队发展电脑系统的吴明却坚持，为了技术的独立，“只要有需要，就值得冒险”。

今天，韩国自己开发的交换机已在南韩乡间处理 20 万条电话线往来通讯，而原本供应乡间电讯设备的瑞典 Ericsson 公司，在南韩自制设备装机完成后，立即降价，替南韩省下 4000 万美元。吴明带点得意地回顾：“如果当时连我这个次长都不敢负责推动这种事，这个政府根本就不能顺利运作了。”

充满个人领导色彩的财团对顶风冒险更无惧色。在三星半导体遭逢全球不景气风暴袭击时，三星集团的创办人李秉喆曾对同仁说过，如果熬不过这

次风暴，三星集团就会破产，而三星集团是南韩最大的财团。“我们承诺要作这行，别无选择，只有设法生存下去”。当时公司上下就是这样的决心。领导层的决心带动员工的拼劲，当时三星厂区每天都像打仗，负责维修生产设备的工程师比作业员还紧张，24小时待命厂区，不让机器停转。

这种做法与台湾对发展科技工业的态度截然不同。台湾非要水到渠成才行，在韩国，水还没来也可以先把渠修好。决策人士的魄力使韩国人做事的手笔越来越大。

5. 经费够用 50 年

通讯部长吴明把韩国迈入资讯社会视为己任。他的目标是：“到了 2000 年，我们要使每个家庭都拥有电脑，使每个国民都有公平的机会取得资讯，达到先进的资讯社会水平。”因此他拨了一笔钱给专门负责电脑化技术的韩国电算院使用。难怪院长金圣镇虽然承认韩国软件技术至少落后台湾三年，却也不经意地透露，通讯部提供的经费，“够我们电算院用 50 年。”

以目前还在加速的 4 兆位存储器芯片计划为例，就是在政府的电子电讯研究所协调带领下，由三星、金星、现代合作开发新一代的产品生产、设计技术。据统计，在四年中，单是政府就要拨出 5000 万美元。

事实上，了解韩国成长过程的人，都将韩国有效率的步调，归功于政府的领导。近二年来经历民主化的大幅度变动后，经济企划院严峰成表示，当局也绝不放任产业自由发展。比如南韩当局就在 1987 年颁布了航空工业推广法，不但规范航空工业的发展，更要成立国家的航空研究所，发展技术，培养人才。

6. 科技就是人才

政府自视更重要的使命，是培养人才。“其实科技就是人才！”金圣镇说道。而在韩国人眼中，人力也是他们仅有的条件。电子协会国际组组长李恒燮表示“我们什么自然资源都没有，只有人。”

为了培养出科技人才，南韩建立了独立的科技教育系统。学生可以在科技高中——科技大学——科学技术院（研究所）一条鞭的体系中跳级就读。此外，政府还特别立法，学生毕业后可以免服兵役，直接进入公民营科技单位做研究工作。

在本土人才成熟前，韩国大量利用散居海外的科技人才。单在 1986 年，就聘请了 150 位海外人才回国。

有担当、大手笔，加上全国集体行动，大力培养人才，韩国才能以跳蛙般的幅度快速发展。可以说，大家都预测高科技起步晚于台湾的韩国，终会冲到台湾前面了。

第九章 造就韩国的二次腾飞

一、亚太世纪来临：机遇与挑战

文明的浪潮由东向西，兴起于太平洋、印度洋，澎湃于大西洋。今天，文明的浪潮继续西行，又轮到太平洋了。

新兴的太平洋地区，尤其是亚洲东缘地区，是古代世界文明中心、近代世界文明边缘。现在，近代文明已在这块古老神奇的土地上发轫、开花，从而使它正在成为当代全球瞩目的新兴文明中心。

亚洲太平洋地区，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中心。1965—1980年间，中国、日本、韩国、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等国家或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比美、德、法、英等西方国家快一倍，而1980—1985年间则快了三倍。

太平洋地区正在成为当代世界文化中心。环太平洋地带是东西方两大文明的融合之处，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文化和文化中心，是东方文明的典型，是几千年来从未间断一直延续至今的人类文明中心。东西方两大文化中心，在亚太地区碰撞交流，构成了空前的文明大融合。同时，西方舆论认为，世界高速增长区域，正是中国文明覆盖区，是深受儒教文化影响的大圆形地带。

太平洋地区正在成为当代世界交流中心。调查显示，全球十大贸易港中，亚太地区占有八家，新加坡、香港、高雄、神户、釜山均在其中名列前茅。在全球造船业中，东亚独占鳌头，占据了造船总吨位的四分之三。而且，亚太地区已成为世界空运中心，在近十年的发展中，亚太地区的空运量从占世界空运量不足10%到今天达42%。

亚太地区正在成为世界工业中心。在西太平洋地区，出现了环亚洲东海岸全球高速增长带。日本、韩国、中国及东南亚地区都曾创造出经济增长10%—12%的世界奇迹。九十年代初，全球经济速度放慢，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率是1.8%，而亚洲地区的平均增长率仍然处在6.5%水平，远远超过西方经济的发展速度。

除此之外，亚太地区正在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世界投资与贸易中心、世界科技及生物科学中心。

社会文明变迁的轨迹越来越明显。随着世界殖民主义中心“日不落帝国”——英国的衰落，以英、法、德国为代表的十九世纪的“西欧世纪”终结了，世界重心跨越大西洋，进入北美大西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后期，世界出现了以工业经济中心“美元帝国”为代表的美国世纪。二十世纪下半叶，世界重心移到了东方太平洋地区。与此同时，在东、西方的中介区域，一个新兴的技术经济文化中心“太阳升起的地方”日本兴起了。随后，东亚、东南亚等环西太平洋地区都在奋起直追。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复兴了，融合东西方文明于一体的新东方文明、新太平洋文明兴起了，从而在亚洲太平洋区域形成了一个旷古未有的黄金大海岸，超级工业、商业、技术、金融、信息和劳务市场，真正的世界“经济场”奠基了。

1. 世界中心东移与东亚经济腾飞

二十世纪下半叶，日本的崛起，四小龙的腾飞，中国的觉醒，终于使世界重心向东方倾斜，导致世界中心迁移到亚太新东方地区。

早在1983年10月28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香港贸易博览会上发表演说时就指出：世界事务的重心已从大西洋移向太平洋，在目前这个10年里，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将受到美国越来越大的注意。

1986年10月3日，美国《商业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二十

一世纪：太平洋时代》，其中写道：“里根把21世纪称作太平洋时代。美国已开始把经济、政治、安全重点从西欧转移到太平洋。环太平洋经济（太平洋经济共同体）已在形成，美国在今后的岁月里面临的最大挑战和机会是在大洋的另一边，在亚太地区。”

1989年11月6日，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由澳大利亚总理一再倡议的“首届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终于召开了。出席此次会议的有环太平洋地区的12个国家和地区的25位外交部长和贸易部长，它们是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文莱和韩国。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建立一个新的环太平洋经济联盟，会议特别强调希望中国加入今后的新的亚太经济组织。此次会议首次在澳大利亚召开，是一件划时代的事件，它正式宣告了环太平洋经济文化圈的形成，从此“环太平洋经济圈”由民间倡议、商界协调进入了实质性的政府合作阶段。

1991年11月12—14日，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在韩国的汉城举行，会议发表了《亚太经济合作汉城宣言》。此次，中国和中国香港、台湾首次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会议接纳为正式会员。亚洲太平洋世纪迈上了一个崭新阶段，进入了全面合作的领域。

亚太地区的新气象是同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20世纪60、70年代，“日本奇迹”和“儒教东亚工业文明”成为全球的热门话题。日本战后沦为被占领国家，成为一片废墟，但是，它赶上了西方经济黄金时期与产业革命的快车，又充分利用了东、西冷战的所有“缝隙”，在原有的高素质人才大军和传统文明基础上，迅猛崛起，一跃而成为同美国抗衡的经济强国，令全世界为之震惊。日本的“世纪经济奇迹”突破了著名的“韦伯原理”，即儒教文化与工业化不相容的命题，为此，全世界都开始重新审视儒教传统文化，探寻儒教文化与后工业相辅相成的奥秘，也寻找儒教文化与21世纪繁荣的正确结论，从而使世界对儒家文化和汉字文明更加刮目相看了。

80—90年代，东亚中国（大陆、港、澳、台）、南北朝鲜和新加坡拼命追赶日本，出现了各项经济指标都后来居上的势头。由于太平洋贸易、亚欧贸易、周边贸易的三大刺激，中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值大幅增长，而港澳台和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小龙”则在金融、投资、债权、外贸、航运、造船、化工、电子等领域出现了加速赶超日本的趋势。环太平洋大冲刺就是这样推动着世界重心东移，一波又一波地迁跃到亚洲太平洋地区这块古老而又年轻的东方大地上去。

从文明角度看，中国是汉字文化圈、儒教文化圈的本土，而日本、韩国、新加坡都是典型的汉字文化国家和儒教文化国家，至今仍然盛行汉字文明和儒教传统。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在现代世界贸易、国际金融、工业制造、科学技术和信息资讯等一切领域都获得了惊人的成功，已开始领先于世界。开始是日本，随后是四小龙乃至整个东南亚，最后中国在今天也显出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这表明，中国东方文化拥有巨大的承受、接收力量，拥有巨大的兼融、认同力量，而且更拥有巨大的融合、创新力量。西太平洋的许多走向成功的工业文明国家如韩国就是立足东方文明之母、兼融东西方文明之长、超越一切现有文明的“新太平洋文明”。

2. 东亚文明圈与经济圈

汉字文明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人们称之为“第五大发明”。中国文化正是孕育在这种文字之中，它经过几千年的发育、创造形成了三大

文化圈即高原文化圈、中部大河文化带和东部海洋文化圈。

高原文化圈，分布在中国周边地区，它曾是中国文化的主要发生圈，这里居住着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形成了丰富多采的多民族文化圈。

中部大河文化带，分布在中国中部、东部区域。长江、黄河等大河孕育了华夏文明，它是中国文化的主要发生圈，也是中国主体文化、传统文化。中国主体民族汉族在这里将各派文化融合、创造、汇萃，形成了世界空前绝后的大河文明圈，也是世界文化的主要发祥地。

海洋文化圈，分布在中国环西太平洋沿岸区域，这里是中国文化生长圈，也是世界海洋文明主要发生圈。这种文化覆盖了环西太平洋区域以东亚东南亚为主要地区，这个地区是世界经济奇迹高速增长带，是地地道道的汉字亚文化圈。汉字和中国文化在 2000 多年前传入日本，致使日本完成文明化并汉化，日本至今仍是使用汉字、尊奉儒学的国家。在亚洲“四小龙”中，台湾、香港属于汉字元文化圈，而韩国、新加坡也是最接近汉字元文化圈的亚文化圈。韩国的国旗、国徽是中国古代的太极图，韩国至今仍通用谚文和汉字混合使用，1992 年 1 月 22 日，韩国《中央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号召朝鲜人“继承文化遗产必须进行汉文教育”。“汉字是我们长期以来使用的记事手段，我们祖先的思想、感情和价值观都渗透在汉字里。所以，如果不培养汉字和汉文的基础学力，就决不可能继承祖先的文化遗产。”

正是在这种文化圈的孕育下，地缘经济学被赋予了崭新的经济文化内涵。这样，亚太东亚形成了一系列举足轻重的大经济圈：

太平洋经济圈：从 60—80 年代，太平洋经济圈已从民间倡议过渡到实质性的政府合作阶段，到 21 世纪，环太平洋经济将形成全球最大、开放的共同市场；

亚太经济圈：包括东亚、东南亚，有 30 亿人口，也可称之为西太平洋经济圈，将占全球生产的 2/3，中国（华人）集团、日元集团、韩元集团有可能成为亚太经济圈的三大支柱；

大东海经济圈：以上海为中心，辐射到日、韩、台的世界经济中心之一；

黄海经济圈：以中国山东、韩国、日本构成黄海大三角，辐射到华北、朝鲜；俄罗斯和蒙古，这是中国和亚太潜力最大的经济区域之一；

日本海经济圈：以中国东北、山东与日本、韩国为三大中心，形成环日本海大经济圈等等。

这是一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新时代！

亚太世纪的来临，标志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是迫使人做出选择的时代，是迫使各个国家、各个民族进行选择的世纪。它充满了挑战与危机，也满载着希望和机遇。

人们已经隐隐感到，韩国这一正在崛起的民族已处在文明圈中，已成为经济圈的中心之一，它与世界诸国、东亚各邦一样，迎来了新的时代的到来。在此背景下，到底如何才能振兴民族国邦，确是一个关节点。

二、东北亚经济圈下的韩国

在当今世界经济出现一体化和区域化趋势的背景下，大大小小的经济圈设想，已经或正在付诸实施。近年来，与中国隔海相望的韩国，提出了建立黄海经济圈的设想。这是韩国对六、七十年代推行“不平衡发展”战略的积极否定。在六、七十年代期间，国家把主要力量倾斜在东海岸地区的开发上面，使汉城到釜山地带的工业得到迅速的发展，成为一个先进技术装备的工业网络地带。相反地，西南海岸地区长期没有得到开发利用，生产力水平较低，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区域，这样就越来越影响到韩国的全面腾飞。加之当今国际经济区域化特征、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对外开放，使南韩意识到要造就韩国的二次腾飞，就要造就“黄海经济圈”。

1. “黄海经济圈”设想诞生背景

众所周知，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物之一的南韩，直到六十年代初还是世界上最贫困的落后地区。1956年5月16日，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之后，总结了李承晚、张勉政权时期推行封闭性的经济政策而导致失败的教训，从韩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一条外向型经济发展路线，即出口主导型经济发展路线。朴正熙政权大力整顿经济，将一直处于自流状态的南韩经济纳向计划发展的轨道，从1962年起开始执行经济开发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了贯彻实施经济开发五年计划，朴正熙在韩国建立了一种混合的经济体制，既“坚持自由经济体制的原则”，又“具有强有力的计划性”。这种经济体制在充分尊重民间企业家的自由和意志的情况下，政府可以对重要产业政策和计划予以积极参与或施加影响，即建立起所谓的指导性资本主义体制，实行“政府干预”。在这种体制下，韩国的第一个经济五年计划取得了成功。其后，又连续实施了第二、第三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使韩国经济别开生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高速发展，跻身于“新兴工业国”的行列。

全斗焕上台后，萧规曹随，继续推行朴正熙时期的经济政策，完成了第四、第五个五年计划，从1987年起，韩国进入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经过二十年的发展，韩国已建立起一个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并且拥有较为发达的农业、水产业和交通运输业体系。到1989年，韩国已成为世界第15位的“经济大国”、第11位的“贸易大国”，跻身于中等发达国家之列，并被世界誉为“发展中国家复兴的样板”。韩国经济能取得如此迅速的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除有内部原因外，仅就外部原因而言，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得到了美国、日本二个经济强国的支持和援助。在韩国同美国的经济关系中，长期以来表现为对美国的依赖，不仅严重依赖美国的市场，而且依赖美国的资金和技术。但进入七十年代以后，双方经济贸易关系发生了变化，一直处于逆差地位的韩国逆差额越来越小，而随着美国经济每况愈下的形势，七十年代初出现了“尼克松冲击”，开始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于是韩美间产生了贸易摩擦。特别是从1981年起，韩国在同美贸易中，开始出现盈余并逐年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韩国在贸易上采取了越来越严厉的限制，取消其许多优惠政策，使韩美间贸易摩擦越演越烈。在韩国同日本的贸易中，随着经济的发展，贸易规模的扩大，韩国对日贸易逆差越积越多。这样韩国一直要求日本方面采取措施改变这种严重不平衡状况，但日本一直不愿采取合作态度，故对日贸易赤字问题已成为双方贸易长期发展的一大障碍。这就是说，韩国曾依靠同美国、日本之间的密切经济关系，实现了从落

后的农业国向中等发达国家的转变。但在从中等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时，再指望美国、日本像六、七十年代那样给予多方支援和帮助是不再可能了。与此同时，随着韩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内工人工资迅速提高，南韩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已受到极大影响。因此，在八十年代，特别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韩国不得不进行贸易、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寻找新的进出口市场。由于经济上的需要，使其将眼光转向中国、苏联。韩国的“黄海经济圈”设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当然，上面所讲的原因只是韩国内部的原因、经济上的原因。“黄海经济圈”设想的提出，还有国际上的原因、政治方面的原因。进入七十年代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972年1月，尼克松总统访华，紧接着又访问了苏联；1972年中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样使政治、经济上以及军事上严重依赖美国、日本的韩国不能不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

1973年6月23日，朴正熙发表了《关于和平统一政策的总统特别声明》，宣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非敌视共产党国家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在政治与经济分离的原则下，可以发展各种经济关系。到八十年代，全斗焕政权上台以后，在发展和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方面，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姿态。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韩国一直在积极研究探索同中国发展经济、贸易关系。1985年2月，韩国经济人联合会提出了一份长达191页的综合研究报告，题为《中国经济的现状与展望》，表现出对发展同中国关系的积极性和迫切性。

从世界范围看，韩国西南海岸地区经济开放战略在宏观上更是迎接太平洋时代的需要。进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后，亚洲太平洋地区各国家工业步伐很快，经济实力不断加强，无论在国民生产总值还是对外贸易总量方面，在世界经济交往中都占有根重要的地位。尤其，日本、中国、韩国、台湾省、香港、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正日益对世界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由于国际贸易主义抬头，使区域经济向“区域一体化”、“地区集团化”趋势发展。诸如1989年1月美、加签定的“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生效，欧洲经济共同体也在1992年实现欧洲统一市场。显然，这种态度对

274 韩国以“出口主导型”为发展战略的国家来讲，无疑将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这样亚洲地区各国也对亚太经济合作提出各种方案，以适应太平洋时代到来的需要。如1966年6月亚洲太平洋协会成立，由韩国发起，9个国家和地区参加。1967年4月美、加、澳、新五国组成太平洋经济委员会，并召开首次会议。1977年12月，日本在“太平洋贸易发展会议”上提出《国际环境的变化和日本的对策——二十一世纪的赠言》为题的报告。第二年10月日本人又写了《太平洋世纪》一书。与此同时，日本学者提出“环黄海经济圈”的倡议，韩国学者提出“环黄海经济共同体”以及台湾学者提出“亚洲华人共同市场”等等。总之，韩国政府为了在保护主义日益加强这种态势下，解除对韩国出口商品的威胁，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并力图在西太平洋经济圈发挥主角的作用。同时，韩国也考虑国际分工在深化，各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在进一步调整，产品结构在进一步升级，由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转变。鉴于这种情况，韩国政府决定在西海岸地区开辟一个新兴工业地带，这不仅满足新的工业布局所提供场所的需要，而且是韩国进一步开拓新的世界市场的前哨基地。总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及南亚各国的广大西太平洋地区已形成世界经济

中心的雏形，可以预见到二十一世纪将是“太平洋时代”，因此韩国开发利用西南海岸地区，不仅适应新的挑战的需要，而且是全面发展韩国经济的一个重要机遇。机遇与挑战并存，必须果断决策，使经济走向一个新阶段。

2. 西南沿海开发与“黄海经济圈”

韩国的“黄海经济圈”设想，就本国方面而言，具体地落实在建立西海岸工业区的计划之上。

1986年，韩国国土开发院和内阁建设部制定的《国土综合开发方案》和重新划分工业部局的计划，一致提出要把九十年代，即二十一世纪之前的这段时间的经济建设重点转移到与中国隔海相望的韩国西南部沿海地带，即集中人力、物力，在西南海岸建立大规模的工业区，以迎接同中国进行大规模贸易的“西海岸时代”或说“黄海时代”的到来，形成一个有广阔前景的“黄海经济圈”。

韩国西南海岸地区系指忠清南道、忠清北道和全罗南道、全罗北道而言。韩国的西南海岸曲折多湾、岛屿星罗棋布。西南沿海包括浅水滩涂在内的大陆架面积达四十万平方公里，大大超过整个朝鲜半岛的陆地面积，很有开发潜力。而且，韩国西南海岸一带的寒流和暖流交汇之处，是良好的渔场。在历史上，韩国西南海岸一带是同中国进行贸易的活跃地区，有通往中国烟台、扬州等地的航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朝鲜分裂为二之后，西海岸一带的经济发展明显放慢，成为韩国最落后的地区。这种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直是南韩社会不稳定的原因之一。西南海岸一带的群众斗争时而爆发，其主要是全罗南北道地区的人民举行反对主要由庆尚南北道人组成的南韩统治集团（自朴正熙以来，几位总统都是庆尚道人，故南韩当局常被称为“庆尚道政权”）。在卢泰愚当选的第13届总统选举中，全罗南北道将选票大都投给了全罗南道出身的在野党——和平民主党候选人金大中，卢泰愚在全罗南北道得票寥寥无几。因此，卢泰愚上台以后，一再鼓吹“地区均衡发展”的政策。作为开发落后地区的西南海岸工业区计划，深得卢泰愚的支持。这也是西南海岸工业区计划得以诞生并迅速落实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海岸工业区计划的中心内容是在2001年以前，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韩国投资10万亿韩元（150亿美元），在南韩西南海岸一带兴建、扩建97个大工程项目。其中主要有：

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投资10970亿韩元，在全罗北道的群山、长项建设起一个覆地面积为3900万坪（1坪相当于0.8平方米）的大工业区，其中包括：工业群2000万坪、农耕地1400万坪、住宅群300万坪、旅游区200万坪。并在群山建设一个年吞吐量为4200万吨的大港口。

投资23620亿韩元，在忠清南道的牙山湾沿岸建设一个覆地面积为1900万坪的大工业区，将富川、九老等地区的几千家工厂迁到牙山工业区内，并计划新建一些电子、机械、汽车配件等工厂。在牙山工业区建成后，再将其与群山、木浦、始货等工业区连接起来，从而形成一个将韩国西南海岸地带都连在一起的大工业区。并在牙山港拓建一个与韩国第一大港——釜山港不相上下、年吞吐量为4800万吨的大港口。

投资10200亿韩元，建设连接仁川、发安、涡阳、礼山、长项、金堤、木浦直到顺天、光阳的长达505公里的环海高速公路。

投资9700亿韩元，在全罗北道万顷江和东律江下游围海造田4200公顷，年产粮食94.5万石，以成为新的粮食基地。

投资 458.8 亿韩元，修建光州、清州国际机场，并扩建木浦机场等等。除上述工业区外，西海岸工业区计划中还包括将建成仁川、始华、河南、熊川、大佛等沿海工业区，群山、长项及光阳湾的跨区工业区，以及连接全州、里里和并州的“T”字形大工业区等。最后，在西南沿海形成一个连接汉城、仁川、牙山、群山、木浦、始华的大工业区。

韩国当局公布了建设西海岸工业区的计划之后，立即得到各界人士的热切响应和支持。

在 1987 年进行的韩国第 13 届总统选举中，四个大党的总统候选人都把实现西海岸工业区计划，建设“黄海经济圈”作为自己的竞选纲领之一。民主正义党总统候选人卢泰愚在

1987 年 11 月 10 日发表了题为“为迎接新的西海岸时代的到来的开发战略”的演说，强调要同中国积极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第一大在野党——统一民主党候选人金泳三则在 1987 年 10 月 23 日发表演说，提出要建立“黄海经济合作区”，呼吁“属于同一文化圈的南北朝鲜、中国、台湾和香港要参加到这个经济合作地区中来”，并主张建立光州经济区，以作为同中

国发展经贸关系的“桥头堡”。第二大在野党——和平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金大中于 1987 年 10 月 18 日主张“把成立同中

国开展贸易的贸易代表机构作为最优先的任务”。第三大在野党——新民主共和党候选人金钟泌也宣称要同共产党国家改善关系等等。卢泰愚在就任总统后多次强调“实施西海岸开发计划是改善同中国关系的重要一环”。主张“立即开始韩中之

间的直接贸易”、“互设贸易代表处这样的机构”等等。

西海岸工业区计划不仅得到南朝鲜政治界人士的积极拥护和支持，而且得到经济界、企业界的热切响应。

南韩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会长具滋暻在 1988 年新年记者招待会上号召各民间经济团体进一步发展同中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为此，要通过同中国有贸易关系的企业和中国问题专家建立情报交流机构及贸易协商机构，对政府建立西海岸工业区予以大力合作。

大韩贸易振兴公社翻译出版了中国于 1987 年 9 月修改的进出口关税率法，于 1987 年和 1988 年举办了商品展览会和中国市场情况介绍会。还设立了专门负责同中国进行贸易洽谈的机构等。

韩国贸易协会则努力研究同中国之间改间接贸易为直接贸易的经济效果，寻求同中国进行直接贸易的途径。同时，该贸易协会将专门负责同中国进行贸易的、由 30 家贸易业工作人员组成的“对中共贸易评论会”成员升格为正式职员。大韩工商会议所也通过其下属的研究机构——韩国经济研究中心加强对中国的研究。此外，大韩商事仲裁院等法律机关为了防止和解决韩国同中国贸易中出现的纠纷，正积极认真地研究中国的仲裁制度和有关法律。而为数众多的大企业集团和中小企业则纷纷通过各种渠道直接来中国，进行贸易方面的洽谈、访问、考察和调研。总之，伴随西海岸工业区计划的公布，在韩国出现了从上到下，从官方到民间的前所未有的“中国热”。

为了总揽和协调西海岸工业区计划的落实，韩国于 1988 年 4 月建立了西海岸开发促进委员会。该委员会由韩国国务总理任委员长，成员有经济企划

院、内务部、财务部、农村水产部、商工部、动力能源部、建设部、交通部以及科技处、政务第一长官等内阁经济各部长官和环境厅长、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国土开发研究院院长等 20 人。

1988 年 10 月 7 日 西海岸开发促进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 确定了 1989 年西海岸开发计划项目，即新建、续建工程 71 项，投资为 6347 亿韩元，并决定 1990 年开始动工建设覆地面积为 50 万坪的青阳尖端产业群。并在设立地区开发基金，以弥补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决定采取多种筹资形式。除政府投资外，还准备大量吸收民间资金，同时对于那些对地区开发波及效果大的事业将采用公营开发的方式。1988 年 10 月 28 日，韩国还成立了“国际民间经济协议会”。该协议由企业、研究机关的 264 名正式会员和特别会员组成。其中有现代、三星、乐喜金星、大宗、鲜京、双龙等韩国最大的一些企业集团的会长，协议会由前任内阁副总理兼经济企划院长官李汉彬任会长。该协议会的宗旨是：促进、支援和协助同未建交的国家进行经济交流，强调“对北方的经济交流，由于对象国坚持计划经济体制，国内企业虽然也可以自由地进行，但必须使这种交流有系统、有秩序地进行，要避免再次出现以前在打入中东地区时所经历的过分竞争和盲目进入而导致的失败。”韩国民间经济协议会的建立，对于推动西海岸工业区计划的落实和发展同中国的贸易关系有重要意义。

总而言之，韩国的西海岸工业区计划即建立“黄海经济圈”的设想，正在有条不紊地落实和进行着。可以说，黄海经济圈的设想，已经不再是一种设想，而是一项正在付诸实施的宏伟事业了。

韩国经济在世纪之交，为了造就二次腾飞，跨入二十一世纪而努力着，努力着……

三、二次腾飞新起点

六、七十年代的经济腾飞，80年代的高速增长，增强了韩国成长为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信心。1986年，韩国开发研究院根据韩国总统的指示和经济企划院的委托，提交了题为《面向2000年的国家长期构想》的综合报告。该报告预测，如果在未来14年时间里，韩国的经济保持7%的增长率的话，那么，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达2500亿美元，居世界第15位。进出口总额将达到1823亿美元，进入世界前10位以内；1994年将由“资本引进国”变为“资本输出国”，在90年代内成为债权国。届时产业结构将进一步向“先进工业国”的产业形态转变。在此基础上，城市居民的生活将更加富足、安定，中产阶级比率进一步扩大；农村地区将实现现代化；居住条件大为改善，平均寿命延长；交通高度发达，电话通信网遍及全国；教育持续发展，进入高学历社会，国民意识呈现多样化和现代化。韩国将跨入工业发达国家之列，成为亚洲的“第二个日本”。

然而从80年代韩国的经济实际增长来看，《面向2000年的国家长期发展构想》确定的指标是明显偏低的。所以韩国于1986年制定的1987—1991年“六五”计划于1987年9月根据实际发展状况进行了第一次调整，1988年7月，根据经常收支盈余剧增的发展形势又进行了第二次调整。按修改善后指标，1991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已接近2000年的水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91年已超过报告确定的5000美元的水平。

在经济增长的同时，韩国政府一直十分重视国土开发，因为国土的适时适度开发是紧紧同经济相联的，是同韩国现代化的进程相联的。“第一次国土开发计划”重点在于开发资源，加强基础产业部门的建设，调整产业布局，使农村和城市得到均衡发展。七十年代的国土开发有力地促进了其经济的腾飞。进入80年代后，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一些问题越来越突出，如人口和企业过分集中于大城市，农村人口减少；发达与落后地区差异扩大；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综合治理。为此，于1987年制订了“第二次国土综合开发计划”，并适时进行了修订。该计划的实施，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对韩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生活的改善起了积极的作用。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经济的国际竞争加剧，韩国经济的发展面临二次腾飞，为了寻求经济积累与消费的平衡，1991年3月12日，国土开发研究院举行了制定第三次国土综合开发计划政策讨论会，公开发表了《第三次国土综合开发计划试行方案》的内容。计划的基本原则是消除国土计划中悬而未决的问题，集中对地方培植，谋求国土均衡发展；顺应新时代要求，确立开放性、效率性国土利用体系；逐步奠定国土统一的基础。计划的基本目标和战略：培养地方，抑制首都圈的集中；促进产业尖端化，形成新的产业基地；建立综合性高速交通网；扩大对国民生活与环境部门的投资，并使其制度化；加强国土计划的执行；开发、管理趋于统一的南北交流地区，等等。

为了实现2000年韩国跨入先进国家行列，政府正采取一系列推进措施，从而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

首先加快发展高科技产业。进入80年代以来，韩国一方面为了应付劳动力成本的日益上升和韩元的不断升值，增加其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为了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想方设法使其劳动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发展，从世界廉价品市场步入高级品市场，正在加快发展高科技产业增强

自身的科研与创新能力，以便到世纪末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其技术水准的拥有量与发达国家一比高低。韩国研究院发表的《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报告说：韩国将通过技术开发和产业调整，实现产业的升级，以微电子、新材料、生物工程等尖端技术产业为基础，以机械、电子和汽车工业为先导，来开发21世纪的未来产业。为此当局增加投资，加速培养科技人才，减免税收等。

二是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韩国从美国和日本大量接受电气及电子、汽车、机械等行业的直接投资，目的在于引进美、日的先进技术，并把这些行业培植成战略产业。韩国通过与美、日合作而引进技术，扩大生产和出口，并能促进关连产业的发展，从而使韩国成为世界电气、电子及汽车产品的主要出口地区。

其三是实现贸易伙伴多元化。长期以来，韩国的出口贸易一直以美国为中心，再加上对日本的出口。美日成了韩国的最大出口市场。进入90年代以来，韩国正采取措施扩大贸易伙伴，首先发展同四小龙之间的贸易；更令人注目的是韩国敢于打破禁区、着力推行“北方”政策，发展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关系及政治经济关系。

其四是加强海外投资。进入80年代后，加快海外直接投资和资本输出的步伐已经是韩国经济腾飞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了。1988年韩国制定并实施“海外投资方针”，从而导致了投资的迅速增加。目前，韩国海外投资的基本战略是：大公司和中小企业兵分两路。大公司大多向美、德、法、英、葡萄牙等发达国家投资，中小企业越来越多地把它们的生产迁往东南亚各国，前者是为了回避贸易摩擦，后者是为了开辟新市场。

如上所述，韩国正准备通过六个方面的转变，来实现经济上的新飞跃。当然，要真正达到跻身于世界先进国家的目标，困难是存在的，尚需做出巨大的努力。事实上，进入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愈来愈大，以前未曾预料的问题冒了出来，对于韩国这样一个在特殊国际国内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经济，其面临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可以说，对韩国目前的经济状况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困难与成功同在，关键就要看韩国人如何迈出这一步，坚持走下去，直至成功。

四、岔路口上的新韩国

1993年的春天来了，虽然汉城地处相对高纬的北方，但初春的汉城显出了其勃勃生机。2月25日，金泳三正式就任韩国第14届总统。青瓦台的这位新主人在竞选时曾许诺要当“经济总统”，雄心勃勃地要推动韩国经济来一个质的飞跃。韩国人陶醉在“建立新韩国”、“在稳定中推进改革”、“清廉的政治、强有力的政府”等新一届政治中心的口号中，但在经济上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走出低谷，必须实现经济转型，时移势易，韩国经济要造就二次崛起。金泳三为韩国经济开出药方。

1. 前堵后追面临压力

60年代，韩国抓住发达国家调整产业结构的有利时机，由政府主导实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由此，“先工后农”、“先增长后分配”、“出口第一主义”等相继出台。政府扶植大企业，大力发展出口加工工业，带动其它产业的发展，从而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80年代世界银行将韩国列入中上等收入国家，韩国被人们誉为“亚洲四小龙”中最大的一条龙。

进入80年代以后，国际经济环境和韩国国内的经济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高速发展所掩盖的矛盾渐渐暴露出来。

由于近年来世界经济衰退，发达国家市场萎缩，致使韩国的出口增长明显放慢，经济增长率进入90年代后也随之下滑，1992年第三季度韩国的经济增长率只有3.1%，是11年来最低的。而且韩国对美巨大贸易顺差引起美国强烈不满，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韩元被迫升值，加上国内工资上涨，使韩国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受到很大的挑战。

在国内，过去许多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已不能适应形势变化，甚至成为经济发展的结石。“先工后农”导致了两大产业的失调；“出口第一主义”造成了出口产业和内需产业的不平衡；对大企业的扶植不仅导致经济力量的过分集中，而且企业缺乏竞争力；“先增长后分配”则加剧了贫富不均。与此同时，亚洲其它国家尤其是东盟各国正在迅速赶上来。

韩国前临发达国家深院高墙的贸易壁垒，后有东盟紧紧追赶，国内的矛盾又来纠缠，使其经济的增长和国际竞争力面临着巨大挑战，必须以新思想大手笔重新振兴韩国。

2. 根子在七个方面的转变

金泳三严肃地指出，韩国经济正处于“危机状态”，“岔路口上的韩国经济是龙还是蝼蚁”？金泳三认为，“过去30年促进韩国经济增长的药方再也不能发挥效力了”，“需要有一崭新的灵丹妙药”，从数量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质量型经济发展模式。概言之，金泳三主张：对外提高国际竞争力，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对内进行改革，逐步克服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矛盾。其设想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向小政府过渡，从政府主导型经济过渡到市场主导型经济。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和管理改为制订公正的社会规章制度，进行间接管理，促进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只对那些民间难以承担的基础设施和环保等部门加强政府的作用。

大力增加科技投资。据统计，韩国的技术水平只相当于日本的5%，美国的1%。因此韩国必须增加科技投资，迎头赶上。政府要给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提供资金支援并创造良好的环境进行科学研究，并在金融和税收方面给研究开发以优惠政策。

实现所谓“经济正义”。韩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但庶民百姓对分配却不满。因此必须缩小贫富差别以调动广大民众的积极性。当务之急是杜绝房地产投机，为此要实行金融实名制，改革现行税收制度。

大力发展农业。由于长期实行“先工后农”政策，农业相对落后，弃农人口不断增加，农业劳动力严重缺乏，有的地方甚至变成了“老人村”。克服这个危机的出路是搞一次“农业革命”。首先要加强农业技术的开发，实现农田的规模化，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开发高附加值的农产品，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

结束“汉城共和国”时代。韩国人口的1/4即1000万人密集于汉城，经济活动也大都集中在此，造成了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今后要通过行政手段严格控制汉城人口的增加，同时改善地方的生产、生活环境，谋求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

大力扶植中小企业。在政府主导、大企业为主、增长第一主义的经济思想指导下，韩国的中小企业一直不受重视，发展受到很大限制。目前韩国中小企业的雇佣人数占就业总数的60%，中小企业产品的出口占韩国出口总额的45%。要想重振经济，就必须大力扶植中小企业，在资金、人力、技术等各方面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提高其竞争力。

加速产业结构调整，鼓励企业到国外投资。由于韩元升值和工资上涨等原因，韩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应尽快转移到低工资区。通过企业的对外投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扩大对外贸易。

由上所述可见，韩国经济的转型将是艰巨的，而且需要时间。金泳三强调，“搞好经济建设，需要所有与经济有关的人们的通力合作和共同努力”，并表示他在前面跑，号召大家一起奔跑。金泳三提出，两年内使物价上涨率降至3%，对外贸易顺差，经济增长率要保持在7—8%，在任期内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5000美元。

1992年12月23日金泳三在当选总统后举行的一次记者晚餐会上说：“现在是经济战争时代”。可见他对韩国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用金泳三本人的话说，韩国“全体国民、企业家和政府应该从现在起团结一致搞活经济。”

从政治上看，金泳三就任韩国总统，结束了韩国自1961年以来长达32年的军人执政历史，开创了文人执政的新时代。金泳三在其《开创二十一世纪的新韩国》这部纲领性的著作中，详细地阐述了建设新韩国的思想——“我所追求的新韩国，是一个自由和平等共存的社会”，“要实行透明政治”“让国民清楚地看到政治家们议论的过程”。只有政治透明，才能防止腐败滋生，保持政权廉洁。

金泳三说到做到，在他宣誓就任总统的翌日，即1993年2月26日，组成了以黄寅性为总理的新内阁——“文民政府”：在25位内阁成员中，除国防部长官和报勋处长是军人出身者外，其他成员均是民间人士，这与历届内阁中军人出身者众多的情形大相径庭；在民间人士的内阁成员中，有5名教授、学者，2名律师以及一些有改革倾向的国会议员、公务员，基本上排除了那些职业官僚、政客；在新内阁中，执政的民主自由党人士8名，不到内阁成员总数的1/3，反映出各党派人士公平参政、量才录用，这是以往历届政府所不曾有的；从内阁成员的地区出身看，各道出身大体均衡，改变了历届政府成员中多出自庆尚南北道的状况；新内阁起用了3名女阁员是历届政府所没有的。这是金泳三将其所阐述的新韩国论付诸实践的第一步。

第二步便集中在国民关心的焦点上：清除腐败。1993年2月27日举行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金泳三说：“如果我们自己不进行自身的改革，就不可能要求国民发生变化和改革。”“国务委员要铲除私心，率先垂范，进行自身的改革和蜕化”。他当场公布了自己与夫人孙命顺、父亲金洪祚及两个儿子的包括不动产、汽车、游船等在内的全部财产，共17.8亿韩元（约合225万美元）。在他的带领和号召下，到3月6日，国务总理黄寅性、监查院长李会昌等都公布了个人财产。之后24位内阁部长、以及其它29位部长级官员和高级官员都公布了个人及直系亲属的财产。在政府高级官员纷纷公布个人财产的同时，各政党、国会等领导人也相继公布个人及直系亲属的财产状况，最高委员4人，国会议员及民自党党务委员161人以及副部长级人士，各市、道知事，市、道检察长以及各级次长等125人，都先后公布了个人和直系亲属的财产状况。在这种形势下，第一大在野党——民主党国会议员和党务委员104人、国民党国会议员13人和无党派国会议员7人于4月5日公布了与自己有关的财产状况。这样，在韩国出现了以各界高级官员竞相公布私人财产为标志的廉政运动。与此同时，内阁总务部修改《公职人员伦理法》，国会通过了《公职者财产登记制度》，使政府的廉政建设法制化。这样，由韩国总统带头的肃贪倡廉风暴，正在荡涤韩国多年的弊端、恶习、非法行为，在这股风暴冲击下，一系列营私舞弊者被揭露出来。

金泳三的文民政府就职不到一个星期，新内阁的法务部长官、在金泳三竞选总统时担任发言人的朴喜太，就因被揭发出将其女儿编造旅美韩侨身份，非法进入韩国女子最高学府——梨花女子大学而不得不辞去法务部长官职务。保健社会部长官、医生出身的朴娘实，建设部长官、教授出身的许在荣等亦同被揭发出毁损保护区建私房，非法从事不动产投机等，使金泳三总统不得不于3月8日改组了内阁。

随着公布个人及直系亲属财产所发生的问题受到冲击被整肃者更是大有人在。年逾古稀、素有韩国政坛不倒翁之称的前国会议长金在淳，曾是为金泳三摇羽毛扇的人物。在肃贪倡廉运动中，他因被揭发出非法占用城市绿地保护区，其夫人非法收购市郊农田，从事不动产投机，不得不辞去民自党内一切职务，退出政界。韩国现任国会议长朴浚圭，是自朴正熙政府以来，就在韩国政坛上声名显赫的元老，在这次公布个人财产中，因被发现隐瞒财产细目、虚报财产金额等不法行为，辞去国会议长、国会议员职务，直至退出民自党。此外，民自党国会国防委员长俞学圣、国会内务委会长徐廷和等十几名国会议员也因在公布个人财产过程中弄虚作假，有的被劝辞去国会议员职务，有的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有的被撤销在党内、国会内的职务，等等，论罪受罚，无一幸免。

从金泳三总统宣誓就职的2月25日至5月中旬的百日之内，因公布个人财产中的问题及其他不法行为而被整肃或革职的高级官员就达千人之多，真是声势浩大，所向披靡。足见金泳三总统的肃贪倡廉之举决非虚声恫吓，也不是沽名钓誉，而是一场扎扎实实的政治改革。

在肃贪倡廉运动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金泳三对韩国军队的改革与整顿。众所周知，自1961年朴正熙发动“五·一六”军事政变执政以来，韩国历届政府都同军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几任总统都是军人出身。而金泳三作为同军队无瓜葛的文官总统，要推行自己的大胆改革计划，不掌握军队就无成功可言。因此，金泳三上任伊始，就着手对军队进行改革与整肃。

第一步是将历来由军队掌握的、炙手可热的总统警护室改由警察部门负责，从而摆脱了军队对总统的直接控制。并任命一位学者出任国家安全企划部长，同时规定该部的职能只是从事朝鲜和海外情报收集等工作，不许干预内部事务。

第二步是金泳三于3月8日以闪电方式撤换了陆军参谋总长金永振上将和机务司令徐完秀中将，任命与前政权无关系的金东镇上将和金渡润中将分别接替之。在解决了这两个人之后，金泳三又于4月初以同样方式突然撤换了首都防卫司令和特种战斗部队司令。金泳三清醒地意识到将这两支部队掌握在自己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三步撤换了与1979年全斗焕发动“双十二政变”的有关军界要人。5月底，金泳三下令与“双十二政变”有牵连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李弼燮上将、第二集团军司令金镇演上将、第二集团军副司令安秉浩中将、以及师长朴琮圭少将等4人转入预备役。任命与“双十二政变”无关的李养镇上将接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在金泳三总统就职的四个月内，对军队进行了全面整顿，韩国国防部的8位最高级官员被撤换了5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11位最高级官员被撤换了9人，国防部情报部门的10位最高级官员被撤换了3人。在韩国军队中，陆军的14位最高级官员被撤换了11人，还撤换了3个集团军的正副司令，11位军长中的5人、22个步兵师长中的9人，以及后勤、训练和国防安全部门的首脑。在各军种中，海军的11位最高级官员被撤换7人、空军10位最高级官员被撤换了4人。此次整肃军队涉及面之广、人员之多，是韩国建军以来从未有过的。

金泳三还借肃贪倡廉运动之机，对军界的一些前头面人物进行整肃。4月25日，前海军陆战队司令赵基烨中将因参与行贿受贿事件被当局逮捕。于是，将此事有牵连的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师长李载敦少将等5名海军高级将领被逮捕，海军士官学校校长简容泰等4名中将被勒令退出现役。

海军中的行贿受贿事件曝光后，金泳三总统下令国防部长官权宁海在对金钟浩任职期间，晋升为上校的129名军官进行逐个调查的同时，对韩国陆、海、空三军中的贪污、行贿受贿等案件进行全面、彻底的清查。4月30日，揭发出前空军参谋总长郑用厚受贿，于是，与该事件有关的5名准将级军官被捕。

随着海军和空军曝光出行贿受贿丑闻，陆军中两大案件被揭发，使人们看到如同海军和空军一样，韩国陆军也非一片净土。第一件是揭发出韩国陆军中有一个非法组织“陆军士官学校一心委员会”。金泳三总统对此组织采取了断然措施，强令部分成员退役，并免除部分成员职务，还将部分成员调离首都，到三八线附近部队任职。第二件是4月27日揭发出的“栗谷军火非法交易事件”，即指1974年朴正熙总统为建立“自立国防”而制定的武器及装备现代化计划，鉴于朝鲜李朝时代大哲学家李珣提出的“养兵十万”的强兵政策，将这项计划以李珣的号命名为“栗谷”。韩国军队内的一些高级将领正是以这一增强军队装备的“栗谷计划”为名，趁进口各种战斗机及其它军事设备之机，出卖国家利益，为外国军火商提供种种方便，大肆贪污受贿、营私舞弊。

经查实，在“栗谷计划”中，前国防部长官李相薰受贿1.5亿韩元，前陆军参谋总长李钟九受贿7.8亿韩元，前海军参谋长金钟浩受贿6700万韩

元，现任海军总参总长金铁宇受贿 3 亿韩元，前空军参谋总长周爽、金受贿 3.3 亿韩元等等。7 月 17 日，韩国警方以“以权谋私和受贿罪”逮捕了李相薰、李钟九、韩周爽、金铁宇 4 名上将军官，震惊朝野。

金泳三总统率先开展起来的廉政运动，正以磅礴之势，深入发展。他果断地精简了政府和执政党的领导机构，将青瓦台的官员裁减 20%，将民自党中央的官员裁减 46%，并将军中超编将领裁掉。这场政治改革并非按照总统一人的好恶，而是紧紧依靠法律。金泳三说：“不能像过去那样，将清除不正当腐败当作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清除腐败始终要依靠法律和民主程序”。这场改革运动取得了民间支持，新闻媒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舆论攻势强大，旗帜鲜明。据《韩国日报》在金泳三就职一个月后进行的调查显示，国民对于金泳三总统的国政运营期待值表示肯定的高达 88.7%。

但是勿庸讳言，金泳三倡导的政治改革和肃贪倡廉运动的道路并不平坦，他面对着层层阻力和重重困难。这种阻力不仅来自执政集团内部，军界也对这场运动侧目而视以观动静，企业界的实力派——企业集团在“新经济政策”中也受到打击，产生了抵制情绪……面对这些阻力和困难，总统表示：“清除不正腐败，是新政府的首要任务，决不能半途而废或放慢速度”。由目前看来，这场运动已初见成效，可谓开创了韩国廉政史上的先河。

无论怎样，进入九十年代中期的韩国在经济振兴、政治改革、消除腐败、走向民主方面迈进了一大步。新韩国的政治经济目标是：到 2000 年跨入发达国家，政治上实行民主，经济上成为强国。

这一理想已深入韩国民众之中，在目前的国内国际形势下，韩国人清醒地认识到民主、富强应是韩国的前途，为此，他们又表现出了东方文化熏陶下特有的民族主义性格——团结奋斗，促进民主政治的进步和韩国经济的再腾飞。

现任韩国总统在他的新施政纲领中写道：

如今传来

开辟新世界的声音。

新的世纪，新的社会，新的哲学，新的文明在蕴育。如今历史要求我们变化，由我们自己去改变我们自身。

新世纪的太阳正在从东方升起，韩国人正以极大的热情和努力迎接 21 世纪！

主编后记

读者朋友们，当您步入中华文明那金碧辉煌的千年古殿时，您一定会梦回秦时月、汉时关，感慨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但当您蓦然回首，放眼世界之际，你会在猛醒后看见，一个个优秀民族正巍然挺立于五洲之上，以强劲的生产力创造着崭新的现代文明和人间奇迹。这时，您不禁惊叹：我们要向世界学习！

向世界学习，这正是《环球人类文明探秘》丛书的要旨。

也许您会问，我们为什么要编著这套丛书呢？这还要从一个故事说起。清末年间，一个法国传教士来到中国考察，他走遍了中国的乡村，看到的全是衣衫褴褛、神情憨厚、无知无识的国人，他极为失望地说：“中国没有文化！”后来，法国传教士来到京城，受到文人雅士的热情款待。当他走进朱廊画壁、匾额高悬、古色古香的豪华餐厅，品尝着精美绝伦、丰盛无比的中国菜肴，听着士大夫们引经据典、妙语连珠般的高谈阔论，他又感叹：“中国太有文化了！”这个故事看似平凡，却寓意深刻。它说明，一方面，中国的文化教育在一个小圈子里高度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化教育没有普及开来，广大民众的文化素质得不到提高。可见，中国的文化分配是极不平衡的，这种二元文化结构至今也没有改变。在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世界，民族素质决定一切。如果我们的文化教育还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发展，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得不到普遍提高，中国是很难真正强大起来的。

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做一点实事，这正是我们编著这套丛书的目的。

我们是学子，不是先知，但沉甸甸的民族责任心告诉我们，经世致用是学问的根本。用我们所学的知识向社会推出适应不同层次需要的有益读物，这也是我们的时代责任。

这套丛书承蒙学界泰斗、东方学大师季羨林先生欣然题词，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及丛书编辑部主任吴振录老师的大力帮助，特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这些青年学子，初出茅庐，可谓鹰隼试翼，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乞读者见谅。

张 晓

